

# 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

陈云



中央文献出版社

## 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雲

勒住“脱僵野马”，实现经济  
统一，让资本家佩服，毛泽东  
称之曰“能”

## 未雨绸缪，毛泽东、周恩来西柏坡点将

1949年初，严冬尚未退尽，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却早已春意盎然。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相继告捷，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主力部队已基本被歼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根本上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全国胜利，“已经是不要很长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的事情。”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几大巨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汇集西柏坡，开始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描绘蓝图。

胜利来的似乎太匆忙了，领袖们不得不对一些过去没有来得及仔细思考的问题迅速作出决策。不过，此时令领袖们费神的已不再是军事问题了。国民党仅存的100多万残兵败将分布在从新疆到海南的广阔地区，这对于久经考验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来说，已经不成对手。令领袖们大伤脑筋的，是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而来的严峻的经济形势。

尽管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我们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但我们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长年的战乱，使得本就不发达的中国疲惫不堪，民不聊生，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而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正如“脱缰野马”，难以控制，使经济形势更加混乱不堪。

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内战的需要，军费开支日益增多，财

政赤字越来越大，为弥补巨额赤字，国民党政府动员上海等地的印钞厂赶印纸币，仍不敷用，以至要到美国、英国去印刷钞票。国民党统治区1947年的法币发行量达30多万亿元，为1946年法币发行量的10倍，比1945年抗战结束时增加25倍。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如以抗战前的物价为标准，到1947年7月就上涨6万倍。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电讯发表一材料，这个材料虽有嘲讽的性质，但很说明问题。材料说：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2头牛，1938年为1头牛，1941年为1口猪，1943年为1只鸡，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1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了。

在全国工农业生产遭受极为严重破坏、物价飞涨的同时，五百几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由于前进迅速，战线延长，开支日益浩大，在广大的新解放区，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大批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加上这些人，全国约有900万军政人员的生活需要我们党想办法安排，这在经济上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也就使得我们在财政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当时部队作战费和脱产人员生活费，很大部分不得不靠发行钞票来解决。人民币的发行额，从1948年开始，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增加，这就使得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稳定，新生的政权也必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后来，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名句，曾被反复背诵和引用，但此刻真正理解毛泽东心境的人恐怕并不很多。自古道：创业容易，守业难。我们可以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夺取全国政权，但要巩固这一政权，则必须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的生活能有所改善。

1949年初，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艾奇逊

在信中说：“中国人口在 18、19 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艾奇逊的这些话，作为中国革命的起因受到了毛泽东的有力批驳，但毛泽东在批判的同时，肯定也注意到了其中的某些道理，那就是经济问题、吃饭问题是每一个政府都必须首先予以关注的问题。

因此，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城市工作时，毫不含糊地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不会站得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看到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真正要收拾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恢复经济，谈何容易。这里，领袖们首先碰到的就是人才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们党内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指挥人才，但懂经济的却少得可怜。因此，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中共虽然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肯定管不好经济。美国人也认为，中共解决不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国内的资产阶级则说的更明确。上海一个著名的资本家就曾说过：“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 0 分。”这些虽然都言过其实，有瞧不起我们这些“土包子”意思，但我们自身的状况也的确不容乐观。

长期的农村环境，使我们的官兵沾染了不少小农习气，一些基层干部，甚至一些相当级别的干部，不但不懂得经济，而且经常做出破坏经济发展的事情。尤其是进城以后。

电影《风雨下钟山》中曾有这样一个镜头：占领南京总统府后，许多战士把总统府的地毯割下来分成小块给自己做毯子用。这样的现象在当时并不罕见，华北解放初期，这种现象就曾非常严重。如在接收井陘、阳泉等工业区时，就有许多干部、战士乱抢物资，乱砸机器。占领石家庄时虽有一些改进，但仍有不少士兵跑到城里拿东西，有些干部、战士不但自己拿，还鼓励老百姓去拿。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就抢私人财物。大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味道。华东都解放几个月了，一些城市仍然秩序混乱，正常的生产无法进行。连陈毅这样的高级干部也不得不慨叹：最头痛的就是接管城市，恢复经济。

类似的报告从全国各地不断飞往党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领袖们开始迫切地感觉到当务之急必须首先物色一位懂经济的帅才，统帅全国的经济工作，以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似乎比其他领袖更早、更具体。他更多的是从组阁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的。因为这时党中央已经决定周恩来将作为新政府的总理，主持政府的工作。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明确指出：周恩来一定要参加政府的工作，其性质是内阁总理。其实，在此之前，早在延安时期，周恩来就已经开始设想将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做总理工作的情况。也许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开始物色各种人选了。

当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还在为寻找一位经济帅才而挖空心思时，周恩来对这一问题早已胸有成竹。七届二中全会之前，周恩来果断地向毛泽东提出：调陈云回中央主持财经工作。

周恩来向中央举荐陈云决非偶然，他对陈云的了解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时期就开始了。当时，陈云在上海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为中央的活动筹集经费，他出色的经营受到了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表扬。这时，周恩来就注意到了这个地道的工人阶级出身，有经营头脑的年轻人。

后来，顾顺章叛变，陈云又协助周恩来妥善处理了善后事宜。这期间，陈云的果断和干练也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周恩来与陈云接触越来越多，对陈云的了解也更加深刻。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云被派往东北。东北解放战争胜利以后，陈云在财经方面的特殊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他的领导下，我们顺利地接管了东北各大城市，东北的经济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到1948年，陈云已经开始考虑在苏联的帮助下拟定东北经济建设的计划。这一时期，陈云善于理财的本领再次受到周恩来的特别关注。周恩来开始就全国财经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征询陈云的意见。1949年初，周恩来即派当时中央财政经济部的秘书长薛暮桥就全国货币发行方面一些问题向陈云征询意见。可见，这时在周恩来的心目中，陈云作为将来内阁中经济工作主帅的地位已经确定了。

毛泽东认识陈云比周恩来要晚，但至少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对陈云已经有了较深的印象。遵义会议上，陈云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之一。遵义会议后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决定让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回上海重新组建上海党组织，并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陈云是非常信任的。延安时期，特别是陈云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时所表现出的经济才能，也肯定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后来，陈云在东北财经工作中的表现，毛泽东更是特别欣赏。1948年陈云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将它批发给全党学习。毛泽东关于“原封原样接收”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吸收了陈云的做法。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不但赞同陈云关于接收城市的意见，还提议东北局将陈云组织的接管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南下接管大城市之用；同时，从沈阳接管人员中抽调二三十个得力骨干给黄克诚同志，前往天津参加接管工作。正因如此，周恩来的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

方案已定，2月6日毛泽东致电东北方面：请陈云来中央一叙。

几天之后，陈云一路风尘，赶赴西柏坡。

在西柏坡，陈云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作彻夜长谈。通过当面交换意见，陈云回中央主持财经工作最后拍板。

## 责无旁贷，组建中财委，九爷府元帅升帐

西柏坡之行，非常短暂，但对陈云来说并不轻松。毛泽东和党中央把统帅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任交到他的肩上，显然是对他的信任，但这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用句老话说，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陈云深知这副担子的分量。不过，从这一决策拍板的过程看，陈云似乎并未推辞甚至谦让。在西柏坡，陈云连来带去只呆了两天，确切地说是一天多一点。除去老战友之间的寒暄和汇报其他工作的时间，这一决策拍板的过程是非常短的，可以说是一拍即台。这一方面说明陈云有服从党的分配的觉悟，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陈云的确是这一角色的不二人选，在他看来，这一工作责无旁贷。

对于经济工作，陈云有着一种特殊的兴趣和才能，这也许与他的经历不无关系。

陈云出生在江苏青浦县的一小镇，自幼父母双亡，靠舅舅抚养长大。舅家开有一个小饭铺，由于人手不足，陈云自小便经常帮舅舅料理小饭铺的生意，耳濡目染，慢慢懂得了一些记帐的方法和经营技巧。

15岁左右，由于家境贫困，舅舅无法继续供陈云上学，后经人介绍，陈云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学徒。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比较有名的企业，管理非常严格。在这里陈云学到了许多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例如，他熟练的算盘技巧，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练就的。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有旧学渊源的人并不少，擅长书法的也大有人在，但懂得珠算，能熟练使用算盘的并不多，陈云却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那个计算机尚未发明的时代，懂得珠算，能熟练地使用算盘，在经营管理方面无疑是一大优势。在陈云身边工作过的许多人都知道，建国初期，主持中财委工作时期，陈云同志的办公室里经常可以听见噼噼啪啪的算盘声，正是在这噼噼啪啪的算盘声中，一组组重要数据被核实，从而为一项项重大决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据说，后来赵朴初先生曾目睹陈云打算盘的镜头，惊叹之余，还曾赋诗一首。这是后话。不过，这说明，陈云在经营管理和财经方面的确有着过硬的基本功。

另外，旧中国虽然落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但旧时的上海却号称“十里洋场”。这里受西方世界的影响较早、较大，很有现代城市的味道，经济运行中各种规律性的东西在这里表现的比较充分。陈云在学徒期间对这些东西接触较多，也有了较深的认识。这些都对陈云后来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70年代，陈云在谈到国际信贷问题时还指出：“这和过去上海、天津那些银行、钱庄一样，看到哪家生意做好了，就找上门来了，无非是要些利润。”）

陈云的这些经历，使他对经济工作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并从此与经济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前所述，在踏上革命征途之初，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时期，陈云即利用自己的特长，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为党中央的活动筹集经费。进入苏区后，虽然他分管的是工会工作，但他仍从自己的工作岗位出发，密切注视着苏区的经济工作。这一时期，他写的《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怎样订立劳动合同》等文章，都是相当有见地的。尽管由于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不高，这些文章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的确是经济工作的行

家里手。

延安时期，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党的建设上，兼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的时间很短，但就在这极短时间内，他的经济才干也得到了充分显示。这一时期他提出的一些观点纠正了党内对经济工作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对许多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 1945 年 2 月，他针对我们财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提出了做财经工作的几条基本原则：

一、要做“掌柜”，不要做出纳。“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

二、“先小人后君子”。“要说老实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先小人后君子’，在同志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不该给的东西，一定不含糊；许可了的东西，则大体不能变更，空头支票不要开。”

三、“豆腐里挑出骨头来”。“检查要严格。俗话说‘豆腐里挑出骨头来，要仔细核算。穷会使工作被动。但是有了东西不仔细核算，人家要什么就给什么，工作也会变成被动。因为要求是无止境的，你放得宽些，人家就要得多，来得勤。总之，在算帐时，项项都必须看一看，虽然形式上好像是找岔子，其实这才是负责的态度。这是对革命负责。”

实际上，直到今天，这些原则也仍然是做财经工作的人所必须遵循的。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各大城市的接管非常顺利，经济恢复也比较快，这些都与陈云出色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早在 1948 年 8 月，三大战役结束之前，陈云就提出：“我们已觉悟到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在那个时期就把财经工作的重要性提到如此高度，这在中央领导人中是比较早的。可见，在经济问题上，陈云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

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当时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决策的果断和陈三对待这项工作责无旁贷的态度。

党中央决定由陈云来做经济工作的主帅，的确是人尽其才。事隔几十年后，薄一波在他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仍然指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决定建立统一的财经领导机构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着是从东北调回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他为中财委主任，是再合适不过了。”

由于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已非常紧迫，陈云受命之后，甚至连即将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都未及参加，即匆忙折返东北，准备交接东北的工作，走马上任。

然而，东北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一时不可能交接完毕。东北解放较早，土地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好，又靠近苏联，这对东北的经济发展都是极有利的条件。而且，当时，中央也已确定了“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的方针，陈云也想在离开东北以前，尽量多了解一些东北的情况，为东北经济的发展制定一个好的计划，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因此，利用这段时间，陈云几乎走遍了东北的各大城市和工厂，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他领导东北财委开始制定 1950 年东北经济发展的计划。

这边，东北的工作，陈云一时无法脱手。但另一边，中央的经济工作却不能“一日无主”了。

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全



国的财经工作。3月14日，周恩来在他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经济及后勤工作的决定》（草案）中再次指出：中央应立即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

4月10日，中央致电东北局：陈云应速来中央工作。

4月30日，周恩来又电示东北局，希望陈云及早动身进京。

5月3日，陈云致电中央：由于正向东北局报告今年东北经济计划，东北局今日起讨论，故5月10日前可到北平。

此后，中央又一次来电催促。

在中央的再三催促下，陈云不得不迅速结束了在东北的工作。5月7日，陈云电告中央：9日一定离沈阳赴北平。这样，5月9日，东北行政委员会第57次常委会才正式免去了陈云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职务。

5月14日，陈云抵达北平。

陈云的一贯风格是谨慎、稳健，因此，进关之前，他并没有立下什么豪言壮语。当有人问他“进关以后怎么办”时，他只是平淡地说：“安下地盘试一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说：“不要看他平和的很，他看问题很尖锐。”陈云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他已经在激烈地思考着如何稳定全国的经济形势了。

陈云进关以后，组建中财委的工作也正式提上了日程。

5月31日，刘少奇起草，经周恩来、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的文件发出。《大纲》指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和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借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应即建立有工作能力的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并使各地方的财政经济机构和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建立正确的关系。”

《大纲》要求：

（一）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前的几个月内，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建立之，并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央各财政经济部门在财政经济计划方面应服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加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为委员。

（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应陆续设立中央计划局、中央财经人事局、中央技术管理局、私营企业中央事务局、合作事业中央管理局、外资企业中央事务局等工作机构。此外，以现在华北人民政府各财经部门为基础，应即陆续建立中央财政处、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中央商业处、交通处、燃料处、金属处、纺织处、工业处、农业处、林业处、水利处和中央铁道部等各中央财政经济部门。

（三）在东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区域及各省各大中城市，均应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若干财政经济部门，并在中央与上级财政经济机关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

中财委作为党在经济战线的统一领导机构的地位正式确定下来了。

6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会议。会上，周恩来正式宣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陈云负责筹备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暂时属中央军委领导。这实际上是

中财委成立前同各界打招呼的会议，会上，陈云对为什么要成立中财委、中财委的任务、中财委的组织机构等问题进行了说明。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7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会议，中财委正式成立。会上，陈云宣布，中财委由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

这样，陈云进关不到两个月，中财委即开始“升帐”了。

中财委成立后，暂时在北京城东的九爷府安营扎寨。九爷府原为清朝王爷的府第，但经过几百年的风雨沧桑，昔日王府的繁华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高大宽敞的房子。中财委组建之初，只有几十人，但随着各路人马的陆续到来，中财委迅速增加到了几百人，昔日的王府也变得拥挤不堪，有些高层官员甚至不得不把洗手间当办公室。但就是这座破落拥挤的旧王府却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工作的统帅部。就是在这里，陈云率领中财委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战役”。

## 查封证券人楼，平息银元风波，使人民币“进占”上海

陈云原想进关以后，首先集中精力组建中财委，待中财委成立以后，再以中财委为中心，指挥稳定全国经济的工作。但事情并不像预料的那样顺利，陈云进关不久，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即解放了上海。上海解放以后，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即摆上了他的案头：人民解放军虽然进占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

发行人民币，是实现经济统一的一个重要手段，陈云早就非常注意人民币的发行工作，194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初，他就开始筹划人民币的发行工作。当时，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大都是他在东北组织印制然后运进关内的。进关以后，他对人民币的发行工作更加重视，为了维持即将解放的上海纺织工业的开工，5月23日，他即致信周恩来，提出需多发行四五百亿人民币，以在中原、江苏等地购买3万吨棉花。现在，人民币进不了上海，我们在上海以至整个东南地区的财经及其他各项工作都将难以开展。因此，必须首先解决这一问题。

上海市军管会对人民币的发行也极为重视。上海解放的当天，军管会即颁发了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为照顾人民困难，在6月5日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在暂准流通期间，人民有权自动拒用金圆券。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式成立，并开始以人民币兑换金圆券。比例是1：10万。

当时，国民党发行的法币由于通货膨胀，变成了一堆废纸，用整捆的法币也买不到什么日常用品。法币信用无法维持，国民党玩了新花样，发行金圆券，号称用金光闪闪的黄金作为发行准备基金，强迫人民使用。但金圆券和法币一样不断贬值。

有人形容金圆券贬值的情况说，假如你进饭店吃饭，第一碗饭是一种价格，等你吃第二碗饭的时候又是一种价格，因为涨价了。解放前上海人民口袋里装的金圆券，一不小心，动作稍为迟缓，钞票很快变成了废纸。有时人们口袋里装的金圆券可以买一包香烟，晚了一会，这些钱连一盒火柴也买不到了。许多人甚至用金圆券裱糊墙壁。

金圆券的信用已完全没有了，因此，兑换金圆券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6月2日、3日，全市各行庄收兑的金圆券源源不断地送到人民银行，到3日这天，作为废纸的金圆券堆满了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的所有库房，后来连营业大厅、走廊、甬道、厕所都堆满了。2日到5日，装运金圆券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排队到四川路。

收兑金圆券的工作很快就结束了，但人民币并没有因此进入上海市场。金圆券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劣的心理影响，以及历年物价波动遗留下来的对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经验，不是一早晨可以扫除干净的。抓住人们的这一心理，投机分子开始利用“黄白绿”（黄是黄金、白是银元、绿是美钞）兴风作浪，企图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

由于军管会及时颁布了外汇管理办法，投机分子把投机的重点集中在了银元上面。投机商掌握了大量银元，任意提高价格，进行投机，一转手之间，一块银元竟然可以获得人民币一百五六十元。贩卖银元的贩子，上海叫做银牛。一时间，银牛横行，“大头”（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银元大多是有袁世凯像的，俗称大头）嚣张，银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比价一涨再涨。

当时上海每一条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可以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者十字路口，穿着长衫，手里拿着一大把银元，发出哗唧哗唧的声音，有的用两块大头互相敲击，叮作响，吸引过在行人的注意。他们嘴里还不断报着当天银元的行市，搞得人心慌慌。投机分子的总指挥部是上海的证券大楼，他们利用几干部电话同他们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在他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 10 天左右的时间，上涨将近两倍。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 13 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纱也上涨了一倍到两倍以上。

在物价疯狂上涨的时候，南京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起，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

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回到了人民银行。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当时，为了稳住市场，人民政府曾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 10 万银元抛出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去了，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越演越烈。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据说，当年，日本占领上海时，为了稳住上海的市场，从东京一次运来 5 吨黄金，但投下去之后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接到华东时委关于上述情况的报告后，陈云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指出：“上海市场收兑金圆券仅用人民券 4 亿即兑完，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是在平津解放及我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垮台之下造成的。”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平津）。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均是银元市场，推广我市增加了困难。”

在对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之后，6 月 8 日，陈云致电华东财委，（这封电报的署名很有意思，由于当时中财委尚未正式成立，中财部又即将撤消，所以电报下方只署了“中财”二字。）决定先用强硬手段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

接到“中财”的指示后，华东财委和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通过报纸和广播电台向少数奸商和投机分子进行阵前喊话，敦促他们早日觉悟，迅速停止犯罪行为，然而，投机分子不见棺材不落泪，对军管会的劝告置若罔闻。

在劝说无效后，6 月 10 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了以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同志为首的军警力量，于上午 10 时分五路大军包围了投机分子操纵银元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

上海证券交易所设在汉口路 422 号，建成于 1934 年，是一幢 8 层高的大楼，占地 4 亩余，当年号称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1937 年抗战前，该所登记的证券字号有 192 家，是金融、地产、纺织、百货、化工、文化等各实业界的一些“巨头”，也是官僚资本在沪操纵资金市场巧取豪夺的一个重要基地。抗战爆发后曾一度停止。1943 年 11 月汪伪政府命令复业，至 1945 年又因日本投降而关闭。翌年 9 月 9 日，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复业，登记参加交易的证券字号达 234 家，它控制着全市的有价证券交易，并通过买空卖空的

投机活动，操纵物价。它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有紧密的联系，南京国民党政府一些要员，或明或暗地充当着投机活动的幕后人或保护人，并凭借权势鲸吞渔利。市民中也有些人，在物价飞涨、通货贬值的情况下，涉足证券交易所从事所谓“抢帽子”（即利用证券价格涨落的变化，迅速进行买进卖出获取差价）的投机活动。因此，所谓的证券交易场所，实际是一个公开的变相的赌场。

1949年5月5日，在人民解放军已逼近上海的形势下，证券交易所即自动停业。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一些字号又悄悄复业，打着经营证券的幌子，非法进行金银外币的投机贩卖活动。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并且每天有数千前来探听“行情”的“银牛”（又称“黄牛”，是上海人民对银元贩子的蔑称）出入其间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操纵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触角得以伸向全市各个角落，证券大楼再次成为全市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

接到中财委的指示后，为了保证对投机分子一网打尽，上海市军管会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9日，他们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数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其余人员全部留局待命，并临时切断他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以防泄密。与此同时，还依靠原地下党设在证券大楼的密点及秘密工作人员对证券大楼各投机商号、经纪人的违法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人员的名单。

6月10日上午8时许，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首先率领200余名便衣干警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随后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上午10时，宋时轮警卫部队的一个营，分乘10辆大卡车到达证券大楼，对整个大楼实行军事包围。同时，分布在证券大楼各个场所的公安人员也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就地接受检查。

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集中到大厅的共2100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38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1800余人经教育均陆续放出。

在238名奸徒中，有一个叫张兴银的，他的办公室在4楼265号。这个办公室门外挂着堂皇的金字招牌“寿昌金号”，装出一副正当商号的模样。警卫旅的工作人员走进去看，原来是干投机买卖操纵市场的总指挥所，屋子里单是电话机就有25部，那密密麻麻的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从门外沿着天花板伸到屋内。屋内还藏着许许多多的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联系。墙壁上挂着一个证明书，是国民党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发给他的，旁边挂着一张红纸表格，好像军用地图用来指挥作战，那上面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所谓袁头和孙头是上面有袁世凯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元。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这显然是金融战线上一座奸商的前线指挥所。

突袭证券大楼，一举获得了胜利。但证券大楼以外整个上海滩上还到处能听到银元的金属声。解放军顺着金属声的方向走去，金属声迅速消逝了，手持银元的贩子也看不见了。指挥所好办，散兵游勇难于对付。事后宋时轮同志曾说，当时，他住在证券大楼7天7夜没有睡一次好觉。后来，他们换上便衣，在一个小孩和一个老太太的帮助下，顺藤摸瓜，又抓获了一大批银元贩子。此后，他们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政策，对10元以下的银元贩子，抓到

即放，并请他们协助抓大贩子。这样，不到一个星期，大的银元贩子，基本上都被抓获。小的贩子也不敢再干这个勾当了。从此，上海再也听不到银元的金囟声了。

为了从根本上稳定人民币的地位，陈云在命令采取强硬手段，查封证券大楼，严惩银元贩子的同时，也准备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6月8日，他在致华东财委的电报中提出了五条经济措施：

甲、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券。

乙、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券。

丙、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

丁、验资，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检验资金。

戊、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其目的是以老区比较坚强之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占领的货币阵地。

这样，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双管齐下，不出一个月，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

## 过家门不入，受中央委托，主持上海财经会议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是旧中国帝国主义、官僚资本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民族资本的重要基地。无论是工商业、还是金融业，或者对外贸易，在全中国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国民党政府国家垄断资本银行的总行都设在上海，全国 24 个大银行总行也都设在上海，这里控制了全国的金融命脉。解放初期，上海共有工商企业 16.3 万多户，职工 100 多万人。上海在 1936 年的进出口总额已占全国一半以上，1949 年，主要出口品种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80—90%。上海私营工商业的资本总额占全国的一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上海都可以说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全国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然而，由于战争的破坏，交通中断，加之物价飞涨，解放初期的上海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国民党反动派，也懂得上海的重要性，因此，上海解放不久，他们即开始对上海进行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企图使上海“电灯不亮，机器不动”。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基础就十分脆弱的上海工商业，面临日益加重的困难。原料严重缺乏，资金短缺，销路呆滞，工厂商店亏损、倒闭，劳资关系紧张，停工歇业的面达 20%，并从中小厂发展到大厂，从单家独户发展到整个行业。上海工商界对克服暂时困难缺乏信心，甚至埋怨、怀疑共产党能否在上海立足下去。他们中有的抱消极观望态度，有的搞“三光”（吃光、用光、蚀光），有的甚至弃店弃厂溜走。敌人则扬言，“中秋节要回上海吃月饼”，“春节要来上海吃年夜饭”。一时间谣言四起，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面对这种情况，7 月 3 日，华中局急电中央，希望在上海召开会议，谋求对策。

中央采纳了华中局的建议，决定 8 月初，由陈云在上海主持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 5 个大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央决定 8 月初在上海召开财经会议，陈云 7 月 17 日即率领中财委的一班人马先期抵达上海。

上海是陈云的老家，自 30 年代初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后，陈云已有近 20 年没有回过家了，（1935 年，陈云受中央派遣到上海恢复党组织，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无法立足，更不敢回家，陈云只好匆匆离开上海，化装成商人去了莫斯科）此时，家中尚有从小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姐姐以及抚养自己长大的舅舅一家，二十多年杳无音信，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按说，此时，离召开会议还有一段时间，他完全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回家探望一下，但他首先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感情，而是如何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陈云的一贯作风是，用 90% 的时间去调查研究，用 10% 的时间来制定解决问题的策略。这次，他先期到达上海就是为了有充足的时间首先对上海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会上将要制定的决策，提供依据。因此，到达上海之后，陈云即全力投入了调查研究的工作。

陈云的调查研究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天上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地上，国民党退出上海以前，在上海潜伏了大量的特务，他们躲在暗处，不断地打黑枪，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天公似乎也不作美，

陈云到达上海不久，7月24日，上海即遭受了30年未遇的台风袭击，由于国民党长期缺乏防汛措施，海堤江堤受损严重，以致江水倒灌，市区受淹，南京路闹市可以行船，市府大厦内水深过膝。

上海的资本家历来看不起共产党，以为共产党都是土包子，根本不懂得经济，因此，陈云找他们了解情况时，许多人不但不愿坦诚相待，反而处处为难。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仍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他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正是以大鱼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在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措施。

当时，上海最大的问题是粮食问题。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超过一般商品的一倍或一倍以上，如大米比纱布、猪肉、鸡蛋、胶鞋等的上涨指数平均超过一倍。粮食价格上涨，影响工业生产的成本，也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更严重的是，它还影响人们的心理。在上海会议上，陈云首先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和安排，指出：对大米的供应问题不要悲观，据去年年底统计，上海共有505万人，到今年5月底达到550万人。这是把周围的农村人口包括在内的。如果只算市区，是440万人，扣除解放后还乡的40万人，现在实有不过400万人。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22斤米计，则每天有300万斤就够用了，这与现在可以供应的数量是相符合的。

陈云之所以如此说，并不只是为了稳定人心，而是经过仔细测算的。当时上海面粉比大米便宜，吃面的人较过去增加了一倍，市场上每天销出的面粉，估计可抵80万斤大米，另外上海每天自由上市的大米约80万斤，还有我们每月配售的大米有3000万斤，每天100万斤。三者合计，每天约260万斤，这与实际所需的300万斤只差几十万斤，而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应急，大部分市民都存有一部分“应变米”，“应变米”完全可以补上暂时供应不足的部分。

7月底8月初，常州以西、芜湖以及皖北的早稻已经下来了，价格比上海低。而且，常州至嘉兴一带的早稻40天以后也可以登场，如果这些地区的早稻能运来，粮食的供应短期内就不成问题即使这些地区的早稻不能及时运来，陈云也准备了万全之策，即从东北、华中等地调来1.2亿斤粮食，9、10两个月各6000万斤。根据几个月来的配售情况，每月6000万斤也够供应了。

粮食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生产问题。对此，陈云也作了分析和安排。他说：要力争上海主要行业（纺织、印染、纸烟）的开工率维持到2/3。当时，恢复生产最困难的是纺织业，也就是棉花的来源问题。陈云认为，以现有的棉花，使上海的纱厂每周开工在3昼夜到4昼夜是可以的。8至11月，每周按4天生产计，共需棉花79万担。而当时，中纺在上海现有23万担，在香港存有2万担；私纺在香港存有10万担，还可在那里买5万担；上海贸易处存1万担，前经济合作总署存7.2万担；华东可以买18万担，华北可以买10万担，西北可以买3万担。以上合计为79.6万担。

陈云还指出：新棉收购计划即将布置下去，估计11月底能开始拿到手。明年准备把农村妇女手工纺线缩小些，以机器纺纱来代替。预计明年在华北、华中、西北等地共可购棉300万担，华东自己再收购180万担，共计480万担。这些棉花收上来后，则明年纱厂的开工情况不会比今年坏。

运输问题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正如陈云所说：“现在上海的问题，是有无大米，有无棉花，而其关键是有无运力，把大米和棉花运进



来。”因此，上海会议上，陈云对运输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指示：蚌埠到浦口一段，要争取开 16 至 18 对列车，保持煤七，粮三，军用二，余为其他货运和客运。现在徐行及错车距离长，行车速度慢，调度不灵，通讯设备不够。今后应缩短徐行和错车距离，加添车站的错车点，放长支线，增加通讯设备，加快装车卸车，使列车停留的时间尽量缩短。铁路调度人员要很能干，因为货物来自各地，管理系统又不统一，调度十分困难。华东财委要把运输看成一个重要问题，好好组织，设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这一工作。华东局要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此外，防空也很重要，一方面要配备防空武器，另一方面要适当疏散，避免列车过分集中。

陈云提出的这些解决上海问题的办法，既明确又具体，使许多同志都感到心中有了底。

上海财经会议除解决上海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探讨解决全国经济问题的办法，会上，陈云也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

作为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陈云总是善于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看问题，因此，在会上，他首先强调：我们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解决这一困难必须从全局出发。“我们不但要注意克服目前的困难，而且要从全国范围来考虑财经问题的解决。否则，就要影响到国计民生。”

当时，经济问题中最突出的就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开支过大，钞票发行过多造成的。因此，有人提出解决经济问题应主要从削减支出着手，对此，陈云的回答很明确，“开支能否少一些呢？不能。首先，军费不能减，减少了就不能保证部队的需要。其次，为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而发行的票子也不能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都会有困难。当然，提倡节约，可以省一些，但数目不会大。”

货币发行量不但不能减，为了解决困难还必须多发行，陈云算了一笔帐，他说：“为了保证今年秋季的支出，8 至 10 月每月需发行 1633 亿人民币，以 7 月底 2800 亿元为基数，每月发行指数增加百分之五十八。”“这些发行，主要是解决军费开支及修复现有铁路的费用，还没有考虑到工业的投资和农产品的收购。11、12 月除军费外，要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两项合计每月需发行 1692 亿元。”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货币发行的是不是太多了呢？对此，陈云也作了推算，他说：“抗战前，全国的货币流通量（包括地方币）为二十多亿银元。经过了 12 年战争之后，生产与货币流通不正常，发行量应少一些，假定打两个对折，还应有 5 亿多银元。可是，现在我们发行的人民币，只相当于 1 亿至 1.2 亿银元，数目还是很小的。”也就是说从全局的观点看，人民币必须多发，也可以多发。

当时，财政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在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员都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也有人主张，为了减少财政负担，裁掉这部分人。针对这个问题，陈云也反复进行了解释。他说：“全部接收在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员，财政上负担很大。但是，裁了这部分人，让他们失业，没有饭吃，问题更大。现在养着这部分人，从财政上看是个损失，但从另一方面看，政治影响好。待解放地区的人看到，这些人生活都有保证，就不怕了，反抗的人少了，这样战争可以更快结束，少损失好多人力财力，整个支出可以大大减少。”“这个问题，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政策。对旧人员要训练、改造和使用，这个包袱不能不背，不能光从财政着想。”

上海工厂的搬迁也是一个类似的问题。由于当时上海有敌机轰炸，原料又缺乏，因此，中央和地方上的一些同志都曾考虑将上海一些工厂搬到别的地方去。陈云经过认真的调查分析，认为“这件事情要慎重。应将解决目前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不能因为目前有困难，就把许多工厂搬走了事。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例如，从原料的供应来说，纺织厂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工厂生产需要有适当的厂房，还需要有电力、机械等有关的企业与之相配合，这些条件棉花产地就不一定具备。估计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目前应力争维持生产。”

开支不能减少，票子不能少发，工厂又不能搬家，当时经济上面临的问题，特别是通货膨胀问题如何解决呢？陈云提出了以下几条办法：

#### 1. 发行公债。

发行公债是近代以来各国政府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它可以起到回笼货币、控制通货膨胀、筹集资金、发展生产等作用。但是我们党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对这种手段不太熟悉。因此，陈云提出发行公债，许多人都不很明白，以为这是靠借债过日子，不光彩。毛泽东同志对此也非常谨慎。

8月11日，陈云将准备在年底以前发行2400亿元公债的建议电告中央后，8月14日，毛泽东即致电陈云，希望陈云就下列各点加以说明：“（一）2400亿元的用途；（二）为什么需要2400亿之多，是否可以减少；（三）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四）利息4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五）为什么规定明年11月起还本付息，3年还清，期限是否太促，为什么要如此规定？”

8月15日，陈云复电中央，对发行公债的数额、用途、利率和还本付息的时间等问题作了说明。电报指出，“发行2400亿元公债，只占货币发行额的1/4，但对金融上所起的作用则很大。其利如下：甲、弥补赤字1/4。乙、减少物价波动；丙、易于收购土产；丁、帮助货币下乡。之所以额定为这个数，是因为8、9、10三个月的财政收购发行数字共约6000亿，而公债收回之数除金钞外只2100亿，在放多收少中银根不致过紧。公债以劝购形式推销。把发行公债的好处对工商业家讲清楚，并采取各大城市代表会形式加以讨论通过，工人劳动者及舆论方面赞助购买，则工业家亦会跟随，但派他们的数字大了，也会叫。大中城市游资很多。债币下乡有利于物资交流，又可刺激工业的恢复，这种影响对于工商业特别是工业资本家是有利的。”

电报还特别指出：“解决财政收入的办法，一般国家均征税、借债，发行钞票三种办法，我们因长期处于农村对公债办法用得很少，在货币收入不足货币支出的情况下，今后适当应用公债的办法，比单纯发行钞票好，短借短还目的在树立债信，必要时与第一次还债同时可发行第二次公债，明年秋后还1/3，因正在秋粮登场、市场需要筹码多的时候，估计国家确能偿还。”

毛泽东对此似乎仍不放心。8月17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陈云：“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

实际上，陈云在提出发行公债以前，已作过可行性研究。他认为“中国地方如此之广，发1.2亿银元（相当于2400亿元人民币）的公债，数目并不算多。蒋介石剩下那么一点地方，还要发行2亿银元的公债。他在历史上每逢到了没有办法时，就搞这么一下。东北4000万人口，私营经济所占比例较关内低得多，两期发1200万银元的公债，第一期已经按期完成了。关内私营经济占的比重比东北要大得多，公债数目可以定大一些。”

发行公债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当时工商业还不能正常生产和经营，公债派下肯定会叫苦的。但发了公债工商业是否会垮？陈云说：“我看不会，因为每月发行的钞票超过公债收回的钞票。现在我们每月发行现钞 1633 亿元，而发公债收口的只有 600 亿到 700 亿元，这是有限度的收缩，不要顾虑筹码会少。我们到时候看情况，如果紧得不行，就后退一点。”对发行公债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陈三也作了准备。如果因发行公债引起银根紧，因而对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不利，怎么办，陈云认为可以采取这样三个手段：

第一，调剂通货。在发公债时，要把票子放出去，必要时再收回来，有吞有吐。要善于使用这个手段。什么时候吐出多少，收回多少，要好好研究。还要研究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使之达到比较合理的程度。如在银根紧时，可以多投放一些票子来收购物资，同时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

第二，调剂公债发放数量。公债各月的发放数量，应该根据情况灵活掌握，在时间上可长可短，在数量上可多可少。例如，新粮上市，票子下乡，银根会紧，就要注意到城乡公债各发行多少。第三，调剂黄金、美钞收进的数量。黄金、美钞收多收少，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这也是一个手段。如果物价平衡，银根较紧，即可多收进些。

后来，陈云又就发行公债的问题向中央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最后，中央同意了陈云的意见并决定，从 1950 年 1 月 1 日起发行人民建设折实公债，第一期发行 1 万万分（每分之值按当时物价计算约等于 2.2 万元人民币）。

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对的，发行折实公债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第一期公债到 3 月份全部售完，这期公债的发行对稳定物价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原定发行的第二期公债，因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未再发行。

## 2. 增加税收。

在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提出：“目前最要紧的有两件事：一是公粮要征得好，二是税收要整顿好。”征收公粮一直是我们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之一，过去我们经常采用这一手段，因此大家对抓紧征收公粮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对于增加税收，有些人却一时转不过弯来。过去我们一直反对苛捐杂税，现在轮到我们执政了，又要增加说收，这似乎与我们减轻人民负担的宗旨不一致。其实这种减轻税收的简单“仁政”观点是一种小农意识，对于发展生产是不利的。

在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对税收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他说：“现在定的这个税收数目，有可能完成。根据在哪里？过去大城市多数不在我们手里，农业税占总收入的 3/4，现在我们有了大城市，情况有了改变。东北地区，税收以及国营企业和对外贸易收入，占整个收入的 3/4，而公粮仅占 1/4。华北地区，税收已达总收入的 38%，今后要争取达到 50%。由此可见，有了大城市和没有大城市是不同的。过去说敌占城市我占乡村，在经济上是敌强我弱，道理就在于城市的税收优于乡村。”“特别是在一个发展的环境中，加一点税不会出大问题。如果赤字不大，可以用增加税收的方法，努力求得收支大体平衡，以便使经济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到那时，货币比较稳定，发了票子物价不上涨，就大有文章可做。”

陈云关于增加税收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9 月 3 日，毛泽东在给华中局饶漱石的电报中即指出，“陈云同志已在 9 月 2 日的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

为了引起人们对税收问题的重视，陈云后来还提出：“宁缺一个县委组织部长，也不能缺一个县税务局长。”这一主张也得到中央的支持，后来中央特别规定，一个县里配干部，除县委书记和县长外，还要配备一个强的干部去当税务局长。

### 3. 实行内部贸易自由。

地区间的相互封锁也是造成当时经济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当时，常州的粮食不让运往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是封锁的。有许多领导干部认为，这是“为国为民”，他们说，粮食运走了，农民会没有粮食吃。陈云同志对此进行了批评，并坚决主张实行内部贸易自由。他说：“这样说是没有道理的。天下没有那样傻的农民，把粮食都卖光，自己等着饿死。农民不是傻瓜，知道票子会贬值，不到用钱时是不肯卖粮的。”

针对有人提出的粮食运走了物价会涨，有害国计民生的观点，陈云指出：“事实上，凡禁止粮食自由贸易的地方，农民的粮食就不能卖到高的价钱，而城市因粮食贵，工业产品成本提高，引起工业品价格上涨，使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扩大。这对农民是有利还是有害呢？完全是有害无利。”“封锁无论对农民对城市的劳动人民，还是对国家经济建设，都是有害的。”“对于这一点，党和政府要发布命令，报刊也要写文章，把道理说清楚。”

### 4. 财委机关要组织成为一个司令部。

政策和措施是要由具体的人去实施的，因此，在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除提出了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一些具体措施外，还特别强调，要把各地财委机关建成一个有思想、有战略眼光的司令部。

他说：“现在各区财委只有几个人，这样不行。财委要设置专管各方面工作的组织，如金融、财贸等处。有些可以设秘书或委员，如工业秘书、计划委员等，负责看有关材料，动脑筋，考虑问题。这光靠下面的业务部门不行。现在工作范围很广，任务很重，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应付不了。人员从哪里来？由上面派不可能，要从业务机关抽。抽二三等的不行，要抽一等的。”“总之，我们今天面临的是管理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的局面，必须吸收党外各方面有知识的人来共同工作。”

除上述措施外，在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还提出了开展国内汇兑，建立统一发行库；税目、税率和食盐外销要统一管理；重要物资由中财委统一调拨等重要措施。陈云提出的这些措施，有根有据，切实可行，不但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连开始看不起我们的一些民族资本家和经济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内真有能人，陈先生提的问题，内容很深。”

## 抓住“两白一黑”，打垮投机分子，稳定全国物价

上海财经会议结束以后，陈云继续在上海逗留了10天左右，一方面根据中央的指示，邀请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财经问题，另一方面继续对上海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通过反复调查和研究，对于解决上海经济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更有把握了。

他认为，当时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因为这三样东西是城市的命根子，是不能一时或缺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也往往是投机分子和游资冲击的主要对象。由于煤炭相对来说难以搬运和保存，只要我们能保证运输，问题不是很大，因此，“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大米和纱布。对此，陈云明确指出：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

在对上海经济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之后，8月25日，陈云离开上海返回北京。9月2日，就上海财经会议的情况向中央进行了详细的汇报。中央基本上同意了上海财经会议确定的解决上海经济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措施。毛泽东还就陈云在上海与资本家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一事进行了表扬。

上海财经会议对形势的分析是准确的，制定的措施也是对症下药的，但关键是落实，再好的措施如得不到落实也无济于事。为此，在得到中央的认可后，陈云即开始全力组织实施上海会议确定的各项措施。

当时，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是要加强中财委自身的建设。中财委虽然成立近两个月了，但由于人员缺乏，各个机构都不健全。上海会议上，陈云提出，要抽调一流人才，把各地财委建成领导经济工作的司令部，中财委必须首先做出榜样。而且，中财委的机构如不健全，对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和指挥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回到北京后，陈云首先抓的就是这一向题。

9、10两个月，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陈云前后两次致电中央，希望中央调大批干部到中财委分配工作。

在向中央要求抽调干部的同时，陈云也在工商界和社会上广泛搜罗懂经济的专业人才。经济界和社会上一些知名的人士，如马寅初、章乃器、孙晓村、钱昌照等都被吸收进了中财委，原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崎在香港组织资源委员会国外贸易事务部的员工起义后，还未到北京（途中）即被任命为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中财委作为一个统率全国经济工作的司令部，到10月份已初具规模。人员由原来的60多人扩大到300多人，机构也陆续建立起来。除行政处、秘书处外，成立了：

（一）计划局，下设财政、金融、贸易、工业、交通、农业、供应7个组共有干部70多人。组长是宋绍文，组员中有曹菊如、钱之光、张国坚、沈鸿等干将。

（二）统计组，有干部70多人，组长为狄超白。有从上海、南京等地吸收的旧职员及大学教授12人，此外，还有一些青年学生。

（三）人事局，有干部2人，科员5人。

（四）合作事业指导局，有干部40多人，局长孟用潜。

（五）私营企业管理局，有科员干事7人。

（六）劳动局，有干部10人。

另外，原华北财政部、企业部(改为重工业部)、工商部(改为商业部)、交通部、农业部、水利委员会、人民银行总行、军委铁道部、电讯总局等也都划归中时委领导。

在抓紧中财委自身建设的同时，为了延长中财委的工作手臂，陈云还组建了一些归中财委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

(一)建立了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同时，将中纺公司划归纺织工业部统一领导。

(二)建立全国性的土产公司，负责推销各地特产。

(三)将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11个专业公司，其中以内地调剂为主的有粮食、花纱布、百货、煤铁、盐业5个公司，以出口为主的有猪鬃、土产、皮毛、油脂、蛋品5个公司，还暂设1个进口公司。各专业公司均按经济区划与交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公司，实行垂直领导，资金和干部统一调度。

与加强组织建设的同时，上海会议确定的各项措施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公粮和税收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由于抓紧了新解放的乡村的征粮工作，关内各地的征粮任务，年内估计可以完成193亿斤，税收经过整顿，也发现“大有文章可做”。如上海的税收每月原仅45亿元，经过研究发现可以增至160亿元，后经过整顿，每月收到了268亿元。

发行公债的工作也基本准备就绪。经与各地协商，华东、华中等地都赞成发行，第一期公债准备在1950年1月份开始发行。

全国重要物资的调拨工作也在中财委的主持下开始进行，为了保证各地物资的运输，陈云指示各地，高度重视铁路的修复和调度，并指示上海加紧制造机帆船，以弥补铁路运输的不足。

这期间，为统筹调剂关内各区棉花，保证纺织厂的棉花供应，陈云还指示中财委于9月24日主持召开了全国棉花收购和调配会议。这次棉花会议，对全国各地当年的棉花种植面积、年成、收获量，各地区公私纱厂锭数、粗细锭子的比例、全年需棉量、群众自用及手工纺织全年需棉量，各地区今年收购棉花的具体计划及布置情况。现有收花机构之组织状况及干部数量，私人棉商及小贩收棉花的活动情况，各地区棉纱棉布全年需要量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分析和研究。

粮食和纱布的市场情况固然决定于我们掌握这些东西的多少，但更主要的决定于这些东西的生产情况。因此，陈云在抓紧收购和调配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9月22日，他和薄一波联名致电中央，建议大量生产农用水车，扩大水浇地面积。并提出，在1950年要确实把生产运动作为全党全年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任务，充分发挥1949年利用城市工业与科学技术援助农村生产的经验，争取把农业生产提高到战前水平。

上海会议后，9、10两个月，全国物价相对比较平稳。但是，这种平稳只是暂时的。在平稳的背后，一场大的经济风暴正在酝酿着。这期间，陈云每天都要看各地发来的关于市场和物价问题的电报，计算着货币发行量与物价的关系。10月初，他已隐隐预感到一场大的经济风暴将要到来。

10月3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目前财政赤字仍然很大，且须收购大量物资(主要是棉花)，必须继续增发货币，从去年底到今年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额已经从185亿增加到4851亿，增加了25倍，在这一时期物价

已上涨了 15 倍，估计 8 至 12 月的财政赤字为 6700 亿，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 4000 亿，合计共需 1 万亿，除 8 月份已发行的 2000 亿外，还需要发行 8000 亿，即在 4 个月内发行数额尚须增加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估计物价仍将继续上涨，且有发生“剧烈跳跃之可能”。

事实果然不出陈云所料，自 10 月 15 日，沪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不出 1 个月，物价平均指数：京津涨 1.8 倍，上海涨 1.5 倍，华中、西北亦大致相同。

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但更主要的是投机资本在兴风作浪。实际上是解放以来资本家跟我们的又一次较量。较量的主战场仍然是上海，这次的主要物资则是纱布。由于投机分子集中攻击纱布，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不到 1 个月的时间内上涨了 3.8 倍，棉布上涨了 3.5 倍。棉纱和棉布价格的上涨也导致了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

上海的工商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投机性。在长期恶性通货膨胀影响下，有所谓“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之说。过去，国民党官僚资本是投机活动的主力，银行钱庄直接参与投机，不少民族工商业也不同程度的卷入了投机漩涡。解放前夕，上海 200 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大都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的投机买卖，许多商业行号投机活动极为严重。1949 年与 1937 年比较 棉纱字号从 60 家发展至 560 家，棉布字号从 210 家发展到 2231 家，糖行则从 82 家增力 644 家。这些商业机构都是靠着投机活动而发展起来的，他们多数以买空卖空或囤积商品为主。产业资本家也普遍囤积原材料和制成品，有的还抛售空头栈单或抢购业外商品。有些“工厂”挂着空头招牌进行各种投机活动。如卷烟厂从 1937 年的 23 家发展到 1948 年的 113 家，其中有的卷烟厂既无设备，又无厂房，只有一间写字间，大搞投机勾当。此外，当时上海专以“踢皮球”为生的就有 20 多万人。解放前夕，上海的投机活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解放后，我们依靠政治力量平息了 6 月银元风潮，资本家和投机势力都不服气，这次看准了上海纱布行情，企图以纱布为突破口，掀起物价涨风，以便混水摸鱼。

尽管我们对这次物价涨风早有预料，但全国范围内物价如此剧烈的波动，也的确令人吃惊。

物价涨风起来之后，陈云首先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在上海，主要是由于纱布短缺，引起了投机势力的囤积，而当时，华北受灾，棉产区粮食很贵，北方的投机势力很可能集中冲击粮食，到那时，我们将不得不在两个战场上同时作战：为了避免两面受敌，陈云准备首先抓住粮食，稳定北方地区。

10 月 20 日，陈云急电东北，要求紧急调拨一批粮食支持华北市场。为求万无一失，陈云又命令曹菊如赶往东北，并要他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由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让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有粮食，在粮食方面无隙可乘。

这一招果然奏效。北京、天津的粮贩子看到东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往北京，未敢轻举妄动。

这边腾出手来之后，陈云即开始全力对付上海的投机势力。

11 月 13 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致各地指示电，电报分析了物价涨势，指出：目前稳住物价已有可能，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为了稳住物价，电报中陈云连续发出了 12 道指令：

(一) 以沪津两地 7 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 2 倍或 2.2 倍。

(二) 东北自 11 月 15 日至 30 日，须每日运粮 1000 万至 1200 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东北及京津贸易公司须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

(三) 为保证汉口及湘粤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

(四) 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之纱布，尽速运到西 (五) 财政部须自 11 月 16 日至 30 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 2.1 亿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

(六) 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

(七) 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之税收，于 11 月 25 日左右开征。

(八) 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

(九) 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 (除去仓库建筑等) 应全部拨付，不得扣压。但请当地党政军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

(十) 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 20 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 20 天。

(十一) 目前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争于 11 月 25 日 (至迟 30 日) 完成；预定 11 月底 12 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彼落，各地需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为了有力地打击投机势力，让投机分子把囤积的棉纱，怎么吃进去的再怎么吐出来，陈云在第 12 道指令中特地指出，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 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 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电报起草完后，当晚即上报中央。周恩来阅毕，在电报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

毛主席历来有晚上工作的习惯，何况此时，“军”情紧急，如何睡得着。电报送到毛主席处，毛主席当即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

于是，电报迅速发往各地。一场全国范围内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势力的战斗拉开了帷幕。此时，投机分子还蒙在鼓里，得意忘形。

11 月 16 日，陈云再次电示各地，要求：

(一) 以后各地物价报告，特别猛涨时期，均须指明我之抛售价 (官价) 与市场价 (黑价)，并估计在成交额中两者之比例。沪津两地必须这样做，以便华北各地和华中、华南以及将来西南在掌握当地价格上较有把握。

(二) 各地在计算物价平均指数时，必须估计到当地若干种物资有余或不足，又须估计到沪津等地若干种物资价格的涨落对本地同一物资价格影响的有无与大小 (例如沪纱布对汉口纱布影响大，大米则影响小)，以便各自规定既适合于全国又适合于当地的价格。



(三) 估计沪汉也可能出现如 12、13 两日京津市场一度极乱的情况，但也不可能不及京津之乱。如出现市场大乱的情况，只要我们确已紧缩货币发行，物价指数已涨达两倍则不必恐慌。那时，粮、油、盐等照正常门售量售出是需要的，但过多的抛售则不必要。

(四) 两日来，京津我贸易公司已卖不掉粮，粮价在回跌中。只要沪汉两地也出现这种情况，此次涨风即告一段落。估计各地紧缩通货及沪汉纱布涨足之后，在 11 月 25 日前即可全国稳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为稳当起见，各地仍照 11 月 13 日电全力准备物资，勿稍松弛。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大量物资集结完毕，我们手中掌握了充足的纱布，与投机势力进行较量的时机成熟了。

11 月 25 日，陈云命令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

开市时，上海等地的资本家和投机势力一看有纱布售出，即拿出全部寸头争相购入，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拆”，这在上海、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投机家们有自己的小算盘，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吃进纱布以后，当天转手，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还可以获高利。

然而，这次他们却打错了算盘，上海等地的国营花沙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投机讲究的是买涨不买落，投机者眼见得国营公司的纱布源源不断地售出，而且价格不断降低，知道大事不妙，也开始赶紧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起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投机分子叫苦不迭。

而这时，我们则几路进兵，穷追不舍。

首先，我们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

其次，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

第三，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交，迟交一天，就得罚税金额的 3 %。

有人跟陈云说，这些招是不是太狠了，陈云说：不狠，不这样，就天下大乱。

这样一来，资本家和投机分子，“两面挨光”，再也受不住了。不得不要求我们出面，买回他们吃进的棉纱。我们则乘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棉纱。

陈云指挥的这场战斗，干净、利索，使投机分子受到了严厉的打击。有些资本家血本无归，应付不了日拆，跳楼自杀，有的卷起铺盖逃往香港。上海和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下来。

事后，上海一位有名的资本家（过去说共产党经济打 0 分）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在经济工作方面有奇才。他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

10 月涨风平息下来以后，陈云并未掉以轻心，他预料投机分子这次受到严厉打击之后，绝不会就此罢休，肯定还要进行反扑。他们这次在纱布上跌了跟头，短时间内不敢再在纱布问题上做文章，但很可能在粮食问题上大做文章，当时，上海的存粮只有八、九千万斤，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

也都面临粮荒。因此，11月底，物价渐趋平稳之后，陈云即开始筹划在粮食问题上与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的较量。

12月12日，中财委召开了全国城市供应会议，陈云在会上讲话，并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会后不久，四川即征集了4亿斤大米支援上海。

1950年1月11日，陈云就解决川粮济沪问题致电饶漱石、曾山，指出：四川的4亿斤大米2月初即可启运，务请抽调大批干部去川运粮。

同时，他又致电邓子恢、东北财委并曾山，说上海存粮仅八九千万斤，要求华中、东北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

1月22日，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解决上海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的办法，除先调沪宁、沪杭两线公粮，同时抓紧华中、四川、东北向上海运粮外，应准备向国外增购4亿斤大米。

为了确保在粮食问题的较量上万无一失，陈云对东北和四川这两个坚强的后盾特别关注。

1月23日，他再次致电东北方面，指出：本月上海米价猛涨，估计春荒难关过不去。华中、四川调给上海的公粮，或因山地集中不易，或因船运量小，何时与能否调到，实在把握不大。由于米价贵，进口的外米能否很快运来，亦属疑问。希望东北再收买一批大米或稻子。

1月26日，他又致电中南财委并转中南交通会议，要求他们设法组织公私船只接运由重庆到宜昌的大米，并运到上海。指出：此一任务，关系到全国物价计划及上海供应问题，必须解决。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我们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布置，即，第一道，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第二道，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这几道防线合在一起，我们掌握的周转粮大约有10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

事实证明陈云的预料是准确的。上海等地的资本家和投机势力，在经历了两次打击之后，仍然不服气，还想寻找机会与我们较量。1950年春节前后，他们又看准了粮食市场，希望在粮食问题上大做文章。

上海粮食市场上，历来有春节后“红盘”（指正月初五开市）看涨的老规律。加上投机商看准了我们粮食准备“不足”，因此，他们以为这次一定可以在粮食上大捞一把，以出前两次被整的晦气。

于是，春节前夕，投机商们开始向粮食进军。他们千方百计大量囤积粮食，市场能买到多少大米他们就买下多少，如同疯狂的赌徒一样，把他们所能调动的头寸都押在这个赌注上，以为肯定利市百倍，等待暴利像黄浦江水一样向自己家里流来。奸商们扒进粮食一直到1949年农历年三十的晚上，然后，烧香拜神，等待明年年初五财神爷上门。

正月初五到了，粮食市场上“红盘”开出，出乎投机商意料的是，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在陈云和中财委的统一部署下，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并连续抛售了两亿多斤大米。逼得投机商不得不在亏本的情况下把囤积的大米全部吐了出来，资本家和投机分子搞不懂，共产党从哪里弄来了这么多大米，但有一点他们算是认清了：共产党在经济上是有办法的。

经过这几个回合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认栽并彻底服输了，再也

不敢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加上我们采取的其他措施，持续了十几年的如脱缰野马之势的通货膨胀终于被制服了。到 1950 年，全国的物价基本上稳定了下来。

稳定物价的战斗结束以后，毛泽东对此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毛泽东还极力称道陈云的理财能力，他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称陈云这种理财能力为“能”。

国外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士，对陈云指挥的这场稳定物价的战斗也很是佩服，认为在短时间内使如此剧烈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简直是经济上的奇迹。事隔几十年后，他们对此仍有深刻的印象。据说，前些年，我国的一个代表团到西方国家访问，希望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取经。西方经济界人士当即指出：这方面我们应该向你们取经，你们在这方面是最有经验的。

## 克服分散现象，一统财政经济

几番金融物价的斗争，我们都胜利了。但是，这仍旧是暂时的，隐忧还没有完全消除。这里的要害问题是，财政经济没有统一起来，收支脱节，中央财政缺乏坚实的基础，随时有出问题的可能。因此，1950年初，物价逐步稳定之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即开始全面铺开。

严格地说，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是从1950年3月开始的。但事实上，进关后不久，在稳定物价的过程中，陈云即对这个问题予以了高度重视。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首先提出了统一支出的问题。当时在支出中占首位的是军事费用，过去各根据地长期分割，被迫各自为战，军队的费用都是由各根据地负担的，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各根据地相继统一，野战军也都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此时，如果仍要各根据地负担原来野战军的费用，长途调运，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费。因此，军队的费用必须由中央统一支付。

要统一支出，首先必须统一货币发行。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中央决定以人民币为各解放区的本位币。陈云认为，中央即已确定人民币为各解放区的本位币，必须由中央集中统一发行，各个地区的地方货币即不再增加新的发行，各地所需要的货币量，一律由中央决定，统一发行人民币解决。人民币作为本位币在全国流通（群众称为长腿钞票），各地区原发行的地方市与人民币规定合理的比价，只准在本地区流通（群众称为短腿钞票）。这样，即了解决了解放区的币制问题，货币的发行又抵顶了一部分财政支出。

为在短期内解决好货币的统一发行问题，陈云指定中时委的曹菊如（原东北人民银行行长）专责掌管解放区货币流通的需要量，并要分别计算新解放区的货币流通需要量和国营贸易公司收购工农业产品的货币需要量，依此及时地计算出货币的发行量，以便既准确又及时地决定货币的发行。

当时有人曾经提出，两广、西南可以另发钞票，以使后方物价稳定。陈云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他认为：“这种票子与人民币比价假如不变，等于是一种票子：假如常常变动，则对前方的物资供应会发生很大问题。”

他还说：“现在决定一切的是部队打胜仗，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是为了战争的胜利，现在是大兵团作战，需要发的票子很多，不是抗战时期的那种小局面了。所以，像抗战时期那样，发几种票子，既可照顾后方，又可照顾前方的办法，已经不再适用。”

在上海会议上，陈云还提出了对重要物资进行统一调拨的问题，这对当时稳定全国的物价是极为重要的，也得到了大多数地区的同意。

但是，只有统一的支出和重要物资的统一调拨是不够的，没有统一的收入，这两种统一都是空的。在没有统一收入的情况下，支出只能靠发钞票，而多发钞票必然会导致物价不断上涨。因此，要使全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稳定的基础，中央必须要有统一的收入。统一全国的支出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要统一收入就难了。各地区各自为政早已习惯了，现在要把财权上交，一时很难转过弯来。为此，陈云做了大量的工作。

例如，1949年12月，陈云提出实行财政、税收、公粮、贸易及各主要经济部门管理的基本统一，很多人都不大理解。当时，华东财委的同志即来电提出，实行财政经济基本统一管理时，下级的同志可能产生一时不关心收入，只伸手向上要的情况。对此，陈云复电指出，“你们预见此点是完全

正确的。但只要反复说明统一与分散的利害得失，说明革命者的责任，并保证下级的开支，那末，预防和克服下级消极情绪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迫切希望你们在这次华东财政会议上，说服各地同志，既交出权利，又勇于负责，以此精神共渡难局。”

在这封以他和薄一波的名义复华东财委并发中南、西南、西北等大区财委的电报中，陈云还分析了统一的利弊和理由。他说目前许多地区是新解放区，实行财政、税收、公粮、贸易及各主要经济部门管理的基本统一，在工作进度上是带跃进性的，一定有许多困难。但从客观情况看来，如不作基本统一，则困难程度、为害之烈将更大。其理由如下：

（甲）支出方面。五六百万主力部队与大行政区直属部队是必须按月由中央（通过大行政区）开支的，其开支到今天为止主要靠货币发行。

（乙）收入方面。公粮、税收均在县、市、省的手里，收的多寡迟早，中央无法确实掌握，而公粮变卖及现金税收，又恰恰是今后按月按季回笼货币的主要手段。

（丙）关内市制已统一，汇兑、交通已畅通，一遇金融、物价风潮，必然牵动全国，除东北外无一地区能自保。

当时，各部门、各机关的高级干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对财政困难不太了解；因此，各有各的想法，例如，有的地方开的预算大大，在恢复经济和建设计划中，不分先后和轻重缓急，什么都想干。军队干部则因前线生活常难保证，而埋怨说“既很穷，为什么养 900 多万人”。地方干部则说“公粮、税收任务太重”。个别余粮省份干部说“公粮不宜调往大城市”，要求留在本省。这些混乱的认识，都是统一财经的思想障碍。陈云认为，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中财委没有及时向他们通报财经困难的情况。因此，他决定，采取“通气”的办法，从 1950 年 1 月份起，每一旬、半月、或一月，由中财委发通报一次，报道财经要闻，使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员知道财经情况以便交换意见，统一看法。

中财委发的通报，许多是陈云亲自起草的，这些报道，在统一认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例如，1950 年 2 月 1 日，陈云在他起草的给中央的一则财经旬报中即指出：“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到目前为止，共发 4.1 万亿元。每月发行的新钞票依当时的物价计算，总值是 214 亿斤小米。这 4.1 万亿元钞票，因为贬值，现在只值 49 亿斤小米。即是说，通货贬值中，人民损失了 165 亿斤小米，等于抗战前银洋 8.25 亿元。为时只有一年即损失这么多，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这是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的一个具体材料。这样下去人民将很难支持。”这就是说，中央财政靠发钞票过日子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央必须有统一的财权、财力。

在同一则旬报中，陈云还指出：“去年夏秋冬，军政人员大增，但是征粮未到时间，新解放区税款又收得少而慢，加之自去年 12 月 11 日全国财粮税收统一后，到今年 2 月这 3 个月，因为要先保证下面开支，才能将粮、税统收上来，因而支出与发行更多。这样做是必要的，但只能限于这 3 个月，不能再延长。否则，粮、税都在省、县之手，中央只出不进，金融物价必然发生大乱。”“3 月份实行粮、税及财政基本统筹，在解放不久的地区，是有困难的。但提早实行的困难小，为害小；如继续不统一，则困难大，为害大。”

这些报道生动、明确，使人一看即感到，统一财政经济确实刻不容缓。

为了进一步统一认识，1950年2月，中财委又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会上，陈云同志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他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是充满希望的。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

会议期间，陈云还分别与各大区财委的领导进行了谈话。他首先找华东财委的同志谈话，直截了当地问：“统一是先统富的，还是先统穷的？”华东是全国比较富裕的地区，但解放初期，在稳定物价的过程中，接受全国的支援也最多。华东财委的同志对财政统一的重要性有很深的感受，因此，他们当即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先统富的。”富的地区首先赞成统一，穷的地区就更好做工作了。因此，会议在统一全国财经工作方面很快统一了认识。认识统一后，1950年3月，陈云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对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作了10条规定：

- 1、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以薄一波为主任，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聂荣臻为副主任。各大行政区、省、大市均分设编制委员会，制订并颁布各级军政机关人员、马匹、车辆等编制。

- 2、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杨立三为副主任，各级首长亲自负责，指导清查仓库。

- 3、厉行节约。所有机关和公立学校，必须规定工作人员的数量及每个人员的工作任务。所有国家工厂和企业，除规定职工人数及生产的质与量外，必须实行原料消耗的定额制度，铲除囤积材料的浪费行为。

- 4、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各省、市、县、区人民政府，非依粮食局支付命令，不得支取公粮。

- 5、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如在2月底尚未建立国库者，统限于3月中建立好，并代理地方库业务。3月份起所有税款逐日入库。

- 6、为了调节国内供求，组织对外贸易，有计划地供售物资和同笼货币，各地国营贸易机构业务范围的规定和物资的调动，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负责。

- 7、国家所有的企业，分为三种，一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直接管理者；二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所有，暂时委托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者；三是划归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者。依此标准，责成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划清现有各类国有企业的管理责任，并制定对这些企业投资贷款的条例。一切公营企业及合作社，均须依照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规定，按时纳税。所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经营的企业，均须将折旧主和利润的一部分，按期解缴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或地方政府。

- 8、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国家银行应增设分支机构，代理国库，外汇牌价和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
- 9、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必须保证军队与地方人民政府的开支及恢复人民经济所必需的投资。

- 10、凡不实行、不遵守上述各项规定者，即属破坏人民利益，违犯国家法纪，中央人民政府将制订适当的法律，给予必要制裁，来保障上述各项规定的严格实行。

3月3日，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发出后，3月

10日，陈云又为《人民日报》起草了《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对人们还有疑问的一些问题，如：统一管理是否会降低下级组织的积极性？把公粮提走，每个月发的经费是人民币，如果货币贬值，下级经费怎样维持？等等，进行了解释。

由于事先统一了认识，事后又作了细致的解释，统一财经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曾经四分五裂的中国，下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财政经济的统一。

## 得饶人处且饶人，发两路“救兵”，调整工商业

继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之后，共和国经济史上的另一件大事即是调整工商业。

1949年底到1950年初，在稳定物价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如1950年春节前后的“四路进兵”（收税，收公债款，发放工人工资而且不准关厂，国营企业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原来设想资产阶级可能会抵挡一阵，没想到他们很快即败下阵来。由于我们采取的许多措施用力过猛，“刹车”过急，到1950年春夏之交，社会经济一时出现了“后仰”现象。

银根紧缩之后，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私营工商户关门、歇业等问题。据上海市统计，4月份大米和棉纱的批发市场交易量，分别比1月份下降了83%和47%；3月份同1月份相比，百货营业额大商号减少了一半，中小商号减少了90%。到4月份，全市倒闭的工厂有1000多家，停业的商店有2000多家。另据统计，14个大城市在1950年1月到4月倒闭的工厂合计2945家。16个较大城市半停业的商店合计9347家。

私营工商业的困难，使资本家与人民政府之间产生了敌对情绪，据上海税务局长报告：补税增税的款子收不上来，资本家赖账的、哭穷的、自杀的、假自杀的都有。上海的大企业家刘鸿生直接致信上海市长陈毅诉苦，说：公债买了十几万万，现要交款，还要纳税、补税、发工资，存货卖不动，资金没法周转，干脆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算了，办不下去了。

资本家躺倒不干了，工人的生活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当时，上海的失业工人有20万，全国大约有100万工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这种状况，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失望和不满的情绪在一部分工人和城市贫民中迅速蔓延。由于不断有厂店倒闭，资本家被索薪的工人包围，有的资本家就煽动，“我的钱都交税买公债给政府拿去了，你们找政府去要好了。”有的店关门停业，门外写“关店大拍卖，为了交公债。”有的职工拿不到工资就分厂分店，甚至发生了抢糕饼铺、游行请愿、撕毁领袖像的事件。经济问题已影响到了社会的安定。

这些现象说明，对资本家不斗不行，斗过了头也不行，得饶人处且饶人，私营工商业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有很大的关系，把他们搞垮并不难，但这样一来必然会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对于私营工商业的这种“休克”状态不能置之不理，必须采取“人工呼吸”的方法，使其“复活”。

对于私营工商业的困难，毛泽东早就有所察觉。1949年底，上海的资本家即通过各种途径直接向毛泽东“诉苦”。

12月30日，毛泽东致电陈云，询问“上海工商业家是否确有这样大的困难，政府是否已允许贷款及贷给多少，资本家叫得那样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有借此抵制公债的意图”。

1950年1月1日，陈云复电毛泽东，对上海的情况进行了解释。电报说：“上海市委12月3日电称，许多大、中厂负债多，难维持，要求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之险。这在当时也是确实的。”电报还说：上海厂商这次困难的原因，是他们在10月15日到11月25日的全国物价大波动中，对波动程度



估计过头，认为人民币会有更大下跌，利息赶不上物价涨快，贪心太大。投机者举债买货，一般厂主宁肯举债开支，也不肯卖货，其利息重至每借1元，月息2元，11月25日起物价稳而且降，出乎他们意外，于是急于抛货还债但愈抛则愈跌，愈不易脱手，急于举新债以还旧债者愈多。因此，物价虽跌，但银根仍紧，利息仍高，许多厂商周转不灵，叫苦连天。相反，天津商人解放以来在物价风潮上经过了三波三稳，经验多，不敢过分冒险，能适可而止，结果无大损失。电报还说：我们于12月8日先拨华东500亿元，大部分用作收购沪厂商品，小部用作贷款，并准备续拨1000亿元。

上海12月份的情况表明，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已对私营工商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金融物价不稳定，一向是中国经济的大祸害，不认真对待，是解决不了的。当时，金融市场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是货币的财政性发行。要稳定物价，就得紧缩通货；紧缩通货，工商企业必然受影响。在实践中，这两方面都掌握得恰到好处，很不容易。因此，春节前后，为了进一步稳定物价，我们还是采取了一系列紧缩通货的措施。这些措施使私营工商业的困难更加严重。

1950年初，上海市长陈毅先后6次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上海工商业面临的困难。工商界叫苦的面也越来越大，毛泽东深感问题严重，必须予以解决。因此，在1950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他还说：“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

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思想，指出：“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

作为经济工作的主帅，对于稳定物价过程中采取的一些措施所带来的负作用，陈云也早有警惕。1950年4月12日，中财委召开的党组会即专门对调整工商业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陈云在会上发言指出：“我们既在经济上承认四个阶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就要让他发展，有困难就要帮助。”“对资产阶级无非有两种办法，一是不给‘油水’；二是给一点‘油水’，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再拿回来。二者必居其一。我主张从预算内划出一部分，给资产阶级一点‘油水’，这对我们更有利。”他还说：“给‘油水’也有一个如何给法的问题。一是税收放宽；再就是说收下放宽，银行给贷款。后种办法给了好处，人家也不知道；前一种办法给好处在明处。所以，还是实行前一种办法好。”他提出：“今后要多照顾一下别的阶级，可以定下一条，明年从预算里让出一部分，叫做‘合作费’，用以解决与资本家的合作问题；国家订计划也要把私营部分包括进去。”

毛泽东讲话以后，陈三对这个问题更加重视。1950年5月，中财委召开

了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 7 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调整工商业的专题发言，他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现在政府挑得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要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要顾此失彼，“按下葫芦又起瓢”。

在七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再次就调整工商业问题进行发言。说：今年夏征要减少，秋征也要减少一点。税率在三五年内，一般的不提高，一部分还可以略为降低一点。中国经过了 12 年的战争，人民很苦，这是第一。第二，照老规矩，开国的时候，对老百姓总应该好一点。我们现在是开特别的国，这一个国不同于大清帝国。也不同于北洋军阀、蒋介石那个国，对人民当然更应该好一些。

怎样才能减轻人民负担，调整好工商业，“对人民好一点”呢？陈云经过反复思考，除了一般地减轻税收，缓催公债外，提出了两条主要措施，即：加紧收购土产，恢复城乡交流；扩大加工订当时，工商业困难的一个主要表现是产品卖不出去，而产品卖不出去的主要原因则是老百姓特别是农民手里没有钱。有人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扩大，因此，主张从降低工业品的价格入手解决这一问题。陈云认为降低工业品的价格很难办到，而且这也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认为造成工商业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多年的战争使城乡交流隔断了，农产品收不上来，农民手里没有钱，因此，工业产品也销不出去。他还仔细地算了一笔帐，他说：现在，仅猪鬃、桐油、茶叶、鸡蛋、药材等项，平均约占农业收入的 10%，有的地方占 20%，甚至更多，如去年全国产粮以 2400 亿斤计，土产收入即相当于 240 亿斤粮食。去年公粮大概是 220 亿斤，如果帮助农民把土产推销出去，农民的收入就相当于交公粮的数量。农民有了钱，工业产品就好卖了。因此，陈云主张 1950 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大力收购土产，恢复城乡交流上。

加工订货实际上是国家出钱买私营企业的产品，这就更加保证了私营企业产品的销路。这对处于“休克”状态的私营企业来说，不啻为一种人工呼吸。

实践证明，陈云同志提出的这两条措施是非常有力的，由于这两条措施和其他一些配套措施（如在原料供应、资金供给等方面，实行公私大体平等的原则；划分公私经营范围；调整价格政策，使私营零售商有利可图；适当减轻税负，简化征税手续等。）的实施，到 1950 年下半年，全国的工商业即开始活跃起来。1951 年：月，陈云在总结去年调整工商业的工作时指出：“去年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是税收、公债、货币回笼、收购四路‘进兵’，一下子把通货膨胀制止了。3 月物价稳定，5 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民有钱就可以买东西。到 9 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

调整工商业的各项措施收效以后，解放初期稳定金融物价的斗争即告一段落，从此中国经济开始步入正轨。后来，陈云对这一段的工作曾作过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说：当时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一统一调，“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整顿财经队伍，消除“三”  
反”、“五反”后遗症  
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一统一调，天下大定之后，陈云开始着眼于财经队伍的整顿。建国初期稳定金融物价的斗争表明，我们这支新组建的财经队伍是有战斗力的。但不可否认，这支队伍还很年轻，很不成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这些缺点和不足拿陈云的话说主要有两条，一是政治不强，一是业务不熟。对于财经队伍中存在的这些缺点和不足，在稳定金融物价的过程中陈云即已开始注意纠正。在上海会议上，陈云就提出，要把各地的财委建成一个有思想、有战略眼光的司令部，但那个时候，由于要应付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的进攻，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被提上正式日程。金融物价稳定之后，一方面时间相对宽余了，另一方面，在工作过程中，财经队伍的缺点和不足也暴露的更加充分了。因此，金融物价稳定之后，这一问题，也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七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在《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的发言中指出：“财经干部经常注意政治是必要的，做财经工作的人，一天脑子里就是数目字，经常转财经工作本身的问题，其他方面考虑的就很少。要经常政治上提醒他们，如果没有群众观点，没有政治观点，就很容易出毛病。”

1951年4月，在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陈云再次提出：“在经济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十分重要。经济干部一天到晚是打算盘搞数字，很少看到全局。为克服这个缺点，使他们不犯错误，每星期抽两三个钟头学政治是必要的。”

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把整顿财经队伍的任务，提到了全党的面前，指出：“财经干部的教育工作，要由地方来做，因为90%的干部不在北京。教育内容主要是为人民服务。要批评和克服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以及片面性和单纯技术观点。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把财经队伍整顿好了，对党有利。但这并不容易做好，没有全党努力是不行的。希望地方党组织帮助做好这件事。”

陈云之所以反复强调，财经工作人员要有政治观点，是有所指的。这与不久前，毛泽东对一些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情绪的批评有关。建国初期，为了稳定经济，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有些同志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同资产阶级斗争，忘记了《共同纲领》中的一些基本内容。

例如，1950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五种经济成分虽然都要发展，但要先公后私。在走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是“允许、限制、排挤”。发言主张国营经济应无限制地发展，还说，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

中国人民银行这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发言，并不是个别现象，中南区有一位参加全国财经会议的同志在回去传达会议精神时也是这么说的。这件事首先引起了周总理的警觉，他把银行负责同志的那个发言打印出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很重视，做了许多的批注，送给了刘少奇、朱德、陈云等。

毛泽东在上述发言的“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一语旁批注，“不对！今天斗争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经济之目的。”毛泽东在批注中还指出：“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者，他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毛泽东的这一批注和后来他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不要四面出击》的发言，实际上是对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对资产阶级的“左”的情绪的一种严厉的批评。这也说明，财经工作人员政治性不强，财经工作中没有政治观点的问题，已经在全国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正因如此，七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特别注意纠正财经工作中缺乏政治观点的倾向。

在强调财经工作要有政治观点的同时，陈云也特别强调财经工作人员要熟悉业务。对业务工作不熟悉、不精通，实际上是当时我们的财经工作队伍中存在的一个更主要的毛病。对此，陈云有着清醒的估计，1951年4月，他在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过去长期在农村工作，经济知识很少。去年虽然实行了财政经济的统一，稳定了市场，建立了贸易公司，办了合作社，但我们的经济干部，同一个普通资本家比较，还是外行。我们靠的是集体力量，有我们的党，有我们党领导下的一套经济机构，才有作用。如果一对一的和人家比，是比不赢人家的。”

这一估计，并非妄自菲薄。对于经济工作我们的确有许多外行的地方。过去战争年代，军队打到哪里，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一个税务局长，收、付等等都是这几个人。现在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的财经制度，许多人还很不习惯。如解放初的银行干部，过去大多是背干粮袋、当勤务员、警卫员的。过去让他们管金库，领导上只要告诉他：“你就睡在那个装钞票的麻袋上边，不要丢掉就行。”但现在管钱，借款、存款、缴税，都要到银行里去，有的人连帐都算不清，很不适应。

解放初期，我们的税务干部，由于不熟悉业务，就闹出了鸡蛋上贴印花税票的笑话。当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我们曾提出要整顿税收。这主要是指加强对大宗货物如纱布、烟草等的税收，并没说鸡毛蒜皮都要收税。但税率发表后，税目没有发表，底下一些“认真”的同志，不知道哪些该收税，哪些不该收税，只好什么都收，在鸡蛋上也贴上了印花税票。

当时，财经工作中一个最大的缺点是不懂得经济核算。对于这个问题，陈云抓得最紧，他曾多次指出，一定要搞经济核算。1951年，针对我们办的贸易公司，只知道完成任务，不搞经济核算的问题，他曾严厉地指出：“贸易公司要搞经济核算。”要告诉他们，“要搞的是经济，不要搞‘政治经济’。譬如，货物从上海出厂，转到天津，北京再到保定，然后再到石家庄，这个路线不是按经济原则，是按着政治系统，像这样做买卖怎么能不赔帐呢？这叫货物旅行，翻毛大衣应摆在天津、上海或北京去卖，但却拿到西安去。再如，天下雪了，发去的货物却是汗衫。私人资本家是不会这样干的。我们是依靠国家机构，按真正的经济原则来讲，统统要赔钱。”

不但做买卖要搞经济核算，陈云认为办工厂、办企业也要搞经济核算。这实际上是针对过去“供给制”思想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工作方针。许多同志在过去供给制的条件下工作习惯了，新的条件下，让他搞经济核算不习惯，

动不动就说：“你还不信任我吗？你把钱给我，我负责就行了。”孰不知，过去我们吃这样的亏太多了。

解放前，解放区军民曾在大行山区修过铁路，当时一说修铁路，大家都很热心，于是，事先也未进行核算和设计，很快就从两头开始修建，等快修完了，中间碰到一座大山，过不去，没办法，只得将铁路拆掉。

有个地方发现有煤，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买来机器，盖好房子，就往地下挖，挖下去以后，发现煤层很薄，根本没法开采，只好停止。

还有一次修运河，运河挖好后，放水的时候，中间的一个地方是沙底子，水到那里后都漏掉了，运河也白修了。

解放后这样的事也发生过。当时要在天津盖一座仓库，有位领导人也像过去打仗一样，一看地形，说：这个地方很好，就在这里盖房子。房子盖好后，一下雨，仓库塌下去了。像这样的冤枉钱不知花了多少。

正因如此，陈云反复强调，“搞基本建设，事前一定要设计。一般的工厂设计工作要一年以上，要看这个地方的地层怎么样，水够不够，水的化学成分对锅炉有什么损害，等等。我们是从乡村出来的，往往不大懂这一套。我们现在还不会，要从头学起。必须学会经济核算，算一算帐，力求省一点。”

他还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是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外行办事总是要吃亏的。偶然浪费少数钱尚可请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的。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陈云不但要求大家要有经济头脑，要搞经济核算，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为大家作表率。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址的选定，就是一个典范。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去苏联访问时，曾同斯大林商定，由苏联帮助我国建设一个汽车制造厂。1950年12月，苏联派两位汽车专家到北京，根据苏方的建议，准备帮助我国建设一个年产3万辆吉斯150型载重汽车的工厂。当时对于汽车厂址选在哪里，有很多种意见。有人主张设在首都北京，有人主张为了战备的需要，设在西安。也有人主张设在石家庄或太原。陈云主张不急于下结论，应首先进行认真的讨论和反复的测算。经过认真的核算，这些地方都不行。因为要生产3万辆汽车，电力就需要2.4万千瓦，钢铁一年需要20几万吨，木材也要2万立方米，此外还有一个运输问题。这些条件北京、西安、石家庄、太原都不具备，只有东北才有这样的条件。因此，最后陈云决定厂址选在东北的长春。后来建设的实践表明，陈云主持制定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一汽的建设非常顺利，厂址选定后，1953年7月15日在长春举行了开工典礼，仅用了3年的时间，1956年7月15日就组装出了第一批国产解放牌汽车。

正是由于建国伊始，陈云狠抓了财经队伍的整顿，及时提出了经济工作由供给制向经济核算制的转变，使我们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也培养了一批有经济头脑的人才。

## 采取迂回战术，向毛泽东反映“三反”中的问题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开始考虑革命胜利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延安整风时期，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特地把这篇文章列为整风必读文献，让党的高级干部反复阅读，目的就是要使全党把李自成的教训引以为戒，避免犯同样的错误。1945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说的一段话，更使毛泽东触耳惊心。黄老先生积几十年之经验深刻指出：“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这话虽然不吉利，但也不乏道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因此，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向全党发出警告，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的这段话可谓经典之作，但毛泽东的用意是要引起全党的警惕，并不想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然而，毛泽东的话却不幸言中。

建国后不久，党内即出现了有损共产党人声誉的腐败现象。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刘青山、张子善。

刘青山、张子善分别于1931年和1933年入党，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刘青山参加过1932年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曾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公正地说，他们的确曾经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曾经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地奋斗过，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进城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他们利用职权，盗用公款达171亿元（旧币），还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盘剥民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刘青山、张子善身上，类似的问题各地也时有所闻。这些问题揭发出来以后，毛泽东极为震惊。为了坚决地根除这种腐败现象，1951年底，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一运动的发动应该说是非常及时的，它使我们党的干部在建国伊始就经受了一场反腐败的洗礼，树立了良好的风气。特别是运动中对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处理，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而且几十年之后，人们仍记忆犹新。

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刚刚执政，对执政党的建设还缺乏经验，因此，“三反”运动中也出现了“过火”和扩大化的问题，伤害了一些干部，使财经工作一时出现了混乱的现象。这与毛泽东对整个干部队伍的估计和领导这一运动的方式也有一定的关系。

也许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对毛泽东的震动太大了，他对当时干部队伍中的腐败问题估计得非常严重，因此，对“三反”也抓得非常严厉。

运动发起以后，1951年12月30日，毛泽东收到谭政关于开展“三反”问题的电报后，觉得中南军区动作稍缓，即于元旦凌晨两点起草复电，要求

他们对运动要“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并对来电不妥之处作了修改，派专人连夜乘专机将修改稿达到，以引起中南军区的高度重视。

1月4日，毛泽东又起草致各地指示，要求各地“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展开斗争，送来报告”。并说：“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在毛泽东的督促下，“三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进入1月下旬后，运动开始向纵深开展，进入打“老虎”（当时，人们称贪污犯为“老虎”，故有“打虎”之说。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阶段。

进入“打虎”阶段后，毛泽东对运动的指导更加重视。1月23日，他在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指出：“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

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

电报还说，“在这方面，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

1月24日，他又致电各大军区和中央局，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分局和省市区党委，要求“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

在毛泽东的严厉督促下，各地打虎的数目开始节节上升，中央一级单位，在1月20日之前还只承认有几十只大老虎，到1月27日，已捉到和认为可以捉到的即达400只：财经部门200只，军事部门100只，政法文教和党的部门100只。这些还都是1亿元以上的大老虎，1000万元以上的小老虎未计入。中央一级单位共12万人，共清出贪污分子1万人。

华北局提出，像山西这样的省应有大小老虎1000只至1300只，其中应有大老虎100只至130只；华北军区过去打虎成绩甚微，经过严词督责，在5天之内也突飞猛进，“捉虎甚多”。

惯于在运动中“露脸”的高岗成绩更为显著，到1月26日已在东北捉了500只老虎，清出了大小贪污分子16万多人。2月3日，他又电告中央，把打虎数目增加到了2000只。

打虎运动也深入到了农村，平原省的武陟县县级机关到2月初已清出1000万元以上的老虎18只。另据河北省香河县9个村的初步调查，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多者占村干部总数的72%，少者占13%，平均为33%。9个支书中7个贪污，9个村长中8个贪污。

各地报来的不断加码的打虎数目，反过来又使毛泽东感到问题更加严重，据他根据各地报来的情况估计，“每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只至三千只”。根据这一估计，2月初毛泽东又进一步提高了对各地的要求。

2月4日，他在给谭政的电报中指出：“你们1月31日给我的报告所述对各省任务的分配数目都太少，是不合实际的，必须指导他们逐步增加。特别是广东军区系统包括海防和各军在内至少有几百只乃至上千只大中小老虎，而你们只分配该军区大老虎二十只，中小老虎一百八十只，这是完全不适当的。你们对各省压力大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想，特别对广东是如此，望注意改正。”

2月5日，他在批转山东分局打虎报告时又指出：“像山东这样的大省，有党、政、军、民、学五个方面，有十几个大中城市，有很多分区和县城，一千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我提议分局立即召开一次打虎会议，规定打虎数目，限期完成任务。上面每天用电话催督一次，下面每三天用电话或电报汇报战绩一次。军区系统打虎也不起劲，应由分局负责统一指挥他们。无论何方面，凡打虎不力者应予批判，严重者撤消职务。”

毛泽东的严厉督促对“三反”运动的迅速展开和深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他对当时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的过高估计和直接下达“打虎”数字的做法，也给基层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从而使运动出现了“过火”的问题。如有的地方出现了逼供信的现象；有的机关干部都打虎去了，正常的业务工作没人管了；有些财经机关的干部因怕当“老虎”，上街是几个人一起去，跟资本家谈话也得几个人，一个人不敢讲，电话一个人也不敢接。有的工作人员为了表示与资本家划清界限，对私营企业验货的规格搞得特别严，标准特别高，“次货”高到百分之六七十，甚至80%。上海有的地方在验乒乓球时，还要用显微镜一个一个地照。有的人索性就不想干了，提出要调动工作。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特别是财经工作的秩序。

对于“三反”运动中出现的这种“过火”现象，直接领导财经工作的陈云觉察较早，2月8日，在政务院第123次政务会议上，他就针对“三反”对农村造成的影响，提出，“春耕时节乡下不能搞‘三反’，这点应该写在文件上。”

陈云对建国初期财经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的估计与毛泽东也不大一样。他认为，在财经队伍中，“贪污的人是有的，但是比例不大。原因就是现在吃穿难，穿上政府的衣服，挂上那么个牌牌，名誉、前途是要紧的，如果贪污被赶走，就不能在政府里边工作了。”

但当时，毛泽东“打虎”正在兴头上，不好直接进言。然而，有问题向上反映又不是陈云的风格。于是，陈云采取了一种迂回的办法。2月15日，政务院会议开完后，陈云和薄一波找到了周总理，向周总理反映了“三反”运动中出现的业务停顿的问题，特别是业务停顿的问题，认为，这一向题，已到了“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希望周总理能向毛泽东反映。

与陈云谈话后，周恩来当天即致信毛泽东，说：“今日政务院会议后，同陈云、薄一波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照中央一级三反斗争的情况看来，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是完全可能的，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各部门业务如果没有领导同志来管是无法进行的。”

接到周总理的信后，毛泽东也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2月26日，即在接到周总理信的第二天，毛泽东即在信上批示：“周总理：我完全同意你的意



见，请速予调整。”

其实，几乎在向周总理反映问题的同时，陈云已开始了这方面的调整工作。2月24日，中时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财委和各级财经部门在“三反”运动中抽出一定力量，进行当前必需的业务工作，如贸易、税收、生产、运输等，并决定贸易部立即恢复收购土产及加工订货等工作。

毛泽东对周总理的信表示同意后，陈云更加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3月25日，陈云签发中财委致各大区时委负责人电，指出：在“三反”运动中，各地亟须恢复财经业务工作。要随时掌握动态报告本委，并定期作出综合报告。

4月30日，他在批转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关于第一季度生产情况的简要报告时，再次指出：“三反”运动的建设阶段，是深入民主改革的补课工作，“三反”运动的成果必须具体地表现于经营管理的改善上。

由于及时采取了调整的措施，“三反”运动中出现的财经工作秩序混乱的现象，迅速得到了制止。

另外，由于陈云、周恩来的及时提醒，进入3月份后，毛泽东也不再直接向各地下达“打虎”指标，4月份以后，毛泽东即开始布置“收兵”，准备结束“三反”运动。这样“三反”运动中出现的过火现象，没有再进一步扩大。

## 消除“五反”后遗症，使资本家“难忘1953年”

在发动“三反”运动的同时，毛泽东还发动了“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与“三反”运动不同的是，这次运动主要是针对不法资本家的。

建国初期，特别是财经统一、物价稳定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大多数资本家是守法的，对恢复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难改，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犯罪活动也越来越猖獗。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拉拢、腐蚀我们的干部，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些犯罪活动，在“三反”运动中不断被揭发出来，而且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如当时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勾结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处长李廷琳共同作弊，高价卖给公家，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帐，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约61亿余元（旧币）；该药行因此从3年前的一个很小的行商一跃而成为巨贾，并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均设分店。丛对李则逢迎奉承，送礼、请客、代找舞女、代雇厨师，甚至令其姨太太陪李跳舞。本溪市还发现投机奸商先以请客施贿引诱我工作人员上钩，尔后则以告发威胁其与之继续合伙盗窃国家资财。

不法奸商的犯罪活动，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如在治淮水利工程中，承包商竟然不顾工程质量，用旧料充新料，次料充好料，从中赚取不义之财。更令人气愤的是，有的不法奸商竟敢在运往抗美援朝前线的军需物资上作文章。如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骗取志愿军款子3亿元搞投机，将失效药品供应前线的战士，使许多战士的生命受到威胁。

投机商的活动，也开始重新影响市场的稳定。1950年8月，京、津糖价暴涨；1951年北京碱价波动，就是不法资本家从他们安插在我们机关内部的坐探那里窃取经济情报后，有意制造的。

所有这些都说明，不法资本家的活动已开始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到了必须予以打击的地步。正因如此，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向全党说明：“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

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此外，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对发动“五反”运动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进城时，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警惕，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变化？这要从进城三年的历史来看。1950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急待去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出击，全面出击是很不策略的。所以，七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提出调整工商业。到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这一年多时间年，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

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他还说，“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情况。一部分，人家打进来；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1950年自发地搞社会主义，想搞垮资产阶级，是不对的；后来，又自发地搞资本主义，资本家向我大举进攻，也不允许。……要整党内那些买房置地、入股、当董事经理的人；同时也要搞不法的资本家。这是一场恶战。”

毛泽东对“五反”运动是非常重视的，许多问题都亲自抓。但应该说，在整个“五反”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是比较谨慎的。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主要是想通过斗争达到团结资产阶级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整垮资产阶级。这从他到中宣部的批评也可以看的出来。

当时，理论界的一些同志没有很好地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在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上发表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两面性。毛泽东发现后，批评得相当严厉，中宣部为这件事专门作过检讨。

“五反”运动后期，对一些较大的工商户的处理也是比较轻的，如荣毅仁先生家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运动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当时，对荣家企业应该划为哪一类曾产生了一些争论，有的同志主张划为基本守法户，毛泽东知道后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

尽管如此，“五反”运动，作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对资产阶级不法行为的运动，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作用，出现了一些后遗症。

工商资本家最集中的上海在斗争不法资本家时，就出现了戴高帽子和体罚的现象，致使48名资本家自杀，死了34人，从而使得整个华东地区的资本家惊恐不安，并用歇业、停工的手段来要挟我们，大批私人工商户停业、半停业，使经济活动出现严重的堵塞现象，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军事订货减少，商品货币流通遇到了障碍。

华北地区也出现了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的问题，华北地区1952年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市新歇业的私营工商户有4000家，影响到40万人的生计。

西南地区，据邓小平的报告，问题也相当严重：一季度的税收减少了一半，重庆一区有两万人失业（占该区人口的1/3）到了无食或缺食的地步，敌特也开始乘机兴风作浪。

“五反”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如不妥善处理，很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

“五反”运动初起时，陈云正全力投入“一五”计划的制定，但他仍然始终密切注视着经济发展的动态。对于“五反”运动可能产生的负作用，陈云也早有预计，为了防止“五反”运动中可能出现的市场停顿，1952年2月20日，他就要中财委发出通知，希望国营贸易公司赶快扩大加工订货。事实证明，陈云的预计是正确的。“五反”运动中，安徽一些农村就发生了农民砸合作社的问题，原因就是“五反”运动中，私商不做买卖了，合作社不能包机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农产品卖不出去。

农村中发生的问题也是城市发生问题的信号，正如陈云所说：“如果天

津这些地方出产的热水瓶、皮带等东西国家不收购，工人也会这么干。”“五反”运动中，由于我们扩大了加工订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停滞的现象，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五反”运动后期，陈云又开始全力投入消除“五反”后遗症的工作。

当时经济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市场死滞，要使市场活起来，首先就必须使私营工商业活起来，而要使私营工商业活起来，就必须首先减轻他们的负担，不要对他们挤得太急。因此，1952年6月的统战工作会议上，谈到公私关系时，陈云首先就强调“五反”之后的退赃补税要合适。他说：“现在我们算资本家的‘五毒’帐，是不是算多了一点，是否有点像在农村曾经有过的那种苛刻的算法：一只老母鸡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鸡，鸡里面又有多少公鸡多少母鸡，母鸡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鸡……我看是有的。”他还举例说：“蚌埠有150家工商户，资本只有1.5万亿元，要退补的就达3万亿元。浙江省有几个工厂，‘五毒’帐超过了加工订货的全部收入。算的太多了，恐怕站不住脚，也会把真正的‘五毒’放过去。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把它核减下来，核减到恰当的程度。”

在这次讲话中，陈云还指出：“要成立一个接受申诉的机关，如果资本家认为算的太多了，可以申诉。对资本家要加以照顾，缴退补款的时间可以拖长一点。”“五反”之后，资本家最关心的就是退补的问题。对此，陈云特地指出：“你不能大补就小补，小补还不行那就不补，明年再补。”这实际上是给资本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对于陈云的这种做法，也有许多人想不通。他们认为，这回我们好不容易从资本家那里搞到这么多钱（当时估计退补的数字达30几万亿元）怎么轻易就放弃了？这些同志不明白，实际上，我们不可能从资本家那里搞到这么多钱，如果一定要坚持退补，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1952年第一季度，“五反”运动搞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搞到几个钱，税收反而少收了5个亿。为了使一些干部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陈云算了一笔帐，他说要“先收税后补退。税收最要紧，神圣不可侵犯。财政部没有钱，什么事也干不了”。“退补大概能收到4万亿元，税收要收到70万亿元。只有把小的放松一下，把大的收起来，等市场活了以后，那4万亿元也就可能收起来了。如果先补后收，很可能因小失大。”

税收在当时的财政收入中的确是一个大头。应该说，人民政府的税收在当时也是下轻的，看起来人民政府的税率都是接收孔祥熙的，而且还精简了一点，但人民政府比国民党时期实收的还要多。当时人民政府一年的税收，大约合23亿元光洋。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前，包括东北在内，也不过收8亿到9亿元光洋。所以上海的资本家说：“国民党复杂简单，共产党简单复杂。”国民党税务条例多得很，形式上复杂，看起来不好办，事实上很简单，只要贿赂一下就行了。共产党办银行的也好，办工业的也好，搞税收的也好，都是从山沟里来的，土头土脑，看起来简单，但是他们很认真，搞什么事情就开会讨论，一开会就“复杂”了。

陈云提出的这种先税后补的办法是非常有眼光的，这样对资本家挤得不那么急了，他们可以放心的经营了，市场就活了。对我们来说，既通过“五反”打击了资本家的不法活动，经济上也可以少受损失。

由于“五反”后期我们采取了这些正确的措施，“五反”运动的后遗症很快就消除了，没有带进“一五”计划时期。“五反”之后，我们的财政收

入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不断有所增加；资本家原以为这下过不了关了，后来也大部过关了，私营经济到 1953 年又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许多资本家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感慨他说：“难忘 1953 年。”

高、饶联手向党发难，财经  
会议平地起风云；毛泽东急  
令周恩来北戴河“搬兵”，请  
回陈云，平息风波

1952年底、1953年初，经过3年的努力，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并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然而，陈云却因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积劳成疾，病倒了。陈云的病入院治疗后虽有好转，但根据苏联大夫和保健医生的建议，必须长期休养。于是，1953年3月以后，征得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同意，陈云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先到南方，后到北戴河休养。但是，陈云开始休养后不久，1953年6月，高岗、饶漱石即利用党中央批评新税制错误的时机向党发难，在财经会议上掀起了一场风波。在这种情况下，7月底，陈云不得不结束休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回到北京，协助周总理平息这场风波。

## 高、饶野心的膨胀

财经会议风波，实际上是高岗、饶漱石试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一场阴谋。因此，要真正理解这场风波的实质，还必须从高、饶个人野心的膨胀说起。

实事求是他说，高岗和饶漱石在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做过一些工作，有一定的功绩。但是，他们的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改造（高岗在陕北搞游击战争时，就曾因乱搞女人等丑恶行为差点被刘志丹枪毙，他的这些恶习后来一直没有得到改正）。因此，随着革命斗争的胜利，以及他们在党内地位的日益提高，他们的个人野心也开始急剧膨胀，以至最后走上了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道路。

高岗此人的确“聪明”过人，他的这股“聪明”劲在解放战争中就曾有过出色的表演。据回忆，东北解放战争中，他在指挥部队作战时，从来不但其他人那样急着追击敌人、抓俘虏，而是首先抢占仓库，这样不但可以在战后报功时说明他缴获的东西多，而且还可以从中捞到很多实惠。

解放后，高岗仍然不断施展他的“小聪明”。他任东北局书记时，特别注意探听中央的意图，一旦得知中央将有什么举动，即在东北先行一步。这样就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高岗这个人很有眼光，处处都走在全国的前头，甚至走在中央的前头。高岗的这种手段在当时也的确蒙蔽了不少人，连毛泽东对他都非常赏识、器重。因此，他在东北的一些错误未能及时发现（他在东北大搞宗派主义、排挤林枫等领导干部。这些是高、饶东窗事发以后才被揭发出来的）。而高岗也为自己的这种“成功”感到欣欣然。飘飘然，真的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无人能及，个人野心也随之迅速膨胀。

1952年下半年，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这年8月以后，邓小平先由西南局来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高岗、饶漱石和邓子恢、习仲勋等也陆续从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委在当时有“经济内阁”之称，地位与政务院几乎不相上下。应当说当时高岗是很受器重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但是，高岗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还想攫到更高的权力。

1953年初，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现象，根据他的意见，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并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对政务院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总理负责；计划工作和8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互助合作工作，由邓子恢负责；劳

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这是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是高岗竟错误地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周总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他以为自己的权势在日益扩大，地位在不断提高，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务，于是更加妄自尊大，目空一切。

高岗是如何盘算的呢？他心里明白，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而此时，在他之上，在毛泽东之下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周恩来和刘少奇。因此，他把周恩来和刘少奇看作是自己攫取更高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周恩来办事机敏，处世谨慎，高岗难以抓到什么把柄，因此，他就把刘少奇当作主要打击对象。

高岗对少奇同志的怀恨和反对也是由来已久。1949年少奇同志曾批评过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那时高岗即怀恨在心，以后就对少奇同志不择手段地进行报复和攻击，他甚至公然在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面前中伤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科瓦廖夫随即写信告诉了斯大林。

进京以后，他更是有预谋地把少奇同志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的材料，进行传播。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来，他发觉毛泽东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刘少奇有不同的看法，心中暗喜，以为刘少奇今后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就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他写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一文，把刘少奇阐述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的处理问题的观点等（这些观点大都与毛泽东的看法下一致），一概当作所谓“党内的右倾思想”而加以批判。

高岗还经常在他的住地，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散布流言，中伤刘少奇。从苏联访问回来后，他还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

尽管高岗的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少奇的形象，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于是，他开始策划对刘少奇进行集中的打击。1953年初，毛泽东对新税制的严厉批评，使高岗感到浑水摸鱼的时机到来了，因此，他急不可耐地跳出来，要“挖刘少奇的老底”。

饶漱石给人的印象是非常谨慎（他的夫人说他是胆小如鼠），有时连一句话都说不完整。有的人对他的评价是“很有原则性”。刘少奇有一个时期也曾对他非常信任。其实，饶漱石也是一个玩弄权术的行家。40年代整风时期，他就在华中制造事端，打击陈毅，试图把陈毅挤走。他的这一企图果然成功了。后来，陈毅被迫去了延安。刘少奇离开华中后，就由他接任了华中局的书记。

与高岗一样，饶漱石也有着极强的权力欲。他对权力的态度是能捞就捞，能抢就抢，决不“谦让”。建国后，他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就是这样抢来的。

1949年10月以后，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由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担任的，毛泽东西次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陈毅担任，陈毅觉得自己是大军区的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够忙了，推辞说让饶漱石当。毛泽东吩咐



让华东局讨论，饶漱石得知此事后对陈毅说，你不担任我担任。根本没有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名义报中央以他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到北京，毛泽东问及此事，饶漱石撒谎说：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我来担任。这样才骗取了毛泽东的批准。

饶漱石有一套做官和做人的秘诀，即所谓“先小人，后君子”，他所说的“先小人，后君子”与一般的解释不同，他所说的“先小人”就是对有不同意见的人要找个机会给他以狠狠的打击，从而“制服”他；所谓“后君子”就是把已经“制服”了的人拉拢过来为己所用，委以重任。仅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饶确实是一个玩弄权术的人物。

由于权力欲极强，又心术不正，饶漱石常常疑神疑鬼。1952年初，由于他身体不好；中央决定让他到北京休养，这实际上是中央对他的关心，但他却以为中央对他的工作不满，让他到北京是调虎离山。因此，到北京后他显得心事重重，惶惶不安。最后，甚至发展到在毛泽东面前装疯，一定要毛泽东说出是不是对他工作不满。直到毛泽东说出，让他到北京只是为了他休养方便，没有别的意思，如果他想回华东，随时都可以回去。他这才放下心来。饶漱石在华东可谓权倾一时，但正式调到北京工作以后，无论从资历还是从工作能力上讲，他都排不上号。因此，到北京以后，他感到非常着急，也非常孤单。而这时高岗正炙手可热，凭自己的敏感，饶漱石认为，高岗的地位将会不断上升。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有这么一个人做靠山，将是非常有利的。而此时，高岗也正在寻找合作伙伴，这样，高、饶为了“共同的利益”，很自然地走到一起来了。于是也就有了高、饶联手大闹财经会议的一幕。

#### 高、饶抓住新税问制问题，“批薄射刘”

财经会议的起因是修正税制，那么，修正税制又是如何成为高、饶手中的武器的呢？这还要从新税制的实施说起。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中财委成立之初就特别重视税收工作，陈云也曾反复讲过，宁缺一个县委组织部长，也不能缺一个税务局长。因此，建国后不久，政务院就于1950年初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当时国营和合作社营经济还很薄弱，因此，这一税则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国营和合作社经济进行了适当的照顾，如：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纳税；委托私营企业加工只就工缴收益按工业税率纳税，私商为国营企业代购代销产品，按实际所得的手续费征税；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纳1年所得税，营业税按2%的税率征收，并打8折；新成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免纳营业税和所得税3年，等等。

1952年下半年，税收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由于五种经济成分不断改组，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在经济中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加工订货及代购代销等经营方式日益扩大；私营企业主看到一些国营经济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不纳税，亦更多地采取“产零见面”的办法，即工厂直接售货给零售商或委托零售商代售，以逃避一道批发营业税。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而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又要求不断增加税收。一方面原定的税难以收上来，一方面税收任务还要增加，再加上“三反”、“五反”刚结束，资本家叫苦，这些原因决定了税制必须修正。

前面说过，“五反”以后，陈云即全力投入了制定“一五”计划的工作，

对中财委的一般性工作很少有时间过问，因此，中财委即在薄一波的主持下，研究了修正税制的问题，并于1952年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颁发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决定于1953年1月1日起实行新的税制。

这次修正税制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保税，一是简化税制。但是，这次修正税制由于事先没有广泛征求意见，有些问题考虑不周，变更了纳税环节，并不恰当地强调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因此，修正后的税制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波动。1953年1月9日，山东分局向明等3人联名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1月11日，北京市委也写情给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新税制引发的的问题，很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1月1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指出：“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信是周总理先收到的，周总理从毛泽东措词严厉的信中已感到问题严重，赶忙连夜给毛泽东写回信，谈了处理办法。据薄一波回忆，他接到信后的心情也“半是沉重，半是茫然”，“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

尽管事后不久（2月10日），中财委即责成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3人联名写信向毛泽东作了说明，财政部又专门就此事向中央汇报了一次。但毛泽东仍就此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的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这次批评的语气比信中又进了一步，并且把错误提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

高岗向来善于探测风声，看到毛泽东批评“右倾机会主义”，以为把水搅浑，借机搞倒刘少奇的时机到了。

高岗早就在几件事上对薄一波心怀不满，一是“东北一党员信”。这封信是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写的，1952年1月27日通过薄一波转给了毛泽东。信中揭露了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问题。薄在把这封信转给毛泽东时还写了几句话，说：“这封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况，写信的人是响应主席的号召，衷心爱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恨。”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件事使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故意给他抹黑。二是“鞍钢检查组”问题。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了八号高炉钢管瓦斯部分爆炸事故，死11人，伤15人。1952年8月，由中监委和中财委联合组织了一个检查组去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检查组认为这是鞍钢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不仅造成了事故，还推迟了建设进度。高岗对此事也大为不满，认为薄一波专挑东北的毛病。因此，一直想寻机报复。

这次毛泽东批评新税制，高岗终于扰到了一个出气的机会，他想趁此机

会很整一下薄一波，并借批评薄一波“右倾机会主义”之名，影射刘少奇，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因为怀有这样的目的，财经会议开始不久，高岗即在底下鼓动一些人“放炮”，有些人本来就对新税制有意见，在高岗的鼓动下，对新税制和薄一波的批评更加激烈。有些人甚至把新税制的错误上升到了路线的高度，认为这是路线错误，中财委内也存在两条路线。

高岗在鼓动他人的同时，还亲自上阵对薄一波大加挞伐，他在批判薄一波的发言中，无限上纲，把“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品质不良”等大帽子都扣在了薄一波的头上。为了达到影射刘少奇的目的，他还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刘少奇曾说过的和毛泽东意见不大一样的话都按在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如刘少奇1947年在土改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讲过的关于现阶段对待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态度，1950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谈话中的观点，1951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一些话等。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高岗记混了，把刘少奇的话当成薄一波的了，其实，这正是高岗“批薄射刘”的诡计。

在高岗对刘少奇和薄一波进行猛烈攻击的同时，高岗的追随者饶漱石也紧随其后。他不但在同期召开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借批评安子文之名，讨代刘少奇，而且，逼迫安子文等人在新税制问题上表态。从而使财经会议气氛更加紧张。

由于高、饶的干扰，财经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新税制和薄一波的会议。

## 周恩来请来援兵，为薄一波“解围”

财经会议后期，毛泽东也发现会议走偏了方向，有些不大对头，因此，希望早点结束会议，要周恩来尽快做结论。但是，会上对薄一波的批评非常激烈，调子一直居高不下，周恩来觉得结论非常难做。周恩来当时是会议的主持者，如果话说轻了，会上不好通过，而且有力薄一波开脱之嫌，话说重了，又会被高、饶利用。

正在周恩来左右为难之际，毛泽东为他想了一招妙棋。毛泽东对他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陈云和邓小平对薄一波是比较了解的，也比较欣赏他的才干。尤其是陈云，解放后，他和薄一波分别是中财委的主任和副主任，薄一波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许多问题，他们都是共同研究的。对于薄一波，陈云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还在北戴河休养的时候，一些人去看望陈云，同他谈到财经会议的情况，陈云当时就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因此，此时，毛泽东提出要请陈云回来，实际上也有为薄一波解围的意思。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7月下旬，陈云回到了北京。稍事休整和准备后，8月6日，陈云即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首先对新税制的问题作了分析，指出：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一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办法应该考虑，新的税制对税收减少缺乏分析，因此提出的补救办法是错误的。新税制的错误，其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

在谈到薄一波的问题时，陈云首先指出：几年来，薄一波在中财委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即令是事务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人顶住事务，中财委的工作是不行的。陈云的这段话一言九鼎，首先肯定了薄一波的成绩。

针对有些人提出的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陈云也指出：“同志们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4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实际上，1953年的财经会议之所以开得非常紧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高、饶的干扰，但他们借机兴风作浪，也是由于我们财经工作中存在一些缺点，地方的一些干部有牢骚。因此，陈云在发言中，还就当时人们关心的一些财经工作中的问题作了广泛的解释和说明。

关于财政工作中的问题，陈云指出：“统收而不统支，收入统一，支出不保证，下面有很多困难。毛主席提出一起收上来，支出要给足。这样，只做到毛主席指示的一半。中国地区这样大，财政经济还未完全走上轨道，因此很同意会议中同志们所提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的制度，做上几年。”“大区财政对条条经费要能做一定程度的调剂，所谓专款专用，要分别处理。有些部分要保存，有些部分要加以改变，如工业投资要保存，盖厂房的钱不

能用于盖大礼堂，但地方上的经费绝大部分是行政公教人员的生活办公费，可以调剂。”

关于会上提出的针对中央财经工作部门的“单纯财政观点和财政机关比别的机关高一等”的批评，陈云说：“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需要在思想上加以克服，而且在制度上加以改革。”

关于财政问题，陈云还指出：“今后国家财力的使用上，地方有困难，过不去的，要照顾，解决地方上必须解决的困难。”“但总的趋势是，财力只能集中使用于建设的主要方面。使用的钱应放在能使我国在经济上起重大变化的方面，对国家飞跃有重大作用的方面。”

物价问题，也是当时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对此，陈云也作了解释。他说：我们国家若干物价偏高，是有许多原因的。有些是人为的，有些是自己升上去的。“去年九月以来，对降低物价，我是犹豫的。也是担心利润下降，因为屁股后面拖着军费。军费不能短少，而且火烧屁股，因为打仗的事情不能随我们作主。去年艾森豪威尔登台，要进行两翼登陆。就得首先保证军事上的供应。预算中相当大的比重，是军事预算，直到朝鲜停战签字前，我们没有脱离军事预算对财政的影响。”

此外，陈云还说：“在物价问题上，不能草率。在我国有私商存在的条件下，简单的降低物价，并不能达到有利于人民的目的。有时物价下降，消费者并不能受益，因为中间商可以乘机囤积，等我们卖完了，他们再提价，赚大钱。”

关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问题，陈云也指出：“缩小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的可以做到。我有责任说清楚，不要以为很快可以缩小，资金还要从工业中拿出来扩大再生产。”

陈云这么一讲，把问题都讲清楚了，也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在讲话中还主动承担了一部分责任。大家听了都觉得入情入理，有说服力，心情舒畅了，意见也就逐渐统一了。原来集中在薄一波身上的批评也很自然地转移开了。尽管高、饶还想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但也无力回天，只好暂时作罢。

后来的情况表明，毛泽东让周恩来北戴河“搬兵”请回陈云这一招的确是非常高明的。事过几十年之后，薄一波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说：“在高、饶问题尚未揭露，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同志的这些话，无疑起到了降温和替我解围的作用。”

陈云讲话之后，周总理的结论就好做了。8月11日，财经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大会，陈云主持会议，周恩来作了总结报告，延续了两个多月的财经会议终于落下了帷幕。

财经会议后不久，高、饶东窗事发，财经会议风波最后真相大白。

## “黑色炸药”与“黄色炸药” 之间的选择：实行粮食统购 统销

建国初期，我们党在财经战线上曾经领导了三大战役：第一个战役是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第二个战役即是实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第三大战役是对资改造）。同第一个战役一样，这一战役也是在陈云主持下进行的。

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在我国持续的时间长达 32 年之久，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5 年以后，随着粮棉合同定购制的实施，粮食统购统销制度逐渐被废止。于是就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在当时是不是必须的？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如果当时不实行这种制度是不是更好些？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当时不实行这样的制度会出现什么后果，但是，从这一决策的过程来看，陈云在当时之所以坚决主张实行这样的制度，的确是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也是当时我们能够做出的唯一选择。

## 1953 年的粮食形势：问题严重，办法不多，难以为继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相对不足的国家。粮食问题是历代政府都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伊始，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就十分尖锐。建国初期的几次剧烈的物价波动都与粮食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经过土地改革和几年的经济恢复，这一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3 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以后，这一矛盾即迅速激化。

据粮食部 1953 年 6 月 2 日向中央的报告和该部负责人稍后向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的介绍：在 1952 年 7 月 1 日至 1953 年 6 月 30 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 547 亿斤，支出 587 亿斤，收支相抵，赤字 40 亿斤。6 月 30 日的粮食库存将由上年同期的 145 亿斤减为 105 亿斤。由于 1953 年小麦受灾，预计减产 70 亿斤，加上广大农民因灾产生有粮借售思想，预计夏粮征收和收购都将大大减少。形势相当严峻。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集中讨论了粮食供销形势，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难以为继。

造成当时粮食供应紧张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使粮食销量大幅度增加。随着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1953 年的城镇人口，比 1952 年增加了 600 多万。另外，由于发展工业的需要，农村经济作物产区也迅速扩大，加上其他缺粮人口，1953 年农村里吃商品粮的人口也增加到了 1 亿；二是土改后粮食产量虽有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农民生活改善，增产的粮食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

当时粮食自由市场存在，社会上一些粮食投机商利用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兴风作浪，抢购粮食，与国营粮食部门争夺市场，也是造成粮食形势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江苏省苏南地区，投机商利用变相提价，拦路收购等方式争购新稻，1952 年 10 月、11 月间，个别点私商收购比重高达 90% 以上。江西省吉安市，1952 年 12 月 18 日到 22 日 5 天内，上市的稻谷全被私商收去。1953 年，江苏省徐州专区各县，当黄豆上市时国营粮食部门和合作社即以合理的价格挂牌收购，而不法私商王雨农、马彦清、陈生、黄荣等，从无锡、苏州等地赶来抢购。他们勾结当地粮商和粮贩子，深入农村抢购，其中王雨农在邳县、新沂等县的集镇上安排 10 多家“代理店”，抢购黄豆 50 多万斤；陈生则用抬高价格的办法，一次就抢购黄豆 6 万多斤。不法私商在农村还大肆买青苗和禾花谷，1953 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湖北省潜江县腰河乡被私商买去青苗谷 13 万多斤；浙江省温州专署粮食局在温州蒲江乡 36 个村调查，有 74% 的农民卖了青苗或禾花谷。粮食投机商预购青苗的价格，一般比牌价低 20—30%，有的则低达 40% 以上，各地私商抢购粮食还有一套与国营粮食部门作斗争的策略：从集中转向分散，从公开转向隐蔽，从城市转向农村。这种粮食投机市场的存在严重地干扰国家粮食购销计划的实现，导致粮食产需矛盾更加尖锐。

由于以上原因，国家粮食收购计划不能完成，销售计划大大突破。从 1952 年下半年起，全国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如河南省洛阳、许昌等地区，群众纷纷出售棉花、生猪、抢购小麦。到 12 月份，情况更为严重，抢购粮食之风，由局部地区蔓延到河南全省。这种粮食局势，到 1953 年上半年各地继续发展。河南省南阳市各供应点经常聚集上千人排队争购。江苏省如东县的白蒲镇，竟发生万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而购买粮食。

抢购粮食之风，造成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这年春天，江苏省杂粮市价高于牌价 15%，有的地区高出 30%。河南、江西、安徽、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省的粮食市价一般高出牌价 10—20%。由于粮食市价高于牌价，在产粮区国家也收购不上粮食。如江西省赣州地区稻谷牌价每百斤 5.05 元，而私商抬高到 5.50—5.80 元，使国家粮食收购比重由原占上市量的 70%，下降到只占 2.9%。湖南、湖北两省的粮食产区，国家收购的粮食所占的上市量亦由 60—70%下降为 10—30%。

到了夏季，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在受灾地区、小城镇已发生混乱现象，有些地区有数千人以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点排成长龙争购粮食。国家粮食部门购少销多，逆差急剧扩大。八九月份形势更加严峻，一些城市的粮食已开始严重不足，如北京、天津的面粉就到了不得不配售的地步。



## 一担“炸药”，八种选择

粮食形势如此严峻，解决粮食问题，当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极为重大的任务。在这紧要关头，政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受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委托进行周密研究，提出对策。

当时，在粮食问题上国家面临的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如果不采取措施，任其发展，就可能导致物价飞涨，市场混乱，经济建设无法进行；而要采取有效措施，就必然要从农民那里多拿粮食，而这也可能引起农民的不满，甚至可能挨扁担。陈云把这比作挑着一担炸药，因为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能引起爆炸性的后果。

其实，对于从农民那里多拿粮食即征购粮食的办法，陈云早就有所思考。1952年1月，他主持起草并向中央作的《1952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即指出：“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只要使人民充分了解征购意义，又能做到价格公平合理，并只购农民余粮中的一部分，则征购是可能的。目前先做准备工作，在1952年夏收时，采取合作社动员收购和地方政府下令征购的方式，重点试办，以观成效。如试验成功，即于1952年秋后扩大征购面，逐渐在全国实行。”由于一些地方的干部感到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希望从缓推行，因此，1952年的试点实际上没有执行。

1953年，全国粮食形势进一步严峻，毛泽东要中财委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当时，陈云因病在外地休养，中财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没有拿出可行的办法。1953年7月，陈云回京参加完财经会议后，即遵照中央的指示，全力以赴研究这个问题。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权衡，陈云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

10月1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陈云将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盘托出，毛泽东听了陈云的汇报也觉得别无良策，表示赞成，周恩来等同志也一致同意。于是，毛泽东当即拍板定案，并嘱：由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由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决议，迅速召开全国粮食会议，把这一方案付诸实施。

由于情势紧急，不能拖延，从天安门城楼回来后，陈云连夜起草了会议通知，并于10月2日凌晨送到毛泽东处。毛泽东迅即对陈云起草的通知做修改，并决定当晚7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陈云作报告。由于事先已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陈云在报告中提出的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的办法，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大家一致表示同意。会议最后，毛泽东发言说，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并说，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还说，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第一农民不满，第二市民不满，第三外国舆论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宣传问题，要大张旗鼓，但报纸一字不登。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从根本上找出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是全党刻不容缓的任务。”通知还规定华东局谭震林，中南局李先念，华北局刘澜涛、刘秀峰，西南局李井泉，西北局马明芳，必须参加会议。

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保密，以免引起恐慌，这次会议对外未用“紧急”二字）。陈云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在发言中，陈云首先向大家说明了当前粮食问题上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及粮食问题涉及的四种关系，即：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和地方与地方的关系。然后指出：经过反复思考，要处理好这四种关系，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

对于粮食问题上面临的危急情况，不用说，大家也都清楚，但对于要采取的办法，许多人还是很难接受。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办法太激烈了，征购这个名词听起来也很吓人，如果能通过自由购买买到粮食，最好不用这个办法。

对此，陈云也说出了自己的苦衷。他说：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400亿斤粮食（当时国家每个粮食年度大约需要700亿斤粮食，通过公粮可以拿到275亿斤。剩下的431亿斤需要购买）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说，如果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能够买到这些粮食的话，我是求之不得的。我这个人属于温和派，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但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造反。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所以，如果采取自由收购的办法，能够买到的话，我是求之不得的。但问题是买不到的。如果今天说可以买到，到时候买不到，我可以肯定他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也有些人问陈云，别的办法还有没有，是不是还可以想一想别的办法。对此，陈云回答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我想过了，开始从改良主义想起，想了很久改良主义的办法，最后还是想到了这个最彻底的办法。”

接着他把自己曾想到的和别人曾提出过的一些办法，概括为八种方案，向大家作详细的说明：

第一，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给，农村不征购。在农村里工作的干部听到“征”字就害怕，说“是不是可以慢一点，至于配给，那是该配给。”提出这个办法好不好呢？如果实行这个办法，那只是关了一个门，就是说，我们在城市里配给，只准一个人买多少，不准囤积，也不准拿到乡下去。只关了这一个门。但是农民也有眼睛，也有耳朵，他看到你在城市配给，他就会说：“啊！你缺少粮食，老子不卖。”所以，如果只在城市配给，在农村中不征购，我们就会买不到粮食。

第二，只征不配。在城市里工作的干部欢迎，他们说：“农村征购是要的，城市配给可以慢一点。”日本帝国主义搞了一下配给，国民党也搞得天翻地覆，现在又搞配给，一听“配给”就头痛。但如果只在农村里征购，在城市里不配给，结果一定会边征边漏。你在农村里征购，换给他钞票，他拿到钞票以后，转身就可以再跑到城里粮食公司把粮食买回去。

第三，原封不动。这叫机会主义的办法。所谓原封不动，就是照现在这样的办法，自由买卖，这个办法的结果必乱无疑。有人说，乱就乱吧，乱一年就不得了吗？乱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翻了吗？乱一年要考虑乱到什么程度，要把乱的利害与征购粮食比较一下，如果乱的害处大，就不如搞征购。如果等到乱了一年再来搞征购就晚了。

第四，“临渴掘井”。就是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来抓大头，搞征购。这样办行不通，道理很简单，到买不到粮食的时候，城市的自由供

应也就无法继续了。

第五，动员认购。这个办法东北搞过。东北的认购是怎样搞得呢？就是上面有个控制数字，交到省，省到县，县到区，区到支部，支部就开会，说：“同志们，大家认呀！”你说一个数，主持人说：“不够，再加！”你再说一个数，主持人看看还不够，就说：“不够，再加。”总之，不加够就不散会。办法就是不散会。这个办法是什么办法？这个办法叫强迫而不命令。不达目的不散会不是强迫是什么？我说强迫而不命令还不如搞征购，有明确的命令好。这样有了明确的数字，至少开会要容易些。

第六，合同预购。有人说棉花订了预购合同，我们就买到了一些。但我看棉花之所以能买到，不一定是合同预购的功劳。最重要的还是棉花收得多。我们一年需要的棉花是1300万担，而农民一年收获量是2000万担。如果棉花收少了，我看合同预购也不一定能收到。如果农民现在收得粮食多了七八百亿斤，他也会赶紧卖的，问题是现在粮食缺乏。定了预购合同他也不一定卖。

第七，各行其是。这样做如果不妨碍其他地方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各地的方法必定会相互影响。

第八，就是在农村里实行征购，在城市里实行配给。

对于这最后一个办法，陈云也是有顾虑的。他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家伙。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二十几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城市里的人都要配给，农村里的人都要征购，所以，这件事情跟每一个中国的老百姓都有关系。财经会议刚开过，如果这个事情出了毛病，翻了车，比新税制翻车要厉害得多。”

对于实行这个办法会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征购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陈云也作了估计。他说：这件事情要做的话，毛病会出得很多。我们全国是26万个乡，每个乡大概有三到四个自然村，全国一共有约100万个自然村，如果10个自然村中有一个出毛病，就有10万个村出毛病。这样就会出现逼死人，打扁担。

对于不这样做的后果，陈云也作了预测。他说：回过头来想一想，不这样做怎么办？如果不这样做，那我们就要恢复到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个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向美国、向加拿大、向澳洲买粮食、买麦子。一年进口300万吨。我们的外汇有多少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向香港出口的青菜、猪鬃、大豆，加上侨汇，总计不过3亿美金，大概能买300万吨粮食。如果把这些买了粮食，那我们就不建设了，机器也不要搞了，工业也不要搞了。那时也有一种后果，我们也要挨东西，挨什么呢？挨飞机炸弹，挨大炮，还要加上挨扁担。你搞得不好，帝国主义打来了，农民扁担还会打你。农民会说：“请你走吧，不要你在北京了。”

两相比较，陈云认为，还是实行又征又配的办法好。而且，这个办法虽然有风险，但也并不是说就一定会出大乱子。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这个办法还是可以行得通的。因为，首先，我们与农民有很好的关系，农民是支持我们的。其次，从我们征收的数量看，农民也是可以接受的。当时，全国须征粮食600到700亿斤，而根据以往几年的经验，农民每年在市场上出售的粮食大约也在600到700亿斤左右。

为了说明这一办法的可行性，陈云还举了历史上的例子。他说：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国曾搞过征购，它的名字叫“出荷”。它那时征得

粮食和东西差不多跟我们东北今年的计划一样，它是 800 万吨，我们的计划是收购 500 万吨，公粮 280 万吨。加起来也只有 780 万吨。它那时的产量比我们低，而且粮食不是运往内地，是运往日本。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满洲国还不倒。当然，日本帝国主义是靠高压统治，压迫、剥削农民，我们的情况与那时不一样。陈云举这个例子是说，从数量上看，我们定的征购数量是有可能完成的。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陈云坚决主张实行又征又配的办法。

陈云讲话之后，邓小平作了补充发言，他指出：农村征购，城镇配给，严格管制市场和集中统一管理的四项政策，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并着重说明了只有坚决实行这些办法，才能真正巩固工农联盟，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保障国家建设计划的实施。

全国各大区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在听取陈云的意见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他们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一致认为实行征购和配给，是调剂粮食供需矛盾的最佳方案。

谭震林根据华东地区会前于 10 月 7 日的讨论，并结合陈云在讲话中提出的方针政策，认为征购、配给，势在必行。他说：华东粮食购少销多，紧张局势由北向南发展，最严重的是山东，已过了陇海路，再不采取措施就要“百万雄师下江南了”，基本原因是农民惜售和私商捣乱。对粮食管理，他赞成由中央统一管理和统一调拨、地方负责征购、保管和代销，做到分级负责。

李先念首先介绍了中南地区各省对征购、配给的态度。他说：最初是两湖拥护，两广犹豫，河南动摇，江西态度不明；以后河南、江西也拥护，唯两广收购尚好，且系新区，要求缓办半年。但李先念认为，外省征购、配售，必将波及两广粮食市场，故仍以同步进行为宜。最后两广亦赞同。接着李先念分析了中南地区当时的粮食形势：湘、豫、赣三省保产，两广和鄂三省增产，全区较 1952 年的粮食产量可增加 4.2%，总的形势是好的。但进入新的粮食年度，购少销多的形势仍在发展，粮食紧张。其原因，一是农民生活提高，粮食消费量增加，二是私商囤积，三是中农余粮多，但贮存观望，等待高价。因此，他认为，必须采取行政手段，干预分配，实行征购和配给。以扭转粮食局势。

李井泉代表西南地区，完全拥护中央对粮食采取征购配给的方针。并认为，不准私商自由经营粮食，是杜绝粮食投机的有效措施，完全赞同。

刘澜涛对粮食征购和配给政策的贯彻充满必胜的信心，认为有国家的法令、合理的价格，征购数量有一定的限度，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全党动手，全力以赴，只要政策执行端正，就既可以得到粮食，又可以得到农民。

内蒙古、东北、西北等地的代表也在会上发言，表示完全赞成陈云提出的粮食征购和配给的办法。

得到各大区的支持以后，对粮食实行征购和配给的办法就基本上确定下来了。

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称不好听，希望改一个名称，当时的粮食部长章乃器想了一个名称，把在农村实行征购叫“计划收购”，大家觉得这个名称比较好，于是征购被定名为“计划收购”，配售也相应地被称为“计划供应”。两者简称“统购统销”。

## 上边“三定”，下边“四定”

统购统销的政策正式确定下来以后，10月16日中共中央即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于11月23日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关系着5亿农民和8000万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事关重大。为此，中共中央的《决议》强调必须“全党动手，全力以赴”。当时，对统购统销，全党的确像打一场战役一样全力以赴。接到中央的决议和国务院的命令后，全国各地在1953年11月底和12月初即开始在农村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中南地区及其所辖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6省的中共党政领导机关，绝大部分都由第一把手带头，组织大区、省、地、县、区、乡各级干部和积极分子共330多万人，经过短期培训，深入农村进行工作；华北地区仅山西省投入这一工作的力量，就有130万人。其他各大区和省组织的人力均以百万计。贯彻实施的具体做法，各地以县为单位先召开扩大的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接着以区或联乡召开中共党员、青年大会和积极分子大会，然后以乡为单位分别召开中共基层党组织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再召开群众大会。在各种会议上，以中共中央拟订的《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宣传要点》为指导，集中宣传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以及粮食统购统销同总路线、总任务的关系。

除召开各种会议，层层深入贯彻外，各地还利用其他形式，配合进行宣传。如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出动了82个电影放映队，携带幻灯机，把有关宣传内容制成幻灯片，走村串户进行放映。该局还组织大批戏剧工作者、音乐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等文艺队伍，深入居民区和田头地角用演唱等形式，向农民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四川省还出版发行了宣传材料300多万册，散发农村，配合宣传。广西省灌阳县一区，利用图片、实物等举办展览会，深入农村，巡回展出。

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12月中旬，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全国各地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尽管在统购统销正式实行以前，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已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于可能出现的毛病也做了预测和准备（毛泽东列举了17条可能出现的毛病，陈云在17条之外又加了一条，叫“有意想不到的毛病”），尽管在贯彻统购统销过程中“全党动员，全力以赴”，但统购统销毕竟是一个新事物，党和政府对此也毫无经验，因此，统购统销开始实行以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混乱。

如据泰安地委通报反映，新泰县八区的一些村，竟采用打虎的办法斗争余粮户，对出卖余粮不通者，驱逐出会场，令其考虑，名曰“去掉挡头”，有的区干部说：“有余粮不卖就封门，对抗就给他穿上个眼。”三区苏庄乡小张庄孙长振在小组会上自报卖粮700斤，干部非逼卖1000斤不行，回家后告其妻，其妻不通而眼了毒。九区沈村富裕户张敏，其子报卖5000斤，他在会上说只卖3500斤，村干部不满，大加指责，其子害怕便装疯，闹得会场大乱。九区北堡党员朱九连，因卖粮不通，在党员会议上受到严重批评，又未转变，第二天小组会都停止他参加，因而苦闷、怀疑而自杀。

泰安地区的问题并非个别现象，全国各地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大

都是由于对统购统销政策执行不当引起的。

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灾。为了救灾需要,1954年至1955年度在非灾区多购了约70亿斤粮食,全国统算,也多购了23亿斤,从而更加加剧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

到1954年底1955年春全国各地几乎是“家家谈粮食,户户谈统销”。有些地方甚至发生骚乱,如广东省中山县即因购粮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引起了骚乱。骚乱自1954年12月13日上午9时起,至27日晚止,历时15天,蔓延到4个区10余个乡,参加骚乱群众先后合计约5000人。骚乱中区、乡干部及积极分子被打伤者63人,其中重伤15人,死1人,被抢去粮食1万余斤及乡政府、农业社等公款3600万元。这种骚乱虽是个别现象,但已开始影响到全国的稳定。粮食统购统销制度面临严峻的考验。这一制度是否、能否坚持下去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为此,陈云决定亲自到农村进行调查。

陈云以善于调查研究著称,他有一套完整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向自己熟悉的人进行调查。他认为自己熟悉的人没有乌纱帽的问题,敢于讲真话,从他们那里最容易了解到真实情况。因此,早在建国初期,他就自己的家乡约定两位农民作为长期的联系人,不定期地直接向他反映农村的问题。这一次他仍然采取这样的办法,直接到自己的家乡进行调查。

1955年1月,他在华东局负责农业工作的领导陪同下来到江苏青浦小蒸乡进行调查。在这里,他约见了自己的特约联系户陆象波和曹兴达,并拜访了烈士家属,向来访的居民和亲友问寒问暖,还专门看了米店、粮仓,找农民、商人、小学教员、居民、干部座谈,征求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意见。调查中陈云发现,当时农民有意见的原因主要是上一年统购时购了“过头粮”,挖了口粮,农民不够吃了。对于统购统销制度农民虽然也有一些意见,但经过说服教育,农民还是能够接受的。这样陈云心里就有底了。就是说,统购统销政策有缺点、有漏洞,可以补充、改进,但能够也必须坚持。

本着这一原则,这次调查中陈云还着重对统购统销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对农户统购多少、留粮多少、缺粮怎么办等等。

调查结束后,陈云回到北京向中央提出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中的“三定”政策和办法,即定产、定购、定销。在一个粮食年度里,连征带购的粮食总数三年不变。由各地政府根据产量确定统购数字,规定卖粮户留粮标准,力求消灭购“过头粮”的现象:确定农村统销数字,留出周转粮,从统购统销总数内扣除。

“三定”的办法还要求全国各地以乡为单位,确定全乡每户的常年计划产量和全乡粮食统购统销的数量,并一律向农民宣布,使每一农户都知道自己是余粮户还是缺粮户,使每一余粮户知道该卖给国家多少粮食,使缺粮的农户知道自己能够向国家购买多少粮食,做到心中有数。

这一办法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赞同。在确定实行“三定”政策时,毛泽东还提出:粮食定产要低于实产,要使农民多留一点,多吃一点,多喂一点,多自由一点,做到“人不叫,猪不叫,牲口不叫”。

“三定”的政策确定下来以后,1955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本着“三定”的原则对粮食统购统销进行整顿。指示发出后,全国各省市立即派出了几十万干部到农村、到城市整顿统销工作,再一次宣传粮食统购统销的意义,号召

人民起来协助政府做好这一工作。对于要求供应粮食的进行评议，把不应该供应、可以少供应的数字削减下来，可以迟供应的就推迟，同时保证缺粮户必要的供应。

经过这样的整顿以后，全国的粮食销量迅速恢复正常，“缺粮”的喊声有了显著的减少。

“三定”的办法也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有力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例如浙江省萧山县小桥村于3月14日获知这一消息，全村农民立即欢腾起来，奔走相告：“共产党又兴了好政策！”农民汪妙兴正在田里撬麦泥，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原来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一些顾虑打消了，忍不住放下撬子，兴冲冲地从田里跑回家来，又笑又说：“共产党兴的好章程，真摸透了我们庄稼人的心思！”这天晚上，村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和单于农民都分别开座谈会，讨论粮食“三定”政策，大家情绪很高，会开得很热烈。中农汪福康说：“实行‘三定，办法好，我准备在今年增加两亩小株密植，在田里施10船泥肥，争取多打粮食。”

蜀山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吴昭坑说：“有了这个办法，今年我们社里就能更顺利地改种连作稻了。”会后，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3天内，就组织30多个社员到萧山街上打扫垃圾3船，1万多斤。北京郊区石景山区鲁谷乡一农民，听到“三定”后，自书楹联赞颂道：“毛主席号召‘三定’，人人高兴；共产党规定‘四留’，个个不愁。”横批“努力生产”。

广大农民对“三定”非常满意，因此有人形容说“三定”实际上是四定，有了定产、定购、定销，农民的心也就定下来了。

全国的粮食形势稳定下来以后，1955年7月21日，陈云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的发言，对人们尚存疑虑的一些问题作了进一步解答。

陈云的发言首先对1955年春季一些地方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1955年春季粮食问题上的混乱，固然同去年粮食统购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即多购了几十亿斤粮食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民还不习惯于粮食统购统销办法。农民是个体小生产者，千百年来他们的习惯是除缴租、缴税以外，形式上是自由处理余粮的。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农民虽然把粮食卖给了国家，但因为他们是私有者，有些农民又想买回去，并且还买得更多。今年三四月份粮食供应紧张地区的城镇上，只看事情表面的人，以为排队争购切面和其他食品的农民都是缺粮的。但大量事实证明，排队的人当中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极少数是缺粮的；一部分是家有余粮的，他们去排队的目的是装做缺粮，怕再向他们购粮；大多数是这样一些农民，即他们的粮食是够用的，但想多保存一些，多有一些后备，所以也去排队购买切面和其他食品；也有的是已经评定为缺粮，并且已经规定了开始供应的日期，但是他们却想在得到供应以前，先买到一些切面和其他食品。因此，粮食供应一时出现了混乱的现象。

另外，不少地方粮食供应一度紧张，是由于地主、富农分子和某些反革命分子，利用农民小私有者的心理和我们某些工作上的缺点，从中造谣煽动造成的。农民是拥护政府的，又因大多数口头叫喊缺粮的农民并不真正缺粮，在我们把道理向他们讲清楚，同时把统购统销工作加以整顿以后，不但销售数量降到了正常的水平，而且缺粮的喊声也很少了。

针对有人提出的停止统购统销的主张，陈云在发言中指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必须坚持，停止统购统销的主张是错误的。他说：大家知道，解放以后的头三年并没有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3年12月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是为了解决全国粮食供需之间的矛盾。那个时候，一方面，城市、工矿区和农村经济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都在扩大；另一方面，国家收购不到必需的粮食。我国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的。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半自给的经济，生产水平不高，商品率很低。土地改革以后，粮食产量是增加了，但是农民的粮食消费也增加了，而且也不急于出卖余粮了，因此，商品率反而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商人和别的行业的商人就囤积粮食，存有余粮的富裕农民等待高价，不卖粮食。很显然，政府为了掌握必需数量的粮食来保证供应，使私商和富裕农民不能够操纵粮食市场，就必须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我们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但有利于粮食消费者，同时，因为收购价格是合理的，对于全体出卖粮食的农民也是有利无损的，因此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

在发言中，陈云还对改进统购统销政策的一些措施，特别是“三定”的问题作了说明。

陈云的发言有理有据，得到了代表们的拥护。

此后，统购统销政策又经过一些修改，最后在全国稳定下来。



主持对资改造，主张网开一面，使资本家“坐三望四得五”，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建国初期我们党领导的财经战线上的第三大战役，这一战役基本上也是在陈云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作为这一战役的具体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对资改造的过程中，陈云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主张，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提前进行的战役

在中国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忘记这一历史使命。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酝酿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的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的方针。此后，从接收大城市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就已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接收大城市时，将私营企业中的战犯、汉奸、官僚股权收归国有，实行公私合营；统一财经管理、平抑物价时，为取缔投机倒把，人民银行与私营银行、钱庄开始实行联营，随后又实行公私合营，接受人民银行委托办理的业务，实际上就拉开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序幕。

1950年调整工商业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国营企业向私营工厂加工、订货，或包销、收购私营企业的产品。据统计，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产品产值，占当年私营企业产值的27%，棉纺业中甚至达到70%以上。实行加工订货、收购、包销，原为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但是，在实施中，却把私营企业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限制了它追求暴利、盲目发展的消极作用。所以，陈云谈到加工订货时说：“这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

1952年我们发动的“三反”、“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做了充分的揭露，这实际上也是向资产阶级的进攻。

1953年，我们党总结了前几年的经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对资本主义实行赎买的政策，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路线明确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正式提上了日程。

尽管消灭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尽管我们党很早就开始酝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问题，尽管总路线已经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提上了日程，但实事求是他说，建国初期，我们党并没有试日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建国初期，针对有些人过早地提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问题，陈云曾反复告诫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时间长着呢，何必急急忙忙去限制他们。”“要让私营工商业发展，发展起来以后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跑不到外国去。”

毛泽东也曾多次谈到，对资本主义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大约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直到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同一些工商界人士谈话时还说：共产主义这个问题要讲开，好像怕鬼一样，大家一说就不怕了。我看共产是好事，没什么可怕的。不是说今天说了，明天就共产了，而是讲要准备共产，要广泛宣传。赎买的时间，从1949年算起可以拖到15年、18年，经过许多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究竟哪一年国有化，不会是一个原子弹扑通下地，总要同你们商量的。大家要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然而事实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中央的预料，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布不久，

全国就掀起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到“一五”计划末期，我国就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显然，这一战役并未按照中共制定的日程表进行，而是大大的提前了。关于这一问题，事后，毛泽东曾有过一段论述，他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即李烛尘先生）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搞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

战役的提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好事，但由于准备不足，缺乏经验，仓促应战，因此，这对我们党也是一个挑战。总路线宣布不久，陈云即受命组织这场战役（他是中央对资改造十人领导小组的组长），面对这一挑战，陈云再次显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组织才能。

## 网开一面，对资本家留牌子、给位子、发票子

我国的对资改造，实行的是和平赎买的政策，要使和平赎买进展顺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好资本家的工作，争取他们的合作。在对资改造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当时，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己使用多年的一件器物，一朝不归自己时，在情绪上还要发生波动，自己甚至几代人苦心经营的企业一朝易主，在感情上产生一定的痛苦，是不难理解的。

荣毅仁先生当时是全国最大的资本家，他的心情就颇具代表性，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一个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这些话也让他眼泪直往下流。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陈云有着坚定的党性，但他对资本家的这种心情非常理解，他认为这是人之常情，应该予以照顾。因此，在对资改造的过程中，陈云反复强调，对资本家，要网开一面，不要两面夹攻。要尽量使他们心情舒畅。

企业是资本家的命根子，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企业改造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特别害怕把祖宗创下的牌子砸了，如果改造后，他们的牌子能保存下来，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对这个问题，陈云专门指出，“原有工厂和店铺的招牌是不是需要改掉？我看最好把它保存下来。如果统统改掉，编成号头，使人搞不清楚，还不如‘瑞蚨祥’、‘全聚德’等各种各样的牌子挂着好一点。这样资本家也舒服，牌子是祖宗传下来的，把牌子搞掉，他们是会心痛的。”

改造以后，对资方人员的安排问题，也是资本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特别担心改造以后没有工作做了。为了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陈云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从1955年起，陈云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所有的资方实质人员，都要安置起来，要给他们饭吃。他们过去没有吃文森豪威尔的饭，是吃中国饭，市且就是吃他那个铺子里面的，今后还要让他吃下去。

对资改造过程中，资本家成了被改造的对象，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抬不起头来，认为自己是剥削者，是没有用的人，政府将来肯定不会用他们。对此，陈云向他们解释说：“政府的看法是，工商业者的绝大部分是懂技术的，有业务经验的。不懂的也有，但是极少数。他们的技术和业务经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用的。国家需要这些懂技术懂业务的人。国家对待资本家与对待地主是不同的。地主对发展社会生产有鲁无益。资本家懂得技术，能管理工厂，组织生产。政府安排资本家并不是对资本家特别好，而是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工商界不要担心得不到安排。对资本家也要进行改造，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干部。”

有些资本家认为共产党是先甜后辣，对资本家今天安排了，将来就会一脚踢开。陈云向他们说：“不是这样的。今天安排，将来也要安排。因为你们在解放后，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土地改革，支援抗美援朝，接受‘五反’教育，最近又积极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这些都是好事，共产党是讲道理的。你们好事做得愈多，得到的好处也愈多，结果也愈好。”

陈云不仅主张要妥善安置所有的资本家，他还特别提出，应该让有能力的资本家当企业的经理、副经理。对此，有些工人不理解，他们说，从前他当厂长、经理，合营后还是他；资本主义是他，社会主义还是他。因此，有些资本家也害怕，当了经理后，工人说闲话，不听他们的话。这个问题，陈云也想到了，他对资本家说：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听了这些话之后，不能生气。因为过去工人与资方长期是对立的，这种对立情绪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正如两个人打架，要一下子就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是不可能的。政府可以向工人讲清楚，资本家愿意公私合营，不要他们，他们没有饭吃，这不好。现在资本家与过去有所不同，过去为利润工作，现在为国家工作。他们中有的人有技术，有业务经验，国家也需要他们。工人是讲道理的，是会认识到应该团结资方的。工商业者自己也要改变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对工作的态度。

改造后的出路问题解决以后，资本家关心的就是收入问题了。我们对资改造的方针是赎买，既然是赎买就要给钱，给多少钱、怎么给呢？陈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定息。所谓定息，就是把原来公私合营后分给资本家的利润，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陈云认为实行定息有很大的好处，实行定息以后，工厂的生产关系有了很大改变，国家对工厂的关系，资本家对工厂的关系，都改变了。定息就是保持私股在一定时期内的定额利润，而企业可以基本上由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经营管理。这样，资本家得到了好处，我们得到了更大的好处。资本家暂时保存了他的资产价值，这个资产的所有权还是他的，但是不能变卖，只能拿到定额利息。工厂企业管理的实际权力转到了国家手里。

实行定息后，利息率定得多高才是合适的呢？工商界的人士希望利息能定得高一点。他们在当时的普遍想法是“坐三望四”，也就是说年息能稳拿3%，争取4%。陈云经过反复思考和计算，向中央提出，定息的原则应该是从简从宽。息率应一律定为5厘。这个决定宣布后，全国的资本家都“喜出望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确太宽大了，因此，他们都感到非常满意。

后来，陈云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从1956年起，定息7年不变，如7年后工商业者生活上还有困难，还可以拖一个尾巴。从而进一步消除了一些工商业者的忧虑。

资本家对定息的期望值才是3%，人民政府提出5%，这个利息率是不是太高了呢？其实不是，陈云在提出这个数字以前是经过仔细思考的。他算过一笔帐，当时，全国的资本家在工业方面的资本大约有25亿元，商业方面有8亿元，合在一起也只不过32亿元。定息5%，国家一年付出的利息也只不过1.65亿元。用这点钱就能使资本家敲锣打鼓地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国家能统统把他们买下来，这是值得的。

同资本家搞好关系，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也是保证对资改造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陈云要求各个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件大事来做。

当时，领导干部和一些工作人员中存在着一种“左”的倾向，“三反”、“五反”之后，许多人怕和资本家接触，怕被资本家腐蚀。对此，陈云提出：“和资本家混在一起，把自己的立场丢掉了，腐化了，是不对的；不和资本家来往，放弃对资本家的改造和教育，也是不对的。要有来往，又不腐化。”他还举了天津的一个例子说：天津有一个女老板，她看到企业中公方代表开会回来，忙得很，饭也没有吃，给他煮了一碗面，公方代表就拍桌子说：“你

腐蚀我吗？”陈云认为这样就太不近人情了。

陈云不仅注意对资本家本人的教育，还特别注意对资本家家属的教育。当时，在工商联座谈会上，有的资本家反映说：“我们通了，但是老婆不通。”也有人说：“两个副总理讲了几个钟头，但是回去还不抵老婆一席话。”对这个问题，陈云非常重视。1956年3月，陈云专门主持召开了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就她们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解释。通过解释，使工商业者家属了解到，公私合营后，资方人员的工作安排是没有问题的，生活和福利待遇上也是有保障的，从而解除了她们的后顾之忧。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还就当时工商业者家属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作了说明。在公私合营的高潮中，有些工商业者家属，把家里的黄金、美钞、人民币、宝石戒指、金钢钻、房产等都拿出来增加资金，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如果提倡不适当，就会发生偏差，有些人本不想捐献，但迫于形势，也不得不捐献。对此，许多家属感到压力很大。

针对这个问题，陈云在会上指出：政府不提倡这种捐献，因为一提倡，一表扬，就会形成一种空气，一种压力，发生强迫命令的现象，使不能或者不愿意增资的人也增资了。这种现象，一定要加以避免和纠正。全行业公私合营，政府不是想要你们增资，这次开会也不是想要你们增资。你们增资一两千万，数目就不小了，但是对政府的帮助并不大，反而给你们自己造成困难。大家

愿意捐献，心是好的，但是政府希望你们最好不要捐献。已经捐献而造成困难的，要赶快退回去。没有东西捐献的，不要认为不光彩。政府不是希望你们再拿钱出来，而是希望你们与政府同心协力，做好工作，办好企业，建设社会主义。

听了陈云的讲话，工商业者家属都非常感动，她们觉得政府想得太细了，处处都照顾到了资方的利益，再也没有理由对前途担心了。

## 资本主义的羊肉为什么社会主义以后不好吃了？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提前到来以后，由于缺乏准备，没有经验，公私合营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产品质量的下降。特别是一些名牌产品，质量下降非常明显。人民对此是很有意见的。

对于名牌产品，陈云历来主张应该加以保护。他认为老百姓，要名牌货，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取消名牌货不好。他举过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他说：早年在上海的时候，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几家共同组织了一个书店，我是被派去的一个。有一个人要买小孩用的书包，问多少钱，我说一块钱。他说，有一块钱，还不如到商务印书馆去买哩。实际上是一样的东西，只是用了另一个牌子，但他就认为商务印书馆的好。

公私合营的过程中，北京的一些名牌产品也受到了冲击，例如，“东来顺”的涮羊肉合营后就不好吃了。有些人就此发牢骚说：“社会主义还是不如资本主义好，资本主义的羊肉到社会主义后都不好吃了，”这话也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1956年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提出：请陈云同志讲一讲，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羊肉社会主义以后不好吃了。

关于这个问题，陈云曾做过深入的调查，他认为，“东来顺”的涮羊肉之所以在合营后不好吃了，主要原因是“我们轻易地改变了它的规矩。”他说：“它原先只用35斤到42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

“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二角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30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50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

当时，不只是“东来顺”的羊肉不好吃了，“全聚德”的烤鸭也不如以前好吃了。对此，陈云也进行了调查。原来，“全聚德”的烤鸭用的是专门的鸭子，这种鸭子从小喂起，大概要喂100天左右，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粮食统购统销和公私合营以后，我们给它的是劳改农场的老鸭子，烤出来的鸭子当然就不好吃了。

根据这些调查，陈云得出结论，要保持名牌产品的质量，公私合营后，这些产品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应该在一个时期内照旧维持不变，以免把以前好的东西改掉了。

为了保证公私合营后产品的质量不下降，品种不减少。陈云还提出了五条措施：

一、对有些商品，如百货中的一部分，国家不再统购包销。好的，国家要；不好的，就不要。陈云说：“这叫‘将’你一‘军’。不好的不要，就要跌价，跌价工厂就要亏本。一亏本，工资都发不出，管理人员就要动脑筋，想办法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这要有步骤有计划分批地进行。”

二、对商品的设计人员，像工厂的工程师，时装店的设计师，要给予奖金。他举例说：“上海有一家皮鞋店，对设计师设计的皮鞋，每卖出一双就给5分钱奖励。如果每年卖1万双，除工资外，就可以得500元。这个办法很好，可以起到鼓励的作用。其他商品也都应该建立奖励制度。”

三、优质优价。好货好价钱，质量好的价高，不好的价低。现在是好货、坏货价钱差不多，这个办法不好。过去稳定物价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做得过分了些，就是好货不能提价，坏货不能降价，现在应该改变。

四、要设专人负责。这事由工厂、商店的经理或副经理来担任，并且大体上可以由工商界原来负责这一工作的人来担任，因为他们比政府干部懂得多，是内行。

五、要给好的原料。没有好的原料，造不出好东西。

陈云提出的这些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防止产品质量的下降和品种的减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小商小贩也是一笔财富

在对资改造和公私合营的过程中，最难处理的不是大资本家和大企业，而是大量的小商小贩。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范围内，大约有小商小贩300多万户，从业人员400多万。对他们的处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当时，有人主张趁改造高潮之机，也对他们进行改造，彻底取消他们。陈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他认为，小商小贩也是一笔财富。他说：“在长时期内，大部分小商小贩在中国社会里是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小商小贩，市场一定会很死，居民就会感到不方便。照我看来，小商小贩也是一笔财富。卖馄饨、卖酸梅汤的小商小贩，如果都取消了，只有‘全聚德’、‘东来顺’，老百姓就要反对我们。在胡同里和火车站有卖饮食的，冬天是热的，夏天是凉的，乡下还有送货上门和收购破铜烂铁的，少了这些小商小贩，老百姓也会不满意。”

有人说，带着小商小贩，夫妻店没法进入社会主义。陈云不这么看，他说：“我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长时期内还需要夫妻店。因为老百姓还要买小杂货、油盐酱醋，还要吃大饼、油条、馄饨、汤团。”

但是，对资改造过程中不涉及小商小贩也是不可能的。小商小贩自身非常愿意接受改造。因为他们大都是小本经营，在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他们就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他们也想趁改造之机靠上社会主义这条大船，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因此，对资改造之初，没涉及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唯恐政府不要他们，说：共产党政府嫌贫爱富，光吃肉不吃骨头。公私合营高潮到来以后，他们更是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公私合营。

在这种情况下，不批准他们公私合营是不行的，只好批准。但是，陈云认为，对小商小贩决不能像对资本主义商业一样，不能用定息和拿固定工资的办法。他说：“夫妻店不能发固定工资，如果按月发工资，那末，半夜敲门买东西，他就不会开门了，一定会说：‘睡觉了，明天来吧。’因为反正他按月拿工资，他省心了，但对老百姓就不方便了。不仅夫妻店不能发固定工资，摊贩也不能发固定工资。如北京卖蔬菜的，过去推车到胡同去叫卖，现在组成了联营小组，发固定工资，他就不到胡同里去叫卖了，老百姓很不满意。”

关于这个问题，陈云是有切身体会的。解放以后，陈云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到中南海居住，而是住在南长街。当时，他家对门就有一个小铺子。这个小铺子只能站两个顾客，但是他卖的东西适合那个地方群众的需要，有文房四宝、牙刷牙膏、针头线脑，直至邮票，样样都有。这种小铺子看居民需要什么就卖什么，对群众很方便。他们卖的方法也跟百货公司不同。百货公司的信封，是成扎卖的，他们一个也卖。百货公司的信纸是成本卖的，他们一张也卖。售货时间也不一样，百货公司是八小时工作制，到点关门，他们是晚上12点敲门也卖东西。但是这样的小铺子也采取了拿固定工资的办法后，就不一样了，它的品种也不那么齐了，晚上12点敲门也不开门了。

因此，陈云坚持主张，公私合营后，也要在很长时间内保留这种小商小贩的单独经营方式。

既然批准他们公私合营，又要他们保留单独经营的方式，那么对他们应该怎样管理呢？如北京的馄饨担怎么办？上海弄堂里的白糖莲心粥怎么办？

陈云认为：“对他们应该很宽很宽。他要求加入合作社，也只能是挂个牌子，报个名，登记一下就算了。把他们组织起来，每个人要在一个小组统一进货，统一经营，统一核算，那就有一种危险，即馄饨皮子就不是那么薄，而是厚的了；肉不是鲜的，而是臭的了。”

陈云认为对小商小贩最好的办法就是经销、代销。实践也证明，经销、代销的办法也的确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改造小商小贩的途径。在公私合营的高潮中，这种办法，既使小商小贩得到了妥善的安排，也没有给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不便。

### 锣鼓声后的思考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展异乎寻常的顺利，从高潮到结束，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全部被批准为公私合营。1月15日，北京市为庆祝这一胜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会上，北京市长彭真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继北京之后，天津、西安、沈阳、重庆、武汉、广州、上海等大城市也先后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月底，全国累计有118个大中城市和193个县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一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此时，全党和全国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然而，陈云却并未感到轻松。因为还有一系列的问题，等待他去思考、解决。

首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提前和迅速完成，固然是一件好事，但由于时间仓促，工作很不细致，留下了一大堆问题。

其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完成以后，建国初期针对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制定的一些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都已不再适应，必须重新制定新的政策。

第三、对资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主义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等等。对这些问题也必须迅速作出回答。

对资改造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陈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会上，陈云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作了全面的阐述。并提出了五条意见：

第一、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应该把商业部门对工厂所实行的加工订货办法，改为由工厂购进原料、销售商品的办法。商业部门对工厂产品的采购，采取下列两种办法：（一）对有关国计民生和规格简单的产品，如棉纱、棉布、煤炭、食糖等，继续实行统购包销，以便保证供应，稳定市场。（二）对品种繁多的日用百货，逐步停止统购包销而改用选购办法。

第二、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纠正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的集中生产、集中经营的现象。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粮食、经济作物及一部分副业生产是必须由合作社集体经营的，但是许多副业生产，应该由社员分散经营。不加区别地一切归社经营的现象必须改变。许多副业只有放开手让社员分散经营，才能增产各种

各样的产品，适应高产的需要，增加社员的收入。在每个社员平均占地比较多的地方，只要无碍合作社的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应该考虑让社员多有一些自留地，以便他们种植饲料和其他作物来养猪和增加副业产品。

第三、必须取消市场管理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国家为了掌握粮食、经济作物和各种农产品，为制止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过去限制私商在初级市场上的收购，这种限制是必要的。今后，对于粮食、经济作物、重要的农副产品，仍然需要由国家统购或者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但是对于一部分农副产品，例如小上产，现在由当地供销合作社独家统一收购的应该改为允许各地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供销合作社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禁止互相封锁。应该根据新的情况，来活跃商品的交流。

第四、必须使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不能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理解为“统一物价”或者“冻结物价”。对于物价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上涨不要产生恐惧。有些情况下的物价上涨是合理的。如一些小土产放开市场后，价格可能会上涨，但这种价格上涨将促进小上产增产，等到供求平衡以后，它的价格就会回落到正常水平。

第五、对某些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的方法，应该有适当的变更。应该把国家计划中对一些产品的各项指标只作为一种参考指标，让生产这些产品的工厂可以按照市场情况，自定指标，进行生产，而下受国家参考指标的束缚，并且根据年终的实绩来缴纳应缴的利润。

会上，陈云还就未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些主要特点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陈云的这些思考和探索，在今天看来也许并不引人注目，但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开拓性的。如果能沿着陈云探索的这条道路走下去，也许后来我国的经济要快得多和好得多。然而，可惜得是，陈云的这些意见，包括对资改造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并未被很好的采纳。1957年以后经济工作中不断滋长起来的“左”的思想和情绪，扰乱了这些正常的探索，从而使对资改造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长期未能得到解决，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越来越僵化。这些问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新得以解决。

主持编制实施“一五”计划，  
强调稳中求胜，反对冒进，  
说：实事求是不是小脚女人  
为“一五”计划呕心沥血，四年编制，五易  
其稿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繁荣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1840年以后的100多年来，我们屡遭外敌入侵，国家四分五裂，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发展经济更无从谈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梦想成真提供了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当时的中国可谓千疮百孔，疲惫不堪。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财力又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使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呢？党的领导者们经过慎重思考认为，要使国家落后的经济状况在短期年迅速得到改观，必须集中财力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1951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编制经济计划，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

陈云当时是中财委的主任，负责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因此，编制经济发展计划的任务也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党中央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不久，陈云即开始考虑编制五年计划的问题。1951年4月，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要考虑到，两个五年计划要建设什么东西，在国防、工业、农业、水利方面，大概一年投资多少。”“我们要建设，在这方面就要有充分的准备。在交通方面，也要有计划，要修多少铁路，公路，要计算出每公里花多少钱。工业方面，我们要开发石油，生产化肥，制造发电机，建设发电厂，等等。”“要计算我们的财力，同时计算经济、文化、国防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现在要组织一个计划委员会，预先把各方面的建设规划一下。”

在这个讲话的同时，陈云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在他的组织领导下，中财委1951年即试编出了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的纲要。这也就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首次编制。由于当时资料不全，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还未定下来，特别是还未能征得苏联的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试验，不可能作为正式的计划。

进入1952年，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即将完成。党中央决定加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并决定，计划编制好后，8月份拿到苏联，征求老大哥的意见，争取他们的帮助。于是，在陈云领导下，中财委开始第二次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到1952年7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次编制宣告完成。尽管时间仓促，经验和数据不足，这个计划还是包括了大量的内容。计划印出来以后，共有25本小册子，主要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

计划草案印出来后，7月1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对这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进行了说明。他说：“这次写的五年计划的主要点是在今后五年中要

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因此在这一方面花的工夫较多。原有工厂的生产方面，也写进去了。但估计这一方面的生产数字一般是低的，可能超过。将来需要好好再讨论的。所以首先集中力量研究今后五年中新办工厂，是为了七八月间可以向苏联提出一个五年中供我装备的要求。”

这个计划提到中央后，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讨论，认为可以将这个计划带到苏联征求意见，并作为向苏联提出援助的基本根据。

8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代表团，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带领30多名专家访问苏联。

当时没有大飞机，一架飞机只能坐16人。中共代表团分乘3架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飞了3天，第一晚在伊尔库斯克，第二晚在新西伯利亚，第三天才到莫斯科。到达莫斯科后，陈云和我国的专家一起，在离地那莫体育场不远的苏维埃旅馆下榻。

这次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换意见，重点是争取苏联的援助。在莫斯科，周恩来、陈云等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会谈。期间，周恩来和陈云两次会见了斯大林。

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过两次编制，而且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有关部门对计划毫无经验，因此，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计划还是相当不成熟的。苏方领导人详细研究了中方提出的计划，对这个计划方针和要达到的目标，表示欣赏，但对计划本身则不敢恭维。他们认为，中方提出的计划草案，还不能算是五年计划，不仅不是计划，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够。斯大林在会见周恩来、陈云时还就中国的“一五”计划，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他认为，中方的《草案》中考虑的五年中工业年平均增长20%的速度是勉强的，建议降到15%或14%。他还强调，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的困难。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苏联同意帮助中国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9月下旬，陈云即先行回国，留下李富春和一大批专家与苏联专家一起做进一步的工作。

回国后，1952年底、1953年初，陈云根据苏方的建议，组织中财委，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这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成立，中央决定由高岗任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因此，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本应顺理成章的由高岗主持，但高岗对经济工作根本是个外行，由他来主持编制“一五”计划是不可能的，高岗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因此，高岗上书毛泽东，请求在计委成立后，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仍由陈云主持。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重担仍旧没有从陈云肩上卸下来。

不久，由于长期夜以继日的工作，陈云积劳成疾，病倒了，并不得从1953年3月起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外地休养。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也暂停了下来。

1953年4月以后，苏联政府经过研究，就中国“一五”计划的问题提出了正式的答复意见。这时，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些项目也基本上确定下来了。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这些意见，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四次编制。这一次，陈云因病在外地休养，未能参加。

由于种种原因，第四次编制的“一五”计划仍不能令人满意。而这时，按照预定的时间，“一五”计划应该进入实施阶段了。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都非常着急。

1954年初，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于是，陈云又投入了第五次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

这一次毛泽东立下军令状，要求计委从2月15日起，一个月内交卷，拿出粗稿，然后，由陈云领导的小组迅速定稿。计委感到时间太紧，压力很大，向毛泽东请求延长一些时间，毛泽东只给了5天的宽限，要求3月20日必须拿出粗稿。

接到指示后，2月19日，陈云即召集中央财经、文教各部部长开会，布置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会上，陈云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时指出：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不能再拖了。毛主席规定的时间非常紧，但现在编制“一五”计划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苏联援助我们的项目已经定下来了，项目是141个，设计和设备安装的时间也大致排好了，这就使我们更有把握了。其次，朝鲜战争已经停下来了，军费和意外的支出都减少了。第三，总路线已经宣布，而且经过广泛宣传已深入人心。第四，我们已经有了几次编制计划的经验。因此，短时间内完成这一任务是有可能的。

这次会上，陈云还要求大家学习毛泽东的工作方法。他说：毛主席现在搞宪法的速度很快，他的方法是：一、吃饭；二、吃了饭不干别的事情；三、每天搞出几条。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制度，专门来作，不要坐在上面，只等着下面的汇报。各部都要指定专人负责，搜集材料，核定数字。

会后，各部和计委根据陈云的指示，迅速展开工作，并按预定的时间及时间向陈云提供了所需的材料。

接到计委和各部提供的材料后，陈云自己也组织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由他和张玺、梅行、周太和、邱纯甫5人组成。张玺是计委的副主任，周太和和邱纯甫是陈云的秘书，梅行是请来的笔杆子。5个人昼夜兼程，开了14次会，用了15天的时间，将这些材料进行了归纳、整理，并于4月初最后拿出了五年计划纲要初稿。这一初稿于4月15日印好后，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计划初稿出来以后，1954年6月30日，陈云就“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

这样，历时近4年，五易其稿，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算有了一个可以拿出来的初稿。后来，这一初稿又在陈云主持下进行过一些修改，但基本上是以这次的编制为基础，没有再重新编制。

1955年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陈云主持起草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决定原则通过这一草案。6月，中央委员会根据全国党代会议提出的意见，对草案再次进行了修改。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

## 总结经验，反对冒进

善于总结经验是陈云工作方法中的一个显著特色，他经常教导做财经工作的同志要注意总结经验。

1950年春节的前一天，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召集一部分部长开会研究工作问题，会议结束时陈云特地向部长们提出：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我建议大家春节不要拜年了，我不给你们拜年，你们也不要给我拜年，互相之间也不要拜了。放假几天干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呆在家里，泡上一杯清茶，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想一想，过去这一年干了几件什么事情，哪些做对了，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完全对，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很好总结一下。也想一想明年抓几件什么事，怎么干法？

后来他还多次指出：“根据过去的经验，找出新的办法，我看这项工作比日常的业务工作更重要。”“我们做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往往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因此常常受到批评。总结经验就可以把过去做对了的和做错了的加以分析，使我们头脑清醒，把工作提高一步。不总结没有交代，做了若干年的工作者是糊里糊涂，死了也不好见马克思，后代的人也要责怪我们。”

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非常容易出差错。因此，在编制和实施“一五”计划的过程中，陈云特别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当时，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不思进取，而是贪多求快，急躁冒进。这种情况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的第一年——1953年就出现了。这一年，由于一些干部看到1952年经济形势比较好，头脑发热，加之没有经验，在当年的预算中多列了30亿元，结果使当年的财政出现了30多亿元的赤字，使工作非常被动。对此，陈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从这一经验出发，后来，陈云曾反复强调，计划不能凭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来编制，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他把我国的主要国情概括为：人口众多（当时已达到5.7亿人），人多第一就要吃饭、穿衣、住房子，做计划不考虑这一条不行；可耕地只有16亿亩，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只有200多斤；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矿产地质工作做得很少，地质勘探力量又很小，探明的储量很少；技术干部严重不足……这些情况是他在编制计划过程中经常提到的。他认为，改变这些情况，需要大量资金和较长的时间，因此只能是逐步的、有重点的进行，不能操之过急。

在发展速度上，他经常提醒大家，计划搞不好，在本子上速度是快了，但行不通，一调整反而慢了。他说，我们有些好心的同志总是希望发展速度快一些，实际达不到，一出问题就反而慢了。因此，有句看似不通的话常挂在他的嘴边，“快了就是慢了，慢了就是快了”。

为了制约经济工作中的贪多求快、急躁冒进问题，1954年，陈云在向中央汇报“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时，进一步提出了四大比例和三大平衡的思想，即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要按比例发展；财政收支、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主要物资供需之间必须平衡，此外，技术力量的供需之间也要平衡。

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陈云在汇报时还将计划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实事求是地向大家作了说明。他说：五年计划中最薄弱的部分是农业，即使完成计划也是很紧张的。轻工业要增产，主要不是投资问题，而是原料问题。重工

业中的主要问题是国防工业突出，石油工业落后，煤电供应紧张，这种状况目前无法改变。铁路运输也将是紧张的。因此，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是台比例的。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期内赶上去，计划中的平衡只能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但紧张决不能搞到破裂的程度。

陈云的这些意见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对经济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他的这些意见，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55年以后，随着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评，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思想在党内迅速膨胀起来。

1955年7月，毛泽东感到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太慢，因此，指责某些同志像“小脚女人”，此后，他的这一思想即发展到经济工作的其他领域，认为“现在备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当前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毛泽东还说：“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从这一思想出发，对于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毛泽东感到非常不满意。

1955年原计划基本建设投资97.9亿元，比上年增长31.5%。执行中，由于经济生活中出现一些行情况，几次调整计划。在调整中，削减了一些非生产性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减为91.7亿元。到年底，原来安排收支平衡的预算，结余了资金18.1亿元。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也有较多的结余。又由于没有经验，还不认识保留必要储备的重要性，一度决定钢材出口，水泥减产。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一些结余作为后备并不是坏事，我们的错误在于急于出口。但毛泽东却认为这是由于发展速度慢造成的。因此，事后，毛泽东对此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他说：“1955年12月，八项东西（钢、铁、煤、水泥、铝、铜、还有两项）多得不得了了，以致毫无办法，只好请苏联帮忙。苏联是要订长期合同的，好，订，订了，签了字了，过一个月要毁约。过两个月毁约也好呀！跟人家订长期合同，你强迫人家订，过一个月就毁约。”“讲起共产党，又是光荣的，伟大的，什么的，就这样一事情讲，我看是幼稚的，眼光短浅的。”

对于1955年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毛泽东也感到不满。

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讨论编制15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问题。按照各部汇报，1967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棉花产量5600万担，钢产量1800万吨，煤炭产量2.8亿吨。毛泽东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了。

1955年11月他亲自主持搞了一个《农业十七条》，按照十七条，到1967年的粮食产量就不是6000亿斤，而是10632.8亿斤，超出原来设想的80%；1967年的棉花产量，不是5600万担，而是1.2亿担，超出原设想的1倍多。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又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



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不仅如此，毛泽东此时甚至已在考虑赶超美国和苏联的问题了。

1956年1月20日，他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和25日召开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它，第一步是接近它。稍后，他还说，我们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的头几个五年计划。

在这种形势下，各生产部门纷纷开始修改自己原定的生产计划。1956年初，各部专业会议，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大都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要尽量往前赶，就得准备生产能力，早上基本建设。

1955年10月，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是：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一五”计划规定的1956年投资多12.4%，但是据计委1956年1月5日报告，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153亿元，后来，又增加到180亿元、200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1倍多，而全年财政收入只增长9.29%。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1956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的追加到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当时的形势正如周恩来所说：“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一五”计划的头几年经济形势较好，但新中国当时的国力还是很弱的，按照这样的规模和速度进行建设是承受不了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随着1956年初基本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经济工作中的各个方面都开始出现了紧张的情况。

面对这种形势，作为全国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陈云感到非常着急，他多次提醒大家经济建设要稳步进行，要注意综合平衡。陈云的观点，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赞成和支持。

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5月11日，在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又指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

在周恩来、陈云等的坚持下，195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了当年的预算问题。这次会议还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会后，刘少奇要求中宣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这就是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

对于这篇社论，毛泽东非常不满。当时，社论清样送给他看时，他就上面批示：“不着了”。后来，毛泽东对这篇社论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说社论是“庸俗的辩证法”，“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是用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是“尖锐地针对我”。

对于反冒进，毛泽东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使6亿人民泄了气。还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了。

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明确表示，批评反冒进，主要是针对陈云的。

从现有的资料看，陈云与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没有直接的关系，陈云并没有参与社论的起草和修改。那么毛泽东所说的批评反冒进主要是针对陈云的，为什么呢？从当时的情况看，陈云的确是反冒进的主力。

前面已经说过，早在1954年，陈云就提出，经济建设必须按比例发展，搞好综合平衡。

1956年初，当大家都争着上基本建设项目时，3月6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陈云即主持将基本建设拨款削掉了7亿，由原来的125亿削到118亿，削减了6%。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指出：“根据中国的情况，每年总要有些结余才行。”

6月12日，陈云与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30次会议通过了《1955年国家决算草案和1956年国家预算草案》，其中，关于1956年预算部分，基本上是按削减以后的数字计算的。

1956年底，在讨论编制1957年预算和控制基本建设投资时，陈云更是多次阐明了反对冒进的观点。

12月4日，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他在会上发言说，“二中全会决定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为126亿元，关键是看材料，材料够就搞126亿元，如果材料不够就砍下来。”

12月18日，他主持国务院第41次全体会议，又在会上说：要把建设和民生的关系摆好，从财政和金融贸易这方面看，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一、财政预算和现金收支必须是平衡的，不能有赤字，而应略有结余。二、预算中建设规模应该和物资的供应相适应。首先应该照顾到心须的民生的生产，有余再搞建设。三、每年人民购买力与供应人民的消费品应该求得平衡。四、我国的建设需要的外汇大体上依靠农产品出口，农业对工业有很大的约束力，工业不能不管农业而为所欲为。

当时，党内的急躁冒进情绪是比较浓的，因此，关于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问题，争论很大。12月27日，陈云再次就这个问题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了发言。

他警告说，“现在马跑得很危险，这样骑下去，后年，大后年更危险。”

他还说：“明年要削减投资，必须要搞些死办法，灵活了不行，哪些东西不搞就是不搞，人不准增加就是不能增加，要砍就砍下来。当然，我们共产党最好是按辩证法办事，但这样不行，不来个绝对主义办不了事。”

会上有人提出，投资削减以后，有些项目就不能搞了，工人也不好安排。对此，陈云指出，“我看不能搞就不能搞，计划完不成就完不成，工人能做别的就做别的，不能就照发工资。这样对不对呢？我看不会不对，如果到明年8月我们看不对，8月以后再搞也来得及。我们是个大国，明年不稳当心里不安。”

他还鼓励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一些干部要敢于负责，勇于负责。他说：经济工作还是大家讨论，我们做决定，我们向中央负责。“我们责无旁贷，少奇同志管党的工作，小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总司令也不管这些事，总理忙得很，首先是我们几个人（指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负责，我们

肩上担着 6 万万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屁股。”

“实事求是不是小脚女人。”

“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

陈云的这些话在当时对于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反对急躁冒进情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7 年 1 月，在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陈云进一步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理论。说：“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这样做的目的是使 1957 年基本建设的规模，适应于国家财力和物力的可能。”“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 6 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

从以上情况看，陈云在反冒进中的确扮演了主力的角色，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把矛头指向陈云，并没有“冤枉”他。

但实践证明，陈云 1956 年反对冒进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关于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理论也是极为深刻的。毛泽东正是因为听不进陈云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在 1958 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 在“大跃进”运动的狂飙中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1957年11月2日上午8点，毛泽东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苏联政府派出的一架图—104大型客机，飞往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宋庆龄等。临行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前往机场送行。

苏联专机的机组人员都是第一流的，飞行很平稳；空姐也是精选的，个个都很漂亮、热情、庄重，服务周到。毛泽东先去看望了宋庆龄，回到自己的机舱后，就请人把同机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找来，待他落座后就开玩笑地问道：“你是哲学家，又是我的老朋友，对不对？”尤金点头：“是的，我是研究哲学的，跟您也够得上是老相识了。”毛泽东说：“那么，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尤金下意识地用手指理了理头发，说，“那好吧，争取及格，”毛泽东问道：“你说说，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这下可把尤金难住了，他想了好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研究过。”毛泽东笑着说：“那好，我来答试试，请你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尤金抚掌称妙：“完全可以这样说明。”

飞机经伊尔库茨克，下午3点左右抵达莫斯科伏努克机场。在来苏联前，毛泽东曾请尤金转告苏方，请他们把外交惯例上的机场迎宾仪式统统去掉，来接的人不要多，不要仪仗队，最好是下飞机就走。可现在毛泽东一出舱门，机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亲率苏联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来到机场迎接，飞机舷梯下铺上长长的红地毯，三军仪仗队肃立欢迎。在从机场去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毛泽东问赫鲁晓夫：“我不是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少来人接了吗？怎么还这么隆重？”赫鲁晓夫解释：“是的，我们收到了尤金的报告，说您有这样的请求。我们讨论了，大家认为不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都是照惯例办的。您这样尊贵的客人，礼遇是不能简化的。”毛泽东微笑着说：“谢谢你们的盛情。我看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也就没用了。”

这样两件小事，很能反映出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特点：思考辩证法，力图打破常规。

毛泽东这是继1949年底至1950年初第一次访问苏联以后，第二次前往莫斯科。那次访问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国加入了东方阵营。此次苏联之行，除了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还有一项安排就是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原来对付共同敌人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很快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集团。一方是以美英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一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46年3月5日，英国战时领导人邱吉尔在美国总统社鲁门的陪同下，在美国的富尔敦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东欧国家“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他还大肆攻击苏联“权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鼓吹英美“建立特殊的关系”来共同对付苏联。邱吉尔的“铁幕”演说吹响了

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两大阵营“冷战”的号角。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的错误，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极大混乱。秘密报告的内容泄露后，被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来大肆攻击共产主义，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才逐渐改变了局面。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中，毛泽东断言，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中，社会主义阵营已经领先了，是“东风压倒西风”。他举出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就说：苏联已经发射了两颗卫星上天。美国吹得那么厉害，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

那时候，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今后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与此同时，又在内部确定，从1959年算起，在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发言中也提出，中国要在15年后超过英国。这样，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把帝国主义远远抛在后面！

对中国的落后，毛泽东是耿耿于怀的。在说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还是很客观的。他说，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来讲是个大国，但从经济上讲现在还是个小国。从莫斯科回国后，他还多次在讲话中反复强调：我们这个国家，吹起牛皮来，了不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炎黄子孙，等等，但就是钢赶不上比利时，粮食亩产很低，识字的人只那么一点点，因此，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一些人，比如美国的杜勒斯等，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毛泽东内心里是多么希望中国能够赶快发展起来，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

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时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转折点，现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两个卫星上了天，全世界68个国家的共产党到莫斯科来庆祝十月革命节，这是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东风压倒了西风。

11月21日，毛泽东带着莫斯科会议的东风，返回北京。

**批评反冒进：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  
非马克思主义。陈云不得不再三“检讨”反冒进的“错误”**

毛泽东回国的时候，陈云没有去机场迎接。当时，他在上海休养。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后，陈云多次视察在建工厂，了解国家工业化的进度和新增实力，以便从实际出发，把握国家经济建设大局。1957年10月12日至19日，8天之内，陈云连续视察东北的大连、吉林、长春、齐齐哈尔、抚顺等城市近20家厂矿和电站、港口，回京后就累得病倒了。11月初到机场为毛泽东一行送行后不久，他就不得不接受医生建议，向中央请假，去华东休养一个时期。

在休养期间，他不安地注意到，一股批评1956年反冒进、反对所谓右倾保守的风刮得越来越厉害。

由于经验不足，1955年底到1956年上半年，出现了经济建设的冒进，造成资金、原材料和市场紧张。1956年，陈云和周恩来等人领导开展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降下来。经济建设中的这个曲折，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过程中，被人用来批评共产党搞“全面冒进”。后来开展反右派斗争，提出批评意见的不少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反右派斗争后，党内“左”倾冒进思想有所抬头。

1957年初，毛泽东在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就批评过反冒进，说反冒进的结果是出了右倾。但他当时所说的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对反冒进的批评就严厉多了，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这些要恢复。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国民党和右派的章罗联盟才是促退委员。进入11月，批评反右倾的调子升得更高了，批评的矛头开始指向反冒进运动的领导人。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社论中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12月12日，又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和政治局讨论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最后这一句的“有的人”，再明白不过地告诉人们，这是有所指的。

陈云曾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表达过类似的思想，最为党内所熟知的，就是年初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他在会议发言中说，1956年经济建设成绩是主要的，但财政和信贷方面多支出了近30亿元，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都紧张。然后他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以保持经济稳定的思想，并且主张，为了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应该注意的几点：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二、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应该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三、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

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五、经济建设规模要考虑到农业的约束力。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经济建设的综合平衡思想。

陈云认为，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规模超过国家的财力物力，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然后他说：“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为什么呢，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

社论那种话中有活的暗示，不免会给陈云造成很大的压力。

进入1958年，批评反冒进的斗争升级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周恩来、陈云受到了点名批评。

1958年1月3日和4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和华东5省1市的第一书记。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对1956年反冒进负有责任的周恩来等人。并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召开会议，参加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9省2市的党委书记。1月11日晚，毛泽东发言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他还说，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弄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就只讲一个长了疮的指头。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6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就是这样的。

为了告诉大家，什么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还给大家举了一篇古文《登徒子好色赋》来说明。

这篇古文说的是战国时代楚国文人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故事。登徒子向楚襄王告状，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意思是宋玉长得花里胡哨，惯会甜言蜜语，生性好色，建议不让他出入后宫。不料有一天楚襄王竟然把登徒子告状的事给宋玉本人说了。宋玉就争辩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也就是一口否定自己好色。楚襄王就问他，你说你不好色，有什么根据？宋玉回答说，天下的美人都比不上楚国的美人，楚国的美人都比不上我们家那里的美人，我们家那里的美人都比不上我东边邻居家的美人。这个美人美到什么样子呢，“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这么倾国倾城一个美人，勾引了他三年，他“莫之许也”，没有答应她，可见不是好色之徒。接着宋玉倒打一耙，说你看登徒子，他才好色，他老婆头发蓬乱，耳朵也有毛病，豁嘴尖牙，驼背弯腰，身上又是疥疮又长痔疮，难看得要命，登徒子还那么喜欢她，跟她生了5个孩子，大王比较比较，看哪个好色。毛泽东说，结果宋玉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办法赢了官司。他还得意地写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赋》流传世间，搞得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第二天，毛泽东又把宋玉这篇赋印发给开会的人看，以便大家更了解反

冒进的人用的“错误”方法，即是只讲冒进的缺点，不讲冒进的“成绩”。

在这次会上，针对反冒进的人所持的保持综合平衡以防止冒进的理论，毛泽东还讲了一大段哲学，说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平衡是革命的平衡，是积极的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不是保守的平衡。

为了给这个积极的平衡作注，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论，指出：“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

根据这一注解，陈云的论点当然毫无疑问地属于应当否定的消极平衡了。实际上，由于把不平衡问题极端化，否认事物的相对稳定性，人为地打破平衡以求跃进，长线平衡或谓之积极平衡最后就是严重失衡。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积极反对“右倾保守”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十分欣赏。1月15日，毛泽东夸奖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16日他又在大会上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总理，“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大家都在猜想，这么严厉的语调，到底是批评谁？刘少奇解释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当时负责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是由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组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其中黄克诚是军队的。1月17日晚上，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亲自揭开了这个谜底，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的。

19日晚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作了检讨，说反右进是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右倾保守主义的思想，是与主席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对此负主要责任。

极力主张冒进的人受到表扬，主张反冒进的人受到严厉批评。一时党内“左”的急躁冒进思想迅速泛滥。在这种党内舆论之下，甚至有一位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公开声言：反冒进的保守主义思想代表就是陈云。

南宁会议以后，毛泽东亲自执掌了经济工作大权。

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陈云因正在养病，都没有参加。他按原定计划，赴大西南的成都、重庆，边休养边视察工厂。南宁会议后，他才听到会议情况的传达。2月上旬，他虽然尚未完全康复，还是决定结束休养，逐步恢复工作。

2月13日至23日，陈云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还是批反冒进。

毛泽东在会上说，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

2月18日是旧历正月初一，中南海怀仁堂里，空气凝重，新年喜庆的气



氛似乎是在另一个世界。批评反冒进的政治局会议仍在进行。

在这一天的会上，陈云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表示对反冒进的“错误”负主要责任。还检讨说。在财经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毛主席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的分散主义“错误”。

这时，毛泽东插话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着。你强迫我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虽然严厉批评了反冒进，但仍然提出要批评的人继续工作。他说：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出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由毛泽东自己在成都会议上说出来了。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明了他发动对反冒进的批评的目的。3月9日，他发言说，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官气、暮气、骄气，一些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3月25日又说，关于反冒进，我看以后不需要谈了。如果从经验上、方法上把它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重点是要用唯物论、辩证法来深入分析反冒进问题。反冒进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冒进则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要和反冒进对起来，反对慢的路线。

显然，批评反冒进，就是要统一思想，实行“跃进”。

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又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虽然说，反冒进问题可以不再谈了，但他仍然不太放心。1958年4月他在武昌会议听一些省市的工作汇报时，表达了这种心情。4月8日，他听叶飞汇报时插话说，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这是宋之间写的《灵隐寺》一诗中的句子。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再次猛烈地批判了反冒进。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

会上，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开展过火党内斗争的气氛很浓，有不少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反冒进，觉得这个结论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轻了，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各地方代表也在会上报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团”、“右倾集团”、“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经过。

在这种气氛下，陈云和周恩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都在会上再一次就反冒进“错误”，违心地作了自我批评。

应该说，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就反冒进问题作检讨，心态是很复杂的。反冒进是在当时经济形势下必须采取的措施，实际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左”倾急躁冒进思想逐渐在党内上升，使他们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很高，而且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维护党内团结的良好愿望出发，他们不能对毛泽东反冒进一事表示异议。

这种心态，从当时周恩来写检讨的经过中可以隐约看出来。据范若愚《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说：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后，周恩来回到北京，起草八大二次会议发言提纲。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周恩来同志说，关于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为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12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第二日凌晨2时许，邓大姐就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后来稿子退回来，周恩来同志看过以后，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较轻了……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改这个发言稿的10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在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甚至委婉地提出自己不适合再当总理。虽然会议挽留了他，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压力之大。陈云也不可能不感受到这一点。

批评了反冒进，“统一”了全党思想，会议正式通过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建设的高指标。

至此，批评反冒进的问题，才告一段落。

## 计划节节拔高；陈云心怀疑虑，但没有说话

批评反冒进，为冒进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各地纷纷以反对所谓右倾保守为柴薪，为经济上的冒进加热、升温，从而形成了贻祸惨烈的“大跃进”狂潮。

“跃进”是毛泽东比较欣赏的用语。1958年5月25日，彭真给毛泽东送去一份材料，即《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关于发动全民讨论农业四十条的社论，并说明这是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地方。毛泽东当即写信赞扬说，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并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实际上，早在1957年6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为了批驳大鸣大放中有人说1956年经济建设是全面冒进的言论，就使用了“跃进”一词，说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所以，一天以后，1958年5月26日，彭真又把周恩来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把“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归于周恩来。

毛泽东欣赏“跃进”一词，一个原因就是它堵住了反冒进论者之口。他在1958年5月26日致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信中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果真如此。在“大跃进”中，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一套套瞎指挥盲干的做法，却不便反对，只能让自己的思想尽力去适应，去“跟上形势”。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关于农业发展的四十条纲要修正草案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提出：“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中共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首次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制造高指标的工具，是所谓计划两本帐的方法。

南宁会议制订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一项用于拔高指标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生产计划搞两本帐和三本帐的规定，“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

两本帐或三本帐的观念为计划的层层加码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中央带头搞两本帐，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帐，下到基层，同一个指标就有六七本帐了。不管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其他行业也好，“大跃进”中的各种高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帐的方法，层层拔高的。

首先是作为农业主要产品的粮棉生产计划，节节拔高。把实现高指标所需要的时间，迅速缩短。

1956年党的“八大”建议：“二五”计划期末1962年粮食产量5000亿斤，棉花4800万担。

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四十条”或农业四十条），提出要在5年内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达到2000斤，半个世纪内做到亩产2000斤。即使不考虑5年中的人口增长，仅按当时6亿人计，1962年粮食产量就要达到1.2万亿斤。

到了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提前实现农业四十条。会后，这一点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草案规定：“在今后5年内，或者6年内，或者7年年，或者8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10年决于3年，争取在3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并提出“5年看3年，3年看头年，头年看前冬”和“苦战3年”的口号。

南宁会议后，各省仿效中央的做法，纷纷提出各自的雄心壮志。浙江、广东等省提出，用5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粮食生产达到农业四十条的规定目标。河南省提出的部署更离奇，要求当年即实现纲要规定要在12年内达到的粮食亩产指标。历年吃外调粮的工业大省辽宁提出，当年要实现粮食、猪肉、蔬菜自给。

就这样层层加码，一个高指标没过几天就不灵了。总有人不断地往指标的水银柱上加热，水银柱烧糊涂了，人也烧糊涂了。

为了给1958年的跃进创造气氛，当年的粮棉产量指标也在迅速拔高。1957年我国粮食产量3700亿斤，棉花产量3280万担。粮食指标年初定3920亿斤，从2月到10月，几个筋斗就翻到了8000亿斤，还说1万亿斤也是可能的。棉花指标，也从2月份的3500万担窜上了6700万担。两个指标都比上年实际产量翻了1倍还多。

拔高了1958年农业产量指标，又开始折腾1959年的指标。1958年6月提出的1959年计划第一本帐的指标是：粮食6000亿斤，棉花6000万担。8月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粮食产量指标8000至1万亿斤，棉花产量指标9000至1万万担。10月西安会议提出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1.5万亿斤必须保证，并力争达到2万亿斤。会上还出现了一种奇异的说法，我国粮食产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

工业上的高指标，主要表现在钢铁指标上。

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是超过英国了吗？”

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公开宣布：“在15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进入1958年，钢铁指标也一本帐一本帐地往上

长。2月3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通过的1958年计划报告，提出当年钢产量为624.8万吨，比1957年实际产量535万吨增长17%。翻了几个筋斗以后，6月17日，政治局会议已开始谈论当年钢产量900万吨的可能了。第二天，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部门领导人的谈话会上已经定到了1000万吨。不料这个高指标也只风光了一天，指标就变戏法似地涨到了1100万吨。

毛泽东似乎为这种令人着迷的数字戏法所陶醉。4月15日，他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宣布：“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他在送此文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胡乔木、吴冷西各同志写的一封信中还写道：“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5月7日，他在人大会议上发言，提出我国的钢铁生产发展速度要超过苏联过去的速度。5月18日，毛泽东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明确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后来这两句话就缩称为“超英赶美”。

在这种节节拔高生产指标的过程中，陈云的处境很微妙。

陈云主张制定计划要搞综合平衡，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从建国以来他就领导经济工作，这两年又亲自到各地看了看新建厂矿。国家有多大家庭底，他心里已经有了一本帐。

陈云也希望我们能有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1957年12月，他在休养期间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国家在“一五”计划后槽加了工业实力，有了一些建设经验，“二五”计划中可以发展得更快。

从1958年初结束休养、恢复工作后，陈云参加了中央和国务院、人大讨论经济建设的一系列会议，。但是在指标层层拔高的气氛中，他却不得不频频为反同进的“错误”作检讨，很少对指标说话。

1958年3月9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南宁会议和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第一本帐，主要是：与1957年产量相比，粮食3920亿斤，增长5.9%；棉花3500万担，增长6.7%；煤炭1.5亿吨，增长16%；生铁720万吨，增长22%；钢620万吨，增长17%；基建投资134.36亿元，增长12%。成都会议大大提高了指标，提出了第二本帐，其中规定：与上年相比，粮食4316亿斤，增长16.6%；棉花4093万担，增长24.8%；煤炭1.6737亿吨，增长30.1%；生铁800万吨，增长35.5%；钢700万吨，增长35.5%。会议并提出放手让各地大办地方工业，加快下放中央所属企业。陈云出席这次会议，就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

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大批一通反冒进以后，提出了一大堆宏伟蓝图。广西来宾县提出“苦战4个月，基本实现水利化”；河南长葛县提出当年要把全县112万亩土地深翻一遍，争取亩产800斤；安徽桐城县提出当年亩产1000斤，争取1500斤；机械部门提出“二五”计划期间机械工业的产品产量平均每年递增50%；冶金部门提出实现“5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任务，“二五”计划期间钢产量平均每年递增车要达到41.5%；铁道部门提出全民办铁路，“二五”期间修铁路3万公里，15年内全国铁路总长度要达到27万公里；包头钢铁厂提山冀实现“产量增加一番，速度

快一倍，投资省一倍”的目标。

在反冒进和“大跃进”中表现积极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5月13日在会上发言，描述了文教卫生大跃进的一幅浪漫前景：

——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15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

——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读到书中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

——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化艺术。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墙报、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

——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将成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规范。那时“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渐消失，而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这位“柯老”还说，这样设想合不合乎实际呢？“只怕我们的眼界还是小了些，想得还不够远大”，“现在已经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的问题了。

柯庆施描绘的文化革命蓝图，简直是太离奇、太令人“陶醉”了。但并没有人对此提出疑问。5月25日，柯庆施被选人政治局，而陈云等人却不得不作自我检讨。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中国正处于“1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

毛泽东在反冒进的时候说过，批评归批评，财经工作还要陈云等人来做，此外没有别人。1958年6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规定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负责领导各方面的工作。其中财经小组由12人组成，陈云为组长，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为副组长，李先念、黄克诚、邓子恢、聂荣臻、李雪峰、贾拓夫、王鹤寿、赵尔陆为组员。

实际上，由于毛泽东亲自走上前台领导经济工作，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变成了一个无实权的机构，它的任务只是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供经济信息和各种意见。

中央财经小组办了一个每星期出一期的《经济消息》刊物。陈云指示，这个刊物要登载各种不同的意见，好消息坏消息都要报道。后来这个刊物因此而受到一些爱唱高调的人的批评。

6月17日下午，陈云参加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薄一波作关于1958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59年设想的汇报。谈到钢铁生产时，薄一波说，预计今年钢产量将达到900万吨，初步安排，明年计划为2000

万吨或 2000 万吨以上，讨论时一些人同意，另一些人还认为当年钢产量不只 900 万吨，明年指标还可能更高一点。会议从下午 3 点一直开到晚上 11 点。常委除毛泽东外，都参加了此会。

6 月 18 日晚 8 点到 11 点半，陈云参加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的谈话会。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常委和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廖鲁言、黄克诚、王鹤寿。在谈话会上，毛泽东说他赞成提高钢铁指标。经研究，1958 年钢产量预计完成效改为 1000 万吨，1959 年钢产量指标改为 2500 万吨。

谈话时，毛泽东对薄一波说，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薄一波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泽东说：对，就按这么办。他认为，机械工业也很重要。接着就议论起工业交通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机械工业也是纲，电力和铁路是先行。后来，薄一波在修改《汇报提纲》时，就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基本建设投资首先保证两个‘纲’和两个‘先行’部门的需要。两个‘纲’就是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两个‘先行’部门，就是电力和铁路。纲举目张，其他一切东西都带动起来了。这是工业上部署上的战略问题，必须有统一的想法。”7 月 1 日，《人民日报》闻风发表一篇《以钢为纲》的文章。“大跃进”中广泛使用的“以钢为纲”、三个“元帅”（钢铁、机械、粮食）、两个“先行”之说，就这么出来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意见，薄一波对汇报提纲作了重要修改，提出：1959 年我国国民经济将比今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经过 3 年苦战，我国可以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方面将实现水利化，达到农业四十条的要求。

6 月 21 日，冶金部向中央报送的《产钢计划》中提出，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明年钢产量可以超过 3000 万吨，1962 年可能争取八九千万吨。

同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 3 年基本超过英国，10 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

6 月 22 日，毛泽东对薄一波起草的汇报提纲作了指示：“赶超英国，不是 15 年，也不是 7 年，只需要 2 年到 3 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 1959 年达到 2500 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毛泽东还修改了汇报提纲的标题，正题是《两年超过英国》，副题是《国家经委党组向政治局的报告》。

中央、地方、各部门相互较劲，三天两头变更计划，给指标升温加热的现象，陈云内心里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但是没有说话。

陈云认为，有了“一五”建设的工业基础和建设经验，“二五”计划期间，经济发展可以比“一五”更快，但是“大跃进”这种搞法，显然与他心中筹划的发展方式完全不一样，大跃进的做法明显是全面冒进，处处紧张，这么搞下去，建设规模怎么适应国家的财力物力，国家计划怎么保持平衡？

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对他认定的事情表示异议是下大可能的。高指标所鼓动起来的建设热情，使每个人都不可能不受到感染，此时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不会起到好的效果。陈云由于刚刚为反冒进运动受了批评，作了检讨，多少有些思想包袱，感到有压力，因而不便说话。

薄一波在回顾他在这个时期的想法时说：“那时，我的脑子也很热，而且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刚就反冒进问题作过检讨，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便坚持，因此，我也同意提高钢铁指标。”这种心态，反冒进的当事人或多或少



都有一点。

陈云私下谈话中也说，现在热度太高，提不同意见没人听。有一次，薛暮桥和宋劭文去见陈云，希望他找毛泽东谈谈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陈云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

当时，对中国制订的不现实的高指标，一些关心中国建设的外国友人，曾经提醒过，其中就有陈云的老朋友，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

1958年7月31日到8月3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华访问。阿尔希波夫作为他的总顾问随同来访。

赫鲁晓夫这次访问，是为了解决双方关系中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此前不久，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苏联领导人的一个意思，希望在中国有一个潜艇基地，建一个长波电台以便与苏联舰队保持联络，并提出和中国搞一个联合舰队。毛泽东当即发火，严厉质问尤金这是什么意思，并让赫鲁晓夫自己来讲个清楚。赫鲁晓夫决定马上来华。

赫鲁晓夫这次来，毛泽东和中共高级领导人虽然去机场迎接，但是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拥抱。气氛明显冷淡。

在会谈中，毛泽东认为苏方的建议是无视中国的主权，因此双方谈得很僵。毛泽东在会谈中很气愤地说：“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他还给赫鲁晓夫讲了这样的话：“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下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话说到这个份上，赫鲁晓夫知趣地放弃了这个打算。

为了让赫鲁晓夫彻底放弃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想法，毛泽东对他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还是站不住。”赫鲁晓夫听了，面无表情。

同志毕竟还是同志。毛泽东把中国当年的雄心壮志给赫鲁晓夫透露了。他告诉赫鲁晓夫，中国今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明年是2500到3000万吨。

赫鲁晓夫搞过技术，对大工业还是有感性认识的，在苏联当了多年领导，工业建设方面也有经验。中国的工业基础还是苏联帮着搞起来的，有多大的家底，瞒不过他。现在中国一下子搞钢铁翻番，他当然不大相信，但也不想再为这次糟糕的会谈添什么新的分歧了。他很圆滑地来了一句外交辞令，说：中国同志提出来的计划，我们相信大概可以完成。

说完这句话，再无下文，怎么完成，有什么条件，究竟具体情况怎么样，他不问；怎么伟大，怎么光明，他也不说。明显表示冷淡和怀疑。

阿尔希波夫就不同了。

8月3日，中苏双方签署《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陈云和阿尔希波夫进行了交谈。陈云把深藏心底的疑问，端出来问这位老朋友：你看我们明年的钢产量计划，完成得了完成不了？

阿尔希波夫也许觉得自己毕竟是个外国人，不好对这个问题说什么。他没有正面回答陈云的问题，只是笑了一下，说：很大的计划，伟大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八十、九十，也是很好的。

阿尔希波夫也许觉得自己这么说，意思还没有表达清楚。他感到，陈云这么问，也是对钢铁指标心里有疑虑。在走向宴会厅时，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又同薄一波走在一起。这一次，他抓住机会，摒弃了外交辞令，明明

白白地对薄一波讲：“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

薄一波不知怎么回事，于是机械地用标准的“大跃进”语言回答：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铁炼钢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实现。

阿尔希波夫苦笑，说了一句：土法炼钢再多也没有用。

当天，赫鲁晓夫一行飞回苏联。

## 出席北戴河会议：避得了自然界的酷暑，躲不过人为的狂热

风光旖旎的北戴河海滨。每到夏天，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差不多都来这里避暑，也在这里工作、开会。于是人们戏称北戴河是中共中央的“夏宫”。

1958年8月17日，在这里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1958年工农业生产问题。这就是载入史册的北戴河会议。

1958年1月至7月累计只产钢370万吨，离6月19日提出的当年翻番搞1070的指标要求，差距很大。

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头几天，分析了6月19日以后钢铁生产未见起色的原因：第一，从部到相当多的工厂，根据南宁会议后下达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要求，把注意力都放到编计划（五年计划和明年计划）去了，部长、副部长都在外面参加各协作区的计划会议，忽视了抓生产；第二，由于小高炉生产不稳定；农民工不熟练和大批工厂领导关系改变（5月29日闭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到6月15日24时止，大批中央部直属厂转交地方领导），主管部门和地方忙于办交接手续，生产调度不灵；第三，钢铁冶炼需要的设备供应不上，6月间安排生产的一批冶炼设备，有的被计划外的东西冲掉了，有的还没有安排落实。

陈云把这些讨论情况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了。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之后，打电话给陈云，作了八点指示：

一、国家经委主要抓生产（此后年度计划的编制工作交归计委，基本建设交归由陈云任主任的新建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

二、原材料调配要服从国家计划，分配钢材既要照顾重点，又要照顾农民的需要；

三、抓紧冶炼设备的生产和安装；

四、机械厂收到钢材后，第一是用来制造炼钢炼铁轧钢的设备；

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每星期抓一次钢铁生产；

六、加大保险系数，冶金部直属钢铁厂今年增加50万吨钢的新任务；

七、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处分；

八、立即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后简称工业书记）找来北戴河，开一次工业书记会议。

毛泽东显然很着急，他特别强调，钢铁指标是政治任务，少1吨都不行！

毛泽东把钢铁指标提到政治任务的高度，务求实现，陈云只能使自己的思想尽快适应。8月21日，由陈云向参加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些指示。陈云还把1958年钢铁指标翻番的来历讲给大家听。

陈云说，6月19日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530，今年可不可以们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当时内部决定1100万吨，后来公开宣布为1070万吨，即以1957年产量535万吨为基数翻一番。

陈云还给大家讲述了同阿尔希波夫谈话的情况。与会者闻知这位苏联顾问竟然对我们完成指标的能力表示怀疑，无不义愤填膺。

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炮轰金门。8月23日，

为声援当时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入侵黎巴嫩的斗争，并打击国民党反共气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国民党守军发起了大规模的猛烈炮击。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加剧。这一事态间接为钢铁升温加了一把火。

毛泽东提出的工业书记会议8月25日在北戴河开幕，由薄一波主持。主要是研究在年内怎样完成以1100万吨钢为纲的工业生产任务的问题。当时提出要搞群众运动，上上炉子。薄一波说：“主席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100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插上了红旗，其余99个都应当向它学习。”

陈云两次到会讲话。鉴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今明两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陈云在讲话中也提到，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

在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统一”思想后，30日下午，薄一波领着主要钢铁产区的工业书记，鞍钢、武钢、太钢等几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去毛泽东那里，一个一个向他当面担保。毛泽东挨个向与会者核实：1070，行不行？

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

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赵敏也说可以。

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

还问了太原中委书记，问行不行，他说可以，太原市委书记姓麻，毛泽东开玩笑说，你姓麻，隋朝大将有个麻叔谋，与你有什么关系？

后来又一个一个地问主要钢铁基地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工业书记，大家都说行。

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毛泽东说，你这个模样我好像见过，刘彬说，我是刘英的弟弟（刘英是张闻天夫人，从延安时就与毛泽东熟悉）。毛泽东于是说“怪不得眼熟。你管什么？”刘彬说：“我管生产，我是冶金部副部长。”毛泽东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做了计算了。”

袁宝华是冶金部办公厅主任，主要管建设和计划。他估计会问到自己，得做些准备。后来问到他，说“你做什么呢？”王鹤寿给回答了。毛泽东问：“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他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10个环节，我们树了10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10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别人讲得简单，他讲了10面红旗，毛泽东很注意听10面红旗是什么。

然后问到冶金部部长王鹤寿。

王鹤寿搞钢铁是比较积极的。3月20日他给党中央、毛泽东的两个报告，特别是有关钢铁工业的报告，提出了可以缩短赶英国的时间。这两份报告是冶金部党组同部分大企业负责人一道，连续“务”了8天“虚”写出来的，一份是《争取有色金属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一份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得更快一些》。后一个报告提出，只要把“红”与炼钢、炼铁结合起来，“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我国钢铁工业“苦战3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至1200万吨）、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路线下，建设速度可以快1倍、投资省一半，1962年钢产量超过1500万吨而争取2000万吨，是可能的。

这两个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成都会议上，3次给予表扬，说报告“不

但鲜明地指出了冶金工业的发展方向，而且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倾向作了尖锐的批判”。要其他部门也要像冶金部一样，“坚决克服干部中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右倾保守倾向和不问政治、只专不红的倾向。”5月29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中，更称赞王鹤寿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这次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当时是8月，到年底只有4个月时间，钢铁指标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当年完成1070万吨钢，王鹤寿敢于向毛泽东拍胸脯，是想借毛泽东的威望把钢铁搞上去，后来王鹤寿专门检讨了这一条。

最后问到薄一波，他看到大家都说能够完成，也不好说不赞成。于是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毛泽东听了以后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薄一波马上打电话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第二天见报。结果公报上写上了：“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1倍而奋斗。”

尽管不少人慷慨激昂，保证完成任务，但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因为只剩下4个月，时间太紧迫，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提醒大家：“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

同工业书记们谈话后，毛泽东对陈云说：1070看来还是可以的。

陈云仍不放心，专门找袁宝华和王鹤寿去谈了一次。他对他们说：“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帐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帐，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帐。”

毛泽东对一套套的数字细节是不耐烦的，曾经为此批评财经部门搞的复杂报表是“下倾盆大雨”，是对他和政治局搞封锁。陈云很理解自己的部下。

袁宝华就把当时他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算的，今后5个月他按4个月算。

这样算了细帐，陈云认为，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后来毛泽东与陈云谈话时，陈云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陈云说话向来是很慎重的，但在这种算法下，连他也不得不相信了。

于是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通过了《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把1070的高指标公诸于世。

北戴河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提出1959年的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是，粮食8000亿斤；棉花9000万至1亿担；钢产量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在“二五”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会议还把人民公社作为实现共产主义之路，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并通过了计划等一系列文件，以配合进行“大跃进”。

9月1日，《人民日报》在公报发表同一天，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5日发表《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

与钢铁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从此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浪潮，使“大跃进”的盲于做法达到顶峰。

**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肆虐。陈云苦口婆心：基本建设要配套前进，要讲质量、讲安全**

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造出来容易，但实际上起来可就让人挠头了。为了完成这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开始违反科学规律，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搞瞎指挥。当时的做法是，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加盲干。并美其名曰：又红又专。

当时号召深翻密植。深翻地，在一些地方变成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竟有翻到1丈2尺深的。“合理密植”，在一些地方也变成越密越好，1亩地下种几百斤。不深翻，不密植的，就会被扣上“右倾保守”帽子。于是干部们着了魔似的布置深翻密植，种地的农民意见再大也不听了。结果是土地变成烂泥潭，庄稼尽长秕子。

我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听说国内农村经过深翻土地稻子亩产“万斤”，放了卫星，开始深信不疑，正好华侨送给他们的一座房子院内有2亩空地，他们就组织人员去劳动，要求深翻1米半，然后种稻子，还打算种出万斤稻，请印尼总统苏加诺来看看，也好帮助印尼人民，那时印尼大米正不够吃呢！谁知挖着挖着，出了地下水，稻子种不成了。后来，听说国内宣传的产量有泽夸，才知道是上当受骗了。

北戴河会议号召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结果只用了20几天就在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并积极向共产主义“跃进”，大搞公共食堂、对社员和生产队的生产生活资料无偿调拨、大办民兵师。“共产风”盛行，一些人的胡作非为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湖北有个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958年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私人的东西也不分你我，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不过这一条还得请示上级。河南新乡兴宁人民公社，4000户2万人，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15个营50个连，房屋公有，搞集体宿舍，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礼拜六回原家度周末。

过高的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靠大辩论开路的刮风式的领导方法，所带来的副作用，最大的还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各级干部的浮夸风。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是以严重的浮夸为其显著特征的。

浮夸风是为了迎合高指标，因为那些高指标按科学规律办事、从实际出发的话是肯定完不成的，而这样就会暴露大跃进实际是“左”倾冒进。为了掩盖这一点，各地把浮夸数量当作政治任务来压下去，不照上级的意见提供浮夸产量就会被说成右倾保守，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人们把自己假造的所谓高产典型叫做“放卫星”，一时间成为全国流行的时髦用语。各种稀奇古怪的“卫星”，让人目瞪口呆。6月8日，报纸率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放出亩产小麦2105斤的“卫星”；6月26日，又报道了江西贵溪县水稻亩产2304斤的“卫星”；随后，“卫星”越放越大。小麦“卫星”亩产量高的，为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的青海蹇什克农场亩产8585斤；水稻“卫星”亩产最高的，为《人民日报》9月18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130434斤。除了小麦、水稻“卫星”以外，《人民日报》和一些省报，还连续发表了玉米、高粱、谷子、蕃薯、芝麻、南瓜、芋头、蚕豆、苹果等28种农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产“元帅”。报纸刊登科学家论证农作物高产的文章。当时的一张照片上，几个快乐的年轻人，竟能举着横幅站在丰产的水稻上。“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

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豪言壮语，在权威的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上频频出现。

工业搞“以钢为纲”，大搞小土群（小高炉、土法炼铁、群众运动）。一些大钢铁厂拼命提高产量，不顾质量，不顾设备的加速损耗，武汉钢铁厂放着现代化设备不好好利用；也在厂区遍设小土群，追求产量“大跃进”。一个个机关、厂矿、学校都搭起了炼铁炉，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

破坏性最大的是农村的小土群。为了完成钢铁指标的“政治任务”，各地发动群众上山炼铁。据当时参观过河南修武县大炼钢铁场面的人回忆，晚上，在一个炼铁点，人山人海，火光映天，人们通宵不眠，大干特干。指挥者不断地作鼓足干劲工作，嗓子都喊哑了，说那天夜里要放“卫星”。场面蔚为壮观。为了炼铁，山上的树砍光了，群众家里的铁锅进了炼铁炉，正当收获季节，9000万青壮劳力上山炼铁，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庄稼，就要到手的丰收粮食，却因为无力收获而烂在地里。小土群炼出来的却是海绵铁，根本不能用。

在这种全国性的狂热中，陈云是较早清醒的一个。

北戴河会议后，9月19日，中央成立基本建设委员会，接收计委原有关基建的工作，由陈云负责。10月12日，陈云担任了国务院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全国的基本建设工作。他一上任，就组织召开了几大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

当时基建战线热度也很高，计划1959年一年的基建投资就有500多亿元，而“一五”时期整个投资规模才400多亿元。基建投资规模陡然加大，必然会造成物资全面紧张。基建战线盲干浮夸风也开始蔓延。陈云多年搞经济工作，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迫于“大跃进”环境，又不便明言，只能委婉地告诫大家注意配套，注意质量。

9月28日，陈云在华北协作区基本建设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在发言的开始，为了和中央精神保持一致，适应“大跃进”形势，陈云被迫说，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缺口的的问题，可以靠挖掘材料潜力和安排后备项目来解决，这种办法虽然使材料供应紧张，但有利于国家大踏步前进。好比几百万大军过长江，大家都叫东西不够，但一边叫一边过，最后主力终于还是过了长江。乱七八糟，总是要过河的。用四平八稳的办法建设，反而不正常。

陈云此时虽然不便抵制全面“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但在具体做法上，仍然强调要综合配套发展。他说：北戴河会议，提出用“上炉子”炼铁，对开采矿石、运输考虑不周到，炼铁需要大量矿石和煤，“上炉子”和小高炉用煤要比“洋炉子”多两倍，明年4000万吨铁，其中2500万吨要靠土炉子和小高炉，耗煤比原来计算的多出：亿吨，我国现有的运输条件适应不了这么多矿石和煤的运输。钢产量跳上去了，翻了番，但各方面并不是配合起来一起发展。

此后，陈云在各协作区基本建设会议几次讲话都强调了运输的困难，对运输能力能否适应钢铁翻番表示怀疑。

对当时各省热衷于搞各自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陈云持有异议。10月21日，他在西北协作区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说，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对全国而言，其次是就协作区而言，各个省不能这样搞。否则，把材料设备分散了，会影响全国和协作区的建设进度。“工业经济是一种协作经济，‘万事不求人’的想法是办不到的。”



当时基本建设也搞群众运动，推广快速施工法，人海战术，搞代用材料，只看速度，不管规章。结果速度上去了，工程质量下来了，工伤事故急剧增加。陈云很快注意到了这一个问题。1958年11月27日，陈云在修改中共国家建委党组《关于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报告》时，增加了开展快速施工运动应该加强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和施工中的技术组织管理工作，避免发生较大伤亡事故，切实保证安全作业等内容。这个报告在1959年3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基本建设工程质量问题也十分严重。为了图快图省，有的工

厂建设连地基也没有打好；有的地方连年产5万吨的炼钢车间也用砖木结构，在水利大坝上用土水泥、用不合格的钢材；还有些工程，上法施工，居然连勘察设计的基本程序都不顾了，画张草图就敢上马，工人不经培训，一窝蜂上岗。

这样做的后果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还留下了无数的隐患工程，不知道哪天就要死人。据统计，1958年，由于强调快速施工，随意修改设计和建筑结构，随意使用代用材料，随意破除规章制度：发生了许多严重的质量事故，倒塌了不少新建的厂房，死亡人数直线上升。仅建筑工程部系统就死亡435人，而上年是135人，死亡人数增加2.2倍。在这些死亡的人员中，由于工程结构倒塌而死亡的有117人，而上一年只死亡3人；高空作业跌落而死亡的有70人，而上一年只有38人，在因结构倒塌而死亡的人员中，属于钢筋混凝土结构倒塌的46人，木结构倒塌的50人，砖结构倒塌的21人。这些问题，大多数发生在10月以后。

面对这些严重问题，陈云十分痛心。他于1958年底在杭州专门召开全国工程质量问题的现场会议，采取补救措施。

12月16日，陈云抵杭州，视察了杭州半山钢铁厂。当时这个钢铁厂由于不注意施工质量，盲目采用由我国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设计的一种还没有完善的拱形屋架，结果发生了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的严重事故。从12月22日至26日，他主持召开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

12月23日，陈云在会议上讲话。他首先肯定基本建设工作成绩巨大，同时指出，在成绩巨大的后面，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点，突出地表现在，从1958年10月以后，发生了比历年多得多的工程质量事故，同时也有许多工伤事故。这向我们敲起了警钟，要我们严重注意。今年基本建设“大跃进”，许多厂房是在下半年建起来的，现在需要对那些质量不好的工程进行补救，要把纠正和补救工作看成是当前的一项紧急任务。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把坏事变成好事，从中吸取教训，力求以后少发生事故。

陈云分析了当时造成严重工程质量事故和工伤事故的原因，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一，注意了“多”、“快”、“省”，注意“好”不够。注意了数量，忽略了质量。对“多快好省”没有完整的理解。

第二，反对保守思想后，出现了片面节约材料和不适当地使用代用材料的倾向。比如大钢铁厂，应该用钢结构的就要用钢结构，应该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就要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这不是保守，也不是浪费，而是实事求是。

第三，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有些地方却把必要的规章制度也打掉了。合理的规章制度不能打破，这就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样，不能把科学当成迷信去破。

第四，注意在基本建设中开展群众运动，但是业务机关放松了必要的管理工作，特别是技术管理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是取消管理制度，而是使群众起来参加管理，改进管理制度，遵守管理制度。

第五，不少地方的施工力量同其担负的基本建设任务很不适应，力量小，任务大，技术工人不够，某些必要的设备不足。许多地方的建筑队伍过去是承担民用建筑任务的，今年开始们工业建筑，技术水平不高。要根据可能性分配任务，用极大的力量去培养和训练技术队伍，并且在可能的条件下补充一些必要的技术工人和施工设备。

陈云在讲话中，针对在“大跃进”中普遍存在的头脑发热现象，意味深长地叮嘱大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我们自己“本领不大”，应该小心谨慎地前进，从错误中取得经验，练出本领。他说，这不是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而是现实问题。

12月26日，陈云作了会议的总结发言。在发言中他大胆提出，就建筑工程来说，当前全国的主要倾向已经不是保守和浪费，而是降低建筑结构的质量。

对当时用小生产的办法来搞大生产，不适当地强调多快省，陈云指出：厂房建筑中，不适当的节约，不适当的因陋就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造成更大的浪费，应该对此有所规定。对“大跃进”中搞的工用和民用建筑，都要马上组织全面检查，对有危险的建筑赶快补救。对不成熟的主程设计不要盲目推广，而要根据工程对象的不同要求，因地制宜。

陈云还指出，现在的主要毛病是单纯图快，设计过分粗糙，给施工人员看的过分简化的设计图纸，已经成了“无字天书”。布置设计任务的时候，单纯图快，搞突击，使设计单位连勘察和搜集必要资料的时间都没有了，最后是欲速则不达。拿一张草图就施工，或者边交图边施工，设计也不经过审查就使用，这些状况必须改变。没有勘察不能设计，没有设计不能施工，这仍然应该是基本建设的程序。

当时施工中的问题也很多。为了赶进度、在施工速度上“放卫星”，许多工程没有施工准备，工地上连必要的道路也不够，万一发生火灾，救火车都开不进去，施工人员随便修改重要设计，保证工程质量的规章制度、包括必要的安全措施和工程验收制度都被当成不合理制度予以废除。职工培训制度也不严格执行，新招的农民工不经必要培训就上岗，用政治鼓动代替科学，让工人不顾疲劳，连续作业，必要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了。

陈云提出，必须坚决纠正这些做法，并且明确说，建筑施工以后不宜再用“放卫星”的办法。

陈云还特别强调，大中型的有关人民生命安全的水电站的水坝工程，必须十分注意工程质量的安全，建筑这些工程所用的钢筋和水泥等建筑材料，必须符合设计规定的质量规格。他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回去后必须专门向各省市区的党委作汇报，因为关系重大。陈云指出，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在设计和使用上保证有必要的安全系数，施工部门不能在设计的安全系数内再会挖潜力，否则遇到意外事故，如大风、地震等等特殊情况，是很危险的。新材料和合格的代用材料必须经过多次试验鉴定，不要轻易普遍推广使用。

对当时一些人片面强调“小土群”，把土洋结合方针误解为“愈土愈好”、“以上为主”，陈云指出，土洋结合不能这么解释。正确的理解是，一要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参考外国的经验而进行创造性设计，就跟西医学中医一样，

学成之后，既不是老西医，也不是老中医，而是一种新型的医生；二是在多数企业只能采用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和简易的设备，目前是只能如此，因为这是当前能够办到而且能够大量办到的。以上为主，如果是指以中国实际情况为主还可以讲，如果是以小高炉为主，以鞍钢为辅，那就不对。

陈云召集杭州现场会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全国、全党对工程质量急剧下降的注意，采取措施补救和改变这方面的严重问题。所以，12月27日至31日，陈云又在上海，出席了工程质量补救办法的现场会。

12月31日，陈云回到北京后致信邓小平，送上杭州现场会的材料，并指出：目前在基本建设中，总的趋向是不适当地片面强调节约，只图数量，不顾质量。

开始纠“左”。陈云说出了对高指标和瞎指挥的疑虑。毛泽东夸奖：真理有时候掌握在一个人手里

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气氛很浓，毛泽东很高兴。但是不久后，各地情况反映到他那里，他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一些极端的做法，毛泽东也非常反感。以钢为纲造成国民经济全面紧张，各种矛盾也日益暴露。毛泽东开始考虑要压缩空气。他到各地视察，频繁地与有关部门和领导谈话，陈云也多次参加，并抓住机会就高指标等问题向毛泽东进言。

1958年10月底，毛泽东外出视察回京后，同周恩来、陈云等人交谈。11月2日到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领导人和若干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广泛地讨论了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次会议开始了纠“左”。

11月21日，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长参加的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开幕，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工业建设的问题。11月20日，在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与陈云、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王任重就武昌会议要讨论的问题谈话。11月22日晚，毛泽东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专门就将北戴河会议建议的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3000万吨降低到1800万吨的问题进行商谈，结果认为1800万吨的根据仍然不足。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中提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要谨慎，在粮食和钢铁生产指标问题上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几次研讨会，对1959年计划主要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2700至3000万吨降为1800至2000万吨，原煤由3.7亿吨提高到3.8亿吨，粮食和棉花产量指标却定为1.05万亿斤和1亿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500亿元降为360亿元。

“大跃进”提出“以钢为纲”。赶超英国，是以钢的指标为标志的。钢的指标虽然降下来了，陈云觉得还是难于完成，另外的三大指标仍然很高。为慎重起见，陈云建议四大指标以不公布为好，并把这个意见向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说了，但胡乔木并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毛泽东。

据胡乔木后来说，他这是保护陈云，否则到后来上海会议时，陈云也不能恢复名誉。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向主席汇报，刘少奇转告毛泽东，结果毛大发脾气。

根据武昌会议精神，1959年初国家计委作出1959年钢产量2000万吨，粮食产量1.05万亿斤的庞大计划。但在工作第一线的领导人都感到这个指标太庞大，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请陈云了解一下计划落实情况。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把自己对这个计划的一些不同看法说了。随后，陈云亲自到计委，说服他们把钢产量降为1600万吨，讨论结果降为1800万吨。

1959年1月，新年刚过，毛泽东请陈云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几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吃饭，彭德怀出席作陪。席间自然要谈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陈云表示武昌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并提出：“1959年钢指标问题，我倾向降到1600万吨。”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把计划指标的问题与党的社会

主义建设总路线紧紧联系在一起，具体的经济指标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陈云不便再说什么。当年7月5日，彭德怀对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不禁感叹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展开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能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

1月底至2月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基本的调子还是指标涨而不降，只有少数人，如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笏等在会上讲了困难，还提到：看来搞经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这时的空气，就是把不同意见和指标问题与修改总路线的政治问题联到一起。毛泽东在会上说：“完不成指标也不要如丧妣。”当然，也就不能再议指标如何。

那时，一些人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还认为陈云在“大跃进”问题上“右倾”。陈云在会上也不便再讲指标需要降低的意见。

2月1日，陈云在会上讲话，介绍了年初调整钢铁计划的情况。他说：1月初，总理、小平叫摸一下计划，富春8号回来，10号开始讨论。在钢的问题上，一种认为可能，一种认为困难，我在计委、财经小组发言，都对困难看得多了一些，后跟主席反映过，说1800万吨好钢是不是能够完成？恐怕有点问题。

陈三讲了这些话后，就作了自我批评，检讨了一番。

在这种气氛下，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

后来，毛泽东说，他此时实际上是希望陈云出来对指标问题讲几句话。1964年9月毛泽东说过：“有时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1959年1月，我建议开会，这是陈云跟我谈了一次话的影响。开了一个星期的会，（指标）仍然不动。我的意思是降低指标。我希望陈云出来讲几句话，谁料他讲的是自我批评。”这虽然表示毛泽东后来对此也不无遗憾，但当时的那种气氛如此严肃，人们主观上又是想把经济搞得更快一些，所以也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下走。

在这种气氛下，各部基本上都是站在高指标上要东西，互相将军，谁也不愿把完不成原订指标的责任算到自己帐上，谁也不愿当“促退派”。冶金部门保证自己能完成钢指标，条件是要有煤炭和设备作保证；煤炭部门则说，煤炭产量保证上去，但得保证有足够的电力、机械设备；机械部门也说，设备和采煤机械好说，可以生产得出来，不过得要及时供应必需的钢材。就这么鸡生蛋、蛋生鸡地绕圈子，谁也不说降低指标的话。

为了完成高指标，水、电、原材料、交通运输等等各种矛盾不断累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的市场紧张，这些问题造成的压力，最后都集中到负责抓综合协调的计委和财经小组，陈云不得不忙于抓配套，抓薄弱环节，尽力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1959年4月，陈云特地给中央财经小组各成员写了一封信，专门谈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问题。

为了缓和当时市场紧张状态，陈云在信中提出了四个办法：

第一，粮食要省吃俭用。

针对上一年度的浮夸风，一些地方随意浪费粮食，搞敞开肚皮吃饭的错误做法，陈云指出，去年夏收和秋收后，估产高了，吃用多了。今年以来，城乡销量继续增加（这一年度比上一年度要多销粮食180亿斤），库存下降，到处供应紧张。陈云已经看出，1958年的粮食产量有很大水份，但为了不至

于被看成是“观潮派”、怀疑论，陈云委婉地提出，不管今年粮食增产多少，都必须省吃俭用，控制销量。抓住这一头，十分重要。

在当时一些人陶醉于高估产的假象，以为粮食已经过关、没有问题的时候，陈云严肃的指出：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

第二，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

由于当时基建规模剧烈膨胀，市场极力紧张，银行信贷已经失控，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陈云不得不关注回笼货币、稳定市场的问题。陈云认为，城市市场上缺少猪肉鸡鸭等的供应和缺少工业品的供应，情况显然是不同的。改善生活，吃还是第一位。市场上如果缺少10亿元猪肉和鸡鸭等商品的供应，是很难有其他的東西可以弥补这个缺口的，即使能拿出10亿元工业品来补缺，也缓和不了市场供应的紧张状况。为什么呢？如果有了10亿元的猪、鸡、鸭、蛋、鱼，有一部分做了菜，经过各种加工，合起来就可抵上十四五亿元的商品，现在，烟酒饭铺，差不多都是国营的，这些东西很快就可以成为国家一个很大的货币回笼力量。

陈云分析说，今年市场物资供应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约有四五十亿元，如果我们想出办法增加10亿元的猪、鸡、鸭、鱼和蛋类的供应，也就是大体上增加1000万头猪，2亿只鸡、鸭，2亿斤蛋类和几万吨鱼类的供应，在弥补差额上可以起很大作用，使市场紧张状态有所改变。

陈云提出，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必须从生产入手，定出有效办法。针对当时人民公社化的大一统局面，陈云主张，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国营、集体、个人三种形式可以同时并行，三条腿走路。而在目前，国营饲养场和人民公社集体饲养的经验还不很多，农户分散喂养可能是最可靠而收效最快的办法。在公社内要很好地安排自留地，保证饲养户得到饲料，还要专门拨出一定数量的饲料粮，同时加强管理工作，认真改善家畜家禽的饲养状况。

陈云建议，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和商业部，在最近期间分别召开猪、鸡、鸭和蔬菜的问题的专业会议，把这一工作认真地抓一下。这样做，即使不能解决今年的问题，但对于改善明年市场供应将会发生作用。

第三，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产。

公私合营以后，不少小工厂已经被并入了大工厂，一些小商品生产已经受到很大影响。“大跃进”更加剧了这种情况，当时连妇女用的发卡、顶针之类的物品，都居然成了紧俏货，给人民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陈云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

陈云提出，在安排工业生产的时候，应该专门拨出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原有生产小商品的工厂，如果已经改行，应该让它们“归队”，恢复生产，特别是原有的手工业合作社，由于改变为地方国营工厂或合作工厂，统一安排生产任务，不能单独生产和经营，大量的小商品停止生产了，现在应该组织它们重操本行。它们名义上可以仍然是地方国营工厂或合作工厂，但在地方工业部门领导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便发挥这些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增加手工业品的数量和品种。对

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原有手工业者，应该通过公社帮助他们解决原料和销路的困难，增加各种农村手工业品的产量。

第四，压缩购买力，认真精减去年多招收的工人。

由于基建规模扩大，1958年过多地招收了1000多万工人。陈云提出必须认真地加以精减，安置到农村去，以便压缩现有的购买力。今后必须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增加城市劳动力的计划，必须由中央和省市区党委掌握。

陈云告诫大家，企业增加职工，就要随之增加购买力。在农村增加劳动力，相应地增加购买力并不可怕，因为同时会增加一些农副产品的供应数量。在城市工业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常地增加劳动力，也就是相应地增加商品产量，同购买力的增加可以大体取得平衡。另一种是不正常地过多地增加劳动力，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商品产量不能增加，只有购买力增加，就加重了市场物资供应的压力，对生产和市场都是不利的。

第五，运输紧张，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量，特别是要安排好短途运输所需要的劳动力。

陈云提出，当工业和商业都需要运输的时候，各地马车、手推车、木帆船等运输工具，应该尽先安排商业的需要，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工业不要去和农业、商业争短途运输力量。

1958年高指标，造成国民经济的全面紧张，其弊端尽露无遗。陈云虽然不久前刚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但他痛心于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损失，勇敢地重申了综合平衡和短线平衡的计划原则。他提出了编制1960年计划的两个方法问题：

第一，拟定1960年的工业生产指标，要根据今年年底现有企业已经达到的综合设备能力（包括动力，运输等），作为编制明年计划的出发点，拟出明年生产指标的必成数。另外，根据现有设备的潜力再加上明年基本建设可靠的新增加的生产能力，加以确实计算，拟出明年生产指标的期成数。这样拟定两个生产指标，保存一个幅度，就可以使得明年生产计划既可靠，又积极。

所谓根据现有企业综合设备能力拟定生产指标，这就是说，不仅要计算主要部分的设备能力，还要计算整个企业和行业各个环节的设备能力。比如钢铁工业和生产能力，不仅要计算高炉、平炉、转炉的设备能力，还要计算采矿、炼焦、耐人材料和轧钢的设备能力。不仅要计算本部门内部的设备能力，而且要计算有关配合部门的设备能力，如计算煤炭、电力、运输等部门的设备能力。总之，要加以综合计算。

第二，对于工业中几个薄弱环节，如铜、铝、石油、木材、橡胶这几种物资，在生产和需要之间差额很大，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我们是一个大国，在工业建设中，对这几种必要物资，如果单靠进口来弥补差额，是靠不住的，因为数量太大，难以全部解决。因此，必须在每年编制计划的时候，重视这几种物资的生产，加强这些薄弱环节，使需要和供应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小，逐步求得解决。

陈云的这封信，对“大跃进”中一系列错误提出了有效纠正办法，其出发点就是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可惜，在“大跃进”的热昏中，这些金玉良言都没有能够起到应有作用，还有人坚决反对。

于是，在无视人民生活的情况下，国民经济盲目追随着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跌跌撞撞地前行，终于导致全国6亿多人的大饥荒、工农业生产大滑坡。

当时，水电部副部长李锐，从水利建设的实际中碰到的问题出发，曾经写了一封信，反映2000万吨钢的指标绝不可能完成，应赶快调整，还提出“宁

肯少些、但要好些”等等意见。这封信交陈云的秘书周太和转陈云看了，陈云是赞同的。当时李富春管计委，对高指标比较积极，周太和让李锐将副本寄给李富春，以免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为了讨论经济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开始考虑降低钢铁指标和把计划定到可靠基础上的问题。

上海会议之初，胡乔木向毛释东谈了陈云在武昌会议期间不赞成公布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事。毛泽东在会上鼓励大家学海瑞，勇于直抒己见，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五怕：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他表扬陈云：“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上。”并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

3月26日下午，薄一波报告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时，说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毛泽东就此提出，要削减一些列入计划的基建项目。

在邓小平主持下，这次会议再次调整1959年钢铁指标。3月28日，邓小平提出，计划要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计划中的问题，讲出来好，应该实事求是解决。他还说，想把计划放在1100万吨钢材和1800万吨钢上。这个意见，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赞成。

在上海会议期间，陈云和彭德怀同住在瑞金二路5号，同席进餐，饭后一起散步，交谈过不少问题，而且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较一致。彭德怀对陈云坚持实事求是，不随声附和而又勇于直言的精神，是很敬佩的。在这次会议期间的交谈中，彭德怀获得了不少的启示。

上海会议当天，周小舟打电话给陈云，请转达两件事给毛泽东：一件事是湖南省委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尽可能少减或不减播种面积，因为如果单位面积产量不能如预计增产那么高的话，完成总产量就有危险。二是稻子密植不能大密，省委决定减少密度。

陈云完全赞同周小舟的意见，他立即与谭震林商定，就保持粮食种植面积和合理密植问题发一个通知，由谭震林同农业部办。当天，陈云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他。

4月29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给农村六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号召要合理密植，对生产情况要说真话。但是，由于没有根本上改变“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一些强迫做法也没有改变，毛泽东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在一些地方并没有传达到基层，也没有起到很大作用。

根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计划要留有余地，多谋善断的指示精神，上海会议期间，国家计委反复研究，才提出一个把钢铁指标降到1650万吨的方案，会议通过了。会议调整了1959年指标。钢2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其中好钢1650万吨，原煤仍力3.8亿吨，其他一些主要工业产品指标也相应做了变动。但粮棉产量仍维持原来的高指标。在会议讨论中，对1959年计划意见仍然不统一，有三种不同意见，有少数人认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已经公布出去了，只要鼓足干劲，还是可以完成的，不赞成修改指标；多数人的意见是，根据1958年情况看，过高指标是难以完成的，如硬要去完成，则在经济上以至在政治上会造成很大损失，同意修改指标；还有少数认为，钢产量指标即使降到1650万吨也是完下成的，应当再修改落实。



## 钢铁指标是政治问题，陈云勇于负责，抱病 研究落实

上海会议，把钢产量计划核减为 1650 万吨，当时国家计委自己估计核减后的数字也难于完成。上海会议后，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组织人员，与国家统计局一道，核实了 1958 年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实际完成情况。结果发现，钢的产量，好钢只有 800 万吨，钢产量中包括一部分不合质量标准的钢。铁的产量为 1369 万吨，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小高炉炼出的土铁。煤产量为 3.7 亿吨，也包括一部分小煤窑的产量。粮食产量为 4000 亿斤，因当年秋季后动员全民大办钢铁，丰产没有丰收，实际收成并没有达到 4000 亿斤，棉花产量 3938 万担，也是丰产不丰收。

根据这个数字，1959 年要完成 1800 万吨钢，就要比 1958 年翻一番的速度还要高，这显然不可能。

当时负责国家计委年度计划综合局工作的宋平在与贾拓夫谈话之后，向计委年度计划局局长廖季立等人出了一个题目：紧张形势从何而来？要他们经过研究后写出报告来。

廖季立组织了几个人，根据当时形势写报告指出，严重的比例失调问题主要是钢的指标订得过高，产生了一系列矛盾；1959 年钢产量计划是完不成的，大体可以按 1200 至 1250 万吨比较切合实际。

这份报告由贾拓夫修改后印发计委党组，计委主任李富春主持计委党组会讨论时只说，这个问题可以研究。陈云看到这份报告后，十分重视。

在此期间，周恩来有一次找廖季立去核实 1958 年钢产量时，廖季立又提出上海会议钢产量指标完不成，周恩来感到不安。

鉴于 1958 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几个月的教训，毛泽东也对 1959 年的指标感到不放心。听到有关方面的反映后，他一方面要求周恩来组织督促实施上海会议确定的钢铁指标，另一方面考虑要进一步落实 1959 年的钢产量指标。

1959 年 4 月，工业中的一些情况更严重。上海会议拟定的第 2 季度分配钢材 250 万吨的方案，由于生产上不去，已经不能实现，只有 205 万吨可供分配，缺口近 50 万吨，而且，原定第 2 季度的工业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也将因此延缓一个月甚至更多时间才能完成。另一方面，由于计划三天两头变来变去，企业单位无所适从，生产秩序很不安定，有人反映，这一时期的生产情况是“长江后浪压前浪，做做停停做做停”。为了安排生产，各部门、工厂和基本建设单位都要求赶快把当年本单位确实可以分配到的钢材数量定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意识到，如果不作及时的进一步的调整，整个经济形势会更加混乱，因此决定由陈云负责，摸清楚实际情况，寻找摆脱几个月来一直被动的局面的措施。

1959 年 4 月 29 日和 30 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开会讨论经济形势特别是钢铁指标问题。会议决定，责成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研究 3 个问题：

第一，1959 年钢铁指标分成两个，一个是可靠指标，另一个是争取指标；

第二，1959 年钢材的分配，要按照本年度确实能够生产的可靠数字来进行；

第三，如果钢材分配的数目减少了，势必要减少一些建设项目，原则上

确定，削减基本建设，保证生产的需要，保证市场和维修的需要；在基本建设中，保证石油、化工等部门必不可少的建设项目。

总的精神是稳定阵地再前进。

当时的问题，实质上是钢铁等生产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的，要扭转被动，不能不触及钢铁的高指标问题。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因为钢铁生产在那时已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落实指标尽管是中央提出的任务，但在计划指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要实事求是地较大幅度地压下来，不是没有风险的。搞不好，就有沦为“促退派”、“秋后算帐派”的危险。

陈云接受任务后，丝毫也没有因此而退缩。从5月3日到9日，他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冶金部的汇报，研究钢铁指标问题，其中一次是汇报钢铁方面总的情况，另外5次是分别按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5个专题的汇报，然后集中讨论了一次。

陈三在财经小组会议上一开始就明确他讲：“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耍滑头，要不然我也可以下再理这个指标调整问题。请大家来谈谈1959年计划究竟怎么处理好。”

然后，陈云具体提出了这次调查落实钢铁指标的几个问题。他说：“是否请考虑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我看要稳住阵脚再前进。第二，质量、品种同数量的关系。要重视质量、品种，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第三，重点和一般的关系。第四，今年和明年的关系，今年少些可能好些，明年可以上去多些、好些。”

陈云在研究和落实钢铁指标的过程中，除了听取冶金部6次汇报外，也听取了国家计委有关各局的意见，他还把冶金部的有关负责人找去，听取个别的详细汇报，了解情况。

有一个晚上，他找了廖季立和计委的重工业局和物资分配局的主管人到他家里进行座谈，对他们说：你们每个同志都可以随便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说话别受拘束。

当时他身体不好，座谈的时候，他躺在垫着棉被的藤榻上虚心听，但始终全神贯注。在谈话过程中，他不是先入为主，先下定论，而是反复询问和反复交换各种不同意见。这次一直谈到深夜1点多。

他在研究钢铁指标时，也了解和研究了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情况，研究了市场情况，运输情况，人民生活情况；同时也研究了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情况，最后确定钢铁指标问题。陈云了解情况之细致，分析问题之周密，工作作风之扎实，都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大家从中也受到很大教育。

对于当时叫得很响亮的“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说法，他从来没有讲过，完全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种不随声附和的调查研究方法，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次调查中，冶金部提出1959年钢材生产指标的3个数字，一个是900万吨，一个是950万吨，一个是1000万吨。与此相适应，钢的生产数字是1300万吨、1400万吨和1500万吨。冶金部还提出过1600万吨钢的计划数字，但没有加以详细说明。

国家计委重工业计划局提出的数字是，钢村可靠指标850万吨到900万吨，争取指标是950万吨，与此相适应，钢的可靠指标是1250万吨到1300万吨，争取指标是1400万吨。

负责年度计划的国家经委冶金局提出的钢的可靠指标是 1300 万吨，争取指标是 1500 万吨。

可以看出，这些指标，都比上海会议拟定的钢材 1150 万吨、钢 1650 万吨要少很多。

参加财经小组汇报会议的几个人，包括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赵尔陆，都同意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 900 万吨，钢产量指标定为 1300 万吨。但是，冶金部参加会议的人仍然死抱住高指标不放，不肯降低指标。说指标低了就会泄气。

经过 6 天紧张的会议，陈云还找了许多人个别谈话，最后决定，按 1300 万吨钢的方案报政治局研究决定，并责成贾拓夫负责以计委名义向政治局写出报告。

贾拓夫组织人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连夜起草了一份报告，他还亲自起草报告第一部分关于形势的分析，从 6 个方面阐明当时经济形势面临的严重局面，以说明调整的必要性。根据所在，把当时的困难形势讲得很透彻。他走后，李富春看了他写的稿子，认为不能这样写，意思是不能把形势写得太刺眼，不能让人感觉“漆黑一团”产生悲观，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因此嘱人另写了一份报告，第二天直送政治局。

1959 年 5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云关于落实钢铁指标的意见，讨论国家计委的报告。

陈云在会上说，他同意把钢材指标定为 900 万吨，并以此作为前进的基点。他提出的理由是：

第一，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来看，这个指标比较可靠，比较实在。

他分析说，要生产 900 万吨钢材，就要求生产 1300 万吨钢，2000 万吨铁，其中，炼钢用铁要 1300 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 550 万吨，另外还准备质量不好的次铁 150 万吨。然后，他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 5 个方面作了说明。

他说，生产 1 吨铁需要 3.5 吨铁矿石，生产 2000 万吨铁就要 7000 万吨铁矿石。现有 14 个有机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的大型采矿企业，今年可采铁矿石 5300 万吨，现有 19 个中型采矿企业，全年可采铁矿石 800 万吨，现有 214 个小型土法生产的采矿点，全年共可采铁矿石 1000 万吨，以上大、中、小三类企业合计，可以生产铁矿石 7100 万吨，能够运出的是 7000 万吨。

炼 1 吨铁，平均需要 1.5 吨焦炭；炼 1 吨焦炭，平均需要 1.5 吨洗煤；1 吨洗煤，平均需要 2 吨炼焦煤。因此，生产 2000 万吨生铁，就需要 3000 万吨焦炭，折合 4500 万吨洗煤，或者 9000 万至 1 亿吨炼焦煤。保证钢铁质量的关键是洗煤，当时洗煤能力的情况是，大型的机械化洗煤厂今年大约可生产 1950 万吨，新建的洗煤厂可生产 550 万吨，还要用上法生产洗煤 2000 万吨。炼焦能力的情况是，原有的大型洋法生产可以达到 1000 万吨，新建的机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如能如期建成，可以生产 1000 万吨，尚缺 1000 万吨，仍然需要用土法生产来解决。

关于耐火材料，全年需各种耐人材料 420 万吨，需原料 600 万吨。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 20%，其余的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

关于运输，为了生产 2000 万吨生铁，除了要运输炼焦煤 9000 万吨到 1 亿吨以外，矿石、耐人材料等物资的运输量也是很大的。冶金部要求：铺设

铁路支线和专用线共 500 公里，铺设轻便铁路 500 公里，增加机车 150 台，增加车皮 1500 辆，还要增加一批小机车和矿车。

陈云在作了这样周密的分析之后，才得出结论：从钢铁工业内部关系来看，当年生产 900 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 1300 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第二，从当年头 4 个月的生产情况看，这个指标还是有可能完成的。

陈云说，头 4 个月已经生产钢材 227 万吨，钢 336 万吨，铁 603 万吨。今后 8 个月生产 673 万吨钢材、964 万吨钢、1400 万吨铁，经过努力还是有可能的。

第三，多生产一些钢当然是一件好事，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力争多增加重轨、大型钢材、中厚钢板、薄钢板、无缝钢管、有缝钢管、矽钢片、优质钢材这 8 种重要钢材的产量，以适应生产和建设的需要。

陈云主张钢材定 900 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定为 1300 万吨。即使如此，他还是有保留的。他说，这次对钢铁指标的研究，只限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还没有对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更没有对整个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关系进行全面研究。仅仅就钢铁论钢铁，来规定钢和钢材的生产指标，还不可能完全妥当。因为钢铁只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钢铁指标定得是否确当，经过综合研究以后才会看得更清楚。提出 1300 万吨这个数字，只是初步的，只是提供政治局进行考虑，还不希望做出最后决定。

陈云还提出，钢铁的争取指标，还要等听取煤炭、机械、铁道等部门汇报后，弄清楚这些部门的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再来研究，这次暂时不议。

针对大炼钢铁中出现的严重问题，陈云提出，在完成钢铁指标时要特别注意改进铁的质量。他说，现在各地生产的铁，不合格的还不少。

当时作为“大跃进”运动一项创举的小高炉，在生产中问题很多，但大家都不敢提，因为小高炉是群众运动“小土群”的代表，对小高炉有意见就会牵涉对“大跃进”方针的态度问题。陈云在这次会上毫不客气地提出，高炉建设要贯彻大中小结合的方针，以大的为主，小高炉要改进技术，有些要向大中型发展。煤铁资源缺乏和运输条件困难的地区，有一部分小高炉要停止生产，条件很困难的地方，不要再建小高炉。

在这次向中央政治局的汇报中，陈云不但讲了对钢铁生产的意见，还讲了对整个生产和计划安排的三点意见：

陈云讲的第一条意见是强调改进质量。

陈云说，有不少出口的东西，过去质量比较好，现在也降低了，在国际上名誉很不好。数量多质量差的东西不能真正顶用，不仅不能满足生产、建设和市场的需要，而且要造成极大的浪费。经委和财经小组准备用几天的时间，专门讨论改进产品质量的问题，并且准备拟定一些切实有效的办法。

以前我国的一些轻工产品，在苏联东欧都有较好声誉。但“大跃进”期间却出现质量下降的现象。当时甚至有人专门给中国领导人写信，对此表示不满。

1959 年 5 月 28 日，邓小平在听取薄一波和李富春汇报时，也特别提醒他们要注意轻工业产品的质量，说我国轻工业产品质量高的声誉，在国际上几个月就垮下来了。现在生产的纸跟战争时期差不多。

陈云提出的第二条意见是，计划安排中，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

“大跃进”中搞钢铁元帅升帐，几个部门先行，实际中把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挤得很苦。陈云提出，对钢铁、煤炭、电力、机械、运输这些重点的生产和建设必须加以保证，但对石油、化工、重要建材和市场迫切需要的轻工业品，也应该切实加以照顾，否则国民经济各部门不能互相协调发展，重点本身发展也难以得到可靠保证。必须按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办事。

陈云讲的第三条意见是，计划安排既要照顾明年又要照顾长远。不能只顾眼前，不顾将来。

陈云的汇报，一直讲了大约一个多钟头。

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计委报告和陈云意见。

邓小平表示，他赞成陈云的初步意见，退到可靠阵地，然后再前进。

他说，搞 1300、1400、1500，实际意义不大，不要再争了，问题是到底能搞到多少？5 月份钢的日产量始终维持在 3.1 万吨，今年 1300 万吨也并不轻松。实质问题最后还是表现在钢材上面，实际没有那么多，开空头支票不好。要定多定少，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人心思定，不管多一点少一点，要先定下来。为了消除对降低指标在政治上的顾虑，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指标定得蛮大，最后不落实，分不到东西，第二种方法是落实的，落实后再前进，后者可能更快，前者反而更慢。这样做是不是机会主义？不是，不但不是机会主义，不这样做反而错误更大。这几个月心情不舒畅，四大指标公布以后，一直比较被动。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把指标退下来，摆脱被动局面，退而后进，计划大，专案多，半成品多，结果积压了 100 多万吨，因此，如果按第二种办法做，决不是机会主义。

邓小平还说，现在没有哪个劲儿不够，没有哪个懒儿不想干。过去的方法是不正确的。现在这样做可以争取主动，能达到更高、更好。是否妨碍多搞一点呢？不会妨碍。能超额当然更好，因此，同意就照 900 万吨钢材先分 840 万吨，留些余地。不怕少分一点，只怕没有，开空头。只要有钢材，不怕分不了。就是分不了，存一点也没有坏处。

周恩来、刘少奇等也都发言同意陈云的意见。

周恩来说，我摸了一下计划，虽然没有全面摸，只摸了钢铁、交通，我觉得现在这么乱，不行。现在以钢材为突破口，先定下来落实之后，就好办了，建议先按 900 万吨定下来。退而后争取超过，使得 7 个月的被动局面改变过来。

他还提到，外贸要当先，质量要抓上去，现在外面骂我们骂得很厉害。计划要照顾一般，不要只抓几个“保”的方面，石油化工要照顾，今年明年都要兼顾。以后不要听了哪个同志一句话，搞得长期被动！

刘少奇说，指标钢材 900 万吨，钢 1300 万吨，初步定下来，是多少算多少，分配多少算多少。分配要十分可靠，不要搞红票、蓝票。

刘少奇也专门针对低指标会泄气的说法指出：这个指标是不是泄气？指标高了气就足，指标低了气就不足？现在应当是泄够了，到了可靠的境地再鼓。这种气势必要泄，高了适得其反，鼓干劲要长期保持，要国有余地，不能每天 12 个小时，那样不能持久。群众的干劲要爱惜，不要浪费，指标定 80%，有 20%可能超过，群众干劲会越大。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波浪式前进，马鞍型，客观上有，出现了也不要如丧妣。应该得出一条经验，克服主观主义，去掉盲目性和主观主义，更接近马列主义，不能说更接近于机会主义。就是 1300 万吨钢，比去年 800 万吨钢还多 500 万吨，古今中外

也是没有的。

刘少奇说，今后项目上马要慎重，以后建设项目，一定要经过审批程序，财经小组要抓这个事；可以动员一批多余的（工）人回乡搞农业生产，支援农业，将来发展了再回来。

1959年5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通过落实的钢铁指标以后，陈云专门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实事求是地把财经小组落实钢铁指标的考虑和分歧作了汇报。

他说，今年究竟能够可靠地生产多少钢材和多少钢，议论是不一的。多数人的意见，把今年钢材生产可靠指标定在900万吨，以此作为分配给各部和各省市的数量，把将来超过的数量作为奋斗和争取的目标。但冶金部有不同意见，认为这个数量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各省市的同志也有不同的意见。

陈云表示，他个人认为，为了安定生产秩序，不使计划再变动太多，以900万吨钢村来分配较为可靠，如果哪个月生产超过了月定指标，第2个月就可将超过的部分再分下去，这样并不妨碍超产。

针对说指标定低了会影响群众积极性的说法，陈云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在信中，陈云也激烈地批评了小高炉炼铁存在的问题。他说，小高炉炼出的900多万吨铁，含硫量超过冶金部规定0.2%标准的，有40%以上，有的说至少有50%。这种情况不改变，将有四五百万吨生铁含硫超过标准，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陈云批评说，这是劳民伤财。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陈云提出，要想办法克服高硫状态，洗煤去硫，是今后能否完成拟议的钢材指标的关键。

5月23日，陈云主持财经小组会议，传达了中央的决定：钢铁生产指标，经向政治局汇报，认为应当降下来。书记处决定，1959年落实指标，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也就是说，中央完全接受了陈云的意见。

钢铁指标调整以后，陈云就出去休息了，一直到1961年。

实际结果表明，1300万吨钢并不是一个保守的目标，经过全民动员式的共同奋斗，连一些老百姓家里的铁锅都弄去回了炉，一些小學生也动员起来到处找废铁，而且还是在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的政治形势下，拚设备、拚劳力，到年终只是勉强完成了1387万吨钢、897万吨钢材。

现在看来，当时不搞1300万吨钢更好。当时为了保钢铁，花了很大代价，挤了其他部门，造成了比例失调。假如不是按照陈云的意见降到1300万吨，还搞1650万吨甚至更多，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庐山会议；观潮派原来是彭德怀；不同声音  
消失了。更大规模的冒进，使饥馑之魔得以肆虐  
于神州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到8月16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这是一次波澜频起、风云骤变的会议，陈云因身体不好，没有参加会议，但这次会议及其后果，与陈云几乎是息息相关的。

庐山会议前，虽然一直在纠“左”，但实际上只是在具体方法上修修补补，始终未能涉及最根本的指导方针的问题。因此，纠“左”也是很不彻底的，效果有限。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同时也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随着比例失调的加剧，农业本来就已经不堪重负，再加上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搞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反瞒产，超购浮夸等等折腾破坏，农村的形势已经极为严重。河南、湖北一些“大跃进”搞得起劲的地方，已经发生农民逃荒的情况。湖南平江一位红军时期残废的老战士，在彭德怀去考察时，躲过生产队干部的视线，偷偷地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是这样几句话：

“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这实际上是人民对“大跃进”盲于冒进最沉痛的控诉。彭德怀心里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庐山会议前，人们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可能视而不见，大家比较了“大跃进”以后和“大跃进”以前的局面，不可能不对毛泽东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有所议论，也就自然谈及原来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

在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曾在闲谈中对李锐说，不久前在毛主席处谈话，主席这样谈到：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是不行了；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心情5月后才开始好转。毛泽东还谈到政治家与书生问题：书生多端寡要，抓不住时机，不能当机立断；1957年反右时，抓住卢郁文讲话，写了《这是为什么？》，使形势急转。李锐也记起田家英1958年同他的一次闲谈，谈到田有次和谭震林一起在毛泽东处谈话，毛泽东突然说起：“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当时还拍了桌子。因此，在火车上，吴冷西、李锐和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的交谈中有一共同观点：1958年由毛泽东自己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施令，结果碰了一个大钉子，他自己也觉得应当如何来转弯了。

彭德怀在去庐山的火车上，吃饭极少，保健人员问他为什么吃这么少，是不是在车上睡眠不好？他用手向窗外指了指：“看看外边，这叫人怎么能吃得下去？”原来远处站着许多人，衣衫褴褛，蓬首垢面，手把栅栏，呆望着车厢，显然都是灾民。

虽然情况已经比较紧张，但庐山会议开始时气氛还是比较轻松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予以肯定。他提出会议要讨论的19个问题时说，“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5个字安排好，这是6.5亿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会议上讲话，也肯定陈云对粮食问题的看法。他说：多年以来，陈云同志对粮食抓得多么紧。北戴河一高兴起来，是从粮

食多了出发的。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

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前不久在湖南视察时，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等发表过感想：去年计划搞乱了，“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即指陈云而言。李锐这时乘机提议，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挂帅为好。周小舟、周惠也当即附议。毛泽东于是给3人讲起了他不久前那句话的典故。他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打袁绍，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陈云当总指挥好，他有短处也有长处。

毛泽东还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实会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说到这里，3个听众忍不住都大笑起来，他自己也笑了。他又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指钱在“大跃进”中论述粮食高产可能性的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今年1月开政治局会，关于钢指标，陈云讲2000万吨下易完成，同陈云意见原来一致，不知为什么他后来要检讨。

7月17日，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了刘少奇的意见，说还是让陈云主管计委比较好。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西北组会议发言中也说到：我们党内真正懂得经济工作的人不多，陈云是一个，贾拓夫是一个。

但是，7月14日发生的一件事，使会议的轻松气氛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彭德怀的一封信引起的。

彭德怀对当时出现的问题，心中是十分焦虑的。眼见庐山会议就要结束，可是还没有提出纠正“左”的错误的的问题，使他感到不能不说话。7月14日下午，彭德怀把自己起草的一封信送到毛泽东那里。在信中，他首先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失有得，然后大胆地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建设工作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已经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具有政治性。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大跃进”中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彭德怀的信，是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思考后写的，反映了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一个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也是完全正常的。不料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

毛泽东把信拟了个“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发给大会，要求评论这封信的性质，但在讨论中，还是有很多人表示赞同这封信的基本观点。

7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激烈讲话，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宣称党内党外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的。

毛泽东讲话中还说：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



悲观性了。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反冒进。

讲到这里，他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重提右倾是党内主要危险，从而使郑州会议以来反“左”过程被迫中断。

毛泽东还让通知未上山开会的林彪去庐山开会，并提出，如果陈云身体情况可以的话，也请上山来开会。但陈云身体实在不好，后来也没有去。

8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重提对财经部门的批评，说财经部门从不下毛毛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字，10年改不过来，横直不让人了解情况。“设计院”不在常委、书记处，而在财经机关，那些人脸皮之厚可观，出来的东西使人看不懂，自己也不懂。像那些教授。这种批评还要继续下去。

在庐山会议批彭小组会上，连彭德怀赞扬陈云懂经济的话，也有人搬出来批。当有人提到彭德怀说过“陈云关于经济工作是摸得熟的。”康生插话说：“他先讲一套缺点，然后慨叹：现在看来还是陈云对经济工作摸得深。他这诸不是拿陈云比先念、一波，而是指毛泽东同志不行。这是挑拨。”

庐山会议把公开对“大跃进”方针持不同意见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并在随后的大规模党内斗争中，又从上到下揪出了一大批“右们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在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不同意乃至抵制“左”的错误的干部群众惨遭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加剧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大跃进”的错误继续发展，最后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大饥荒的发生。

## 一切为了渡过困难时期

赤地千里；成千上万的逃荒人群涌向破破烂烂的火车站；火车车顶上挤满人、车门上扒着人，喘着粗气，沉重地驶向远方……新来的县委书记到小饭馆吃饭，抬头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几个衣衫褴褛、满脸饥色的孩子站在周围，木然地盯着他手里的馍这是一部电影中给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人们展示的本世纪 60 年代那场全国性大灾难的令人心酸的场面。

关于这场大灾难，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么说的：“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 1959 年到 1961 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为了渡过困难时期，1960 年 9 月 30 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关于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决定实行“调整、巩固、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 年 1 月 14 日至 18 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又正式通过这一方针。

## 全面紧张，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首先绷断；面对危急形势，力主进口粮食

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从主观愿望出发，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国民经济中的合理比例关系，再加上在农村中搞公社化、公共食堂、瞎指挥、浮夸风，破坏了农业生产，到1959年初就已经暴露了严重问题。从1958年底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被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所打断。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跃进”，使勉强维持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雪上加霜。

绷得太紧的弦终归是要绷断的，国民经济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农业，终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首先绷断了。一场大灾难无情地降临了。

本来，在“大跃进”运动之前，粮食就非常紧张。“大跃进”猛烈扩大生产规模，1958年一年就增加了1000万工人，大大加剧了粮食紧张局势。要命的是，粮食生产又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大跃进”以后并大社，搞人民公社，一个公社几万人，生产都没法安排。干多干少也没有人管，生产队的东西甚至社员家里的东西，说拿走就拿走，农民出工不出力，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全民动员，大炼钢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被抽走，上山炼钢去了，成熟的庄稼却丢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老百姓讽刺说，“棉花吊了孝，豆子放了炮，没见过这样种庄稼的。”种麦季节，却发动群众深翻地，折腾土地爷，把土壤破坏了。搞密植，竟然密不透风，要用鼓风机来吹，用大电灯来照。这么种地，到头来当然下会有什么好收成。

本来，老天爷还是比较照顾的，1958年算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到头来却是增产不增收。到1959年天老爷变了脸，连续3年大旱。

辛苦了1年，收下的粮食，农民却得不到多少。为了造“大跃进”声势，为了不被插“白旗”当右倾，各地都疯狂地大搞浮夸，卫星放得人头晕目眩，平常亩产几百斤的土地，竟然能吹到亩产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人民日报》还宣传小麦总产量已超过美国。一时似乎粮食多得不得了。

中国人从来是省吃俭用的，粮食是宝贝。可是这时各地大搞食堂，为了宣扬食堂优越性，为了突出“大跃进”的成就，居然号召“敞开肚皮吃饭”，拿粮食不当回事。白面馒头，顿顿干饭，吃得有经验的老农直皱眉头。

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上报产量的时候可以神吹，到征购的时候就得多交粮。1958年粮食产量实际不足4000亿斤，居然按虚报的7500亿斤产量征购，1959年到1961年间征购粮占总产量的比重高达百分之三四十，连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都被国家拿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甚至抓人、打人。搞得最厉害的是河南。

河南是“大跃进”最积极的省份，搞公社、放粮食和钢铁卫星、反瞒产，都是轰轰烈烈，敢为人先。”

1960年10月18日至26日，陈云到河南省搞调查，参观了“156项”的重点工程洛阳拖拉机厂、三门峡水库等，实地了解农业机械和水利发展情况，以便确定农业特别是粮食前景。当时河南方面对他声称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他们还可以调出粮食。

陈云反复问他们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河南省当时的生活水平，农村人口最低限度每人平均需要多少粮食，全年要

吃掉多少？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这几笔帐加在一起，留在农村的粮食最低限度需要多少？总产量减去必须留在农村的，剩下的就是能够向城市提供的粮食，包括征粮、购粮。然后问他们，现在全省吃商品粮的有多少人？每个人平均最低限度要吃多少？这些人合起来总共需要多少？

一个是农村能够提供的粮食数字，一个是城市需要的粮食数字，把两个数字一比，就看得非常清楚，能够提供的粮食比需要的粮食差了很多。陈云说，我不希望你们调出粮食，你们农村能够征购的粮食，能不能够养活现在城市人口呢？养活不了。

河南方面的人还不服，说河南城市人口的粮食还够吃，自己能够解决粮食。

与此同时，陈云还派秘书周太和去安徽阜阳地区了解农村情况，而后去南京，了解江都提水工程以及扬州里下河地区的灾情，向他作汇报。

这一带农村“大跃进”运动中盲干折腾，加上天灾，当时情况是很困难的，周太和一行想在农村吃顿早饭，找了几个村，都说负责人不在，最后在一个村才找到了几块白薯和一点青菜，吃了一餐早饭，这还是比较好的村执行北京来客的好饭哩。至于农民的生活真相，可想而知。很显然这些地方粮食生产的情况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生产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得多，但他们报的情况仍有不少的虚夸。

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陈云当时在河南了解到的粮食问题是十分准确的。河南粮食根本不够吃，是靠高征购勉强维持的。本来拿不出那么多，为了使城市人口得到供应，就来了一个“高征购”。征购不到，又来了一个“反瞒产”、“反私分”。明明当时的高产是靠政治手段压出来的，这会搞反瞒产反私分，却反过来咬一口，说你原来报那么多，现在征购的时候为什么少了？就这么左一个办法，右一个办法，一定要人家卖出那么多粮食来，超过了农民能够负担的程度。到了1960年秋冬就爆发了震惊全国、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数以万计的人活活饿死，整个整个的村子死人绝户。

庐山会议以前，河南粮食问题已经出现，好些地方已经饿死了人。庐山会议后，又大搞反右倾，使问题更加严重。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王任重受中央委派前来揭河南省委的盖子，陶铸1961年2月2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说，“在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是1959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第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虽然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还是扭扭怩怩，不忠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王任重说，“西平县因为7320斤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1万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

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于人祸，加上天灾，粮食产量连续大幅度下降，3年平均产量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人均占有产量433斤，比1957年减少170斤。到1960年5月，粮食问题已经异常严重。交通沿线的国家粮食库存越挖越空，已经高度不灵。到6月上旬，北京市库存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市库存只够10天的销量，上海市粮食部门已经没有大米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过日子，工业基地辽宁有10个城市库存粮食只够销八九天。粮食调出大省江西，省内南昌、景德镇。赣州、九江4个主要城市也处于随调随销的危险境地。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拥有大片肥沃黑土地的东北三省，都纷纷向中央告急：请给我们粮食！

华中重镇武汉缺粮，最紧张时候，粮食只够销3天。武汉钢铁厂在饥饿的阴影下，大厂小厂折腾“超声波”蒸食物，连蒸几次使体积胀大哄肠胃。就这样，仅有的粮食供应也不能保障了。省长张体学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挂电话，泪流满面地恳求：“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呀！我没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请求中央支持我们粮食！”

为了平衡地区间粮食余缺，保证城乡粮食供应，加强粮食统一调度至关重要。在此期间，粮食调运任务十分繁重，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粮油棉调运指挥部，由李先念挂帅。由于粮食奇缺，甚至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一地区粮食脱销了，向中央告急，中央把原来确定发给另一地区的一列车粮食转向，紧急调给脱销地区。当时还搞了“以早济晚”和“以晚济早”的季节性调剂，即每年夏秋季节，先把南方收获较早的小麦、大麦、早稻等调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然后，又在冬春季节里，将东北晚熟粮食返调给国内缺粮地区度过春荒。这种挖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对保证军需民食起过积极作用。

当时，从1957年以来的中苏矛盾进一步激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华专家，撕毁已订合同，逼还旧债。此举使中国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1960年9月，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搞“低标准，瓜菜代”，降低口粮标准，大搞瓜菜，大搞代用食品。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建议，由中央推荐的代食品有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

到1960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浮肿病大范围地出现、并迅速蔓延。估计到下一年春青黄不按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周恩来，陈云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

眼看着人民陷于这样悲修的境地，陈云心里异常难过。他向中央提出，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

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搞了3年“大跃进”，搞了人民公社，我们早已宣布解决了粮食问题，还每年出口粮食。现在突然要进口粮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不进口粮食，人民就要挨饿，无法渡过难关。陈云提出这个建议，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中央和国务院接受了陈云的建议，决定进口粮食。1961年1月19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到粮食进口问题时说：我们这个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立脚点，当然要摆在自给上面。但是，现在有进口200万吨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合同了：如果能再多进来一些，我们也要。要把一些有出口市场的东西都集结起来，国内少吃点，多出口一些，换粮食进来。如果有400万吨粮食进来，那我们今年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些了。明年、后年如果再多进一点，那我们就能够稍微有点存粮了。进口粮食这一条，我们现在大体上已经这样做了。

当时还有人对进口粮食有顾虑，担心多进口粮食影响其他商品的进口。陈云指出：进口粮食，有没有危险，我看，再咬紧牙关搞几年，对我们有利。

陈云给大家算了一笔帐。他说：现在老百姓的布票已经减少得不像样子了。从前每人每年18尺，还不包括絮棉和针织品。现在都算在里头，实际上真正的布只有6尺，当然不像样子。但是，上次讨论进口粮食的时候，我们

还是定下来每人再减少 1 尺布。每人减少 1 尺布，就可以多进口 10 亿斤粮食。5 美元 1 匹布，7000 万匹布就是 3500 万美元，恰好是买 10 亿斤麦子的钱。我看宁肯每人减少 1 尺布，也要多进口 10 亿斤粮食。这样做是错的还是对的呢？恐怕是对的，应该这样做。1961 年 5 月 30 日，陈云在外贸专业会议上，又专门解释了进口粮食的考虑。他说：稳定市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进口粮食，就要下定决心拿出东西来出口，先国外，后国内。把粮食拿进来，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农民手头的粮食宽裕了，可以多养鸡、鸭、猪，多生产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总之，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市场上其他商品少了当然不好看，现在已经不好看了，百货公司实际上是商品陈列所，很多东西都凭票证，只有文具、化妆品和小商品可以自由买。但是比较起来，还是粮食重要得多。

1961 年 1 月 2 日到 9 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缅甸访问。行前，在飞机场，周恩来、陈云、叶季壮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量是 150 万吨。

周恩来到昆明后，外贸部给随同访问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 250 万吨了。雷任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件事我不知道。随后，他马上打电话问陈云。

陈云在电话里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粮食才能渡过难关。

周恩来是了解陈云的。陈云考虑问题一向精细、稳重，现在连他都主张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足以说明国内粮食紧张的程度。周恩来心里也非常着急，拿着话筒很久没有说话。

决定进口粮食以后，如何保证粮食安全迅速进来，中央和国务院作了很多部署。

周恩来在访缅期间还多次研究进口粮食问题。在访问结束前一天周恩来对雷任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支付问题？1958 年金门炮战以后，台湾海峡局势一直比较紧张，国民党海军对大陆实行海上封锁，大陆船队进出海峡地区，他们是要劫持的，这样运输和资金问题显得特别重要。

雷任民到香港召集中资的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了解情况，进行研究。讨论后一致认为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可以解决。货源问题，美国、澳大利亚存粮很多，资本家急切要找出路。找市场，中国向他们购买大批粮食，他们就可影响政府，把粮食卖给中国；运输问题，一是买 FOB，按到岸付款方式购买，二是可以租用外国商船；外汇可以由中国银行周转透支解决。雷任民回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他又问了很多反面问题，得到满意答复后，才觉得心里踏实了。在这个时期，周恩来每天晚上都把雷任民叫去向他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情况，船只航行情况等等。

当时粮食进口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亲自抓，叶季壮、陈国栋、牛佩琮等协助。对派到国外的购粮小组发回的电报，李先念都亲自批阅，亲自听取外贸部主管人员的汇报，解决有关问题。有一次，购粮小组汇报后，李先念对他们说，你们任务完成好，我请你们吃烤鸭。后来他真的请大家吃了一顿

烤鸭。

由于进口数量大，时间集中，怎样卸下来、转运出去，缺乏经验，困难很多。为此，李先念召开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进行专门研究。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进口粮食接运工作组，由他本人任组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姚依林、交通部部长王首道任副组长，并从有关部抽调干部组成办事机构，设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

这次会后立即派粮食部副部长周康民、财政部副部长李树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江东平，率领工作组分赴大连、天津、上海等主要港口坐镇，其他港口也由有关部派司局级干部粮食工作组，协助各港口组织接卸工作，各有关地区和港口也建立相应组织，每隔一个时期，召开各个港口接运粮食的经验交流会，以便把接收进口粮转运工作进一步做好。

为了进口粮食，接运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清晨六七点钟，粮食部的陈国栋、杨少桥等，就已经在李先念那里谈粮食问题了。那时不仅要解决购粮的国别、数量、价格、用汇。到货等外贸方面的问题，还要解决到港粮食的接卸、调运等问题，最紧迫的时候，还要调动部队的力量，协助突击装卸，以解燃眉之急。

在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人亲自领导下，还下到两个月，1961年2月，外贸部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李先念派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牛佩琮、交通部副部长于眉、机械部副部长沈鸿等。在进口粮运到前先去天津，检查码头和天津到北京的公路运输以及仓库的准备工作。当时遇到一个最大的难题是，进口粮都是散装的，怎样从船上卸到火车上运出来？开始时是用铁抓斗把船上散装粮食抓到火车上运走，但铁抓斗撒漏多，浪费粮食。后经沈鸿和粮食部的傅立民（后曾任商业部副部长）一起研究，突击抢制出了吸粮机，把粮食从船上吸出来。

陈云对进口粮食接运工作非常关注。

2月7日至11日，陈云到天津，专门到塘沽港口，现场调查进口粮食卸船和接运情况。看到前不久反映的粮食撒漏现象已经克服，十分满意。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达到500万吨。

经过各方面努力，1961年6月30日以前抢运到国内215万吨（43亿斤），用在刀口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当时虽然大量进口粮食，但是进口国别还是有所选择的，美国虽然是世界粮食市场的大供应商，但大家似乎都有意回避。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都订购了大量粮食，却没有从美国买粮。毕竟美国是中国头号意识形态的敌人，两国关系从朝鲜战争以来一直相当紧张。而且当年朱自清教授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还受到毛泽东的称赞，说他有中国人的骨气。

陈云并没有受到这个观念的束缚。1961年8月23日到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调整方针，陈云在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说可以。不久后，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在对待进口粮问题上，当时党内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尽管当时粮食问题那么紧张，但有人就是视而不见，还在侈谈什么“大跃进”的成绩，侈谈社会主义农村的美好田园。

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在分组开会时，有一个发言，提出不要

进口粮食，从国内解决。这个发言登了内部简报。陈云看到简报上的这个发言，马上提出，粮食部应该有人发言，讲明进口粮食在现时的必要性。

粮食部经过研究，决定由副部长杨少桥在财贸口小组会上作了必须进口粮食的发言，从粮食产、购、销、调、存及国民经济的有关方面，说明必须进口一部分粮食，弥补当时国内粮食的不足，并登了简报，发到七千人大会各组，以统一认识。

从 1961 年至 1965 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 500 万吨左右。这占我国粮食产量比重虽然很小，但作为国家集中掌握的大宗粮源，这批粮食在国家的粮食调度上却起了重大作用，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 扬汤止沸何如釜底抽薪；寻找走出粮食困境的办法，陈云对发展化肥情有独钟

1960年秋预计，当年全国粮食产量剧减，将从1958年的4000亿斤减为2870亿斤，人均占有粮食将从612斤降为430斤，还低于1952年570斤的水平。陈云对粮食情况深感忧虑。在提出进口粮食渡过难关的同时，他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发展化肥工业，促进粮食增产上。

陈云对发展化肥促进农业增产非常感兴趣。1957年陈云曾经研究比较过国外农业增产的途径，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苏联和美国为代表，人少地多，走的是扩大耕地面积之路，一种是日本和联邦德国为代表，人多地少，走的是扩大单位面积产量的道路。陈云感到，中国虽然国上面积大，但是人口也很多，人均耕地面积少得很，农业增产只能是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三年恢复时期，陈云把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希望放在土改上，后来又对发展农业互助合作寄予了很大希望。因为那时候国家要恢复经济、要搞工业化，农业投资不可能搞很多，只能尽可能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尽可能合理组织各种生产要素来提高生产水平。经过几年实践，陈云认识到，这些只是为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1957年，陈云提出，发展化工和水利事业，可以对农业增产起很大作用，其中发展化肥是农业增产最快、最重要的一条，年产100万吨化肥，只要10亿元投资，可增产粮食300万吨即60亿斤。同样增产这么多粮食，用开荒的办法，需要投资15亿元开3000万亩土地。

1957年以前，陈云觉得发展化肥希望不大。苏联为中国设计年产7.2万吨的化肥厂，需要建设5年才能投产，国内还不能制造设备。农用肥料主要只能是靠养猪积肥。到1957年的时候，情况变了。化肥厂的重要机器和部件，比如高压反应筒和高压压缩机，都试制成功了，只缺一些特殊钢衬。化肥的原料是煤炭、硫铁矿、石膏和食盐等，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都可以供应。

1957年2月化工部提出大量发展化肥的意见以后，1个月前才成立的、陈云当组长的中央财经工作五人小组就同化工部多次研究，并召开了各机械工业部门的会议，准备从当年下半年开始，经过一年半的试制，做出成套设备的设计，1959年大批制造，1960年装配，然后大量投入生产。发展化肥，促进农业增产的思想还写进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1959年和1960年在化工部的技术指导下，开始建设了一批年产800吨和年产2000吨合成氨的小型氮肥厂。到1960年底，年产800吨的厂已经建成投产20多个，其中5个生产比较正常；年产2000吨的厂已经建成投产7个，其中3个生产比较正常。

陈云原来对年产800吨到2000吨的小化肥厂很感兴趣。他曾派人到几个小合成氨厂了解了情况。

1960年7月21日，陈云在北戴河对化工部领导说，“现在看来，小合成氨厂有两大革命，第一，不需要氨加工，而用氨水直接施肥，这样就可大大节省硫磺或其他原材料；第二，这些小设备各省市都可以制造，便于推广。”

但是，小化肥厂设计还没有过关，当时已有人批评小化肥厂“太娇气”，碰不得，像王孙公子，像林黛玉。陈云对出现的这些问题，也很担心，他鼓励大家进一步改进，不要怕失败。他叮嘱化工部每个月向他报告一次关于小化肥厂的工作情况。陈云设想大量地、普遍地建设小型氮肥厂，觉得小型氮

肥厂需要的重要材料比较少，设备制造比较容易，省属机械厂就可以承担制造任务；适合农村分散的条件，易于满足各地方对氮肥的普遍需要，有利于调动各级地方以至某些人民公社发展化肥的积极性；建设的时间短，发展快。他夸奖说：看来 800 吨是好的，将大化小，照葫芦画瓢，这是别人没有干过的，想出这个办法的人是绝顶聪明的，应当得“勋章”。

1960 年 9 月间，陈云不顾病体，前往天津、河北视察，10 月间又视察河南、安徽和江苏，所到省市，陈云同各省市的书记、省市市长，都作了详细的交谈，对粮食减产情况了解得十分深入，对粮食减产的严重性作了重要阐述，并对各省市的负责人提出了农田水利建设和小化肥厂建设问题。

在这次视察中，陈云对当时小化肥厂的建设情况，以及已建的南京、上海、芜湖等地的建厂过程，用的哪个厂生产的设备和零件，是否好用，大化工厂如何帮助小化肥厂的建设，都了解得很具体详尽。

10 月末陈云去了上海，随同考察的王耕今回到北京，把跟随视察的情况和陈云的指示向国家计委党组写了报告，但报告中对陈云讲水利的东西讲得多，却没有讲小化肥厂的建设。计委主任李富春看了这个报告后批示：“按陈云同志指示办。”1961 年计划中就列了治理里下河的水利项目，解决了里下河的排水问题。治理海河、黄河及淮河的工程也陆续进行。

陈云回京后，看了王耕今写给国家计委党组的报告，没有说什么。他的秘书周太和对王说，报告没有写小化肥厂的建设，陈云可能对此不很满意，王耕今也感到这确是一个失误，但报告已送上去。

随着对情况更深入的了解，陈云对小化肥厂的看法也有了改变。

当时，小型氮肥厂的建设 and 生产，在技术上还没有过关。即使是 8 个生产比较正常的小型氮肥厂，由于设备的质量不好，技术操作很难掌握，事故比较多，生产也辽不稳定，实际产量还没有达到设计要求，而且原料和动力的消耗都很大。小化肥厂技术要完全过关，还得作很大的努力，需要一定的时间。

相反，年产 2.5 万吨或 5 万吨合成氨的大型氮肥厂，不论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都已成熟。大型化肥厂那时全国共有 6 个，分别设在大连、南京、吉林、兰州、太原、成都。这些大厂都已经进行了比较长时间的生产，而且一直很正常。建设这类大型厂需要的各种主要设备和配套设备，除个别以外，国内已经试制成功，并且正式生产。到 1961 年底，可以争取制成 3 套年产 2.5 万吨合成氨所需要的设备。

同时，大型氮肥厂可以节约劳动力，可以集中使用技术力量，产品质量好，生产成本低。在这些方面，大型厂比小型厂都要优越。

当时也有人主张上一些年产 1 万吨化肥的中型厂。陈云对此也作了一些了解，经过比较，陈云认为，中型厂在技术上不如大型厂成熟。1959 年底在北京建成并投入生产的年产 1 万吨合成氨的中型厂，生产一直不稳定，产量并没有达到设计要求。特别是由于氨加工的技术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氨的损耗比较大，而且成品容易分解，不易保存。

陈云感到，经过 1 年多实践的检验，证明自己当初关于小化肥厂建设的一些设想还缺乏充分根据。小型氮肥厂虽有它的优点。但是，由于技术上还没有完全过关，还要继续试验，不断改进。在没有完全过关以前，不应该大量地：普遍地建设。

1961 年 3 月 4 日到 8 日，陈云听取化工部的工作汇报。谈到小化肥厂的

生产技术一直没有过关时，陈云讲，我们本来是想搞小的经济，可是搞了许多都没有搞成，反而不合算。小的可以继续实验，但不要搞大多项目了。

当时化工部准备推广 1 万吨的中型化肥厂，要陈云定夺、签字。陈云说中型厂技术上也没有过关，还不能立即大量推广。

这样，只能选择上大型化肥厂。陈云拍板：大的过关了，搬的是外国的技术。现在搞大的和老太爷一样，稳稳当当，我们要的就是实际，大化肥厂无非设备、材料多要一些，可以先搞一批，从进口方面解决。

陈云说，要把试验研究同推广分别开来。一方面试验研究要敢想敢说敢作，经验教训是要的，老头子头发白了就是碰钉子碰出来的。另一方面，具体做必须从实际出发，要摸着石头过河，推广必须是成熟的东西。

1961 年 4 月 4 日到 10 日，陈云在杭州召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化肥小组和有关部委及地方生产部门一些人士。

陈云在座谈会一开始就讲，真正增产粮食还要靠化肥和水，中央一致意见是多搞、快搞化肥。把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列为工业支援农业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个座谈会就是讨论为实现这个任务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氮肥厂的规模是搞小型的，还是搞大型的？第二个问题，氮肥厂建设的部署，是把现在已经铺开的十几个点全部列入年度计划齐头并进，还是集中力量分批进行，每年建成 20 万到 25 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

在几天时间里，总共开了 6 次会。陈云鼓励大家要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说：你们不要怕讲话，有些人讲话不痛不痒，怕犯错误。讲话总是要有些机会主义或盲动主义的，讨论问题一边倒不行。不要怕左或右，如果有人说你你们右了，我来承担；将来要开除党籍，就找我好了！

经过详细研究讨论，会议提出了化肥工业发展的方针性意见：在 1962 年到 1964 年这 3 年年，氮肥厂的规模应该搞大型的，建设的部署应该是集中力量，每年建成年产 20 万到 25 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

1961 年 5 月 16 日，陈云为中央化肥小组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汇报了杭州座谈会关于发展化肥工业的方针，并提出了相关的一些重要建议。

在氮肥的品种问题上，这个报告建议，由于硫酸的资源 and 产量的限制，在某些地区硫酸根还容易破坏土壤结构，不宜于过多地生产硫酸铵；碳酸氢氨和尿素还在小规模试生产阶段，也不能大量推广；在今后两三年内应该主要生产硝酸铵。

在化肥工业布点问题上，报告建议，应该尽先在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和粮食的高产区布点，然后分期分批在其他地区布点。

这样布点，就要把经济作物的分散产区和粮食的一般产区的氮肥工业建设加以推迟，即使是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和粮食的高产区，也要分成若干步骤来进行。这同全国各地都希望普遍地发展氮肥工业的要求，是有矛盾的。但是按照当时材料、设备和技术力量等条件，只能这样做。

陈云指出：过去的经验证明，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势必把有限的材料、设备和技术力量分散使用，使建设期限拖得很长，不能按期形成生产能力，甚至造成很大的浪费。实行集中力量、分期建设的方法，正是为了避免上述缺点，大大加快建设速度。

陈云在报告中还提出，为贯彻执行上述方针，争取大型氮肥厂建设计划的全部完成，建议采取如下几条重要措施：

### 第一，进口重要材料。

陈云指出，建设一个年产5万吨合成氨的厂，包括自备电站、自备焦炉、硝酸铵加工设备等在内，需要各种重要金属材料共约1万吨。这些材料，目前国内生产不足，或者不能生产，必须从国外购进，应该列入国家年度进口计划，并确实保证所需要的外汇。这是能否完成今后3年氮肥厂建设的关键。

据当时化工部计算，一个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厂需要的重要材料，约需要外汇320万美元，5个厂共需1600万美元。进口这些重要材料建设氮肥厂，比进口粮食有利得多。320万美元只能购买4.5万吨粮食，很快就吃完了。而用来购买重要材料建设一个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厂，生产的化肥每年可以增产粮食五六十万吨。

为了组织这些重要材料的进口，陈云建议由化工部、一机部、外贸部成立专门的进口小组，决定进口的详细货单，并进行其他各种准备工作，争取于5月底6月初派人出国订货，根据品种规格成套分批定足。进口重要材料的数量，除保证本年度的需要外，要逐步做到有一年的储备。这些进口的材料，由化工部设立专门仓库保管，保证专材专用，以便氮肥厂的设备制造和建设工程能够按计划进行。

### 第二，定点制造设备。

力保证氮肥厂设备的正常生产和成套供应，过去制造氮肥专用设备的工厂，应该继续担任原定的制造任务，同时必须由一机部指定一批工厂，给氮肥厂制造通用设备（如制氧机、冷冻机、鼓风机、阀门等）和各种电气设备，以避免氮肥厂所需要的通用设备不能保证供应或者不能如期供应的现象。

陈云在报告中还建议，在定点制造以后，化工部和一机部负责供应专项材料，制造厂就可以按期完成生产任务，保证供应，并不断地提高质量。另外，原来由三机部所属工厂承担的制造氮肥设备的任务，仍应由三机部继续承担，几年内不变。

### 第三，成套供应氮肥设备。

氮肥设备种类多、数量大，协作关系很复杂。为了保证氮肥厂建设的顺利进行，陈云提出，必须按照大型合成氨厂设计文件中的设备清单，组织设备的成套生产和成套供应；同时，必须扩大氮肥设备的成套供应的范围，即除了要保证氮肥主要生产设备和全部辅助车间的设备能够成套供应以外，还要保证有关的洗煤、炼焦、电站、交通运输和公用工程等所需要的设备，都能够成套供应。

陈云在报告中建议，国家计委把大型氮肥厂设计文件中所规定的全部成套设备列入计划，由一机部成套总局负责保证供应。氮肥设备的配套产品，凡不属于国家和有关部统一分配的机电产品，以及需要向市场采购的五金、电气器材（所谓三类物资），应由物资总局、商业部分别成立专门机构，负责供应。在氮肥设备实行全部成套供应，并把这些供应关系固定下来以后，大型氮肥厂的建设单位可以不再参加全国机电产品的订货会议。

### 第四，保证国内材料的供应。

建设一个年产5万吨合成氨厂所需要的各种金属材料共约3万多吨，其中由国外进口的将近1万吨，由国内生产供应的约2万多吨，陈云在报告中提出，这些国内生产的材料，应该由一机部和化工部按照每年氮肥厂建设的需要计算数量，经国家计委核定分配指标，列入年度计划，确保供应。制造设备的材料要提前半年预拨，专料专用，直拨到厂，以便尽早制造设备。供

应的材料，特别是铸造生铁，必须是合乎规格的，以保证设备的质量。

第五，消除配套设备制造中的薄弱环节。

当时全国对制氧机、冷冻机、压缩机、高压阀门、中压阀门、大电动机的需要量很大，但是产量少，供不应求。这是机械制造工业中的薄弱环节。

陈云建议，为了不致因为保证氮肥厂建设的需要，而使其他部门的建设受到影响，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包括扩建原有企业和加强新产品的试制，在两三年内提高这些设备的制造能力。这一工作，由一机部提出具体方案，报请国家计委审查批准后实施。

第六，严格遵守基本建设程序。

“大跃进”中，化肥厂建设贪多图快，盲于冒进很厉害，陈云为此提出，以后建设大型氮肥厂，除了做好设计计划任务书，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以外，必须按照先材料、再设备、后土建的次序进行。首先必须组织好重要材料的进口和国内材料的供应；在材料供应完全落实的基础上，组织设备的制造和成套供应；然后，再安排工厂建设进度，组织上建施工。陈云说，根据过去的经验，这样做，不但不会推延建设时间，反而会加快进度，保证工程质量。

中央不久就批准了这个报告。

1961年5月5日，为了具体落实杭州座谈会的建议，陈云专门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确保氮肥厂建设和生产所需物资问题。他还督促化工部组织人员出国考察进口材料，要求在材料上船到卸车入库各环节都要派专人负责。

在外汇奇缺的情况下，他及时拨给了进口所需要的1600万美元外汇。后来发现一些重要材料漏订，陈云又很爽快地同意化工部补订。

由于及时明确了化肥工业的发展方针，周密组织化肥厂的建设和生产，化肥工业迅速发展，在粮食生产恢复和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 生产无以为继，调整不得不提上日程。纵览 全国，主张动员两千万城镇人口下乡

由于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已经支撑不住庞大的建设规模，工业的“大跃进”也就无法继续下去。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整顿、提高”的方针，基本建设要退下去，比较容易做到，难办的是几年来增加的2000多万职工怎么安置。这也是关系到调整能否使建设规模与粮食形势相适应的关键。

当时虽然已经决定要大量进口粮食，但是数量上毕竟是有限的。进口多了，外汇就成问题。

当时外汇是非常紧张的，大宗出口主要靠农产品，但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也影响了出口。1960年全党动员，使尽了浑身力气，在当时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物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当年外贸收购突破100亿元大关，创历史最高记录，超额完成当年的外贸收购和出口计划。可是也出现了严重的后遗症，当时外贸收购几乎是“竭泽而渔”，收购过头。给农民留得太少，最后农民不愿生产，反而收不到东西，结果出口和城市供应都大为减少。

1961年5月30日，陈云在华东地区外贸工作会议上不得不提醒大家：农产品收购松一点比紧一点好，宁可我们少购一些，也要给农民多留一些。农民养1只鸡，一年产蛋五六斤，我们只收购一两斤；养两头肥猪，只收购1头。这样，农民高兴，就愿意多生产了。现在农民还很穷，多给农民留一些，其实农民也舍不得吃，还是要卖的。放宽一些。东西反而会多起来。

陈云还提出，要在国内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凡是总值在二三十万美元以上的出口商品，生产多少，出口多少，留下内销多少，原材料怎么供应等，都要逐项讨论，并且开专业会议进行安排，每一项都要有着落。同时，还要研究和实行产销直接挂钩，组织外贸部门同人民公社或者工厂直接挂钩。当时在河南建立了活猪出口工地，在浏阳建立了鞭炮基地，等等。这一方针延续到今，已成为外贸出口货源的重要来源。

1960年7月苏联突然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止12个政府间的协定和几百个合同，同时逼还抗美援朝的欠债，给我国经济 and 外贸造成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中国欠苏联的债，很大一部分是抗美援朝的军火款，当时是作为尽国际主义义务，所以并没有计较价格数目，现在赫鲁晓夫逼债，党内是有意见的。但毛泽东一声令下：“还！”中国政府还是如数如期还掉了。但这样一来，外汇就更紧张了。

当时为了搞外汇，大家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用李先念的话来说，除去吸毒、赌博、娼妓以外，凡是能增加外汇的办法都可以考虑。

由于外汇紧张，当时管外汇真像守财奴当家，每一笔外汇都要在手心里捏出汗来才舍得花出去，用几百美元，都是要反复斟酌的。有一次国家体委为参加国际比赛，申请进口几辆自行车比赛的赛车和撑竿跳高的撑竿，一共没有几个钱，最后还是体委主任贺龙找了率先念说明情况，才批准进口。

但是外汇紧张一时总是无法缓解的，进口粮食量不能太大，也不能持久，支撑不了城市人口的需要。

陈云感到，进口粮食负担太重。而且，很大一部分花在粮食进口上，势必削减成套设备和重要工业原材料的进口，大大影响国家工业建设。长此下去，不是个办法。

1961年1月到5月，煤炭、钢铁生产等都大幅度减产。作了很大努力，生产就是上下去。陈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做了大量调查工作，以查明原因。

1960年订计划，规定1961年第1季度日产原煤65万吨，第2季度70万吨，第3季度85万吨。陈云从留有余地出发，估计2月份可能达到60万吨，3月15日以后可能达到65万吨。但是，直到5月底，日产只有53万吨多一点。

煤炭上不去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陈云找煤炭部的几个人谈过，也跟地方一些人谈过，了解到了实际情况。

煤炭生产上不去，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一是开采与后备力量比例失调；一是大量设备失修，“带病”运转；一是工人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不够；一是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需要调整。这许多实际问题都必须解决，如果不解决，即使在两个月内把整风搞好了，产量也还是上下去。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不是很快可以办到的。

陈云了解到，煤炭生产的后备力量，前后、左右、上下都有问题。

前后的问题，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掘进量要超过开采量，而实际则是相反，掘进没有后备力量。

左右的问题，就是同时开几个巷道，这个巷道开完了，可以马上转到另外的巷道；如果这个巷道发生了事故，能够马上转到另外的巷道。实际的情况是，左面开采，右面没有准备新巷道，或者准备得很少。

上下的问题，不是开采上一层的时候，要为开采下一层做准备，以便这一层采完了，能够紧接着采下一层。老井向下延伸，开新井宋代替采完了的老井，都可以叫上下。实际的问题是只顾眼前，在一个水平上开采，不顾长远，不预作准备。

这里说的前后问题，两三个月可以解决；左右问题，五六十月可以解决；上下问题，则需要两三年的时间。至于现在煤炭工业前后、左右、上下的问题各有多少，陈云没有过细调查。

当时批计件工资是“金钱挂帅”，煤炭工业也取消了计件工资，干多干少一个样，对生产影响很大。煤炭部有人吹，说产量高的几个煤矿都不是靠计件工资。陈云亲自找来有关人员调查，结果发现情况正相反，这几个矿都是“金钱挂帅”，全都搞了各种形式的计件工资，陈云主张为计件工资恢复名誉。

通过调查，他得出结论：以后几个月，煤炭产量肯定上升不了很多，弄不好还会下降。这个结论还没有涉及设备失修及其他影响生产的问题。

钢铁指标是所谓的政治任务，陈云调查得格外仔细。他找了冶金部和地方有关人士开座谈会，还亲自视察了矿山。在视察位于河北赤城、宣化一带的尤烟铁矿时，他甚至不顾年高体弱，下到矿井去调查采掘情况。

陈云了解到，“大跃进”搞钢铁，主要搞了冶炼，没有很好注意铁矿的开采，也没有注意轧钢设备的制造。因为钢材少，制造的矿山设备也少，铁矿开采的机械化跟不上，开采方式很落后。

当时冶金工业部系统，小土群矿山跟大洋群矿山各占一半。铁矿开采的机械化问题是很不容易解决的。过去搞小土群，用手工开采，搞了一点露头的矿石。现在露头的矿开采完了，要采地下的，就要有基本建设，安装抽水、通风、提升等设备。过去铁矿石的运输，多半是靠人力，工具只有手推车。

此时再要那样多人搞运输是不行的，这就要把手工劳动变成机械化作业。

钢铁生产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贫矿要变富矿。过去是含铁量 30% 的矿石也好，40% 的矿石也好，统统都用，费煤很多。要提高炉料的含铁量，就得把矿石磨碎，进行磁选，然后烧结成富矿。这样一个由露头变地下。由手工变机械，由贫矿变富矿的过程，即把小土群变成小洋群，没有 3 年时间是不行的。

修铁路运矿石，也是个大问题。所谓开矿，无非是搬石头。光靠手推车推，那是不行的，势必要修铁路。陈云指出：离南京 20 里有一个牛首山铁矿，是个很小的矿，就有 1300 十工人，其中 1000 个工人是在搬石头。河北龙烟铁矿年产 290 万吨矿石，矿下的铁轨就有 30 万米。建设一个机械化的矿山，是要很长时间的。

此外，解决炼焦问题也需要一定时间。那时许多炼焦厂没有经过洗煤就炼焦，或者是用土法炼焦，用煤多，质量差。要洗煤，要把土法炼焦变为洋法，就要增加很多设备。

当时陈云身体还是不好，在病中他对前去看望的冶金部领导恳切地说，大家都想把钢铁搞上去是好心，谁不想多搞点钢铁？但究竟能搞多少，要充分考虑现实可能性，否则好心也会办蠢事，办坏事。这番话对他们震动很大。

在关于钢铁生产的座谈会上，陈云要求冶金部门抓好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提高支农钢材的比重、解决军工生产缺少的品种等项工作。会后冶金部门按陈三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逐项加以落实。

调查完毕后，陈云指示向周恩来总理写报告，归纳煤钢生产大滑坡的主要原因：

第一是煤和钢的产量计划大大超过现有综合生产能力，他计算钢的综合生产能力只有 1200 万吨，煤只有 2.5 亿吨，1960 年的产量都是超负荷运转逼出来的。

第二，由于超负荷运转，设备不能按时检修，损坏严重，这几年需要停产检修。今后几年重工业生产不但需要“先生产，后基建”，而且需要“先维修，后生产”。

第三，小高炉炼铁浪费煤炭。小高炉炼 1 吨铁耗焦炭二三吨，大高炉只要半吨。由于小高炉耗煤过多，使若干大高炉因缺煤而停止生产。

第四，煤矿这几年只顾采煤，矿井没有掘进，坑道没有延长，几乎所有能采煤的工作面都采完了。今后要掘进、延长，创造新的工作面，要花二三年时间。因此煤产量到 1964 年下降，此后才开始回升。

第五，粮食和副食品减少，体力下降。因此需要酌量增加粮食和副食品供应。

陈云的报告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说这一下把原因说清楚在这次调查中，陈云更深刻地认识到，建设规模超过国力，当然要调整。另一方面，煤钢生产几年内显然难以有较大发展，与此相关，整个建设规模也上不去，必然闲置大量职工。与其让他们坐等工业恢复，不如先动员部分城镇人口下乡，从事农业生产，减轻粮食和农业问题的压力。

1961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农村工作、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工作问题。

在会上，陈云把自己反复思考的问题提了出来，就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下乡问题，作了题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的讲话。



陈云首先讲，由于解决了一些政策问题，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了，农村的情况逐渐好转。下一年度会比今年更好些。但是，现在看，国家掌握的粮食，明年度将比今年度还要紧张，因为库存减少了。假如今年度各省、区上缴的公购粮有 116 亿斤，明年度可能下降为 84 亿斤。为什么呢？今年度各地上缴的粮食能达到 116 亿斤，是因为挖了一部分库存，而明年度就没有什么库存好挖。陈云在讲明粮食问题的前景以后指出，要解决摆在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需要采取四条措施。

第一条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

“大跃进”后，由于瞎指挥、浮夸风、一平二调、平均主义、高指标、高征购、搞公共食堂等等胡作非为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个时候不能不赶快解决。

陈云认为，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他主张坚决贯彻执行“十二条”和“六十条”，再加这次会议议定的四条（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与处罚）。

第二条是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

陈云认为这一条也很重要，但是因为化肥、拖拉机、排灌机械等不可能一下子增产很多，所以这一措施不是短时间可以见效的。

第三条是进口粮食。

陈云从前一段进口粮食的情况指出，进口粮食很有必要，但超过 100 亿斤有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外汇，也没有那么大的运输力量。

第四条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

陈云说，这一条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非采取不可。

“大跃进”中，把粮食产量估高了，想着工厂多搞一些，小一点土一点的也好，即使用人很多，只要把东西搞出来就好，就这样招了很多人。3 年招收职工 2500 多万人，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从 1957 年的 9900 万人，增加到了 1961 年 1.3 亿人。这样迅猛的城镇人口增加速度，农业根本承受不住，粮食库存连年下降，到 1961 年 6 月底甚至有可能下降到 140 亿斤，其中陈粮只有 101 亿斤。

陈云在 1959 年 4 月就提出，“大跃进”后，招工太多，1958 年一年就过多招收了 1000 万工人，造成市场紧张，要认真精减，还要加强对增加城市劳动力的控制。但是在“大跃进”空气正热的时候，谁也没有听进去，问题越积越多，越积越大。

到这时候，事态的发展与陈云过去的预言不幸地吻合了，但陈云也并没有摆出一付先知先党的面孔，去抱怨或者责怪谁。他只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同大家一起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

陈云说，建国以来，出现过 4 次粮食供应比较严重的紧张状况。这 4 次当中，1953 年、1957 年和 1959 年以来这 3 次，都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产生的，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只有 1954 年那一次是由于工作上的失误造成的。由此可见，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

陈云提出，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他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陈云不主张再挖农民的口粮了。当时农民口粮已经挖得很苦，再挖下去

农业就没法恢复。

他说，城市人口如果丁下乡，就只好再挖农民的口粮。现在全国在讨论贯彻“十二条”和“六十条”，但是，如果粮食征购任务下减少，“十二条”和“六十条”就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因为农民最后还是要看我们征购多少。如果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农民还是吃不饱，那末，他们的积极性仍然不会高。

由于各地灾荒严重，要继续挖农民口粮，当时只能向高产的省、专区和县要，向高产的社、队要。陈云指出，向他们多要，一年还可以，长期下去不行。像黑龙江、杭嘉湖等商品粮产区，如果长期吃粮标准很低，他们增产的积极性就没有了，高产区会变成低产区。全国高产县并不多，浙江省有23个县，担负了全省征购粮总数的74%。江苏省苏州专区6个县，征购12亿斤稻谷，上缴中央和供应南京市的粮食，主要靠这个专区。把这些高产区的积极性打下去，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陈云曾亲自到洛阳拖拉机厂、南京化学公司等生产农机和化肥的工厂去看过，已经了解到，他们的发展还有很多具体条件的限制，农业生产主要还是靠畜力和粪肥，而不是靠机械和化肥。

在谈到不能再挖农民口粮的问题的时候，陈云就指出，再挖下去，农民口粮不够，而饲料又留得少（大牲口80斤，猪60斤），牲口和人争粮，牲口是争不赢的，人会把饲料拿来吃掉，牲口势必继续大量死亡，这对农业的损失就太大了。

陈云还指出，再挖农民口粮，经济作物产量也会继续下降。

他说，向农村征购的粮食多，销售的粮食少，农民吃不饱，管你棉花不棉花，管你发多少布票，为了吃饭，就会挤掉经济作物。要种经济作物，就得给粮食。比如说，要山东恢复种花生的面积并不困难，只要给5亿斤粮食，并且规定适当的价格，就可以了。不然的话，你说种经济作物是“政治任务”，农民就在地头上种一点，中间还是种粮食。这样，不仅城市市场不好维持，对整个农业的发展也很不利。你拿了农民的粮食，把什么东西给农民呢？老是给他高级糖果总不行吧，他还要穿衣服。所以，经济作物继续下降对于人民生活 and 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很不利。

陈云还指出，农业是不可能很快恢复的。要是农业可能很快恢复，人们就会说，既然很快就恢复了，何必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多此一举呢？农业生产即使恢复到1957年以前的水平，粮食供应依然不能维持，至少要达到1958年的水平才行。要达到1958年的水平，即使从今年起每年增产200亿斤到300亿斤粮食，也要三四年。增产的手段，包括化肥、排灌机械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一下子增加很多？不可能。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让很多人在城里吃着饭等待农业的发展呢，还是现在就下去？我看不能等待，应该现在就下去。

陈云认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

挤农民口粮的一条路走不通，那就只有下决心动员城镇人口下乡。但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也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人已经来了，在城市里生活比农村好得多，再动员他们回去是很不容易的，搞不好要“打扁担”。而且是涉及几千万人的生计问题，这样规模庞大的人口转移，风险性和具体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陈云说，要承认，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是困难的，但与城市勉强维持过多人口的困难比较起来，还是城市人口过多的困难更严重，我们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子。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

1961年初以来，煤钢生产持续大滑坡。陈云把自己对这一现象的调查情况作了总结，指出，煤、钢生产一下子很难上得去。如果煤搞不了很多，钢铁搞不了很多，那末，轻工业生产也好，重工业生产也好，基本建设也好，都上不去。我们又不能靠进口原材料，因为外汇买了粮食，所剩不多。

陈云指出，原材料不够是很大的问题。棉花少了，许多纺织厂就要停工。煤炭上不去，许多钢铁厂要停工。钢铁少了，许多机械工厂要停工。建筑材料和设备少了，许多基本建设项目也要停工。这说明，工业生产上得去上不去，目前不在于人多人少的问题。停工待料、生产上不去这种现象，是不是到今年12月31日就可以结束，从明年1月1日起就大为改观？我看也不是这样。不能设想工业生产的困难局面一下子就可以好转。

当时工厂企业停工待料现象已经出现，纺织工业已经停了500万纱锭，工人吃了饭没有事做。食品工业3年来增加了55万人，算是增人较少的，也是很多人没事做。

陈云从这些情况出发，提出，动员大批工人下去搞农业，并不妨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也不妨碍工业改造和矿山改造。工业摊子铺得太大，用人又太多，人浮于事。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将来农村情况好转了，农民能够负担那么多粮食了，那时候再说嘛。工人下乡，也一样要吃饭，不在这里吃，就要在那里吃。从消费问题上来看，似乎粮食问题还是不能缓解。

陈云指出，其实在城市吃饭和在乡下吃饭大不一样。究竟差别有多大？我看相当大。工人头一年下去，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应150斤粮食，下去1000万人就是15亿斤，2000万人就是30亿斤。这是第一年的差别。更显著的差别在第二年。原来家在农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来家在城市的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和分配了，加上自留地有收成了，他们就不要国家供应粮食了。这样，下乡1000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45亿斤，2000万人就是90亿斤。

陈云还说，工人回乡会不会没有事情做？不会。农村里可做事情很多，他东搞一点，西搞一点，总会生产一些东西出来。搞一点能够出口的东西也是可能的。农业的基本建设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如平整土地、修渠挖沟，加上精耕细作等等，总可以多增产一些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

陈云最后得出结论，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凡是近3年从农村来的，一般地都要动员他们回去。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当然全部回去会有困难，但大多数要回去。至于原来城市里的小商小贩以及资本家，就不必动员他们下乡了。只要工作做得好，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样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肯定是会收到显著的效果的。

陈云关于下决心精减城镇人口的建议同邓小平、周恩来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会议还根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测算，决定将当年的钢产量调低到1100万吨，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发言说：“重工业这样下降，是一个惩罚，是没有按规律办事。重工业速度发展过快，基本建设拉长了，城市人口增多了，工农矛盾突出了，所以退也是应该的。你不退，有什么办法？”、毛泽东说：“去年1850万吨钢，现在1100万，降下来750万吨，我看可以。无

非是外国人骂中国人不行。”这样，钢铁生产也开始相应作出调整。精减城镇人口已经势在必行。

6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并于18日发出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提出在1960年底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同日，中央还发出《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为此，中央成立了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小组，由安子文任组长。

中央作出精减城镇人口的决定以后，各地迅速行动起来。2000多万城镇人民，体谅国家困难，响应党的号召，打点起行李，扶老携幼，回到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上，重新拿起了锄头镰刀。他们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

实践证明，在当时的形势下，2000多万城市人口下乡，不仅对于缓解城市供应紧张状况，而且对于农业的休养生息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宣布减少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上述报告指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 农民牢骚满腹。陈云四下青浦农村调查，深感问题严重

1961年3月10日，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中南、华东、西南）会议在广州开幕。与此同时，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在北京开幕，两个会的主要议题，都是讨论农村工作。

3月13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并“三北”会议写了一封信谈平均主义，号召大家亲身到农村去调查情况，信中说：一些领导同志至今对农村平均主义的问题不甚了了，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或者看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希望从此改正。他原定派陶铸去北京通报“三南”会议情况，但马上又改变主意，请“三北”会议移师广州，合开广州会议。

广州会议于3月15日开幕。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陈云亲赴老家上海青浦县，开展调查。这是他解放后的第四次青浦农村调查。1955年1月5月，1957年3月，他也曾回故乡进行农村调查。

出发前，他请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院长顾复生、长期搞工会工作的领导人陆铨（后两人当年曾同他一起从事农民运动）3人，加上与他长期联系的两个青浦农民组成先遣队，先去青浦县小蒸乡、观音堂乡摸底。后来陈云曾说，之所以选择小蒸乡，是因为1927年陈云曾与顾复生和陆铨在这里搞过农民运动，解放后又常有联系，对这里情况比较熟悉，农民也知道他们，比较敢于讲真话。

先遣队于6月19日抵达小蒸。经过摸底后研究决定，这次主要调查种双季稻、公私养猪等农民最有意见的问题。

一星期后，陈云从北京出发，先到上海，同上海市委负责人交谈后，坐火车到青浦县石湖荡镇下车。随后陈云从这里坐上小船，前往小蒸。

小蒸地处江南水乡，湖荡中的一个个小村庄，原来树木葱茏，竹林茂密。现在却是一片荒凉，村庄孤零零地散落在湖荡中。看到家乡情况，陈云心里很不好受。他说，原来这里都是茂密的竹林包着村庄，远处看都看不见房屋，公社化竹林都归公了，树木也归公了，结果都被砍光。农民的竹林作用是很大的，这里的生产用具、生活用具都离不开竹子，可以制成竹器到市场上换钱用，农民从来不花钱到市场买竹扁担、竹筐用的，现在也只好花钱买了。

6月27日，陈云到小蒸后，他住在自己娘舅一族的亲属、农民廖开弟的家里，作了15天的调查。

当时正是困难时期，粮食、肉蛋供应非常紧张，日用品非常缺乏，商店的东西多是陈列品，有样无货。陈云临去前特地叮嘱工作人员，到小蒸后不许在当地买任何东西，他们如果在那里买，当地群众就没有供应了。要和百姓同甘共苦，坚决谢绝烟茶招待和请客送礼。

在小蒸，陈云用了几个下午听公社党委汇报，此外又开了10次专题座谈会。这10次专题座谈会的内容是：一、公养猪；二、私养猪；三、农作物种植安排；四、自留地；五、平调退赔；六、农村商业；七、公社工业和手工业；八、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农民积极性；九、干部问题和群众监督；

十、防止小偷小摸，保护生产。

每天上午，陈云都深入农民家里，跟农民谈话，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并参观了公社的工厂、商店和仓库。

经过半个月调查，基本摸清了情况。农民对我们党既有赞扬，也有批评。陈云特别注意听批评的意见。

青浦县原来是生活比较好的鱼米之乡，过去农民习惯每天吃三餐，农忙时加一餐。“大跃进”时搞浮夸，搞高征购，农民种了地，收了粮食，却被国家拿走很多，只给农民留下不到400斤，搞得每天只能吃上一顿干饭、两顿稀饭。

调查组到那里的时候，由于组织人民公社，社员都到大队办的公共食堂吃饭。食堂缺少粮食，结果一天三顿饭，顿顿喝稀粥。他们到一个大队去参观时，大队正在开饭，看到一大锅粥。胆子大的农民愤愤地对调查组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却要吃粥。”这话很尖刻，但确是事实。农民吃不饱饭，把大队种的作为绿肥的红花草都吃光了。

走在小镇上，可以看见许多农民门口晾着麦秆，据当地人说，这是生产队碾麦后分给农民的，可是家家户户都把麦秆重新晾晒后，放在簸箕里搓，结果还能搓下来许多麦子。

陈云觉得很有意思，他问一个老农妇：这么搓能搓下来多少麦子？老农妇看陈云比较和蔼，就说了实话，她这么搓下来的麦粒，攒起来竟然能有一斗！

陈云分析说，这是生产队故意在打麦场上不碾干净，借着给社员分草，就把麦子分给社员了，这些粮又可以不算在社员分的口粮之内。

联系到当时的高征购、反瞒产，陈云说，我们不能多拿农民的东西，你要拿，农民总是有办法应付的，还不如不拿。应该告诉各个地方，今后不能再搞反瞒产了。

当时为了渡过粮食危机，好多地方都在寻找代食品。这一带地方有人宣传说，芋艿能高产，一亩产好几万斤，可以立即解决吃饭问题。陈云听了以后有点不相信，就问一个熟识的老农。老农也摇头说不可能，为了用事实说话，陈云请老农用稍微好一点的田搞试验，保证种子、肥料、用水，管理做得细一点，看最后到底能产多少。为了两亩试验田，陈云逐个问题解决当时的田地所有权。工分、口粮等等一系列问题，有的费用还决定由自己承担。

那时，中央虽然已经决定，农民可以种自留地。但各地方执行的时候都打折扣，青浦也是这样。在小蒸，合作化以后，还给社员留了700亩自留地，到了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一声令下，自留地统统归公。郑州会议后纠“左”，1959年春天又分给农民300亩自留地。可是春天刚分下去，庐山会议后风向变了，反“右”倾，于是当年秋天自留地又收归公有，自留地里农民精耕细作种的粮食，也折价归公。田边地头农民开的一些小块地，当地叫做“十边地”，搞公共食堂的时候，也收去当了菜地。就这么朝令夕改，收了放，放了收，拿农民当猴耍，把农民搞怕了。

陈云对自留地问题很关心。他说，自留地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关系重大的问题，祖祖辈辈农民都得有点自己的地，自留地不仅是某家的自留地，也是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少的地，生产队只按计划生产的那几种作物是不能满足社会和社员的各种需要的。

陈云很带感情他说：农民有了自留地，我就放心了，不会饿死人了。农

民没有粮食吃呀。中国的农民真好，饿死人不想起来造反。中国历来农民造反，都是在粮食问题上造反的。有自留地，农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留足！

在开专题会讨论自留地问题的时候，来开会的社队干部虽然也认为有必要给农民多分一点自留地，另一方面又有顾虑，有人讲，集体耕地减少了，完不成征购任务怎么办？也有人担心，农民有了自留地，到时候只关心自留地，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会影响队上的生产。

在陈云主持下，经过讨论，干部逐渐统一了认识，消除了顾虑。农民种自留地，可以种得很好，单产比生产队高。增加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的口粮得到一些补充，生活有的改善。再加上包产落实、超产奖励。多劳多得等一系列的措施，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就容易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种这样一点自留地决不会妨碍集体生产，相反会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生产发展了，国家规定的征购任务也就会更容易完成。

在当地人民公社的所谓优越性宣传中，有个“一条龙”的创造。所谓“一条龙”，实际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支配下，无视人民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强迫过集体生活的居民点。有一天，陈云亲自踏着泥泞小路去看这个“一条龙”。

陈云他们踩了一脚泥，走了好半天才到地方。在一块平地上，建起了几排新房，房与房之间有回廊相通，有食堂、商店、制衣点、医院、托儿所、养老院等等，干部能想到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公社负责人还介绍起这样的社会主义新村的长远规划。对这种做法，陈云很不赞成。他皱眉说，社员群众不会愿意这样生活，这商店里货架上也没有商品，以后不要搞了，已经修起来的房屋要注意管好，不要弄坏了。

农民对农村干部的一些做法，意见是很大的。有人对于部不参加劳动不满意，说干部“大衣捧了捧，不做三百工”，群众是“头发白松松，不做不成功，做了二百工，还说不劳动”。对干部说大话，缺少自我批评也很不满，说“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还说，“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当时政策多变，基层干部也得跟着变，还要想办法把变来变去的理由讲足了，群众讽刺这是“嘴唇两张皮，翻来复去都有理”。

“大跃进”中，小蒸的瞎指挥、浮夸风也很厉害，不顾实际情况乱折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很恶劣。

小蒸地势低洼，人均耕地少，无霜期不够长，农民向来是种一季水稻，种一季夏熟作物如大豆、小麦。“大跃进”后非得让种双季稻，虽说比单季稻每亩多收 220 多斤粮食，但陈云找他所认识的老农算了笔细帐，发现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很大，实际上并不合算。因为算上困种双季稻给寄秧田、秧田造成的减产，算上每亩多用的种子，算上不能种夏熟作物损失的收成，就少收了 250 到 270 斤粮食，还不算多耗的肥料、少收的稻草。豆麦与水稻差价带来的收入损失。

那时农民明明连饭也吃不饱，干活都没有力气，公社还要逼迫他们种双季稻，立秋前抢割早稻、抢种晚稻时，一昼夜要弯腰劳动 16 个小时以上，这样插秧进度很慢。后来公社决定包括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插秧勉强完成了。

陈云在田头看到，水稻田里的禾苗，有的碧绿，有的却是还没有转青的黄秧。有老农向陈三反映，秧是插下了，凑合了事，插得不好，要减产。陈云问怎样能不减产？老农说要联系产量，包产到户，以促进加强田间管理。

这事引起陈云的深思，回来时路过上海，听到安徽省包产到户的消息，他要薛暮桥同周太和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通过调查，陈云得出结论，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宜轻易变更，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像小蒸这样无霜期不够长，地势较低，人均耕地少的地方，不宜种双季稻，种夏熟作物，也要看上质情况，多种蚕豆，少种小麦。这样，也要相应改变口粮年度安排。

陈云对农民的意见不仅耐心听，而且作了解释，有些还主动承担责任。他在几次座谈会讲话时，都先说这么几句：我是国务院副总理，现在把你们搞得没有饭吃，犯了错误，对不起老乡们。请你们把我这个意思也给各位老乡讲一讲。他还风趣地问大家：“我是好人，还是坏人？”群众说：“你是好人。”他接着说：“我虽是好人，结果办了错事情。”为了让农民敢讲话，陈云注意把各种人分开，干部、农民、中农富农分头开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都付给误工补助，误工合多少粮食也同等付给，以免影响生产队的分配。

对调查组查出的一个作风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干部，陈云当即支持作出处理。

多少年来，对于农民来说，养猪等于是开了一个活的“家庭银行”，农民的大宗费用、年节开支，都指望靠养猪卖钱来解决。二年“大跃进”时期，“左”眼病大发作，农民私人养几头猪、几只鸡鸭也成了小资本主义的表现，不准农民养。等到市场缺少肉蛋，又勉强发还。

对农民私养的猪和鸡鸭，曾经两次没收，两次发还。第一次没收是1958年秋人民公社化时期，到1959年春发还；第二次没收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到1960年冬发还。这么两通胡闹，吓得农民心惊胆战，养家禽的积极性一落千丈。

陈云对农村养猪的事情是非常关心的。1960年陈云曾专门召集一些有关部门开了两个星期的会议，座谈怎么样发展农村养猪事业的问题。陈云当时对养猪问题了解得很细致，小猪刚生下来，除了喂奶外，到什么时候该喂什么东西，长架子时该喂什么，架子长起来后育肥该喂什么东西；一头猪从出生到出售，共需要多少粮食，多少青饲料。在集体养猪时，精饲料只好用粮食，私养时每家每户有泔水，有剩饭剩菜，只是到架子长成要催肥时需要一些粮食。两相比较，国营养集体养要这么多精饲料需要有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钱；私养花多少。这么一算私养显然要省得多。然后又算，喂一头猪要烧多少柴，私养只要大人小孩从地里捎带一点就够了，大规模集体养猪，就需要专门供应烧柴或烧煤。从用工来看，集体养猪要专门有人干，私养就是老太太、小孩，附带就干了，私人养猪可积肥料，卖给集体可以增加多少工分。陈云对这些问题都作了调查，最后说，看来我们的方针应该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后来根据会议决定用一两天时间就起草了一个文件。

1961年初，中央规定了养猪的方针是“公私并举，私养为主”。但是，一到地方，大家都搞地方土政策，留个尾巴。当时上海市不准农民私养母猪，把农民养的母猪都作价（实际是无偿）收归集体饲养，还把这一条提到刹住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由于母猪只准公养，不但产苗猪大大减少，而且公养母猪的饲养员，远不如农民细心照顾，产苗猪少，苗猪死亡也较多。

在小蒸，陈云调查很仔细，开专题会，仅养猪一项就召集公家养猪的六七人和私人养猪的六七人各座谈两次。公社有15个养猪场，调查组看了10



个，陈云亲自去看了2个。陈云经过调查后讲，不准私养母猪，就解决不了苗猪的供应。

在集体养猪场，陈云看到，饲养员责任心不强，喂猪时就像食堂开“大锅饭”，干稀一律，哪头猪吃得多，哪头猪吃得少，根本没有人管。在大大的猪棚下，猪圈卫生极差，里面只薄薄地铺了稀稀落落的一点稻草，湿漉漉的，猪们滚得遍体泥浆。陈云生气他说：“从来没有见过有这样养母猪的地方，这样的猪场能增产猪仔吗？”

公社干部汇报说，去年一年公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3.8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要负担16元。建猪场，搞基建还花了7万元。

公社化以前，私人养母猪的时候，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只有6%。实行公养以后，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4.5头苗猪，苗猪死亡率达到89%。这么强烈的对比使陈云很吃惊。但饲养场的管理人员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责任，而是强调客观原因。他们说，私养母猪，几个人管一头，当然管得好，公养母猪一个饲养员平均要养10头，加上种饲料、搬饲料的人和管理人员，平均每个人要养4头，所以养不好。

参观了集体养猪场后，陈三得出的结论是，“大而无当。”

陈云又向养母猪有经验的农民调查。他们告诉陈云，私养母猪的时候，养得好赚钱多，养不好要亏本，所以他们对母猪像对产妇一样关心，对苗猪像对婴儿一样关心。喂猪的时候很细心，也很有耐心，注意猪什么时候该吃什么、喜欢吃什么，有什么异常。母猪怀孕了注意保胎，母猪快生产时农民就睡在猪栏边守护，对比较瘦弱的奶猪特别照顾，把它放在奶水最多的第三个奶头上吃奶，这样奶猪部长得比较均匀。猪圈保持清洁，夏天割青草垫猪圈，冬天往里垫些干草，保持冬暖夏凉。这样农民私养猪养得好，又能赚钱，和公养猪形成鲜明对比。

陈云得出结论，要发展养猪业，必须把母猪也下放给农民私养，鼓励农民多养猪。

以前，即使粮食很紧张的时候，陈云也主张，为了保证肉食供应，粮食分配时要考虑猪的饲料粮。但毛泽东听说后不以为然，说：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养猪可以不费粮。陈云这次下乡调查，也很想具体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调查以后，他得出结论，养猪还是要用粮的，只喂草，某一段时期可以，长久下来就不行，每头猪少不了100斤原粮。养猪不用粮，不能相信。

在一次老农座谈会上，陈云问老农：“把你们的猪没收对，还是发还对？”农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一个老农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上面说没收、发还都是对的。”

陈云又问：“你们现在敢不敢养猪？”

那个老农回答：“还不大敢，说不定哪一天又是没收对了。”

陈云就对大家说：“没收不对，发还才是对的，以后再不会没收了。”

陈云的这个明确表态，开会的老农听了都喜出望外。当天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公社。第二天是7月1日，党的生日，公社宣布放假一天。农民几乎家家都到别的公社去抢购苗猪，妇女们把所有的小船都开出去抢捞水浮莲（养猪的青饲料），掀起了一个养猪的高潮。

看到农民的积极性，陈云非常高兴，他对调查组说：你们看，现在猪归私养，妇女养猪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她要是不养猪，收工回家，除了做饭，劳力就闲起了。这样算下来，要闲下来多少劳力呵！他还深有感触他说，我

们党犯了错误，必须向农民承认，不然就是改正了，农民还不相信我们的正确政策。

小蒸公社在两次养猪问题座谈会结束后的当天下午宣布：即日起，原由集体词养的母猪，统交原养户领回。

在小蒸，陈云参观了百货商店，本来看到商店里还有一点东西，但旁边马上有群众揭穿说，是为了应付他而摆设的。负责人汇报说，商店现在亏空很厉害，群众需要的东西短缺，没有小铁锅，只有食堂用的大铁锅，没有套鞋，没有农民常戴的毡帽，没有花格布、花条子布……陈云听了汇报后说，现在是上面拨给什么卖什么，不是群众需要什么卖什么，做生意不是这样子做的，这是官家生意。

那段时间里，每到傍晚，小镇上合作商店的店员就在街道上吆喝：棒冰，棒冰，两分一碗！开始大家还奇怪，棒冰应该论根卖呀，怎么这里的棒冰还是论碗卖的？出去一看，还真是用碗卖的。一问才知道，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后通过国营商业渠道，运到县里，县里再用汽车、小船运到各乡镇，乡镇再往下面分，等到了基层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想不拿碗卖都不行了。陈云知道后，摇着头叹息：现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区划来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过来。

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过去有许多渔民下午开船到黄浦江去捕鱼，黎明运到上海，就在上海出卖。解放后上海市为了保证水产品供应，规定青浦县每月要向上海供应一定数量的水产品。因此青浦县规定渔民的鱼不准在上海出售，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县水产公司和下属收购点，再由县水产公司运到上海去完成供应任务。这样多次来回运输，耽误了渔民的时间，而且往往把活鱼运成死鱼，价格大落，渔民有时只好把鲜鱼做成咸鱼上交。而到市场上，光这些运输费用和手续费用一加，鱼价就很高了。

陈云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又亲眼看到鱼行准备上交的死鱼，十分惊讶。觉得这样做大不合理。他亲自我来青浦县委和水产局的负责人来谈话，劝他们准许渔民在上海出卖。青浦县委很为难，他们说，如果这样做，必须由上海市委取消我们的供应任务，上海市是不会同意的。陈云无奈，只得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

会后陈云叹一口气对周大和等人说：“我一个党中央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人民。”回到上海后，陈云把这个意见向上海市委反映，陈丕显亲自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事情牵涉整个商业流通体制，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得到很好解决，水产品仍要经过几个批发环节才能进入市场，所以市场上看不到活鱼。这个问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得到解决。

7月12日下午，陈云一行完成调查任务，离开小蒸。

为了论证在小蒸公社调查的问题，进行比较，陈云又到与青浦情况相似的杭州、苏州找了几个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支部书记，研究种双季稻和种小麦的问题，也问了养猪和自留地情况，然后又到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浙江萧山、江苏无锡两县调查种植情况。

在杭州，陈云把调查结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随后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他们都认为很好。

此后，陈云又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三个问题同上海市委、江苏省委、浙江省委交换了意见。

最后，陈云把这次调查发现的问题和儿点建议整理出来，专门给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陈云在信中把这次了解到群众的几点意见概括为 4 点，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随信附了这次青浦农村调查的 3 个专题调查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通过这次深入调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引起了陈云新的思考：为什么直到 1962 年 3 月调整时期快结束的时候，产量虽有回升，但还未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1958 年我国粮食产量已达到 4000 亿斤，人均 606 斤。1960 年下跌到 2870 亿斤，到 1962 年才恢复到 3200 亿斤，人均只有 475 斤，要怎么才能迅速走出低谷呢？青浦调查后，陈云日益焦虑不安，不断探索出路。

## 一曲“隆中对”，赢得满堂彩。陈云西楼会议 会议一席发言，使经济调整进入正轨

“大跃进”后经济工作面临的困难局面，财经部门虽然有最直接的感受，但囿于认识上的局限，不能跳出“跃进”的框子，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分析形势，只知道形势很困难，心里着急，又找不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工作十分被动。

1961年8月9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听取计划会议汇报时，对财经部门贯彻调整方针不力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说：“去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八字方针，究竟怎样贯彻，一年多了还没有具体化，各部、各地区和计委都没有具体地安排。”

1961年8月，中共中央再次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李富春讲话说，“八字方针”提出以后，想调整，但总想在重工业生产已达到的水平上调整，结果延误了时间。现在认识到，整个工业不后退，不退够，不松动一个时期，就不能调整。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赞成这个意见，认为只有退够，调整好比例关系，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9月5日，邓小平在会上明确他说，“大跃进”跃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过了头的要退下来，退到这次调整的目标为止。退要退够，调整要抓重点，工业集中力量加强煤炭，农业主要是粮棉。要宣传提倡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3年初见效，7年大见效。

毛泽东在会上也说，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但是对形势的估计上，他认为，当时已经退到山谷了，形势是一天天向上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退够了再前进的决定，然而为时已晚。这一年，最初的计划指标仍然很高，调整后的指标也不低，始终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结果，计划执行情况相当差，绝大部分指标不但距原计划相差很多，连调整后的计划也没有完成，甚至比上年还低。更为严重的是，城乡居民的粮食、食油、猪肉、棉布等的供应量比上年续减，更加剧了吃穿用的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000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

这次会议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认识上前进了一步，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调整。毛泽东在会上也强调要发扬民主集中制，对前几年的工作失误承担了责任，使党内政治生活面貌有了改观，初步使大家解放了思想，敢于直言，为调整方针的落实贯彻，为国民经济走出严重困境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好几次请陈云在大会上发言，陈云说在作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话，谢绝了。

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还曾说，做经济工作，他不如陈云。第一次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中还有这些话，后来修改稿几经改动，愈改愈少，改到最后这段话就全被删掉了。但是这句话毕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陈云受到了很大鼓舞。会后，毛泽东又提出，要开几天出气会，让大家把意见都说出来。

2月8日，陈云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发言，明确地说，这几年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

陈云对这次大会取得的思想认识上和党内生活上的进步评价非常高。他说，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陈云系统提出了正确认识问题的方法，全面、比较、反复。全面，就是要实事求是，弄清楚实际情况，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决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比较，就是把各种方案多方比较，同现行的办法比较，同过去的方法比较，同外国的比较，等等。反复，就是比较了多种方案后，不要匆忙决定，最好过一段时间再看看。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了解，陈云对形势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进一步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

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财政部门向中央反映，发现当年财政有二三十亿元的赤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少奇决定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这个会是在中南海西楼开的，由刘少奇主持。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猛烈攻击的西楼会议。在会上，陈云把一段时间对于形势的观察和如何走出困境的思考，作了详细的阐述。

在对形势的估计上，陈云首先对庐山会议关于形势已到谷底的认识，大胆提出了公开的质疑，明确指出了当时经济形势面临的几点困难。

当时面临的最大口难是农业减产，粮食不够吃。陈云对这个问题最重视。他说，我们都是于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样关系全国6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

那时有的人为了维护“大跃进”的面子，闭眼不看现实，还在强撑着说，有的乡村，农民吃得好，鸡鸭成群，等等。陈云毫不客气地批驳说，有这样的乡村，但这是极少数。全国大多数地区并不是如此，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在农业恢复的快慢问题上，也有不同的估计。陈云明确地讲，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水利、机械，以及今后几年中工业支援农业的可能性等等，好的条件同不好的条件相抵，恐怕很难说目前的情况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情况好。

陈云作比较说，现在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水利和机械这两个条件要好一些，灌溉面积扩大了，防洪能力加强了，排灌机械多了，拖拉机和和其他农业机械也多了。同时，工业基础大了，可能支援农业的力量也比过去增加了。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这几个条件，现在都比过去差。拿土地来说，最近4年，水利、工业、交通的基本建设占用的耕地大约有2亿亩，菜地扩大了5000万亩，而新开荒地只有1.5亿亩，增减相抵，粮食和其他作物的用地减少了1亿亩。全国的耕地一共16亿多亩，减少了1亿亩，是一件大事。而且，这几年减少的耕地，大多是产量高的好地；增加的耕地，大多是在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一般的产量比较低。耕畜和猪现在比过去少了，有一部分种子退化了，有些地方的茬口搞乱了。

根据这样的比较，陈云认为农业恢复不会很快。他讲，一五时期，5年合计共增产612亿斤，平均每年增产122亿斤。如果公布的1957年的粮食产量有“水分”，那末，每年平均增产的数字还没有这样多。按通常情况说，恢复时期的速度可能会快一点，但是，也要看条件怎样。总的看，好坏两种条件相抵，现在的条件可能不如过去。这是稳当的说法。至于农业恢复的速度能够多快，目前还不能肯定，需要再看一两年。那时候，实践将会证明能不能快一点。

陈云指出，经济形势面临的第二个大困难是，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大跃进”那几年建设规模是合适的，就是因为有灾荒才发生了问题。也有人说，是农业扯了腿，不然就正好。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工业吃了农业的亏，工业本身没有问题。

陈云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农业负担下了，工业也负担不了。不仅在农业遇到灾荒的时候负担不了，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

他说，工业建设的大发展，是建立在1958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7000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当时以为粮食过了关，可以大办工业，所以大量招收职工。这几年增加了那么多职工，绝大部分是1958年下半年招收的。从过去的经验看，今后几年即使恢复到年产3700亿斤粮食，同现有的建设规模还是不相适应的。

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建设规模大增，除了1958年误认为粮食过了关以外，又是根据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吨的设想来布置的。实际中工业的情况是，工人增加得大多了，产量却增加得不多。工业产品，不论从数量、质量、品种、规格来看，都不能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因此，基本建设项目就不得不一批一批下马，工厂半成品就不能不大量积压。

陈云指出的第三个严重困难是，钞票发得大多，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也是非常刺耳的。但陈云从实际出发，认为事实就是这样。他说，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问，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陈云分析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对通货膨胀的趋势，陈云认为，照现在的情况看，在采取有力措施以前，恐怕还不能停止。我们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否则，将不利于工农业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

陈云指出的第四点困难是，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千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

对这一点，那时在高级干部中也有不同的看法。

陈云说，目前的情况是，农民自己经营的副业产品，集体和个人生产的3类物资，都大幅度地涨价。在过去一年多中间，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相当于正常价格10亿元左右的物资，换去了30亿元左右的钞票。现在不少农

民手里的钞票相当多，城市钞票向农村转移的趋势还没有停止，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原因是国家没有充分的商品来满足城市的需要。我们要公社和农民发展农副业生产，不让卖不行，过多地派购也不行，而城市人民又要吃，价钱虽高，你不买，有人买。过去每年供应给城市的猪肉 30 多亿斤，现在还不到 10 亿斤。

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对于这种情况，陈云说，要把两种人区别开来。一种是农民，他们把自己生产的猪肉、鸡蛋等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卖，多得了一些钱；另一种是投机分子，他们一手买进，一手卖出，一转手就捞很多钱。从人数说，前一种人占多数，但后一种投机分子确实也不少。一辆自行车要 650 元钱，还有人抢着买。

对市场投机分子，陈云是深恶痛绝的。建国初期市场动荡，造成普通百姓心理恐慌，和投机分子兴风作浪有很大关系。陈云要求，对于投机分子，必须采取有效办法来对付。

对于农民持有大量钞票的情况，陈云则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他说，大批钞票流向农村，国家没有足够的工业品来回笼这些钞票。集体生产者向国家出售了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也得不到等价的工业品。农民卖出 100 元的农副产品，国家能够供给他们的商品只有 60 多元，加上理发、看电影等，也只有七八十元，还差二三十元。没有相当的工业品供应农村，没有等价交换，单靠政治动员，是难以持久的。在相当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对促进生产是有利的。但是，农民高价出售农副产品所得到的钞票，如果不想办法换回来，农民手里的钞票越来越多，就有农民不愿意继续向国家出卖农副产品的危险。

陈云指出的第五点困难是，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这是已经彻底表面化的现象，无可掩饰。

这五点困难，陈云认为其中一、二点是基本的，其它三点都是从前两点派生出来的。

陈云把当时面临的困难讲得这么透彻、这么严重，是为了从中找出经验教训，从而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但这样做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从批评反冒进、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大家讲困难都要先把光明面多讲一点，要套用 1 个指头和 9 个指头的形势估计程式，以免被看作是“右倾”、是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想泄气。事实上，当年 8 月的北戴河政治局会议，确实就把陈云实事求是估计形势说成了“黑暗风”，予以严厉的批判。

但陈云并未因此而退缩。他说，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对这些问题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这几年处在大变动中，大家对形势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大家的认识，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地一致起来。把各种不同的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有利于使认识趋于统一。高级干部的看法统一，非常重要。经过讨论，如果还有不一致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再看一看，保留不同意见是容许的。

陈云严肃他说，“逢人只说三分话”，说话有顾虑的情况还是存在的。见面打“官腔”，不互相交心，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革命是会失败的。我们干革命的，应该讲真话，有问题就提出，有意见就发表，认真地进行讨论。

在指出当时面临的严重困难以后，陈云也分析了克服困难的几个有利条件。

第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实践中已经逐步地丰富起来。

当时中央已经制定了实现总路线的一些具体政策。改进农村工作的“十二条”、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贯彻执行后，农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农村人民公社已经进一步巩固。中央关于调整工业的指示、工业企业“七十条”也已经开始实行并收到效果。七千人大会以后，全党县级以上主要干部的思想认识大力提高，各项工作将会有显著的进步。

第二，粮食、家禽、猪的产量在回升，这是肯定无疑的。回升的速度，还要观察一下。至于经济作物的产量是否能很快恢复以至有所发展，现在还难于肯定，因为粮食不够吃，农民还不愿意多种经济作物。

第三，克服困难的力量，比以前大了。此前几年扩大了工业、交通的生产能力，其中许多部分，将会在经济恢复中起作用。

第四，只要把存在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讲清楚，人民在克服困难，恢复经济中，是会同党合作的。当然，不是说一点小乱子都不会出。但是总的来说，人民是会同我们党一道去战胜困难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几十年的历史，建国后十几年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人民是看得清楚的。在某些问题上，人民可能有意见，但是，同旧社会比，他们还是觉得中国共产党好。党所做的好事，包括革命的胜利、建设的成就，同所犯的错误造成的损失比较起来，当然是好事多。对于这一点，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评价。当前的困难，一般说是好人好心做了错事所造成的。人是好人，心是好心，就是做错了事，讲清楚了，改正了错误，把工作做好了，能够得到人民的原谅。

第五，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一点很重要。干部取得经验，有利于克服困难，恢复经济，对今后工作很有好处。

讲清楚困难，指明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后，陈云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把十年规划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

陈云指出，无论农业或者工业，都需要一个恢复时期。农业的恢复大约要3年到5年。工业在这三五年内，也只能放慢速度，只能是调整和恢复。当然，恢复阶段的某些方面也可能有若干发展。但是，就全体来说，十年规划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恢复。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克服困难，恢复农业，恢复工业，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恢复是为了发展。有了前一阶段的恢复，才有后一阶段的发展。

把十年规划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并且确定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对妥善部署财经各部门的工作很有好处。如果不是这样，笼统地要大家执行十年规划，又想发展，又想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而分成两个阶段，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

恢复阶段的时间，陈云考虑，从1960年算起，大体上要5年。

对恢复阶段的困难情况，刘少奇说类似非常时期。陈云也同意这个说法，并且说，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另一条是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集中统一，就是在给地方必需的机动财



力、物力以后，把力量集中统一起来。集中统一的程度，可能要超过建国初期，因为现在的情况更复杂。

陈云提出把十年规划分两个阶段的说法，虽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但他提出恢复需要5年时间的意见，有人认为太悲观了，后来又被说成是“右倾保守”，泄了气，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最后实际却表明，陈云的估计惊人地准确。

陈云提出的第二个办法是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

陈云指出，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无论从临时之计看，还是从长久之计看，都必须如此。

精减职工的工作，当时已经在进行。但面临的困难是相当大的。招人容易，要他们走就很困难。要精减的职工，不单是来自农村的人，还有一部分城市的人。减下来后都要做适当的安排。如纺织工人，大多数是城里人，那时很多纺织厂不能开工，也只能多做思想工作，把道理向工人说清楚。

陈云主张，无论精减工作怎么困难，都要坚决进行下去。他说，如果现在不减，财政继续亏空，市场发生动乱，就会使我们更加被动。现在减有困难，将来减更加困难，两个困难比较起来，还是早减为好。

他还说，家在农村的人，动员他们回乡有困难。但是总比从农村征购粮食拿到城市里来供给他们要容易得多。1961年压缩城市人口1000多万，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城市，一年要吃40亿斤粮食。现在向农民多征购40亿斤粮食是不可能的。就是多征购10来亿斤，甚至几亿斤，也是困难的。让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在家里匀着吃，比较好办。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陈云提出的第三个办法是，采取一切措施制止通货膨胀。

建国之初，陈云已经领导进行过一次抑制通货膨胀的行动。但是鉴于这次通货膨胀与那次通货膨胀相比，产生的原因、性质、经济条件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点，他制定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这一次他制定的方法是：

一、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银行要把钞票管理好，能下用的钱一定不用。

这个措施，在建国初期也曾采取过。但陈云这次重新提出，还加了一条，就是在恢复银行严格管理现金的制度时，执行的严格的程度要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二、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

造成这次通货膨胀，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跃进”后钢铁冒进突击，破坏了国民经济两大部类的合理比例关系。陈云一贯主张，要先市场后生产，这次他提出，要从重工业方面转移一部分原材料，增产日用品，回笼货币。

陈云说，人民有了钱，总要使他们能够买到东西，才能心情舒畅。没有这一条，只搞高价商品，老百姓是要骂娘的。

三、增加几种高价商品。

搞高价商品，当时已经在进行。

“大跃进”后市场紧张，一个结果是票证经济大流行，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供应，引起群众不满。江苏有一个资本家讲：“现在人民币不挂帅了。”上海一个医生对党委书记说：“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400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

为了缓和人心，一些地方开始出售高价商品。1960年8月8日，中共中

央批准北京市委关于饮食业实行凭证供应的意见，同意保留少数高级饭馆可以下凭票，实行高价销售。这一办法逐渐在一些大中城市推广。后来又增加了高价糕点、高价糖果。

1961年1月19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对出售高价糕点、高价糖果十分支持，并鼓励商业部门放手卖。

陈云认为，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他曾经了解过，英国伦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实行严格的粮食配给，但饭馆还是开的，一个人只能吃一份，不要粮票。

陈云总结了这样做的三大好处，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他赞扬说，用这个办法口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一个大主意。

出售高级糕点前，有关部门曾经送了几十种样品给陈云等人看，做的还是比较可以的。但是后来陈云让自己的孩子在中南海排队买了1斤，拿回家一看，就觉得做得很不像样。北京的高级糕点开市的前一天晚上，姚依林到零售店去看样品，发现质量也不好，陈云对做假样品给他们看很有意见，指出高价点心要贵得像个样子。当时高级点心质量不好，是因为把做糕点的老师傅搞到乡下去了，陈云就指示要把这些人我回来重操旧业。

陈云提出，要充分利用进口的糖和麦子，先用来制作高级糖果和糕点。他说，从古巴进口的糖，平均分配每个人只能摊到很少一点，我们中国有7万万张嘴巴，稍微张一张就差不多了。

他还要商业部门不怕抢购高价商品，说，你越怕鬼，鬼越厉害。可以放大胆子，敞开来卖高价糕点、高价糖果，让人民币“挂帅”，挂得越多越好，把钞票都挂过来。

他算了一笔帐：资本家一年定息最多1亿元，让他们把所有定息都拿出来买糖果，也才买掉1万吨，却能回笼1亿元货币；高级知识分子最多20万人，每人买100斤也才不过1万吨；5000万职工，只有那么多工资，要养家活口，要吃饭，是不能多买的，平均每人买1斤，就是了不得的事情，也只有2万多吨。国家手里，已到货的糖就有十几万吨，在路上还有二十几万吨，第2季度靠得住的还有30万吨，根本用不着怕抢购。

他还举例说，天津卖高价糖果，第一天卖了7万斤，第二天卖8万斤，第二天就只卖了8000斤。开始买得多些，这是人们心理作用。敞开来卖之后，情况就会改变，卖数会降下来。

陈云当时已经考虑要增加一些高价商品，说有了猪肉可以在饭馆里搞些炒肉片、炒肉丝卖高价。但由于生猪饲养一直没能恢复元气，这个打算最后落空了。

由于过去高价商品品种大少，回笼货币数量有限。陈云在西楼会议上就提出，要增加一些高价商品。

他说，高价商品不要星星点点地搞，这也高价，那也高价，所得不多，弄得名誉不好。应该是不搞则已，一搞就要能收回一大批钞票。我们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首先是为了把在自由市场上商人出售商品的人的钞票收回来，同时也利用它来平衡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

陈云说，去年搞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城市；这次搞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农村。哪里钞票多，就在哪里投放高价商品，这个办法要先试点，看一看，听一听反映，步子稳一点，看准了以后再推卖高价商品，实际上是货币贬值，

群众会有些不满意。陈云对此有所准备，他说，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多余的货币不能回笼，到处冲击市场，更不好办。

#### 四、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建国初平抑物价时，国家掌握的物资有限，私人资本势力还很强大，陈云亲自部署了对付市场投机的行动，主要是结合运用税收、信贷杠杆，利用国家掌握的物资，等物价涨到一定程度时统一抛售，使投机资本因消化不了市场物资而败下阵来。

60年代，国家主要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国家手中，可以运用的手段也多得多了。陈云据此提出了这种斗争三方面的对策。

首先是经济斗争。你按牌价卖给我鸡蛋，我也按牌价卖给你糖果；如果你卖高价鸡蛋，我就卖高价糖果，你多赚了钱，我就想办法拿回来。这就是说，不仅要有低价对低价，而且要有高价对高价，否则办法不完全。

其次是业务经营。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在城市建立消费社，互相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和一部分工业品。供销社经营这些东西，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如果不要他们经营，搞投机倒把的人会经营，人民的损失更多。让供销社、消费社得利，比让投机倒把的人得利好得多。

再次是行政管理。要通过市场管理、税收、运价等办法把自由市场管起来，这些工作，都要反复考虑，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铺开。

当然通货膨胀同国家宏观管理有很大关系。陈云提出，1962年和1963年，必须千方百计做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不能今年不动手，等到明年再去制止。

陈云提出克服困难的第四点办法是，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由于当时粮食定量已经低得可怜，浮肿病蔓延得很厉害，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陈云对此极为忧心。他想出三个当时能够逐步采取的办法。

一是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夏天和蔬菜多的地区可以少一点。

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保证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点职工的实际工资。有了豆子吃，或者换豆腐吃，就可以少买或自由市场上的高价副食品。据计算，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的蛋白质，1斤粮食含蛋白质45克左右，1斤蔬菜含5克，1两大豆含20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陈云经过计算，认为这是可能做到的。他说，1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30亿斤大豆。我国每年大豆的产量，在1958年以前是190亿斤左右，1961年是120亿斤，拿出30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力求在两年内逐步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口中实行。

二是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尤袜子。

当时国家因棉纱不足，保证供应已经很吃力了，而群众买了袜子，穿不到1周，脚指脚跟就露出来了。年青人穿得又特别费，补了破，破了再补，当时1个人1年只发几尺布票，补袜子就用去一部分。这件事困扰着千百万妇女和战士的心，陈云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他说，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补袜子是一件伤脑筋的事。

当时国外已开始兴起穿尼龙袜子，比棉线袜子抗磨耐穿，陈云要外贸部、纺织部研究解决原料问题，决定进口。

陈云在西楼会议的发言中说，如果每年用400万美元进口1000吨尼龙，就可以织4000万双袜子，产量可以加倍。=双尼龙袜子可以卖几块钱，买的人欢喜，国家1年可以回笼几亿元的货币，这是公私两利的事情。

三是把全国各地价值约4000万到5000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馆子，价钱卖贵一点。招待所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卖高价。这样，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

陈云力克服国民经济困难提出的第五个办法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

陈云指出，这一条是根本大计。从国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事情：

一是除增产粮食以外，要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

1961年4月3日，中央决定对种植棉花、烤烟等重要经济作物的农民奖励一些粮食，但标准不高，不足以解决口粮问题。

陈云认为，当时对经济作物的奖励办法是“二百二”红药水，有点用处，但是不能解决多大问题。经济作物不恢复，国家就没有商品来保证乡村的供应，国家同农民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等价交换，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国家用一块钱收购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就可以卖4块钱。如果用来生产针织品，回笼的钞票就更多。但是，要鼓励农民种棉花，就必须保证棉农有足够的口粮。这个办法，农民吃不饱，他们只好把棉田改种粮食。这样下去，棉花不但不能很快增产，而且还可能继续减少。

陈云提出，如果棉农交售1斤皮棉，供应2斤粮食，那末，农民就会积极种棉花。按照这个办法，每年收购2500万担棉花，就要用50亿斤粮食。其他经济作物的情况也是这样，要增产就要供应足够的口粮。

为了保证这个办法的实施，陈云主张在以往进口粮食补充口粮的基础上，为了保经济作物，还要多进口一些粮食。陈云也曾经考虑过，是进口棉花合算，还是进口粮食合算？研究的结果，进口棉花不仅货源不够，而且不如进口粮食合算。进口1吨棉花要用700美元，进口1吨粮食只要70美元。这就是说，进口1吨棉花所用外汇可以进口10吨粮食，而用10吨粮食就可以鼓励农民多产5吨棉花。

二是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

陈云说，我国商品粮的主要产区，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关中平原，长江三角洲、江汉平原、洞庭湖周围、成都盆地、珠江三角洲等等。这些地区，都各有不同的特点，应该找出适应这些地区各自不同的特点的有效的增产办法。

陈云提出，对商品粮的主要产区，应该多供应化肥。他说，据计算，进口化肥比进口粮食合算。只要外汇有可能，就要多进口一点化肥。

三是拨出一部分钢材、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陈云指出，目前工业支援农业的重点，不是拖拉机，而是中小农具。要切实计算化肥和农业机械可能供应的程度，要确实能够办，不要做不切实际的计划。

陈云为克服经济困难想出的第六个办法是，把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

计划里得到体现。

陈云说，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 750 万吨钢，2.5 亿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在不妨碍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能搞到这么多钢和煤，当然很好；如果有所妨碍，搞不到这么多也可以。

要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只靠国务院的农林办公室和财贸办公室是不行的，主要要靠计委、经委等综合机关，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位置。陈云说，毛主席早就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现在，必须研究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怎样才能切实地体现这个精神。

陈云的这个讲话，把当时面临的主要困难、克服困难的条件和办法作了透彻的阐述，使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陈云的这个讲话，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表示完全赞成。刘少奇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他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1962 年 2 月 26 日，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季富春、率先念讲话之后，陈云发表了讲话，再次阐述了在西楼会议发表的意见。陈云讲完，全场完全自发地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当时大家听了以后，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么一讲，困难讲够了，心里踏实了，办法也确实可行。会后，各部委都纷纷要求传达。

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时，邓小平说，全部传达。怎么讲就怎么传达。刘少奇也同意用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国，而且还对怎么写转发批语提了一些意见。说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讲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困难估计够，工作才能主动。

通过中央转发讲话的指示以后，刘少奇说，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

第二天，刘、周、邓就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同意陈云讲话，起草了一个指示，会议上是通过了，还要请主席看一看。刘少奇还说，这个问题我也在会上讲了，如果主席同意，我们就发出去；如果主席不同意，我们重新开会讨论。

毛泽东看了陈云讲话和中央转发讲话的指示，表示同意发出。

1962 年 3 月 18 日，中共中央将陈云西楼会议讲话加了批语转发各省市区和各部门。

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全体会议后，中央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主张陈云当组长，陈云一再推辞，说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有意见时可以提，他也相信，财经小组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会上确定丰富春当组长，周恩来、陈云都是组员。

在讨论批转陈云讲话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刘少奇说，有人向他建议，恢复后的中央财经小组请陈云当组长，丰富春当副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丰富春马上说，陈云当组长最合适，他自己当助手。会议就这么定了。

这次会议陈云没有参加，知道后他还是谦让。刘少奇就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4月19日，中央作出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全国财经工作。

这样，从1960年开始提出的“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方针，经过1962年七千人大会统一认识，在“西楼会议”上才真正下了退够的决心，寸真正开始扎扎实实地全面调整，落到实处。

1962年3月7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陈云在会上讲话，对他在西楼会议上提出的办法，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陈云在西楼会议讲话中曾提出，十年规划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恢复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发展阶段。这次陈云进一步提出，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先搞五年计划。只有恢复好了，才谈得上发展。在恢复阶段，可以逐渐看清楚发展阶段的问题。现在谈发展，情况还摸不准。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在情况清楚以前，甚至连第3个五年计划指标也可以下忙搞。

陈云还主张对1962年计划也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4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再不能犹豫了。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

陈云说，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5亿多农民和1亿多城市人民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

对农业和市场面临的形势，陈云看得非常严重。他甚至说，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6亿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陈云提出，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今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

陈三设想了改善人民生活的两个具体办法。

当时城市的主副食品供应都不足，人民的体质下降。陈云设想，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捅一些鱼。如果1年增产15万吨鱼，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

周恩来当即表示赞成，他插话说：陈云同志以前提出的每人每天供应1两豆子的办法很好。但人光有植物蛋白不行，还要有动物蛋白。和尚尼姑，每天打坐，有植物蛋白也许就行了。我们这些人不行，劳动量比我们大的人更不行，有了植物蛋白，还需要有点动物蛋白。

陈云还设想，除了每人半斤鱼，到1963年年底，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每人每月可以增加半斤肉。他根据姚依林提供的情况说，今年计划收购1200万头猪，每头按60斤净肉计算，共有7亿多斤。猪要保证收购到，收购到以后，还要合理分配，如压缩一部分出口。这样，鱼、肉两项，5口之家一月就有5斤。

陈云说，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如果6000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

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周恩来在陈云讲话时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陈云也开始对“大跃进”的理论基础予以否定。他在这次会议上，公开对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提法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不同的。他提出，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東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

陈云指出，“大跃进”的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综合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

对“大跃进”的高指标和“以钢为纲”，陈云勇敢地提出，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长期计划的指标，更要注意留有余地，而且以后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

为了了解钢产量，陈云曾查了美、英、德、日、苏等国几十年来钢产量的统计数字，看出这些国家钢的年产量在1000万吨以下的时候，花的时间最长。美、英、德、日等国，钢产量在500万吨到1000万吨之间，就成了帝国主义国家。苏联也是在这样的生产水平上，成了工业强国。大体说来，这些国家钢产量在500万吨到1000万吨的时候，各种工业就比较齐全，把工业基础打下来了。日本在发动“六六事变”的时候，钢产量还不到700万吨，陈云指出，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

此外，陈云还就物资集中管理、研究农业基本情况、计委要管好农业和市场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这个讲话的记录，经陈云看过后，在小范围内印发了。讲话后，陈云就到上海、杭州休息去了。

这次会议后，刘少奇组织人把陈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13篇讲话和报告，都找到编出来了，大概有四五万字，还搞了一个1万多字的提要，准备印发有关部门学习和参考。

陈云对编辑他的言论曾经几次坚决表示不同意，尤其是不同意印发。刘少奇说，可以不广泛印发，只印发给财经小组成员和中央常委看看。

1962年4月，这个材料由刘少奇主持，选编成《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以及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刘少奇还专门写信给毛泽东，说他叫人选编了陈云文章印发给少数同志参考，送上一份，请有空时翻翻。这份材料，一直到八九月北戴河会议时，都摆在毛泽东桌子旁边，由此看出他对这件事情是很重视的。

这时陈云身体十分虚弱，医生要他长期休养。陈云赴华东休息后，领导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主要责任，就落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身上。陈云也尽力做一些工作。

1962年2月，刘少奇告诉陈云，毛泽东已经同意改组中央财经小组，授

权小组审查修改国家计委制订的 1962 年经济建设计划。中央财经小组根据陈云意见起草《关于调整 1962 年计划的报告》，建议对耗煤过多的小企业（主要是 10 万个小高炉）和大部分没有前途的地方建设项目实行“关、停、并、转”，并对关停的企业和建设项目要“拆架子、收摊子”，以便在 1961 年已经精减 1000 万城市职工的基础上，1962 年再减少 1000 万，回到农村加强农业生产战线，使大减产的农业有力量支持已精减的城市职工生活。

报告起草完毕并经周恩来审查修改后，周恩来叫薛暮桥把草案带到杭州去征求陈云的意见。这时陈云的身体仍很虚弱，每天只能谈 2 个小时，分 3 天报告完毕，他完全同意草案所提出的意见，要薛暮桥把他的意见转告总理。

陈云对生产尼龙袜一事十分关注，召开了专门会议，决定进口原料，开始时为节省外汇，生产袜尖、袜跟用尼龙，帮、底、筒还是用棉纱的加固袜子，后来逐步改成全尼龙的袜子。尼龙生产力广大群众的生活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经济调整，要“伤筋动骨”，一些项目必须下马。当时我国正在研制人造卫星。在连吃饭都困难的情况下，对人造卫星的专款是否照拨，是否暂缓研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负责这个项目的张劲夫根据当时苏联撤退专家、我们面临的发愤图强的形势需要，以及由于这一尖端科研任务可以带动一大批学科的需要，反映了许多科学家的意见，希望党中央继续支持这一任务，不要下马。他打电话给陈云反映情况，陈云接了电话后，立即约他去面谈。听完张劲夫的意见，他思考了片刻，表示同意，并告知了丰富春。这样，在国家经济严重困难情况下，这一重要尖端任务只是把进度放慢了一些，实际工作未受到影响，得以继续奋战攻关，以后终于完成了上天任务。

陈云建议出售高价糖果、点心，开高价饭馆，后来又出售部分高档的高价商品作为补充，并借此回笼货币，稳定物价，此后三四年间靠出售高价商品共计多回笼货币 50 亿元，相当于 1961 年货币发行总额 125 亿元的 40%，为物价稳定创造了条件。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从 1960 年后的 5 年内，进行了全面的经济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 1964 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 不顾个人安危得失，毅然向毛泽东提出分田到户办法，却再次遭到严厉批评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问题极端尖锐。陈云一直在探索恢复农业的办法，并先后提出发展化肥工业、进口粮食缓解供应等等建议。他领导的中央粮价问题小组还曾向中央提出《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问题的报告》，决定从1961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5%，196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农村工作“十二条”、“六十条”等政策，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纠正“大跃进”后的胡作非为。但是，粮食生产仍然徘徊，粮食问题始终尖锐异常，陈云心里十分着急。

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以后，陈云提出全党都要研究农业问题，他首先就带头研究思考这个问题。

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在杭州、上海休养时，经常考虑如何解救缺粮的农民，如何加快恢复粮食生产。他对当时一些地方的包产到户做法非常感兴趣。

包产到户，是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以后，一些地方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病，实行的一种联系产量、责任分解到农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

从合作化以后，浙江、江苏、河南一些地方就开始试行包产到户，对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了很明显的作。不料庐山会议一反“右倾”，也顺带把这个包产到户挂到“右倾”的帐上，一块反掉了，支持这一办法的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处理。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问题严重，各地纷纷寻找出路。显然，“大跃进”口号喊得再响，也变不成粮食，而“右倾机会主义”的包产到户，适应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觉悟水平，能够多产粮食，这才是实在的。于是好多地方变着法儿实行了多种形式、多种名目的包产到户。

安徽是“大跃进”比较积极的省份，后来农村困难形势也表现得极为突出。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安徽的主要领导能够认真反思，对农民自发采取的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包产到户做法，加以肯定，适当引导。

1960年初，安徽宿县一个农民向公社要求带着生病的儿子上山开荒种地和休养。父子俩开荒16亩，收获3300斤，扣除自用，上交粮食1800斤、现金60元。他汇报了自己的经验并向有关领导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去种。省委了解到这个建议，震动很大，省委书记曾希圣亲自向华东局负责人柯庆施汇报，柯庆施只说，这个办法可以试验，不要推广。1961年2月，柯庆施路过安徽全椒县古河镇，几个老农向他当面提出要求实行“责任田”，并问，“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安徽省委派一个工作组搞的联产到户试点，也受到农民的欢迎。3月6日，安徽省委讨论了试点情况后，请示了毛泽东，决定全面试行“责任田”的办法。

1961年3月15、16日，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表态时也只是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使曾希圣如释重负，他兴奋地打电话告诉安徽省委：“已经通天了，可以搞。”

但是，在戴着“左”眼镜的人看来，这种做法是与集体化方向背道而驰的。他们看到的不是因此而增产了多少，而是看“公”的程度、“大”的程度。遗憾的是，当时党内“左”倾思潮市场很大。

另一些人仅仅从一些片面现象出发，也对包产到户持怀疑、否定态度，认为这是搞“单干”，是与集体化道路相违背的，会引起农村两极分化，对农民特别是孤寡老弱不利。这种观点，田家英可以算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

会议期间，他将安徽的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他看到材料里讲到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生产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含着眼泪写了那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她们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带我们的话，要求给一条牛，一张犁，8个寡妇互助，爬也要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时候，又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支援的方向”。

田家英在这封信里所表达的主张和流露出来的情感，同毛泽东是一致的和相通的，毛泽东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的信批给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传阅。

中南局书记陶铸见到田家英说：“家英呀，我赞成你的意见。”

陈云则对田家英的意见不以为然，说：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陈云主张不要急于表态，先派人去调查再说。

在会上，田家英的观点代表了会议的主要看法，曾希圣感到很大的压力，不得不于3月20日打电话回去，通知暂停推行，同时给毛泽东等人写信，解释“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不是1959年受到过批判的“包产到户”，争取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没有表态。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具体了解包产到户办法对粮食生产的作用，陈云让粮食部派一位副部长去安徽调查。当时粮食部是派周康民去的。调查结果，认为他们有五个统一，即统一安排粮食生产计划，统一大农活，统一管水用水，统一打场，统一分配（包产数字以内的），不是单干，是克服困难的办法。这份调查报告，以“简讯”形式上报中央。

由于农民和基层干部已经在实践中尝到了包产到户办法的好处，此时想刹车也不行了，包产到户办法迅速推广开来，安徽省委也一再向中央解释，极力辨明他们的办法与1959年包产到户的区别。1961年7月，曾希圣在毛泽东来安徽蚌埠时当面汇报，毛泽东勉强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随后，安徽包产到户办法在全省推广。湖南、河南、浙江、陕西、甘肃、贵州等地也先后搞了名目各异、形式多样的生产责任制。

但是，由于毛泽东坚持认为包产到户是违背集体化路线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最后政策界限，不能再退，因而决定了包产到户的命运。

1961年12月，毛泽东在无锡把曾希圣找去，用商量的口气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办法变过来。

曾希圣没有附和，对毛泽东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显然他并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想法。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终于因安徽“大跃进”中刮“五风”严重受到批判，又说他主张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被撤了职。公正他说，安徽“大跃进”中刮“五风”，

是与当时大气候分不开的，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撤销他的职务，与他坚持“责任田”有很大关系。

果然，新省委上任就动手解决“责任田”问题，作出决议，要求在1962年内大部分改过来，1963年收尾。

但是，“责任田”已经让人民实际体会到了优越性，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的需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群众不愿意改变。

1962年8月，安徽大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直接给毛泽东写信，保荐责任田办法时，曾举了这么一个生动的事例：1961年冬，他下乡到大湖县徐桥时了解到，徐桥嫁到邻县宿松的姑娘三天两头跑回娘家。当地农民反映说，徐桥搞了责任田，生产上去了，农民生活好了；而宿松没有实行责任田办法，生产上不去，农民生活很苦。这些徐桥外嫁姑娘回娘家，竟是为了多吃几顿饱饭，回去还要带些粮食走。做母亲的直叹息：“唉，你们宿松下实行责任田，真急人。”

1961年10月安徽省对36个县的典型调查，实行责任田的36个队粮食平均亩产比上年增长38.9%，另外36个条件大致相同但未实行责任田的队，平均亩产只比上年增长12%，责任田对粮食增产的效果极为显著。

能增产的办法，上面说是资本主义，不让搞；不利生产的办法，上面说是社会主义，压着搞。农民当然想不通，许多干部也想不通，纷纷要求维护责任田办法。在休养中，陈云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后，非常重视，认为与他在农村所见、所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一个路子。他指出，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肯定了这类做法，叫做“分田到户”也好，叫做“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实行《国际歌》歌词中的号召“全靠我们自己”，要依靠广大农民，尽快恢复生产。

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形势一直十分严峻，这就使原先对包产到户持怀疑甚至反对意见的人，也开始在实践中重新思考。

1962年2月25日，毛泽东把田家英叫去，要田再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韶山等地作调查，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3月底，他们一进村，却遇到一个没有料到的情况：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尤以韶山、大坪为甚。对这一情况，田家英没有精神准备，大家也都没有精神准备。农民列举事实，讲了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同时历数公社化以来集体经济的缺点和困难，有时同调查组的人辩论到深夜。田家英认真听取和思考农民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调查组内也有人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日便组织全体同志进行讨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双方争论非常热烈。当时不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占着上风，但是他仍鼓励少数几位主张包产到户的同志继续进行研究。田家英心里很矛盾，他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明显地对恢复生产有利。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事关重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轻举妄动。他私下多次说，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为了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这种家庭经济还是有它的优越性，集体经济现在“难以维持”，已经萌生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度过难关的思想。但在公开场合，在农民和干部面前，对包产到户的要求他丝毫不松口。

田家英就是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的。当时，陈云也在上海。田家英将三个点的调查报告同时送给他们两人。得到的反应迥然

不同。

陈云读后很称赞，说“观点鲜明”，他也打算向毛泽东进言。在这之前，田家英已经把在刘少奇老家炭于冲大队的调查报告寄给了刘少奇，刘少奇认真地看了，认为很好。

毛泽东却很冷漠，大概没有看，只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汇报，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的又一次明确表态。

显然，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和一套政策，虽同意调整，进行局部改变，但并未放弃，如提出“包产到户”等方案，预料他是难以接受的，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再对他提出这类意见，政治风险也是很大的。对于这个大问题，是提出来，还是不提，实在是一个大难题。

陈云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决定尽快回京同中央常委商量，向毛泽东直接陈述。有一些人曾经劝他再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但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6月24日，陈云从上海回到北京，立即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几位中央常委交换了意见，看法基本一致。

6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后，也立即向刘少奇、邓小平等讲了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7月6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同时，田家英也下决心，冒险以秘书身份向毛泽东进言。那时毛泽东正在河北邯郸视察，他打长途电话要求面陈意见，那边传来电话说：“主席说不要着急嘛！”这句话明显有些不耐烦的情绪。

7月9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陈述说，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由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另外60%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最后，毛突然向田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力主？一下子把他问住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他毫无准备。

毛泽东接着又问，“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没有说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商谈过，只说：“是我个人的意见。”当时，毛没有表示意见。没有表态，这就是一种态度，不过没有说出来而已。

当天夜里，毛泽东约陈云谈了1个多小时。陈云向毛泽东提出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这个办法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他主要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现在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同样没有明确表示意见。

到了第二天早上就传出，毛泽东认为陈云、田家英的建议是错误的，很

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

这个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他听到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他向身边工作人员表示，这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说是“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但是，他顾全大局，对批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未作辩解。

毛泽东还召集会议，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会上，毛泽东撇开田家英，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决定。

过了两天，中央通知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8月上旬，北戴河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讲话，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批评包产到户，成了会议的主要内容，它是“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提到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政治高度。

毛泽东认为，实行包产到户，不要一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的厉害，还描绘了一幅阶级分化的景象：“一方面是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一方面是破产，其中有四属（军、工、烈、干属）户、五保户。”

陈云到了北戴河，因为腹泻，写信绪邓小平并转毛泽东，说明因身体状况不好，向中央请假，并表示，“7月24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经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个决定。”陈云请假的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在半个月的会议中，集中批评了“反对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和“单干”的思想，但会上始终未点陈云的名。会后，毛泽东表示，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因此在会上没有点名批判。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未经党中央同意，在中央党校等处多次宣传包产到户，因而受到严厉批判。

从此，再没有人敢提“包产到户”等问题。

毛泽东虽然对陈云支持包产到户，对严重形势作实事求是估计不满意，但对陈云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才能并没有一棍打死。

1963年春天，毛泽东提到一个高级干部和陈云关于是否提三大平衡的争论，说事实证明陈云意见正确。后来中央常委为学习雷锋题词，其他几个常委都题了，陈云是最后题的，在报上发表了。毛泽东说，陈云补了一个题词，很好，如果陈云身体好，很希望他能参加今年国庆节的活动。到1964年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业建设方针时，毛泽东说，他对陈云很怀念，在大跃进时，大家头脑发热，陈云在压低指标上提过多次意见。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这个教训永远也不能够忘记，永远也不能够再干了。

但是，从北戴河会议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以后，陈云的政治处境日益困难。“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几乎已成定论，使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以后。

## “文革”后期复出，协助 周恩来抓外贸

“文革”后期，1973年到1974年，陈云曾出来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期间，周恩来让陈云协助抓外贸。当时，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曾使国内出现了短暂的相对宽松的环境。这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中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也进一步好转，从而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陈云针对我国外贸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见解和对策，为我国的外贸领域注入了勃勃生机。尽管好景不长，不久，由于“四人帮”的阻挠，陈云在外贸领域的工作被迫停止，但陈云这一时期的一些探索，对当时我国的外贸工作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也为后来的对外开放积累了经验。

## 在江四“蹲点”两年七个月后，回到北京

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陈云就因为在包产到户、反对冒进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左，靠边站了。但是，“文化大革命”中，陈云还是和其他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受到了冲击。1969年10月，林彪以所谓战备为名，将一大批老干部赶出了北京。陈云也在其列。当时，他被限令在3日内离开北京，到江西“蹲点”。

这次“蹲点”与以前的蹲点调查已完全不一样了。以前蹲点是为了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这次则是“接受劳动改造”了。因此，此时的陈云处境是相当困难的。这从当时地方领导对他的态度也可以看得出来。陈云到江西不久，就受到了当时江西省委的负责人程世清的批评。

10月20日，陈云与王震同车到达南昌，还未住下，程世清即来“看”他。程世清对他说：你以前管经济工作，没有管好，发展太慢了。他还说：现在江西一个省就准备年产汽车六七万辆。国家每年进口的100亿斤粮食，江西也可以全包下来（也就是说，国家每年不再进口粮食，由江西每年向国家上缴100亿斤粮食）。如果是以前，对于这种不知干高地厚的说法，陈云肯定要进行严厉的批评，但此时，他也只能保持沉默了。

此后不久，陈云被安排到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蹲点”。在这里，陈云渡过了两年六个月的时光。两年七个月，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已经64岁的陈三来说，就大宝贵了。60几岁，对一个国家高级领导人来说，正是经验最丰富，最富创造力的年代。把这样的年代在一个小厂中默默无闻渡过，的确是一种浪费。正因如此，历史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庆幸的是，这两年七个月的时光，陈云也没有白白浪费，利用这段时间，他除了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外，还重新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全集》，并对其中的经济理论部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对他复出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使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林彪过去曾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法定”的接班人，现在却成了最凶狠的敌人。毛泽东对此感慨颇多，正如他1972年7月会见法国外长时所说：这个林彪啊，他天天吹我，说我怎么了不起，而实际呢，就要杀我的头。跟他斗争了几十年，后头变成了“亲密战友”、“副统帅”。结果庐山会议到去年，一年多他就呆不住了，谁也没有赶他，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跑，坐一架飞机就上天了。

由对林彪的认识，毛泽东也开始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特别是用人问题。他开始怀念以前被排挤和打击的一些老干部。觉得也许他们是正确的。

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周恩来开始大胆地解放和起用一些老干部。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下放劳动的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信中批判了林彪并作了一些自我分析。8月14日，毛泽东阅后在写给周恩来的批语中说：“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8月15日周恩来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同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活动。

12月17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又表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第二天，周恩来即指示纪登奎、汪东兴负责办理谭震林回北京的事宜，并指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这样，被下放到外地的老干部中，谭震林首先回到了北京。这就为其他老干部回京打通了一条道路。

1973年开始，国内政治形势进一步好转。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4月12日，邓小平即公开出席了周恩来举行的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招待会。

在这种情况下，4月24日，陈云也经中央批准回到了北京。

周恩来对陈云的情况一直比较关心。他认为，陈云是经济工作中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1969年陈云离开北京还没到达江西的时候，他就给江西省委打电话，要求江西省委对下放到江西的陈云等老干部加以照顾。说：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干不了重体力活，要让他们多搞一些调查，多到底下走走。并特地指出：陈云身体下好，住的房子一定要有暖气。

陈云回到北京不久，周恩来即让他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并决定由陈云协助他抓外贸。



## 离用金子修厕所的时代还远，现在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随着世界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科技技术的迅速发展并转化为生产力，各国经济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全世界已找不到哪一个国家能够生产出自己所需的一切产品，也不可能有一个国家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的全部资源和所有的先进技术。因此，世界范围内的平等互利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成为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

其次，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但经过调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渡过了危机，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客观事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发展潜力，辽会长期存在下去，并且在一些方面占有优势。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将处于一种长期相对和平与竞赛的共存状态。

第三，发达国家（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直接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逐步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而发达国家则希望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从发展中国家攫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因此，双方的经济关系即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又有着一些共同的利益。相互利用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

此外，这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原来主要面向苏联和东欧转而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

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 and 了解，但6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起来的极“左”思潮却在人们的思想上形成了巨大的障碍。“左”的思想一方面认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很快要灭亡的，现在正在作“垂死的挣扎”，没有利用的必要；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又不敢接触资本主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对资本主义的了解非常少，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也常常处于被动的地位。

对此，陈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此，1973年他出来工作不久就首先提出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1973年5月5日，他在听取外贸部周化民等汇报外贸计划和价格方面的情况时即提醒他们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他说：“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外贸特别是对我进口贸易很有关系。”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因此，陈云首先提到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对于资本主义一般情况的研究陈云也特别重视，在这次谈话中，他还以价格为例，说明了研究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现在消息真快啊！美国的播种面积，各地的气候变化都会很快影响市场价格。”“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和过去上海交易所一样很敏感。我们进出口今年如按80亿美元算，在价格上如果差1%，一年就要差8000万美金，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6月7日，他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又一次明确指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现在离那个时候还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

应占的地位。”

当银行的干部汇报说，文化大革命前，银行有金融研究所，专门研究国际金融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研究所被撤梢了。陈云立即指出：“研究机构还是要搞起来。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他们。供求关系、货币关系的变化统统反映到外贸上来了，不搞研究机构怎么能行。”

为了解除一些人的顾虑，放宽研究的范围，他还指出：“机构搞起来以后，要研究包括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像康纳利、舒尔茨、德斯但的讲话材料都要看，都要研究。”8月4日，在外贸部价格小组会议上，陈云针对新闻单位不注意报道国外商情的情况也作了委婉的批评。他说：“新华社关于商情的报道少，可同人民银行、外贸部合作。外电有关商情的报道要充分利用。例如最近20国财长会议的发言要全文译出来。”这一时期，陈云不但要求外贸部门的同志注意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他自己也身体力行，非常注意研究资本主义。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他特地向银行的人提出了10个问题，希望他们围绕这10个问题帮他搜集资料，供他研究。这10个问题是：

1. 美、日、英、联邦德国、法各国从1969年至1973年的货币发行量多少？外汇储备多少？其中黄金储备多少？

2. 现在世界黄金年产量多少？其中主要产金国的年产量多少？

3. 800亿欧洲美元都分布在哪些国家和地区？

4. 作为经济繁荣、衰退、危机的标志，工业除了钢铁以外，还有哪些行业？美国是包括建筑业的。

从1969年至1973年，美、日、英、联邦德国、法各国的钢铁、机械或其他基本建设投资多少？

5. 美、日、英、联邦德国、法各国度过危机的办法是什么？每次危机间隔时间多少？

6. 美国同英、日、联邦德国、法各国的矛盾，除了政治上的以外，经济上的表现在哪些方面？主要矛盾是什么？

人美国和日、英、法、联邦德国各国在贸易和货币方面存在的问题，估计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

法国财长德斯但是主张把货币和黄金联系起来的。世界上货币总流量和世界上黄金总持有量，是否可以算出一个大致的比例来？

8. 美国1973年对外赤字多少？包括转移、驻军、投资、旅游、贸易等方面。

9. 对世界经济和货币，金融情况的近期和远期的估计。

10. 对外国银行给我们的透支便利的利害估计。

从这些问题看，陈云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是非常认真的。这10个问题到现在也仍然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所必须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事后，根据银行提供的资料，陈云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目前经济危机与一九二九年危机的比较》、《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等笔记。

陈云关于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指示、要求和身体力行的表现，对冲破当时外贸领域里“左”的思想的束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解除了一些干部

的顾虑，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外贸领域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对外开放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

## 当一国“洋奴”

自力更生是延安时期针对敌人的封锁造成的困难，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条生产自救的方针。这一方针在当时对于鼓舞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困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建国以后，自力更生被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条基本方针确立下来。自力更生的原意是鼓舞人民群众依靠本国力量发展经济。它与利用资本主义并不矛盾。

早在 100 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深刻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交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了。列宁也曾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

建国初期，对于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利用资本主义并无疑义。50 年代，在坚持自力更生和主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同时，中国也曾积极开拓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到 1957 年，中国已同世界上 82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并同其中 24 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或议定书。当时，中国同西方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都建立了贸易关系。到 1957 年，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比 1952 年增长了 6 倍多。尽管当时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但中国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从西方国家进口了许多经济建设急需的物资。

60 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当时，日本经济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为了同西欧竞争，大企业集团打算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扩大出口。中国有关部门抓住这一时机，于 1963 年 6 月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打开了西方国家从技术上封锁中国的缺口。随后，又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 9 个国家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成套设备和技术，共 84 项。这一时期为了缓解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中国还通过法国转口，买进了美国的大量小麦。这些在当时都没有引起大的争论。但是，60 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严重歪曲了自力更生的方针。他们攻击引进技术是“崇洋媚外”、“爬行主义”，出口创汇是“出卖资源”、“外汇挂帅”，他们还把按照国际通用的原则做买卖诬蔑为“右倾迁就”、“丧权辱国”、“叫洋人牵着鼻子走”，并集中攻击对外贸易部为“卖国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谈资色变。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交往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等工作受到严重干扰。1973 年，尽管林彪反革命集团已经覆灭，但这种极左路线并未得到纠正。这时，陈云出来抓外贸工作，其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陈云并没有被这种左的势力所压倒，他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明确提出了不要把自力更生与利用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原则。对“左”的思想进行了有利的反击。

当时我国外贸领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能否利用国外信贷资金的问题。70 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许多国家的闲置资金

找不到出路，因此，千方百计试图挤入发展中国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由于“左”的思想的束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迈不开步伐。1973年6月7日，银行的同志在向陈云汇报历年来的资金运用情况时，特地就这一情况进行了汇报。他们说：我们可以从外国银行得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的外汇信贷资金，但是在国内碰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即这样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党的路线，以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即要把国内的一些规矩变动一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利用国外的信贷就行不通。陈云听后立刻明确指出：“你是说一个是不是合法问题，一个是规章制度问题。我看，首先要承认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立一个新的办法，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有条有理，不会和国内冲突的。总之，只要承认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来。”

针对当时“左”的思想的束缚，他还特地指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是不是合法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东西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准不犯错误？”“过去没有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有些同志没有看到，所以要向他们解释这些。”

陈云还从理论上对利用国外资金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说：“这和过去上海、天津那些银行、钱庄一样，看到卯家生意做好了，就找上门来了，无非是要些利润。这就是马克思讲的平均利润率。你信誉好的时候人家找上门，不好的时候就要逼债。”

陈云的这些指示和论述对当时盛行的“左”的思想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击。根据陈三的指示，中国银行在“文革”中、后期开办了对国内企业的外汇贷款业务。尽管数量不大，但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并且摸索了宝贵的经验。

70年代初，能否利用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也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有人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其实，利用国外资源，发展来料加工业，是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曾走过的道路，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当时，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对我国也非常有利。70年代初，国际上的产棉大国是美国，但美国下会大搞棉布出口，因为它当时的工时工资是3.8美元，搞棉布加工不合算。英国是靠纺织工业起家的。但到70年代，英国的工时工资是1.6美元，搞棉布加工也不台算。日本50年代曾大量出口棉布，但当时日本的工时工资也达到了1.9美元。这些国家的工时工资水平都大大高于中国，中国当时的工时工资只有一角外汇人民币。因此，中国棉布的生产成本大大低于这些国家，价格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当时，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也生产棉布，但纺织工业水平不及中国，因此，中国的棉布出口是很有前途的。

根据对上述情况的分析，1973年10月，陈云在听取外贸部副部长陈树福等汇报广州交易会的情况时，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指示。他说：“我们是要依靠自力更生的。但是，现在国内棉花不够……国内棉花要做到自给有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出口，可能要8年、10年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利用就是傻瓜。”“有人怕用外国的棉花靠不住。但计划中打算用的国内棉花，有时也有靠不住的。买到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以从中赚一笔钱。买不到棉花，赚不到这笔钱就是了。买外国棉花

有时靠不住，这事先就要预料到。如果3年或5年中有一年买不到棉花，其他年份能买到，还搞不搞？我看还是要搞。要长期的搞。这样搞是合理的。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

陈云不仅主张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在这次讲话中，他还提出要进口钢材，加工小五金产品出口。他说，“进口1吨好的钢材加工小五金出口，可换回四五吨钢材。搞小五金出口，我们潜力很大。我看要定产品，在京广、陇海、浙赣、胶济等铁路沿线，选好工厂，专门生产。”“这要作为一个方针提出来，从创造外汇的全局着眼来搞。外贸这样做，方向是对的。”

陈云的这些思想与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提出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些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党所接受，但20年前，在“左”的思想横行的年代，提出这样的想法是要有很大勇气的。这也是陈云的一贯风格，看准了的事，就坚决他说、坚决地做，从不顾及个人得失。60年代初，他看准了包产到户能够解决我国农村的困难，虽然明知道提出这样的观点可能受到指责，但他还是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事后他因此事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他并不后悔，这次重新出来工作，他仍然坚持自己的风格。

在有些问题上，陈云同“左”的思想的斗争是针锋相对的。当时“左”的势力打着自力更生的幌子，反对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1973年，在周恩来等同志的主持下，国务院决定从国外进口一套3亿美元的轧钢设备，但“左”的势力从中进行阻挠，他们主张只进口主要设备，不进口附件和相应的原材料。在他们看来，连附件都要进口，破坏了自力更生的原则，是十足的“洋奴”表现。对此，陈云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主张正在订货的那套3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要把有关的附件和原材料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300万吨，2年就是600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产300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有人批评这是‘洋奴’，就让我做一次‘洋奴’。”

正是由于陈云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抗争，“文革”中后期我国在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72年至1977年，中国从西方10几个国家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谈成了包括化肥、化纤、石油、化工、轧钢、采煤、火电、机械制造等方面的222个进口项目。

## 利用资本主义的交易所，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

商场如战场，国际市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因此，要在对外贸易中掌握主动，就必须采取灵活的贸易方式，但“文革”中，由于“左”的思想的束缚，人们思想不解放，不敢采取灵活的贸易方式，从而丧失了许多好的贸易机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1973年至1974年，陈云协助周总理抓外贸时在这个问题上也做了不少工作。

当时对外贸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能否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的问题。1973年4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布置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尽快购买年内到货的原糖47万吨。当时国际市场砂糖求过于供，货源紧张，价格趋涨。五丰行认为，如果我们立即大量购糖，必将刺激价格上涨，可能出了高价不一定能按时买到现货，为了完成购糖任务，五丰行采取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每吨82英镑左右。然后立即向巴西、澳洲、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买现货41万多吨，平均价格89英镑左右，从5月20日开始，市场传说中国购人大量砂糖，纽约、伦敦砂糖市场大幅度涨价，然后，澳洲、巴西先后证实我向其购糖，市价又进一步上涨，至5月22日涨至每吨105英镑。我因购买砂糖现货任务已完成，从5月22日起至6月5日将期货售出，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利润60万英镑外，五丰行还多赚240万英镑。

五丰行当时为了完成任务，破例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但怕违反政策，事后主动向陈云请示。陈云听取汇报后，立即指出：“我们可以利用交易所。”“交易所是有两重性的：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的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的投机性的一面，忽视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因此，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

后来，陈云专门就此事向国务院写了报告，提出：“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陈云的指示和建议，解除了外贸部门工作人员的思想顾虑，提高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从此以后，在中国对外贸易历史上开始出现了期货贸易的方式。中国不但通过交易所买进商品，也通过交易所卖出商品，贱买贵卖，又买又卖，搞活了外贸。

对于对外贸易方式中的其他一些问题，陈云这一时期也有许多论述。例如：关于如何扩大市场的问题，他就指出：“要巩固和扩大西欧市场，千方百计打开美洲和其他市场。”“保持发展高档货，重点发展中低档货”，“要以较低的售价进入新的市场，先进入市场，占稳之后，再按情况逐步提价”，“要充分利用香港德信行和其他商人，要充分利用香港。”等等。

后来，由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对外贸部门的攻击也进一步升级，加之周恩来因病住进医院，陈云在外贸部门的工作不得不停止下来。

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要彻底纠正“左”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但陈云这一时期的这些活动，对于一定范围内，特别是对于外贸领域冲破“左”的束缚，坚持正常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陈云与三中全会前后的调整与改革

1976年10月，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为标志，中国人终于从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当我们睁开朦胧的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时，我们不能不震惊于世界变化之大，不能不痛心于我们被耽误的时间。在世界新一轮科技和经济发展浪潮中，我们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痛心和震惊之余，头脑又开始发热，搞起了一轮新的“跃进”。这次跃进，同五六十年代的“大跃进”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求快之外，加上了求洋，企图从国际市场上买进一个现代化。其结果，使被“文革”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中国的经济建设，又一次面临关键时刻。



## 多年不鸣，一鸣惊人。两次关键时刻的发言， 都起了关键的作用

1977年3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到半年，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在揭批“四人帮”方面有些积极作用外，总的说来，是华国锋继续推行“左”的指导方针的一次会议。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先是要求“继续批邓”，以后又一再重申1976年清明纪念周总理的群众运动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会上，华国锋宣扬“两个凡是”，极力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党内“左”的思潮仍然强大，党的新的领导人华国锋继续坚持“左”的一套，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没有能尽快恢复正常。在这么重要的党的会议上，他不是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领导开创新局面，却大搞“两个凡是”，如果不打破这种局面，国家前途堪虞。

这个时候，正需要一个人出来打破政治上的沉寂。但由于党的最高领导人已经公开表明了态度，对这一问题表示异议，其政治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种情况下，陈三站了出来。

1962年以后，陈云因病经中央批准长期治疗休养。在1962年的北戴河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云因为主张包产到户和主张实事求是分析形势恢复经济等正确的经济主张，被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而受到不点名的批评，在党内一直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受到冲击，在党内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名义。1972年以后曾一度受周恩来委托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对外贸易问题。1975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多年来一直被排斥在中央核心领导集体之外。这位党的老资格的领导人在政治上保持了沉默。

现在，国家处在能否促进形势进一步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关键关头，陈云打破了沉默。

陈云以中央委员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陈云从全党、全国的利益出发，并同王震等商量，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书面发言，郑重地提出恢复邓小平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意见。

陈云明确表示：天安门事件，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尤其是关心周恩来逝世以后党的接班人是谁，而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并且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这一点，是对华国锋“两个凡是”论调的公开挑战。因为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划了圈的，华国锋又一再重申过，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个问题可以提出，那么过去的其他事件，即使是毛泽东划过圈的，也可以重新认识。

另一件事，就是公开提出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陈云与邓小平都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邓小平对极“左”路线的抵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是党内公认的，毛泽东说他“人才难得”。“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被诬蔑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被打倒。

“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一度复出，领导了全面的整顿工作，开始系统纠正“左”的错误，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新气象。但他领导的整顿工作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做法实际上完全否定，当时毛泽东有意让他主持制定为“文化大革命”歌功颂德的评价性决议，他委婉地谢绝了，说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实际上表明了对“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异议，为毛泽东所不容。

毛泽东发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中断整顿进程。1976年更错误地以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有关而撤销了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这次陈云提出，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复出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陈云提出让邓小平复出，继续领导纠正“左”的错误，反映了全党的心声。

陈云的这篇书面发言，尽管受到华国锋、汪东兴的压制，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但却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忌，为思想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吹响了号角。

在党内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华国锋被迫同意让邓小平复出。4个月后，1977年7月16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复出以后不负众望，领导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工作，开创了新局面。

鉴于陈云在党内的崇高威望，以及党内公认的领导经济工作的卓越才能，党的十一大前后，邓小平、李先念多次提出要补选陈云进政治局，但未能如愿。当时极“左”思潮还有很大影响，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全面正常化还有很大影响，使党的工作、国家建设和社会生活在徘徊中发展。显然，不解决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等关系安定团结的问题，党的工作局面还不能顺利发展。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10日，这次会议一开始，华国锋在开幕会上宣布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如何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和《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会前的提议决定要讨论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一些老干部提出，与此相适应，还应当解决历史上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作了两次重要发言。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题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的发言，指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

接着，陈云话锋一转，提出了会议原定议题之外的一件重大事情。他说：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广的问题，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陈云公开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

陈三指出，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1936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薄一波等一批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党员，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即办所谓自首手续。或填写一般的反共自愿书，争取出狱。薄一波等人出狱后，对开展华北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革命胜利10多年后，来了一场颠倒是非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3月，这批忠贞的共产党人，竟会被诬为“叛徒集团”而横遭迫害。

陈云本着对党负责，对干部负责的态度，率先提出他们不是叛徒，要求中央予以考虑决定。

经过组织部门的努力，12月16日，中央就为这个冤案进行了平反。

第二，进一步提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决定是党的决定。

1937年12月，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就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对抗战时期的组织工作，十分熟悉。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为了适应党的工作迅速发展的形势，当时迫切需要大批干部，中央组织部在1937年7月7日作出决定，对经过党组织允许，履行过敌人出狱手续的党员恢复组织，未经党组织允许而履行出狱手续的党员，经过工作考察以后，也可以恢复组织。

陈云当组织部长时，虽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但针对延安整风中审干遇到的问题，1941年也写过一个类似的决定，经过中央批准发布，对纠正延安审干工作的偏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叛徒”帽子满天飞，只要在过去复杂的革命战争年代被捕过，就摆脱不掉“历史问题”的阴影。一些在反动派监狱里坚贞不屈、横遭摧残的党员，在革命胜利后，竟被打成叛徒，重受牢狱之灾。

陈云对此十分痛心。他提出，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卡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陈云还提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我边缘地带有一个所谓“两面政权”问题。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掩护我军的工作。这些党员在“文革”中也大多数被定为叛徒，这是一个涉及数量更大的党员的政治生命问题，也应该由党组织复查，对并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

第三，陶铸、王鹤寿等一批干部的问题。

陶铸、王鹤寿等一批党员，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抗战后才由党向国民党要回来。这样坚定的党员，“文化大革命”

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组织生活，但仍留着如“有严重政治错误”之类的尾巴。

陈云提出要解决他们的问题。

陈云对当时审查干部仍保留“文化大革命”中专案组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要求把中央专案组材料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结束现在既有组织部又有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

中央迅即采纳了这个意见，使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大大加快。

第四，彭德怀的问题。

彭德怀是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因为实事求是地指出“大跃进”的错误、要求采取措施改正，而被打成反党集团之首的。这件事与毛泽东关系很大，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陈云提出，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没有开除出党，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第五，天安门事件问题。

陈云在“文化大革命”后不久就提出要为 1976 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受到压制。这一次，陈云再次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求中央肯定这次运动。

11 月 14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各地也先后为与此有关人员平反。

第六，康生问题。

“文化大革命”时，康生是中央文革顾问。他那时候呼风唤雨，随便点领导干部的名，煽动红卫兵和造反组织去揪斗、打倒，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负有重大责任。

陈云指出，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中央应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曾说过，康生是鬼不是人。他对康生这种见风使舵，不讲原则、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牺牲革命利益以向上爬的小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解决安定团结问题，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不能有效地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全心全意投身“四化”建设的热情。陈云的发言，实际上是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在此之前的“左”的错误的重大问题。这一系列影响大，涉及面广的政治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使拨乱反正工作大大推进一步，并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作了准备，因而理所当然地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和响应，使会议冲破华国锋规定的框框，在畅所欲言的气氛下活跃起来。

胡耀邦、万里、聂荣臻、康克清等在发言中，一致表示，赞成把尚未解决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完全同意陈三提出的六点意见。并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根据会议的这种发展状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以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这样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11 月 25 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革”中和“文革”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并决定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几个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康生、谢富治问题的揭发材料交中央组织部审理。与会者高度评价真理标准的讨论，对华国锋、汪东兴等工作中的失误问题和恢复党的优良传统问题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

12 月 10 日，陈云在东北组会议上再次发言，就经济问题发表了 5 点意见。

陈云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要坚持实事求是，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

事实，这是关键问题。方法是全面、比较、反复。

针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陈云提出：

第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 2000 万吨粮食，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

陈云指出，建国快 30 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7 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

那时候，有人还在囿于极左思维，说什么“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陈云认为不能这么说。他举例说，1961 年庐山会议时期，他就请示过毛主席，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主席说可以。现在有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

陈云说，粮食进口多一些不要紧，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如果感到粮食进口多了，下一年少进一点就是了。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他认为，这是大计，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第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能窝工。

这一条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洋跃进”。那时候，一些干部为了求快，只看外面时机有利，不看自己的情况，盲目进口，造成很大的积压和浪费。

陈云提醒大家要清醒看待内外条件。他说，我们的起点，是 3000 万吨钢。但是，不能光看钢铁这个指标。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这两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比解放初期有很大进步，但同日德英法比还是落后的。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从正确看待内外条件出发，陈云主张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他说，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项目排队，如有所失，容易补上，窝工，就难办了。

第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从 50 年代以来，在中央的地方分权中曾经几收几放，结果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一直处理不好。“文革”后，中央集权很厉害，地方没有多少机动性。

陈云提出，给各省真正的财力不能有名无实。要信任各省市领导同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高级领导干部，我想他们不致把钱乱花掉。

第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

陈云向来主张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文革”后洋跃进，建设规模膨胀很厉害。陈云提出，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现在采购员东奔西跑，就是由此而来的。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

第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

陈云对旅游业很早就感兴趣。1957 年，陈云到上海，当时上海锦江饭店经理宣铎向陈云建议开放外轮船员和乘客来华旅游以赚取外汇，陈云当时很重视，把宣铎的建议书亲自转交给了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国务院秘书长

齐燕铭。

在这次讲话中，陈云提出，国家旅游局计划 1983 年接待 300 万人次可以收入 30 亿美元。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旅游项目必须统筹安排，要同引进重要项目一样对待。但是又不要看得太容易，有大量工作要做。现在的旅游事业，是行政管理，还不是业务管理。

陈云说，旅游收入，比外贸出口收入要来得快，来得多。英伦三岛每年收入 54 亿美元，我们中国这样大，可以收入更多。旅游收入实际是“风景出口”，而是可以年年有收入，一年比一年多。

陈云对当时一些人的顾虑作了分析，指出，反过来想一想，有无害处？有。例如，其一，外国会派特务来侦察。陈云认为那时候已经有特务来侦察我们，只是小开口、大开口的问题。其二，可以有意志薄弱的人被收买。陈云提出，这个问题只要我们注意就行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其三，外国人看到了我们的落后情况。陈云认为不要紧，我们本来并不先进，而且外国人早就知道。

对于陈云这些意见，邓小平完全赞成。

陈云两次发言，从政治和经济这两个主要方面，对促使粉碎“四人帮”以后良好局面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王震第一个提议，补选陈云为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副主席。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问题和现在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再次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他提出要发扬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他提出要贯彻有错必纠的原则处理遗留问题，这是为了向前看，是解放思想和安定团结的需要，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提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体制、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会议闭幕两天后，各组又讨论了两天。

12 月 18 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于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会议为天安门事件、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案件平反，确定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 1971 至 1975 年一定 5 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允许购过头粮。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重新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核心。

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解决了党从1957年以来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真正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同李先念联名上书：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必须进行调整！邓小平和李先念请陈云再次出掌经济工作**

我国国民经济经过十年动乱，处于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许多同志急干早日恢复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尽快赶上世界发展水平，却忽视了现实的客观条件，纷纷要求“大于快上”。

1978年2月26日到3月5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年规划纲要》提出，从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全国基建投资竟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当时省事的说法是要搞10个鞍钢、10个大庆。1978年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项目，初步估计，把这些项目全部建成，大约需要600亿人民币，其中光宝钢1项就200亿。

一个身染沉疴的病人，本来就虚弱得很，再给下上一贴虎狼药，其情可知。“洋跃进”就是如此，它大大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和财政困难的严重情况。

1979年2月17日，为了打击越南的侵略气焰，惩罚其对中国的挑衅，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完全正当的。但是，战争是很花钱的，这次作战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开销对财政仍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三中全会后，国务院讨论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时，感到问题很多，难以确定下来。邓小平同当时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财经委员会，请陈云出来当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

李先念从50年代以来一直在财经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他对陈云是很佩服的。常常对人说：“我一生有两个教师，一个是徐帅，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教会我管经济。”他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并且主动说，他给陈云当助手，任副主任。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提议。

197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大事的决策机关。财经委员会组成人员是：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共12人，几乎都是建国后财经部门的领导人，陈云担任了财经委员会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任秘书长。这个决定，7月1日交由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陈云还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3月14日，陈云同李先念商讨了财经工作以后，两人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对财经工作的几点意见：

第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第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速度。

第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第四，要有两三年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第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的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5至7年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

第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总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这封信根据按比例发展经济的要求，指出了当时经济形势不稳的根源在于比例失调，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进行经济调整。这样，实际上是提出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施政方针。

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陈云在会议上根据他和李先念商定的几点意见，更具体地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最好3年，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陈云提出调整，主要是根据他对于国情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按比例发展经济的理解。

建国以后经济工作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急躁冒进，不顾国家财力物力的情况。陈云在这个讲话中说，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不搞清楚这一点，什么事情也搞不好。这个“实事”就是，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

陈云提出，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搞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样的现实情况，就是我们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中国跟外国的情况，在这一点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陈云不客气地批评说，许多办工业、办商业的同志不大考虑这个问题。

按比例发展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这种论述本来是很明白的。陈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深有感触。他明确地说，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

过去的所谓快，大多数时候是钢铁单兵突进。陈云多次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异议，也多次因此遭到不公正的批评。一些人甚至形成了一种错误印象，觉得陈云似乎专门主张少搞点钢。陈云说：“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

他说，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

那时候，冶金部提出引进设想，想靠引进克服国内技术、设备、原材料的限制，发展钢铁工业，表现出一幅典型的“洋跃进”架势。

陈云没有指责他们，只是说，这个设想他看了，冶金部也是好心，想要多搞，可以理解。冶金部一是把问题看简单了，二是看孤立了。

想靠借钱买一个现代化，陈云说，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他讲，旧社会，我在上海呆过，钱庄、银行贷款，要经过好多调查，确有偿还能力，才借给你。现在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外国商人说借钱给你，有真有假，这件事也不要看得太简单。

他在别的场合也曾讲过，资本家贷款，总是你生意好的时候他找上门，你生意不好的时候人家就要逼债，这是“大晴天借伞”的买卖。

陈云辽分析说，借外国人的钱，把钢铁的发展都包下来，把冶金机械制造也包下来，所有借款都要由人民银行担保，究竟需要多少钱，没有很好计算。那么大的引进，国内要多少投资，也没有计算。你一家把投资占了，别人怎么办？冶金部提出不拖别人的后腿，实际上不可能，搞那么大的建设规模，那么高的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

陈云根据国情和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明确指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用两三年，最好是3年的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对比例失调发生的原因，陈云主要讲了两条：

一是当时基本建设规模太大，光大的项目上了1700多个，小的几万个。

还有个原因就是还“文化大革命”的欠帐。

“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结果，只管上项目，不管配套不配套，“骨头”和“肉”，“骨头”搞起来了，“肉”欠了帐。

陈云说，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重点企业、城镇工业、社办工业，各方面都大体安置下来。

陈云主张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要丢掉一批，勉强搞起来，没有燃料、动力，没有原料、材料，还是白搞。

陈云同意当时余秋里等人的意见，要让先进企业“吃饱”，地方工业、社办工业，如果同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也要下来。搞“三个人饭五个人吃”，不能持久。

另一方面他考虑到国家的具体情况，不主张搞“一刀切”。他认为，我们国家，先进的企业、落后的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有人就要闹事。

当时，根据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有关部门正在商讨2000年的钢产量指标。冶金部想通过大规模引进，搞快一点。

陈三主张要看实际，说那时能够达到8000万吨就不错了。他诙谐地说，我这个话大有“机会主义”的味道。问题是，1985年搞到6000万吨钢根本做不到。我说2000年搞到8000万吨钢，是冒叫一声，但也有点根据。因为平均每年增加200万吨，或者多一点，就不算少。如果将来超过8000万吨，或者超过很多，阿弥陀佛！如果达不到，稍微少一点我也满意。我不光看你那个数目字，钢要好钢，品种要全。

由于陈云建国后长期领导财经工作，他在这方面的才能是党内外公认的，在国际上都有影响。但陈云并没有因此而飘飘然，忘乎所以。他深知经济工作的复杂艰难。

在这次会上他提出，要他当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他认为自己承担这样的工作，体力上完全不行。那时陈云虽然经过长期休养，身体状况有好转。但仍很虚弱，每周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另一方面，他自谦自己经验还很有限，说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

他还坦诚地为过去经济工作的一些决策承担了责任，说：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156项中，三门峡工程是经过我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我要有自知之明。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

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陈云讲话后，邓小平发言，表示完全支持陈云有关经济工作的意见；他说，中心的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一个大方针、大政策。这次调整，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很大的决心是搞不成的。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能够干成。这次提3年调整非常好。邓小平还说，陈云提出2000年搞8000万吨钢有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了该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钢多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精密的东西多，用的材料就少。钢铁工业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把钢的指标压下来，把包袱卸下来，就可以有力量去搞别的东西了。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搞得好，8000万吨钢，并不一定比2亿吨质量差，品种、规格少的钢的作用小。

1979年3月25日，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陈云走马上任，主持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的第一次会议。12个委员，除了王震请假，都到了。

陈云在这次会上，对财经委员会的工作讲了几点意见：

第一点，协力同心，相互合作。

陈云说，财经工作问题很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老百姓的吃饭、穿衣等等，多种多样的问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怎么处理法，意见会有不同，但只不过是意见不同罢了。我看意见不同也是好事情，那怕争得面红耳赤也是可以的。辩论总可以搞清楚一些问题，经过比较，就可以看出哪一种意见好，取得一致看法，没有比较，不好。

第二点，调整，搞四个现代化。

陈云说，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第三点，要参加4月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文化大革命”后，问题一大堆。三年困难时期下乡的城镇人口要求回去，“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要求返城就业，一些城市还发生游行和冲击政府机关的事情，闹得很厉害。冤假错案平反的人要退赔、补发工资，城市人口要求改善多年积累下来的住房困难问题，两地分居的人要求团聚，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政治局势的稳定。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要讨论面临的经济问题。

陈云说，这次工作会议，我估计问题很多，一个星期开得完吗？各部有各部的意见，地方有地方的意见，要发扬经济民主，让大家讲，听就是了。我看有很多实际问题，这次会议至少要理出几个重要的问题来。比如，2000万人的就业问题。这回调整和60年代初期的调整下一样，那时可以下放人员，这次不能下放。在农场劳动的知识青年，有的地方一个月32元，44元，比农民高得多了。他们都要回城市，回到父母身边，大体上办不到，要说服教育。请愿，冲办公室，不行。要有民主，还要守法。民主是必须的，守法也是必须的。没有这两条，我们一事无成。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要不要讨论民主和法制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一个外国人说，中国的“民主墙”问题是次要的，真正的问题是农民问题。现在有些农民还吃不饱饭，再过一二十年，若还是这个样子，那时支部书记会带领农民进城要饭吃。延安时期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你说不准要饭，他说共产党没讲过不准要饭，毛主席说过不准要饭吗？中央工作会议可能要争论一些问题。安排2000万人就业，增加城市人口居住面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等等，

这些属于还欠帐。城市建设经费过去是 1.5%，后来不到 1%。

第四点，找一些较年轻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

财经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建国以后在综合机关做财经工作的，虽然经济工作的经验很丰富，但他们此时最年轻的也有 62 岁了，大一点的已经 70 多岁。陈云感到，要领导全国的经济调整工作，这种状况是有问题的。

陈云说，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 48 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子，无非是向“八宝山”开快车就是了。

陈云要求找来的年轻干部要有一点工作经验，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而是在当“后排议员”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他还说，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第五点，要注意粮食。

始终关注粮食问题，这是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特点。对于一个拥有近 10 亿人口的大国，粮食问题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也是关系重大的政治问题。

陈云强调，粮食一定要有人管，这是周总理早已定了的。我看这个问题要注意。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要进口一些粮食。一方面地方不要靠中央，一方面中央手里还要抓一点粮食。

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筹划、组织，明确了方针，组建了机构，陈云又一次领导了大规模的卓有成效的经济调整。

## 宝钢匆促上马，进也难，退也难。陈云亲自 调查，思之再三才拍板：干到底

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以后，着手纠正 1978 年经济工作发生的冒进错误，决定全面调整比例失调相当严重的国民经济，把理顺各种比例关系作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这一次调整，是步伐的调整，压缩基建规模仍是突出问题。为此，只压缩一些小项目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涉及当时引进的一些重点大项目，如宝钢，4 个石油化工的 30 万吨乙烯工程等。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是外资大量涌入。能否处理好这个问题，对调整和对外开放都有重要意义。

由于外资大量涌入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经历过的新情况，很多人被这股洋风吹得头脑有点不清醒。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

1978 年 7 月 6 日至 9 月 9 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四化建设的问题。

7 月 31 日，陈云看了会议重要发言，向主持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和谷牧建议，务虚会多开几天，专门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可是当时很多人都一味想快，在当时气氛下，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会议最后决定放手利用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宝钢等一批项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匆忙决定上马的。

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到国内资金、技术和设备的配套能力，使得这次大规模引进浪潮的效益很不理想。

受中央委托，陈云亲自抓了宝钢问题。

1977 年 11 月，日本新日钢铁公司董事长、日本现代钢铁业的创始人，有日本“钢铁帝王”之称的稻山嘉宽先生来华访问。

稻山先生很早就同新中国有着贸易往来。1958 年 2 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他就同中国方面签订了一个为期 5 年的钢铁贸易协定，双方出口总额各为一亿英镑。这个协议在当时是一宗大规模交易，对日本和国际上都有很大影响。为此稻山嘉宽曾来华访问，周恩来总理还曾亲自接见他。

这次他来华访问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他探讨了由他协助在中国沿海地区建造大型钢厂的设想——这就是创建上海宝山钢铁厂的最初动议。双方几经协商，达成了近 20 亿美元的合同意向。国内有关部门概算的总投资是 200 亿元人民币。以当时全国人口计，平均每人要为宝钢分摊 20 元。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超级引进项目。

1978 年 10 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在稻山嘉宽陪同下，参观了新日钢铁公司君津钢铁厂，进一步落实这一合作项目。

参观中，邓小平表示希望日本方面帮助搞的钢铁厂能比现代化的君津钢铁厂更好，稻山同意了。对邓小平关心的投资额问题，稻山主要从他在日本建厂的经验出发，估算为每吨 10 万日元。实际上稻山的估算对于中国来说偏低了。在日本，新建一个钢铁厂一般不需要再配套建设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后来在建设过程中，投资远远超出了稻山的估计，中方感到资金负担太重。1979 年 4 月以后中国开始调整经济，邓小平为此对稻山说：“宝钢由于调整会拖延一段的，我说过用现金支付欠款的，但现在看来做不到了。”稻山说：“就让宝钢采取日中长期贸易协定的那种延期

付款方式吧。”对于这件事，稻山一直非常内疚，觉得自己作为该项目日方负责人，不应该轻率地作出这种估计，以致给中国造成了一系列困难。

1978年12月22日，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和新日钢铁公司在上海签订了关于订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12月23日，宝山钢铁总厂正式开工建设，预定分两期、用7年时间建成。

宝钢投资规模巨大，对国民经济全局影响甚巨。而且，很多当初没有全面考虑的问题，开工后都暴露出来。公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建钢铁厂需要新建配套；华东电力、用水本来就紧张，再加上一个宝钢就更困难；上海地质条件也是个问题，光打地基就要花不少钱，有人形容是用钞票一寸一寸垒起来的，等等。人们议论纷纷。

显然，宝钢问题，是关系调整能否真正落实的关键。陈云对此非常重视，决心亲自处理这个问题。

陈云从1979年4月底5月初开始着手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那时，宝钢建设已经上马，而国内又议论纷纷，处于“骑虎难下”状况。

宝钢建设，已经同外商订了合同，日本方面行动很迅速，按照协定准备了材料，组织生产，大批引进设备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由于风闻中国即将全面开始经济调整，外国厂商担心影响自己的利益，更是加速向中国抢运设备，货物已按协议交付，中国方面就不好说不收、不建了。已经订了合同，如果不履约，外商是要索赔的。那样的损失相当大，也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声望和信誉，对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十分不利。

在国内，宝钢从1978年破土动工以来，建设工程已全面展开，高炉、焦炉、转炉和电站等主体工程基础桩都已打完，现场施工队伍已经集结了四五万人，一下子也难以停顿下来。

但是，如果宝钢照原计划建设，调整方针就会落空，进口设备要占用大量外汇，还需要有相应的国内配套设备和材料、资金，大体上是一美元需要一元人民币的物资和资金来配套，根据当时的财力物力，无论如何是配不起的。

当时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说要全部下马，有的说可以部分下马，还有说下马损失太多受不了。有的说已经进口的设备先放起来，形势好转了再说，有的却说与其保存在仓库里，倒不如把它安装起来，哪怕不能开工也行。众说纷坛，谁都占理。这个决心不好下。

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讲，他不反对借外债，建设新工厂，买外国新设备，但必须循序渐进。现在调整重担落在他的肩上，他就把这个意见具体贯彻到经济建设中。

1979年3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发表讲话，对当时冶金部提出的大规模引进设想提出异议，并说，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有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快，有美国的特殊照顾。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陈云看了宝钢上马的一些材料，又把宝钢建设规划与鞍山钢铁公司的情况

况做了一些对比，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宝钢工程的一、二期建设，可以适当拉开间距。

陈云认为，鞍钢 1901 年开始建设，日本人搞了 40 多年，建国后搞了 30 多年，前后 70 年，才搞到 600 万吨；宝钢同鞍钢规模相当，用 7 年时间建成，虽说有几十年建设经验，毕竟有些工作还有困难，这是大事，不能含糊。

他还担心，匆匆忙忙搞突击，一些问题来不及处理，积累下来，等完工了，出不来钢铁，那就不好办。对外国设备，陈云并不迷信，他认为，外国设备也是有问题的，要注意。

在一段时间里，建设周期问题是陈云考虑的主要问题。

5 月 9 日，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外贸部、一机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和国务院提交报告，主张：主体设备引进，当然也买技术和专利，但为了增加国内自制设备的能力，将 3 套轧机改为同外商合作制造。二号高炉及三、四号焦炉等大大增加国内分交的比重。把原计划 1981 年底建成一号高炉系统、1983 年底全部建成的进度，予以调整、推迟，不要操之过急。

5 月 11 日，陈云看了这个文件，对其中的建议作了认真的思考。

其后不久，陈云要薄一波代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多年搞财经工作特别是冶金工作的七八个人开了两次会议，这些人是姚依林、薄一波、王鹤寿、吕东、沈鸿、柴树藩等。他们经过讨论，也赞成陈云的意见，认为可以把建设周期拉得长一些。另一方面，主张立足国内，多分交一些设备，锻炼自己的机械制造能力，只进口关键设备，以便发展国内机械工业。

陈云很重视这个意见，觉得有道理。

不久，中央经过讨论，下了决心，要把宝钢工程搞到底。如何把这项国内外瞩目的重大工程安排好，而又不影响到调整方针的贯彻，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5 月 31 日，陈云为了取得第一手的资料，亲自赴上海，进行调查研究。

到上海后，陈云对前一段考虑的结果进行了反复思考，又有了新的想法。

他觉得，立足国内，当然符合自力更生的建设方向，但是搞大型现代化钢铁企业，国内实在缺少必要的经验，冶金部、一机部的能力令人担心。国内机械制造能力，集中力量搞一些项目，有过成功经验，但宝钢关系太大，不能拿来练兵，还是立足国外比较保险。技术资料也要全套买下来。

6 月 1 日，陈云与上海和宝钢方面的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这个想法。他们也主张设备全部进口。

在上海，陈云多方征求对宝钢建设的意见，并摆出自己的想法，鼓励大家提出各自的见解。他在上海召集上海钢铁一厂、三厂、五厂和冶金局的人士座谈对宝钢建设的意见，他们表示对这些情况了解不多，陈云就要求有关部门多通气，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过于强调保密问题，不让别人接触。

6 月 6 日，陈云结束在上海的调查，回到北京。从全盘考虑，他最终决定还是按有关部门的意见，设备要进口，也要有一部分在国内分交。技术资料要全部买下来。

一个半月之内，陈云集中考虑宝钢建设方针，三度反复，才最终拍板定案。

6 月 16 日，陈云在中南海主持召开财经委员会会议，讨论宝钢问题。在会上，他根据一段时间来的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的结果，提出了八点意见：

一、干到底。这是先念同志也讲过的，举棋不定不好。

二、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掉。是否还有没想到的，预先预料到比事后追加要好。外部协作条件，如煤、电、运输、码头、机电等等，都要考虑周到。

三、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专利。

四、要提前练兵。宝钢技术先进，各方面都要求很高，一定要抓好技术练兵，以保证产品质量，并可在国内推广先进技术。

五、由建委抓总。负责人第一是谷牧，第二是韩光，冶金部有叶志强，上海市是陈锦华。

六、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宝钢是四化建设中第一个大项目，一定要作出榜样来。

七、冶金部有带动其他各部的责任。冶金部是重工业各部中一个重要部门，特别是壮大一机部机械制造能力，是冶金部应有的责任，冶金部应有这样的全局观点，各有关部门像煤、电、铁路、水运、一机部等，都必须同心协力，把宝钢的事情办好。

八、冶金部要组织全体干部对宝钢问题展开一次讨论，采纳有益的意见。对不同意见，也要听取，目的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要组织全国的冶金建设专家，讨论宝钢，让他们过问、接触、关心这件事情。宝钢是个新的现代化水平的工厂，外国专家要请，但最后还要靠我们的现有专家，把经验提高起来。

会议一致同意陈云的意见。会后，主要根据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形成了中财委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中央的报告，9月经陈云、李先念批准，上报中央，中央常委圈阅同意，宝钢建设在总体上即按照报告精神贯彻执行。

根据陈三的意见，宝钢一期工程继续干下去，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对外已签的合同按合同进行赔偿，已进口的设备得到妥善保管。宝钢一期工程于1985年9月建成投产，一年后各项指标就达到和超过了设计水平。工程质量全优，获国家金牌。一期工程建成后产生巨大效益，为二期工程提供了资金，整个宝钢的工程技术达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际水平。二期工程的连铸、热轧、冻轧系统主体设备技术已达到8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水平。宝钢的一些关键性技术经济指标如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能耗、环保等等，在国内都居于前列，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另外，主钢引进的技术、现代化管理方法，经消化、创新，已在全国冶金系统逐步推广。宝钢建设对机电、交通、煤炭等行业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实践证明，建设宝钢的决策是正确的，党中央、国务院对主钢建设的领导是强有力的。

1986年5月18日，陈云以八旬高龄亲自视察了宝钢，除听取宝钢负责人的汇报外，还视察了炼钢厂、原料码头、焦化厂、炼铁厂和初轧厂，亲自看了出焦和出钢，他对我国以较快速度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钢铁企业，由衷地表示高兴。

宝钢问题定案以后，对1978年确定的120项大工程，也就有了调整的具体蓝图，克服了一段时间内头绪众多、无处下手的毛病，为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陈云并未把宝钢问题局限于一时一事上，而是抓住典型进行深入分析，为纠正“洋跃进”的错误，贯彻调整方针提供指导。

1979年9月18日，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的汇报会上，根据处理宝钢问题的经验，提出：我们建设像宝钢、平果铝矿、三峡水电站（是否



能建成还需收集各方面意见)等那样大的工程,在第六个和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每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计算大体上只能建成一个。

陈云分析说,这些大建设项目,每个投资都在 200 亿元人民币上下,5 年平均,每年 40 亿元上下,我们的财力物力是能够胜任的,是能够建设好的。但是,如果 5 年不是建成一个,而是要建成好几个,甚至于要求一年建成一个,这显然是办不到的。我们今年的全部财政基建拨款,照财政部计算,只有 170 亿元。如果要一年建成一个宝钢这样的大项目,那就占了我们一年多的全部基建投资的金额;如果同时要建成两个三个,非但所要建的大项目建不成,而且把其他的必需资金全部都挤光了还不够。

他还说,即使我们能借到一些外国的买方信贷,但自己配套的那一部分投资也要占到接近一半。不错,每年财政收入都会增加,基建拨款也会按比例增加,但是非大项目的其他基建所需要的支出也会增加,例如:轻工、国防、交通、学校、城市建设等等也会要求按比例增加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必要的思想准备。大家应该斟酌这件大事。

陈云据此提出,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用这个办法来进行基本建设,充分利用现有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技术改造,这是脚踏实地地前进。表面上看来像慢,但实际上是快。照顾到各方面协调地前进,这个前进是可靠的,若干年后在工业交通内部和其他各方面都可以按比例地发展。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

## 陈云预言：今后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计划 经济和市场调节两种经济的比例调整将占重要 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陈云在领导经济调整的同时，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也予以了极大关注。

三中全会后，陈云担任了中纪委书记，但他仍然一直在思考，如何系统地从事体制上和指导思想上的改变，改变过去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陈云是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也是党内较早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作用的领导人之一。

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共八大会议发言时，谈了在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迅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存在着若干不可忽视的弊端，指出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既坚持计划经济，又把经济搞活。

陈云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设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

陈云的这个设想，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突破苏联模式的一种新的构想，可惜，“左”的指导思想使这个正确构想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被忽视了。

多年来，经济工作中一再出现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而且为害时间长、破坏性极大。这和我们的指导思想上和体制上的失误和弊端是分不开的。陈云总结建国以来工作的经验教训，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1979年3月8日，陈云把自己思考的一些结论写成了提纲。由于三中全会以后，各方面工作头绪太多，陈云身体仍不太好，使他感到一时难有太多精力来把这份提纲形成完整的文章，后来就把这份提纲交给秘书保存起来。

但是这份提纲实际上已经反映了他对当时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些核心问题的思考。秘书看到这份提纲后，建议发表。这份提纲即是后来《陈云文选》上的《计划与市场问题》。

这份提纲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后提出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60年来，苏联和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马克思这个理论来办事的。

陈云指出，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根据已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的原理加以发展，导致了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要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

这样一来，由于计划管得太死，又缺少市场调节，就造成很大弊端。由于计划事务繁杂，常常是“五年计划，计划五年”。即使这样，计划还常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调度。计划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

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日用品十分单调。

这个缺点，后来被概括为“统得过多、过死”。为克服这方面的缺点，陈云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即有计划按比例部分；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已掌握了国民经济的计划经济部分，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调节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当然必须基本上是无害的。

陈云分析说，国民经济中有市场盲目调节的成份存在，并不能说就不是社会主义。我国解放初期，国家只掌握了国民经济中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存在，但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

忽视市场调节的一个后果是，国民经济中必须按比例发展的，没有能够真正按比例发展，比如基本建设战线太长，电力、运输等先行部门没有先行反而落后，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失调，钢铁工业内部比例关系失调，各工业部门之间比例失调，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另一方面，应该适当扩大市场调节的方面又管得太死，比如计划权力大集中，农业的非计划部分大紧太死，地方财力热心建设，真正机动的太少。

忽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经济工作中忽视价值规律，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经济工作中对我国社会经济的特点要有深刻的认识，这个特点就是农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现在这一点在认识上有盲目性，如果不纠正，必然碰壁，而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计划比例关系原则。

陈云预计，在今后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中，实际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重要地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陈云的这个预计是很准确的。改革中，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探索，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后来，陈云把这一思想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82年12月2日，陈云同出席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谈话时，把计划和市场关系又比喻为“鸟”和“笼子”的关系。

陈云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工作中扩大市场作用，尊重价值规律而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现在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群众把票子拿在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以来没有见过。今后还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经济工作中，要有时间观念，要有利润观念。否则，就是大少爷办企业，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他也提醒说，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们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

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下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的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1985年9月，陈云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发言说，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

陈云的这些观点，对在当时条件下解放思想，改革经济体制，重视市场调节，以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起了积极作用。我们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到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在前人的探索基础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1979年3月，担任国务院财政委员会主任以后，陈云这一思想也进一步落到了实处。他提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现在要进行研究，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怎么改。

当时时委的分工，要张劲夫组织一些人员草拟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财委于7月份决定成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下设办公室，专职参加此项工作的有廖季立、柳随年、季孟飞、徐景安等。

1979年12月3日，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当时他们感到这个稿子还不成熟，没有提到财经委员会审议。邓小平听说有这么一个素材性的稿子，指示说：可以披头散发和大家见面征求意见嘛。这样，张劲夫就在国务院全国计划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体制调查小组人员会议上，于1979年12月15日，对这个意见作了说明。大家的意见是，基本思路对头，具体方案还不成熟，因此当时未定下来。在酝酿此事前后，有些省市即主动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为以后中央正式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陈云在就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时已经表示过，自己身体不行，难以承担全盘领导经济工作的重任。大量繁重的工作，严重损害了陈云本来就虚弱的身体，宝钢调查后不久，他就大病了一场。虽然大家都希望他全面主持经济工作，但他从大局出发，主张让更年轻的人上来。

1979年10月，陈云在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讲话，主动提出，为了党的利益，建议中央调比较接触实际、比较年轻一些的干部，到中央来搞财经工作，这是国家的大计。如果不采取这样的组织措施，自己身体不行，工作搞不动。中央认真考虑了陈云的意见。

1980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继续贯彻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的政策。

陈云积极支持和配合新的财经领导机构工作，并为调整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1981年，陈云热情地赞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和工商业及财政计划等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其意义不下于50年代消灭剥削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